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

第八辑

*Information und Forschung über
deutschsprachige Länder*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 编

顾 问 梅兆荣 顾俊礼
主 编 殷桐生 刘立群
副 主 编 姚晓舟 姚 燕 吴 江
执行编辑 包葛耿 周海霞
德语编辑 李 克 (Patrick Kühne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目 录

采访精撷

- 中国驻瑞士新大使耿文兵先生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 3

新闻鸟瞰

- 外交新闻····· 于 芳 9
 经济新闻····· 徐丽莉 16
 媒体新闻····· 周海霞 20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 史笑艳 24

热词诠释

- Kreativwirtschaft 和 Gamification ····· 徐四季 31
 Big Data 和 Smart Data ····· 关海霞 34

政治舞台

- 2017 年德国大选前瞻····· 吴 江 39
 德国联邦议院的议会党团和各州议会政党·····
 郑斯榕 吴永德 贾金明 蒋雯菁 王欣然 聂嘉雯 王惠中 陶 晨 李 婍 冯媛媛 47

外交观察

- 欧洲难民危机的由来及其对德国和欧盟的深远影响····· 梅兆荣 57
 德国外交研究在中国····· 刘立群 63
 欧洲难民危机中的德国····· 连玉如 70
 危机中的欧盟，特别对难民问题的思考（下）····· Peter Schisler 77
 德国对英国脱欧的评估及欧盟未来发展前景····· 李文红 88
 难民危机管理对德国在欧盟中地位的影响····· 邹 露 95
 德土关系最新发展与挑战····· 梅 霖 106

经济视野

- 德国的科研创新政策（下）····· 殷桐生 117

民主德国经济失败原因探析·····	王 涌	127
瑞士金融监管实施政策新探·····	任丁秋	135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定位的研判——多元竞争下的视角·····	张 凯 徐丽莉	140
德国与二十国集团（G20）及中德两国在 G20 中的合作·····	李倩瑗	146
21 世纪德国政府产业创新政策研究——以制造业为例·····	陈 扬	159

文教论坛

阿尔弗雷德·韦伯及其文化社会学·····	姚 燕	171
六阶跨文化敏感度模型的民族中心主义局限性·····	赵 倩	183
关于《中德关系》课程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于 芳	193
电视讨论对比：无情有道与一虎一席谈·····	潘 颖	205

智库天地

2015 年欧盟经济观察报告·····	张 凯 刘立群	217
德国智库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	徐四季	222

科研环视

科研新动态·····	邹 露	229
------------	-----	-----

大事记

德国外交经济大事记（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李倩瑗	243
--	-----	-----

Inhaltsverzeichnis

Interviews

Interview mit Herrn Geng Wenbing, dem Botschafter Chinas in der Schweiz	Die Herausgeber	3
---	-----------------	---

News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

Außenpolitik	YU Fang	9
Wirtschaft	XU Lili	16
Pressemeldungen	ZHOU Haixia	20
Politik, Gesellschaft, Kultur und Bildung	SHI Xiaoyan	24

Modewörter

Kreativwirtschaft und Gamification	XU Siji	31
Big Data und Smart Data	GUAN Haixia	34

Innenpolitisches

Ausblick auf die Bundestagswahl 2017	WU Jiang	39
Bundestagsfraktionen und Parteien in den Landtagen	ZHENG Sirong, WU Yongde, JIA Jinming, JIANG Wenjing, WANG Xinran, NIE Jiawen, WANG Huizhong, TAO Chen, LI Li, FENG Yuanyuan	47

Außenpolitik im Fokus

Ursachen der Flüchtlingskrise in Europa und deren weitreichende Bedeutung für Deutschland und die EU	MEI Zhaorong	57
Untersuchungen zur deutschen Diplomatie in China	LIU Liqun	63
Deutschland in der EU-Flüchtlingskrise	LIAN Yuru	70
Die EU im Zeichen der Kris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Teil 2)	Peter Schisler	77
Deutschlands Bewertung zu Brexit und Perspektive der Weiterentwicklung der EU	LI Wenhong	88
Einflüsse des Krisenmanagements der Flüchtlingsströme auf den Status Deutschlands in der EU	ZOU Lu	95
Aktuelle Entwicklungen und Herausforderungen der deutsch-türkischen Beziehungen	MEI Lin	106

Wirtschaftliche Horizonte

Die deutsche Forschungs- und Innovationspolitik (Teil 2).....	YIN Tongsheng	117
Untersuchung über den Niedergang der Wirtschaft in der DDR.....	WANG Yong	127
Neue Untersuchung zur Durchsetzungspolitik der Finanzaufsicht in der Schweiz..	REN Dingqiu	135
Chancen und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as Offshore-RMB-Finanzzentrum Frankfurt -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multidimensionalen Konkurrenzen....	ZHANG Kai, XU Lili	140
Deutschland und G20 sowie die chinesisch-deutsche Kooperation im Rahmen der G20	LI Qianyuan	146
Studie zur Politik der industriellen Innovation der deutschen Regierung im 21. Jahrhundert am Beispiel der Fertigungsindustrie	CHEN Yang	159

Kultur- und Bildungsforum

Alfred Weber und dessen Kultursoziologie.....	YAO Yan	171
Beschränkung des Ethnozentrismus im Sechs-Stufen-Modell der interkulturellen Sensibilisierung	ZHAO Qian	183
Überlegungen und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Aufbau des Seminars „Chinesisch-Deutsche Beziehungen“	YU Fang	193
Fernsehdiskussionen im Vergleich: Hart aber fair und Tiger Talk.....	PANG Ying	205

Denkfabriken und Medienwelt

Beobachtungsbericht über die Wirtschaft der EU im Jahr 2015.....	ZHANG Kai LIU Liqun	217
Untersuchungen deutscher Denkfabriken über die chinesische Wirtschaftstransformation.....	XU Siji	222

Forschungsrundschau

Neue Forschungstrends	ZOU Lu	229
-----------------------------	--------	-----

Das Wichtigste in Kürze

Wichtige Ereignisse i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01.04.2016-31.10.2016)	LI Qianyuan	243
---	-------------	-----

采
访
精
撷

中国驻瑞士新大使耿文兵先生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

一、大使先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瑞关系。

1950年9月，新中国诞生第二年，即同瑞士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建交66年来，双边关系一直发展比较顺利，特别是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可谓是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先行者”。中国改革开放后，巨大的商机和市场为中瑞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因此，中瑞关系在中-西欧国家关系中赢得了好几个“第一”。比如：瑞士第一个与中国设立中外合资企业；第一个与中国相互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签署自贸协定。这多个“第一”奠定了当前中瑞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也为中欧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2016年，瑞士联邦主席施奈德-阿曼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瑞共同确定了两国“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也成为瑞士在中国赢得的又一个“第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及影响力的提升，瑞联邦和各州政府发展对华合作态度更加积极。双边高层往来更加密切，务实合作全面拓展，两国关系

进入了一个发展更快、领域更宽、成果更加丰硕的提质升级新阶段。中国已成为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瑞士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游客来源国，瑞士是中国在欧洲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七大投资来源国。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瑞自贸协定自2014年7月实施后，双边贸易额逆势增长，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42.6亿美元。金融领域合作成为新亮点。中国在苏黎世积极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今年初中国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正式挂牌营业，1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届中瑞金融峰会再次明确了双方金融合作的重要地位。

二、请您介绍一下目前瑞士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情况。

瑞士是欧洲内陆小国，长期游离欧盟之外，具有鲜明特点和个性的国家。4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分为26个州，840万人口讲德、法、意及罗曼语四种官方语言。200多年的中立国，躲过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坚决拒绝加入欧盟，但享受欧盟成员国几乎所有的便利。自二战以来，瑞士一直政治稳定，政策连续性很强。联邦委员会是瑞士的联邦政

府，由7名权力相同的联邦委员组成。2016年1月，新一届联邦委员会组成，议会国民院中前三大政党（人民党、自民党、社民党）分别占2席，第四大政党（基民党）占1席。新一届联邦委员会积极推动科研、国防、养老等方面的改革并取得进展。

经济方面，瑞士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有世界首富之称。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均财富超过50万美元的国家（人均56.2万瑞士法郎）。失业率长期控制在3%左右。

2015年，瑞士医药化工业超越机械制造业，成为瑞士第一大支柱产业和出口行业。此外，钟表业、食品加工业、旅游业都是瑞士重要产业。受市场不稳定因素影响，以银行业为代表的瑞士金融业2015年以来业绩有所下滑。

外交方面，瑞士联邦政府一直以来奉行“积极的中立政策”，努力通过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来扩大瑞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维护其自身利益。如利用日内瓦作为联合国机构所在地的优势，承办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和叙利亚问题多边会议等，显示其中立国的独特影响力。难民危机爆发后，为应对难民潮涌入，瑞士全民公投通过了反对大规模移民法案，限制欧盟境内人员自由流动瑞士，遭到欧盟和周边国家的不满和批评。

三、中国与瑞士在教育、文化交流方面的情况如何？

近年来，随着中瑞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教育和文化领域合作与交流也在迅速拓展，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支点。

教育方面，2015年，中瑞两国将“中瑞教育政策战略对话”工作机制提升至副部长级，主要职能是对合作进行设计和部署。截至2015年底，中国在瑞士留学生总人数为

2458人（不包含旅游酒店管理和私立学校学生），其中80%以上为研究生和博士后，生源素质非常高。2012年，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达成协议，每年接受我优秀博士生到其位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实验室学习。类似的优质项目还有很多。

目前，瑞共有12所综合性大学、7所应用科技大学和20所师范高等学校，不少高校享有国际声誉，其中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2016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第9。这些高校与我国国内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积极性较高，希望在科学研究、合作办学、联合开发国际项目、教材开发和教师培训、互换学生等方面开展合作。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地方高校转型，中瑞应用技术类大学合作日趋活跃，呈现出良好势头和广阔前景。此外，瑞士以成功实施“双轨教育”制度闻名，并成为全球教育的典范，这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在瑞士广受欢迎，在日内瓦和巴塞尔开有两所孔子学院，苏黎世大学和日内瓦大学也开设有汉语专业学位课程，其他许多大学也都开设了中国文化学分课程或汉语选修课程。此外，瑞士还有约40所高中也开设了汉语选修课，社会上汉语培训学校、中文学校也有不少。每年从“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学生中文比赛中可以看到许多出类拔萃的瑞士青少年成为汉语文化爱好者。

文化方面，双方近年来创新交流，除歌舞、戏剧、民乐、交响乐等传统文化形式外，在造型艺术、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也呈现崭新面貌。双方有意在以动漫等产业为代表的新型文化产业方面开展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同时，每年结合“欢乐春节”项目，国内一批优秀的文化节目和演出团组走进瑞士，受到了瑞士民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2015

年，中瑞两国文化部门签署了加强文化领域合作的备忘录，目前正在商签两国政府文化协议及中国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开设文化中心。

四、在创新成果上瑞士常年高居欧洲第一，其成因在哪里？

瑞士一直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被誉为“创新的国度”。截至2016年，瑞士已连续6年位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榜首，连续8年位居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榜首。2015年瑞士每百万居民的专利申请数多达873项，为欧洲之首。瑞士平均每千名居民的出版物数量为3.6，也列世界第一。瑞士如此高的创新水平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良好的政策环境。瑞士联邦宪法规定“联邦应推动科学研究和创新”，并制定《研究与创新促进法》具体落实。联邦政府还专门设立瑞士国家科技基金会（SNF）和瑞士技术创新委员会（KTI），重点支持基础科研活动和面向应用的研究与创新活动。

二是充足的研发投入。瑞士每年研发投入高达163亿瑞士法郎，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9位。其中2/3由私营企业出资，1/3为联邦或地方政府支持。

三是高效的创新体制。瑞士既拥有诸如ABB、诺华、罗氏、雀巢等大型跨国企业，也拥有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创新的商业运作主体。瑞士还有许多一流水平的联邦及大学科研机构，是创新的学术主体。瑞士商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之间保持密切协作，确保研究成果到市场应用的快速转移。为此，瑞士于2016年初启动了5个创新园项

目，进一步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创新合作。

四是高素质的人才。瑞士成熟发达且独具特色的双轨教育体制为瑞士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各类人才，同时其良好的环境还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国际人才。截至2015年，瑞士在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中连续两年名列榜首。2015年，瑞士在全球商业人才排名中名列第一。

五是广泛的国际合作。瑞士凭借地处欧洲的优势，积极参与欧盟的科研创新计划，并与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多个国家签订双边科技合作协议，通过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力。

五、您曾在驻中东国家使馆工作，后来任驻塞舌尔和驻贝宁大使，2016年2月就任驻瑞士大使，请您谈一下和其他国家相比对瑞士的初步印象。

外交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要辗转于许多国家。我对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怀有一段深厚的感情。相比于黎巴嫩的雪松、叙利亚的历史古迹、塞舌尔的浪漫海滩和贝宁的炎热气候，瑞士的美景举目皆是，静谧中透着无限活力。瑞士是欧洲内陆国家，但经济和社会高度发达，人民乐观富足、勤劳务实。中瑞两国虽然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体量等方面存有很大差异，但双方一直坚持平等互尊、交流互鉴，努力扩大利益交集，实现互利共赢。我作为第16任中国驻瑞士大使，将为促进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和扩大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做出努力。

新闻鸟瞰

外交新闻

于 芳

2016年夏秋的几个月中，德国外交重点仍旧集中在巩固和建设欧洲、应对危机的挑战方面，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德国表示出较大关切并给予了经济上的资助。由于默克尔总理访华和G20峰会在中国的召开，中德领导人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繁，两国关系发展具有了更深厚的基础和良好的势头。

一、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

2016年5月29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纪念凡尔登战役一百周年。

6月2日和3日，德国和波兰的地区和边界合作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举行，2016年的纪念会议由勃兰登堡州主办。作为德波邻国条约的重要机构，政府委员会为两国的接近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过去的25年间，它主要完成了三大任务：1. 促进地区和其他机构、

协会、团体的合作；2. 提出建议和倡议；3. 交流信息。

6月25日，德国和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外长共同发表声明，对英国脱欧表示遗憾，欧盟因此不仅失去了一个成员国，也失去了一段历史、传统的经验。六国希望英国能够尽快进入脱欧程序，同时也坚信，欧盟提供了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框架，鼓励欧洲国家追求富裕、自由和安全，追求睦邻友好关系和互惠互利，追求和平与稳定。在全球化的今天，欧盟面临着巨大挑战，欧盟成员国将会加强欧盟应对挑战的能力，紧密合作，并对未来抱有信心。^①

德国担任2016年欧安组织的轮值主席国，7月6日德国外交部召开“欧安组织作为调解人——手段、挑战、机遇”大会。在协调乌克兰问题等系列冲突的过程中，欧安组织起到了核心作用。本次大会旨在通过欧安组织调解的各个具体案例来加强欧安组织解

^① Gemeinsame Erklärung der Außenminister Belgiens, Deutschlands, Frankreichs, Italiens, Luxemburgs und der Niederlande am 25. Juni 2016,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6/160625_Gemeinsam_Erklaerung_Gruenderstaatentreffen.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2.09.2016.

决冲突的能力。^②

7月5日,德国外长召开“和平实验室2016”会议,来自非军事危机预防领域的主要代表共同讨论德国在危机中的行动有哪些特点,对德国的行动又有哪些期待,德国在危机预防和危机处理过程中应该如何制订计划。会议提出了危机预防、稳定、冲突后续处理、和平促进这样一条路径,此后,该讨论将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继续进行,得出的新结论也将会被纳入联邦政府的考虑。^③

8月29日至9月1日,德国、法国、波兰外长共同庆祝“魏玛三角”建立25周年,并召开了大使会议,共邀请了200多位德国驻外代表和来自政界、经济界、文化界的高级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责任、利益、手段——德国和国际秩序”。德国、法国和波兰的外交部长共聚在魏玛,秉承“魏玛精神”的传统和价值观,回顾了“魏玛三角”过去的良好发展,发表了对于欧洲未来的共同宣言。“魏玛三角”有利于欧盟在扩大之后保持团结,三国外交部长在欧洲邻国政策、欧洲扩大政策和安全与防务整个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经济部长、农业部长等也定期在“魏玛三角”框架下进行交流与合作。在当前欧洲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德国、法国和波兰希望在理解欧洲怀疑论的同时,加强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欧盟目前在三大洲执行着

11项民事行动和6项军事行动,欧洲的防务管理需要得到加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欧洲强大了,才能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减少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如失业、贫富差距加大等,包括经济政策在新技术和能源转型方面的新动作,共同保证能源供应安全,欧盟的结构性改革以及重新赢得欧洲民众的信任等。^④

9月8日,德国外长在外交部会见乌克兰外长,双方交谈的重点是目前的乌克兰局势和明斯克协议的落实状况。

此外,德国还加强了同欧洲之外国家间合作。9月初,德国外长和国防部长一同会见了澳大利亚外长和国防部长,双方在柏林进行了第一次德国和澳大利亚的“二加二”磋商,双方发表了共同宣言,都认为这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借此契机将两国在2013年开始建设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层面。双方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和安全政策以及乌克兰问题、亚太地区战略问题等。德国和澳大利亚要求叙利亚实现停火,以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两国的四位部长也呼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切实落实明斯克协定的内容。两国部长还表示,中国南海问题是事关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问题,要求各方保持克制,减少紧张,依据国际法和海洋法来和平解决。双方交谈的另一个重点是两

② (Verfasser unbekannt): Konferenz “Die OSZE als Vermittler – Instrumente, Herausforderungen, Chancen”,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6/160704_OSZE_Konferenz.html, 4. Juli 2016, letzter Zugriff am 12. 9. 2016.

③ (Verfasser unbekannt): Krisenprävention weiter denken,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6/160704_PeaceLab2016.html, 4. Juli 2016.

④ Gemeinsame Erklärung der Außenminister des Weimarer Dreiecks Frank-Walter Steinmeier (Deutschland), Jean-Marc Ayrault (Frankreich), Witold Waszczykowski (Polen) zur Zukunft Europas,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6/160828_Gemeinsame_Erklärung_Weimarer_Dreieck.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2.09.2016.

国的国防政策白皮书。两国国防部长商定在利益攸关的共同领域进行合作，包括参与军事演习、更紧密的人员交流等。此外，两国还将在阿富汗问题、反恐问题、移民问题上进行合作；加强智库之间、外交人员之间的交流。^⑤

二、难民危机

德国联邦警察局发布的统计显示，从2016年1月起至6月，共有8991名未成年难民失踪，比2015年增加1倍，其中大多数年龄在14—17岁之间。虽然警方表示这些难民很可能投奔了朋友或亲戚，但一些民间组织仍担心他们会沦为有组织犯罪的侵害目标。

7月12日，德国外长受邀出席国际难民和移民组织关于加强在难民危机中全球合作的会议。会后一致决定加强包括德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的合作，并且提出了如下措施：

- 调查和分析移民和难民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切实的移民政策；
- 加强难民和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的信息交流和沟通；
- 向难民提供奖学金项目，鼓励他们接受教育；
- 加强同私人领域的合作；
- 迁徙住地和其他补充措施；

- 保障在避难、返回和重新融入过程中的安全和尊严；
- 促进移民和难民的融入。^⑥

三、人道主义救援

5月16日，德国外交部向国际移民组织提供了450万欧元，用于促进利比亚的和平与稳定，自6月开始，德国外交部将继续向利比亚东部、西部和南部地区提供资助。

日前，土耳其拒绝德国国会议员访问土因吉尔利克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克尔介入，但未取得进展。德国多位政治家因此考虑撤军。德国国防军自2015年底派兵驻扎因吉尔利克，参与国际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斗争。但2016年6月底，土耳其拒绝德国国防部国务秘书率议会代表团访问驻扎在此的德国国防军，引发两国外交风波。此前，德国国会将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定性为种族屠杀，引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强烈不满。

8月11日，德国决定支持联合国粮农计划署救助埃塞俄比亚的计划，再向当地难民提供400万欧元的资助，这样一来，联合国紧急救援能够一直持续到2018年，每个月向60多万名难民提供基本食物和现金资助。德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称，“德国很看重难民问题，愿意为此做出贡献，改善进入埃塞

⑤ Gemeinsame Erklärung des Treffens der Außen- und Verteidigungsminister Australiens und Deutschlands,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6/160906-Erklaerung_DEU-AUS-Ministertreffen.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2.09.2016.

⑥ (Verfasser unbekannt): Runder Tisch zu Flucht und Migration in Berlin Schlussfolgerungen des Vorsitzenden,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cae/servlet/contentblob/740588/publicationFile/218507/160712_Runder_Tisch_Flucht_Migration_Chairman_Conclusions-DL-DE.pdf, 12. Juli 2016, letzter Zugriff am 12. 9. 2016.
(Verfasser unbekannt): Nothilfe für Flüchtlinge in Äthiopien - Deutschland leistet langfristige Unterstützung,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6/160811-Nothilfe-Aethiopien.html>, 11. August 2016, letzter Zugriff am 12. 9. 2016.

俄比亚的难民的生活条件”，“这也是对埃塞俄比亚接收非洲难民的支持”。这份支持对于联合国而言也至关重要，从2015年起，德国已经提供了3000万欧元的资助，是五大资助国之一。^⑦

9月10日，德国外长同也门外长谈话后在柏林宣布，这次谈话是在也门严重的困境下进行的。德国会广泛提供支援，希望能够尽快停止暴力，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也门的冲突各方应当停火，回归到和平谈判中来，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最终解决问题。^⑧

四、叙利亚问题

7月18日，德国外长出访伦敦，和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外长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一起商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8月18日，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政府发表了对利比亚联合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2259号决议强调，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必须有效监管国家石油、银行等机构，以利于利比亚重建，并呼吁所有利比亚人支持和保护利比亚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⑨

9月11日，德国外长在周日的《世界报》上就美俄谈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双方

的停火协议如能顺利执行，将能中止叙利亚的战火，带来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他呼吁叙利亚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停止军事冲突，给予人们接受人道救援的机会。^⑩

五、中德关系

5月17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共同主办的“感知中国——中国西部文化行”德国站活动在法兰克福欧洲之角会议中心举行开幕式。2016年，“感知中国”首次选择法兰克福作为活动举办地，选择了“中国西部文化行”这一主题，通过多民族歌舞演出、图片唐卡展、电影展映、专家交流等活动，让德国民众有机会多角度接触和了解中国广大西部地区，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独具特色的多民族文化。国新办副主任崔玉英、驻法兰克福总领事梁建全，法兰克福、海德堡、埃什伯恩、凯尔斯特巴赫等市市长、市政委员、市议员等地区政治、经济、文教界人士，外国领团及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近300人出席开幕式招待会。

6月1日，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应邀出席德国洪堡经济论坛“地缘政治力量转移”研讨会，与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全球和区域研究中心前

⑦ (Verfasser unbekannt): Nothilfe für Flüchtlinge in Äthiopien - Deutschland leistet langfristige Unterstützung,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6/160811-Nothilfe-Aethiopien.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2.09.2016.

⑧ (Verfasser unbekannt):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nach seinem Gespräch mit dem jemenitischen Außenminister, letzter Zugriff am 12.09.2016.

⑨ Gemeinsame Erklärung zu Libyen,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6/160818_LBY.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2.09.2016.

⑩ (Verfasser unbekannt):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zu Syrien gegenüber der Welt am Sonntag,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Meldungen/2016/160911_BM_zu_Syrien.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2.09.2016.

主席卡佩尔以及经济学家施泰尔特共同讨论上述议题。史大使在讨论中重点就全球治理、“一带一路”战略等议题发表看法。其他三位专家分别从各自的研究的领域出发，介绍了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大家总体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利益相互交织，中国的发展有利于德国，也有利于世界。德各界应不断增进对华了解，不能一味听信媒体报道，而应根据事实，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2016年6月12—1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九次访华。6月12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围绕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王毅表示，当前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良好，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进展。在2017年中德迎来建交45周年之际，双方应该加强长远谋划，推进战略合作，以落实政府磋商共识为契机，延续中德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为此，两国外交部要发挥好多个领域对话平台作用。双方要密切配合，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成功，共同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国际金融稳定作出贡献。双方要妥善处理彼此间分歧。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德方多次表示愿为推动中欧关系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中欧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深化互利合作。中方希望欧方如期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义务。施泰因迈尔表示，德方对当前世界形势下德中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迅速、稳定发展十分高兴。德方愿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推动两国经贸等领域及国际事务中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德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还就有关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日下午，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接受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发表演讲。6月13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两国总理

积极评价中德关系发展。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德方把握好中德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增进政治互信，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金融、产业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就国际和地区事务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双方民间和地方密切交往，推动中德关系与合作全面升级，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习近平欢迎默克尔再次访华，祝贺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成功举行并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6月1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沈阳故宫获赠一尊迷你雕塑，雕塑是按照默克尔本人塑造的。

6月28日，中国青岛“德国工商中心”揭牌仪式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毛静秋，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卞建平，德国巴伐利亚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威斯豪耶以及巴州经济部、慕尼黑市和企业界代表50余人出席仪式。该中心是青岛市在欧洲设立的商务代表机构，于2015年10月在慕尼黑注册，以立足德国、面向欧洲、服务“引进来”“走出去”为主要职能，是青岛市继在新加坡、韩国、美国之后在海外设立的第四个青岛工商中心，也是青岛市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新成果。据介绍，青岛“德国工商中心”将积极推动青岛与欧洲企业间开展双向投资贸易合作，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为青岛企业“赴欧”提供政策咨询、投资贸易信息；为欧洲企业“入青”介绍投资环境、扶持政策等；调研欧洲经贸法规政策、市场发展动态及投资贸易等信息；宣传青岛引进海外人才政策，为欧洲人才、留学人员来青工作提供服务；促进青岛与德国及欧洲扩大和深化相互投资和经贸合作。

7月12日，第一届中德古典音乐节在德国朗恩市拉开帷幕，华人钢琴家朱晓玫在开幕音乐会上演奏了“音乐之父”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在为期一周的音乐节期间，世

界华人音乐家汇聚在此用音乐与观众对话、交流。

7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乌兰巴托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双方就中德、中欧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德方共同努力，推动不久前举行的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成果得到积极落实，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共同促进中德关系与合作的发展。李克强指出，日前发生在法国尼斯的严重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世界。英国公投脱欧也使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受到影响。上述表明，当前亚欧国家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认为一个繁荣和稳定的欧洲符合各方利益。希望欧盟同英国关系实现平稳过渡，相信欧盟将继续向前发展。中国愿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李克强还就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义务问题阐述了中方立场，表示中国和欧盟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这一问题事关企业和市场对法治、国际规则和中欧经贸关系的信心，希望欧方严肃认真对待，如期履约。期待德方积极推动该问题得到妥善解决。默克尔表示，德中总理保持经常性对话，反映出两国关系的紧密性。德方愿与中方就欧洲局势最新发展保持沟通。国际社会应妥善应对英国脱欧影响、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中国是欧盟可信、可靠的伙伴，德方乐见欧盟以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同中国开展合作。

7月18日，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从安全、政治、经济等多角度分析英国“脱欧”对中欧关系及地区战略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访谈中，柯慕贤大使非常坦率，谈到德国对华政策，他表示：“德国争取做中国一个可预测的可靠伙伴，而不是有太多政策波动的（伙伴）。我们会继

续明确、不断地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在一些议题上，我们也有不太一致的意见。”

8月，中国装备制造上市公司上海电气拟以1.7亿欧元购买德国TEC4的100%股权，间接全资控股BAW公司，从而进入航空工业领域自动化制造装备和系统市场。

施特拉尔松德是默克尔担任联邦议院议员的选区所在地，被视作其政治故乡。8月30日下午，德国第17家孔子学院——施特拉尔松德孔子学院隆重举行成立仪式，德国总理默克尔应邀出席并为这家孔子学院揭幕。这是默克尔本人以及德国现任总理首次为孔子学院揭幕。

8月30日，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接受新华社采访，他指出，中国和德国分别是2016年和2017年的G20轮值主席国，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方面，中德两国具有诸多共同立场。作为二十国集团“三驾马车”成员，中德在G20框架内的良好合作是保证G20机制成功运转的重要因素，加强在G20框架下合作，将赋予两国关系更多战略内涵。

9月初，作为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德国一直贡献卓著，并将是下一届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德国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协调人、德国工业联合会对外政策部主任斯托米-安尼卡·米尔德纳表示：“二十国集团既要注重实施各自的行动方案，更要为未来发展制订长期的战略框架。”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到本次峰会主题之一创新，他表示，在互联网创新领域，无论是网络购物还是网络打车服务，可以说中国是德国的榜样。中德两国可以在提高创新力和生产效率方面，通过各自制定的工业发展方案，进行合作，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他也表示，英国脱欧不会影响中德关系，中德关系具有连贯性和可预测性，将在牢固的基础上不断深化。

9月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杭州出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习近平强调，中德是全方位战略伙伴。2017年德国接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德方愿将创新、结构性改革、发展、数字经济等继续作为2017年峰会重要议题，确保议题和成果的延续性，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中方愿同德方保持密切沟通和协作，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取得成功。默克尔表示，祝贺中方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杭州峰会的主题和成果契合德国2017年主办汉堡峰会的设想，期待着在筹办汉堡峰会过程中得到中方支持。德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沟通，加强经贸、投资和发展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德方致力于推动欧中关系不断发展。

关于中德关系，德国学者，如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辜学武、德国经济研究所克里斯蒂安·德雷格（Christian Dreger），都认为，中国主办G20峰会有望向全球开出经济增长的“药方”。同时，中德两国都希望把在财经领域的一系列共同理念融入G20当中，在2017年具有德国特色的汉堡峰会上，两国将会在应对难民危机、防范新的金融风险、统筹应对数字化挑战、消除贸易壁垒等方面继续合作下去。德国学者认为，过去八年，德国和中国成功地打造了一个特殊关系，主要建立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经贸合作是这种互信的源泉，双方在维护彼此核心利益方面保持配合，双方的信任为两国之间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础。

作者简介：于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经济新闻

徐丽莉

一、德国经济总体情况

德国经济继续持续稳定增长

德国经济研究所 (DIW)、慕尼黑 ifo 研究所、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哈勒莱布尼茨经济研究等研究机构于 2016 年 10 月对世界、欧洲及德国的经济做出秋季预测^①。其中指出德国经济将继续适度增长。2016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为 1.9%，2017 年达到 1.4%，2018 年约为 1.6%。德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来自劳动市场。预计 2017 年将新增 50 万个就业岗位。这将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支柱产业是建筑业和服务行业以及在这两个领域产生的就业增长。稳定的工资增长和低位的通货膨胀促进私人消费的膨胀。此外，由于难民问题导致国家的支出急剧增加。而工业只能贡献平均数的增长率。特别优惠的融资条件对企业在德国的投资行为几

乎没有刺激，企业大部分的投资均流向海外，这就增加了德国经常项目收支的出超数。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景气指数在 9 月份从 100 点降至 98 点。这一微弱的下降并不能抹杀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因为其主要原因是 7 月份一些企业启动休假制度，导致工业生产与出口的减少。

德国赶超中国重夺世界贸易顺差冠军^②

按照 ifo 经济研究所的计算，德国今年将赶超中国，重夺世界出口盈余冠军。ifo 专家格林姆 (Christian Grimme) 预计，2016 年德国的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将达到 3100 亿美元，而中国只能达到 2600 亿美元。第三位是日本，1700 亿美元。格林姆指出，德国的出超基于商品贸易。前半年从机械制造业到汽车制造业的出口已经超过进口 1590 亿美元。主要的驱动力是来自欧洲的商品需求增加。ifo 研究所

① DIW: Gemeinschaftsdiagnose Herbst 2016, im Wochenbericht Nr. 40.2016, letzter Zugriff am 13.10.2016.

② (Verfasser unbekannt): Deutschland wird 2016 wieder Exportmeister, 06.09.2016, <http://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konjunktur/konjunktur-daten/stimmungsindikatoren/schaetzung-des-ifo-instituts-deutschland-wird-2016-wieder-exportweltmeister/14508544.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2.10.2016.

预计，今年德国的出口盈余将占经济总量的8.9%。而欧盟委员会已经将德国持续出超大于6%的情况归因于危害稳定的级别，建议德国扩大投资促进内需，从而降低出口盈余。

德国联邦劳动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9月德国失业人数260.8万，失业率5.9%，登记的就业岗位68.7万。德国十月份的失业人数降至254万，创25年以来的新低。德国今年的失业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9万，失业率降至5.8%。

2016年10月ifo研究所商业景气指数^③继续好转，由9月的109.5点上升至110.5点。企业对其目前的商业形式感到满意，对未来几个月倍感乐观。德国经济正蓬勃发展。加工业的商业景气指数有所提高，达到两年多以来的最高值，这源于对未来几个月的乐观预期，对目前商业状况的估计也变得更好。工业企业的开工率比前三季度提高0.9%，达到85.7%。批发业的指数下降，其两个部分值均减少，但仍继续明显超出常年的平均值。零售业的指数保持不变，预期继续较为乐观，但企业对目前状况的良好估计有所减弱。建筑业的指数从一个记录奔向另一个记录，连续七个月保持增长。建筑企业对未来的预期达到一个新高。

德国经济研究所景气研究部主任费希特纳（Ferdinand Fichtner）指出^④：从德国目前的经济指标来看，英国脱欧尚未对德国出口产生巨大影响。但如果欧盟和英国的谈判进程中出现较大的矛盾对立，就会出现对德国投资产品需求的减少，这便会影响到德国经济。

二、改革正当时

2016年11月2日德国“五贤人委员会”做出题为“改革正当时（Zeit für Reformen）”的德国总体经济发展的年度报告（2016/2017）^⑤。报告指出：德国和欧元区的经济景气持续发展。2016年德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9%，预计2017年将为1.3%。这一预期的下降原因在于2017年的节假日多于2016年。欧元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6%，预计2017年将为1.4%。

德国经济的良好发展为经济结构改革提供了机遇，以提高效率，为可持续的富裕程度打下牢固的基础。现在到了改革的时候，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德国经济增长潜力；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全球化和数字化带来的挑战；并增强欧洲的稳定性与能力。德国不能躺在之前改革（如2010议程）的成就上睡大觉，而是应该坚决推进必要的改革。德国政府的一些措施，如最低工资等，甚至削弱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回顾德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德国经济政策主要以消费和分配政策措施为重点。这一状况亟待改变。德国经济政策更多应集中于促进增长的措施。其中包括提高投资性支出，无论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还是教育方面的投资。因为未来几年德国将面临人口变化的挑战，只有提高投资性支出，才可以保证德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报告指出：改革要聚焦机会平等，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接受能力，为更多创新提供框

③ ifo: ifo Konjunkturtest Oktober 2016 -- ifo Geschäftsklima erneut verbessert, 25.10.2016, <https://www.cesifo-group.de/de/ifoHome/facts/Survey-Results/Business-Climate/Geschaeftsklima-Archiv/2016/Geschaeftsklima-20161025.html>, letzter Zugriff am 30.10. 2016.

④ DIW Wochenbericht Nr. 40.2016 Letzter Zugriff am 14.10. 2016.

⑤ <http://www.sachverstaendigenrat-wirtschaft.de/presse-jahresgutachten-2016-17.html>, letzter Zugriff am 3.11. 2016.

架条件，为已被认定的难民融入德国社会创造前提，稳固财政政策，创建能应对人口变化的社会福利体系，改革税收政策，在医疗卫生领域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等。

三、行业、企业要闻

1. 德国政府重新审查中资收购爱思强案

爱思强公司（Aixtron）2016年10月24日宣布，德国经济部撤回了9月初做出的对中国福建宏芯基金（Fujian Grand Chip Investment）收购爱思强无异议的决定，并将对该收购案重新进行审核。爱思强是于10月21日接到德国经济部的这一通知。此前一周，中国福建宏芯基金在收购要约接收期限到期前已付清了爱思强约65%的股份，这足以让这项6.7亿欧元的交易通过。

10月中旬，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马赫尼希（Matthias Machnig）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一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联邦经济部今后将加强对德国企业的保护。德国媒体还报道，经济部正在起草一份名为投资审核方针性文件，重申如收购者获得25%以上的投票权，政府有权对这笔收购叫停。这一措施主要针对以下四种情况：投资系外国政府产业政策引导、投资者得到国家补贴、收购者为外国国企、投资者来源国限制德国企业进入该国市场。德国企业和欧盟驻华商会一直批评中国限制德国企业在华投资，双方市场准入条件不对称。

德国工商大会主席艾瑞克·施伟策（Eric Schweitzer）对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保护德国企业的计划提出批评。他对《商报》表

示：“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这样依赖自由市场。我们不能一边关闭自己的市场，一边又等待其他国家对我们敞开市场。”他还警告说，这关系到德国的核心经济结构。施伟策还谈道，德国在中国有大量投资，相反，中国在德国只有少量投资，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此外，如果收购的对象涉及德国内部安全，德国经济已经有相应的措施防止外国投资者进入，设置新的壁垒并非良策。

2. 汽车行业

德国汽车制造商对销售持乐观态度

2016年8月德国新车销售量的增长超过了8%，9月继续增长，达到29800辆。所有德国品牌均得益于汽车市场的良好发展。Mini创造了最高的增长率，为35%，梅赛德斯紧随其后销售增长达到26%。大众品牌虽然销售量最大，但由于柴油汽车事件，其新车销售明显受到影响，9月的销售量仅增长1.7%，远低于市场平均增速。到目前为止，大众的年销售量比2015年降低1%，同比少销售51万辆新车。电动汽车在德国还没有扮演重要角色，2016年前九个月，德国市场共销售电动汽车7700辆，其中美国车企特斯拉的销售量达到1400辆，比2015年前三个季度的销量增加近30%，在E系列小型车中的占比超过18%。^⑥

宝马公司注资 Nauto

在自动驾驶安全系统方面的角力中，宝

^⑥ <http://www.handelsblatt.com/unternehmen/industrie/automarkt-deutschland-starker-september-verspricht-goldenen-oktober/14645310.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5.10.2016.

马、丰田和安联公司共同注资美国自驾装置新创业公司 Nauto。三公司与 Nauto 签署了许可证协议。Nauto 公司主要生产特定的监控设备，其辅助驾驶产品配备摄影机来监控驾驶行为，并传输给电脑做出评价。该公司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海科（Stefan Heck）对路透社表示，德国和日本的汽车公司将把这一技术应用到其测试汽车上，并利用所获得的数据来发展自己的自动驾驶战略。^⑦

大众公司在波兰的分厂开业^⑧

2014年3月大众公司宣布将在波兰中部的弗热希尼亚（Wrzesnia）建造一座新工厂，投产 Crafter 箱式货车。两年后，2016年10月24日新厂开业，大众公司的总投资为8000万欧元。预计2018年新厂将生产10万辆 Crafter，创造3000余个就业岗位。这一大胆行动被寄予厚望，因为大型货车拥有很大的盈利空间。

作者简介：徐丽莉，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⑦ <http://www.handelsblatt.com/unternehmen/industrie/autonomes-fahren-bmw-und-allianz-sichern-sich-neue-technologie/14658680.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5.10. 2016.

^⑧ <http://www.handelsblatt.com/unternehmen/industrie/neues-vw-werk-in-polen-deutsche-autobauer-zieht-es-in-den-osten/14729132.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5.10. 2016.

媒体新闻

周海霞

一、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

中德两国领导人互访在德国媒体涉华报道中永远是重要议题，此次李克强总理访德同样引发德媒关注。关于此次李克强访德，德媒重点关注两个议题：其一、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实行多项新政，中德两国合作被赋予很高的期待，包括外交领域，也包括经贸关系和气候政策等诸多方面。报道称，中德两国鉴于全球安全形势认为双方应在各领域扩展深化合作关系。也有报道称，此次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还涉及7月初在汉堡举行的G20峰会的准备工作。其二、德国汽车生产企业在中国的电动汽车配额问题。德媒在相关报道中一再提及该议题，因为这涉及德国企业的根本利益。中国市场对于德国汽车工业而言非常重要，比如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大众公司在德国境外的第一大销售市场，因此一直以来德国车企在中国的发展都是德媒关注的议题。

二、世乒赛在杜塞尔多夫举行

2017年5月底6月初，世界乒乓球锦标

赛在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举行。虽然德国队成绩并不算理想，但因为德国是主办国，所以德国媒体对于此次世乒赛的关注度依然很高。在德媒报道中，三个国家和来自这三个国家的乒乓明星构成主角，即东道主德国、获得最多冠军头衔的中国、出现闪耀新生力量的日本。

德国媒体关注最多的德国乒乓明星是波尔。媒体对波尔的评价是最成功的德国乒乓球运动员。有报道表示，在德国乒乓运动中几乎每次都是所有人到最后都将目光投向波尔。德媒认为，波尔很多年来都被视作中国选手最大的劲敌之一。波尔是唯一一个杀入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欧洲人，因此报道称波尔是欧洲对抗远东的最后堡垒，虽然波尔在男单四分之一赛中2比4不敌马龙，但是场馆里的8000名观众依然为他们的乒乓偶像波尔喝彩。

与波尔同样受到德国媒体关注的另一位德国乒乓明星是奥恰洛夫。报道称，他在欧洲和德国乒乓运动中现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五，是最好的非中国选手，但是可惜的是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奥恰洛夫因碰上了日本选手丹羽孝希而止步。前德国国手现德国国家

队教练约尔克·罗斯考普夫（Jörg Roßkopf）对此表示惋惜，但同时他也认为奥恰洛夫是德国和欧洲乒乓运动的未来，他会继续努力的。

在男女混双项目中与中国运动员方博搭档获得铜牌的德国运动员索尔佳自然也是德国媒体关注的对象。报道称，这枚奖牌是此次世乒赛 32 枚奖牌中唯一一枚没有挂在亚洲运动员脖子上的奖牌，也是 46 年来德国女子在世乒赛中获得的第一块奖牌。对于这对中德混双组合，德国媒体的点评大相径庭，报道称方博是专为混双比赛来到杜塞尔多夫的，他的目标是金牌，铜牌对方博而言一点意义都没有，而对于索尔佳而言则完全不一样，她虽然也因为半决赛后期被日本组合反败为胜而气恼，但是却并没有失望，反而还是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自豪和高兴的。

对于此次世乒赛中德国队的表现，德国媒体一方面认可德国运动员的能力和所取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表示对德国乒乓球运动后继无人的担忧。同时，对于德国政府没有派遣任何代表出席此次世乒赛，德国乒乓球协会（DTTB）名誉主席盖博（Hans Wilhelm Gäb）称之为“东道主德国的耻辱”。国际乒乓球联合会（ITTF）主席托马斯·维克特（Thomas Weikert）也批评德国政府对此次世乒赛漠不关心。他表示，这是一个百余个国家参加的大型赛事，在其他国家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作为乒乓强国，中国在本次世乒赛中的表现一如既往的抢眼，自然也是德国媒体关注的对象，其中又以国手马龙最受关注。马龙在德国媒体中一再被称作“曾经的世界冠军和新一届的世界冠军”，并且多篇报道都描述了德国运动员波尔对马龙的敬重之情。对

于中国队在此次世乒赛中的表现，德国媒体表示，中国队包揽此次世乒赛所有的重要奖项，只有在对中国队而言不是特别重要的混双比赛中让日本队赢得一筹，中国是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绝对主导者。德国媒体对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这种高度评价，从其报道将世乒赛运动员分成中国选手和非中国选手（[德]Nicht-Chinese）两类亦可窥见一斑。

此次德媒关于世乒赛的报道中，一并出现的第三个国家是日本，尤其是才 13 岁的日本小将张本智被德国媒体誉为乒乓神童。德媒认为，中国最强，日本也处于上升趋势，亚洲的乒乓人才储备似乎永远是取之不竭的。

三、中国驻德使馆发文警示在德华人华侨注意安全

日前，德国媒体对于我国驻德国使馆提醒在德华人注意安全的声明予以关注。有报道称，中国驻德使馆在其声明中表示“德国治安安全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并提醒在德华侨华人、留学生等加强安全防范，夜间关好门窗，避免单独前往偏僻的地方等。德国媒体同时称，在过去的几年里德国发生了多起中国人遭遇暴力袭击的案件，并猜测称这有可能是中国使馆发此声明的原因。报道指出，中国使馆发布的声明是中文版本的，没有德文版本，并且使馆新闻处也未就外界关于该声明的提问进行答复。^①

四、德媒看 G20 峰会

2016 年 9 月在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因其重要性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集中关注，自然也

^① dpa: Chinesen sollen nachts nicht allein auf die Straße, 09.02.2017,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inland/chinesen-in-deutschland-sollen-nachts-nicht-allein-raus-14869216.html>, FAZ, letzter Zugriff am 13.06.2017.

进入德国媒体的报道议程。德国媒体从多个视角出发、依托不同的领域观察 G20 峰会，包括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等等。

在经济领域，德媒表示，鉴于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处于下行状态，因此东道主中国将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此次 G20 峰会的首要讨论议题。相比之下，德媒表示，其他棘手的世界性问题如叙利亚问题和难民危机成为峰会的边缘性议题。^② 德国媒体一方面称，引领世界经济的国家在 G20 峰会上达成一致，欲将数字化经济作为经济发展重点，尤其是德国和中国，尝试通过这一方案促进全球经济增长。^③ 相应的，总部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公司多次出现在德媒关于 G20 峰会的报道中。此外，德国媒体称，欧洲企业认为中国企业在欧洲完全自由，而欧洲企业在中国则还受到诸多限制，因此在 G20 峰会召开之前，欧洲商会代表欧洲企业要求中方能够为其提供更多公平待遇，要求中国真正贯彻实行承诺已久的经济改革。^④

在国际关系方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继续成为德媒的重要关注点。一方面，美国代表团在杭州机场与中方机场工作人员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引发德国媒体关注；另一方面德国媒体称，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表示不满，要求美国应在此问题上起到建设性作用。当然，德国媒体自然也非常关注 G20 峰会期间与德国直接相关的

一些议题，比如默克尔在中国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或者一再提及此次峰会上难民危机和叙利亚问题只具有边缘议题的地位。

在政治与社会领域，与 2014 年北京主办 Apec 会议时德媒的相关报道如出一辙，此次德媒的关注点也包括：中国作为东道主为了保持会议召开期间当地能有蓝天和良好的空气、交通畅通，政府采取特别措施，关停工厂、给市民放假。^⑤

五、中国家电企业美的公司并购德国机器人行业先锋库卡公司 (Kuka)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企业实力增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实现成功并购。德国媒体对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并购的关注度持续升温，尤其是中国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并购案例更能引发关注。在德媒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中国企业的并购之旅”等的表述。与德媒中一直存在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调相应，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潮在德媒中也引发怀疑和猜忌。不过，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德国国内对于中国企业并购行为的态度实际上正在逐渐发生积极转变。

此次美的公司并购库卡公司事宜从始至终一直受到德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在美的公司宣布并购意向之初，德国媒体一方

② Dpa/AFP/mm: Spann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n USA überschatten G-20-Gipfel, 04.09.2016,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6-09/hangzhou-usa-china-spannungen-g-20-gipfel>, Zeit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10.10.2016.

③ Lee, Felix: Roboter sollen die Weltwirtschaft retten, 05.09.2016, <http://www.zeit.de/wirtschaft/2016-09/g20-gipfel-china-weltwirtschaft-digitalisierung-angela-merkel>, Zeit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10.10.2016.

④ Wurzel, Steffen: Europäische Wirtschaft fordert von China mehr Fairness, 03.09.2016, <http://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g20-china-101.html>, Tagesschau, letzter Zugriff am 10.10.2016.

⑤ Dorloff, Axel: Gipfel in der Geisterstadt, 05.09.2016,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g-zwanzig-china-103.html>, Tagesschau, letzter Zugriff am 10.10.2016

面从经济方面观察分析该意向，认为库卡公司通过并购能够获得中国市场准入，而这正是库卡公司很长时间以来积极努力的一个目标；另一方面德媒也报道了德国政界的态度，比如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对此事持反对态度，并试图在欧洲寻找有意愿并购库卡的企业。反对的原因不外乎担心德国企业的核心技术流失。^⑥

六、爱思强并购案与欧司朗并购案相继遭遇阻力

如上所述，对于中国企业并购德国企业一事，德国国内一直都存在一种忌惮和恐惧的心理，担心德国关键行业的核心技术因此流失，这种声音来自德国各界，包括德国政

界、德国媒体、德国经济界等。这种现象与在西方一再宣称的中国经济威胁论是一脉相承的。此次德国经济部出尔反尔，撤销已经颁布的“无危害证明”（[德]Unbedenklichkeitsbescheinigung，国内也有译作“无异议证明”），叫停中资企业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爱思强（Aixtron）的案例，就是德国忌惮中资并购的一个非常好的证明。

德国媒体表示，中国企业在德国/西方的大手笔并购让中资企业名声大噪，但是在中国却不允许德国企业如此收购。同时媒体表示，受到爱思强并购案的影响，对于中资企业并购德国照明企业欧司朗旗下子公司朗德万斯（LEDVANCE）的案例，德国政府将会睁大眼睛，将其“置于放大镜下”审核，评估其是否会“危害德国公共安全和秩序”。^⑦

作者简介：周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⑥ Wilke,Olaf: Übernahmeschlacht um Roboter-Bauer, 08.06.2016, <http://www.bild.de/geld/wirtschaft/china/wenn-chinesen-deutsche-firmen-kaufen-46195436.bild.html>, Bild, letzter Zugriff am 10.10.2016.

⑦ Dpa: Gabriel will Schlüsseltechnologien vor Übernahmen schützen, 29.10.2016, <http://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deutschland/technologischer-ausverkauf-gabriel-will-schluesselftechnologien-vor-uebernahmen-schuetzen/14756866.html>, Handelsblatt, letzter Zugriff am 30.10.2016.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

史笑艳

一、德国统一现状报告

德国统一纪念日前一天，德国国旗在柏林国会大厦上方高高飘扬。在周一到来的统一纪念日当天，首都柏林也会迎来八方宾客。与此同时，德国联邦政府也公开发布了德国统一现状报告。报告集中阐述了在德国东部地区与日俱增的仇外事件对原本就疲软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安定所造成的影响。

在庆祝统一纪念日之前联邦议会的辩论中，有关德国统一现状报告的讨论十分激烈、分歧不断。左翼党批评政府无能，两德统一之后 1/4 个世纪都过去了，政府还是没能让德国东部地区的居民过上和西部地区同等的的生活。联邦政府则认为他们的批评毫无根据，“关于养老金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即至 2020 年将实现东西部地区的均衡调整”，基民盟 / 基社盟党团议员豪普特曼反驳道。

针对报告中指出的德国东部地区的仇外事件，东部各联邦州州长认为仇外事件并不仅仅是新联邦州独有的问题。对此，来自社民党的新联邦州特派专员伊雷斯·格莱科女士反驳道：“现在人们都在谈论新的东部仇外

事件，数据也十分清楚，极右翼暴力事件在德国东部急剧增长。从居民人数比例来看，东部地区暴力事件的数量远远高于整个德国的平均数。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希望这一现象自然消失，无为而治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不听、不看、不说吗？”

左翼党议员苏珊娜·卡拉万斯基在讲话伊始就提到她最近在自己选区一再听到的一句话——“你要是想有所发展，你只能去西部地区”。卡拉万斯基认为，东部地区的经济状况是人们产生仇外情绪的原因。她讲道：“东部地区贫穷、陈旧而且极右，这当然很糟糕，可是这种状况既不新鲜又不让人意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卡拉万斯基指责联邦政府缺乏一个面向未来的方案，两德统一之后 1/4 个世纪都过去了，而德国联邦政府依然没能消除德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实现两个地区的均衡发展。她接着表示：“东部地区的人们努力工作、积极储蓄，但是仍然被视为二等公民。我们不想再等上 1/4 个世纪了。”因此，左翼党要求通过税收的方式来实现东西部地区养老金的均衡。

针对卡拉万斯基的批评，基民盟 / 基社盟党团议员马克·豪普特曼回应道：“对于养老

金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左翼党发起的这类全民辩论。”豪普特曼认为，联邦政府至今已经实现了很多目标，例如东部地区人均寿命的提高、创业的新发展、国际知名企业的投资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增加等等。“我再也不想听到左翼党的抱怨了，我对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他接着说道。

在豪普特曼发言过程中，左翼党团提了一个问题：“在我的选区中，全职工作的人有一半在退休后会陷入贫困。这难道也是抱怨吗？”对此，豪普特曼也用统计数据进行了辩驳。绿党党团主席卡特琳·歌林-埃卡尔特也批驳了左翼党的观点：“并不是整个东部地区的状况都是这么差。”她强调外国人所占的比例在德国新联邦州并不高，东部地区仇外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没有认真反思纳粹德国时代的问题，包容、开放和民主精神是东部地区现在应该重视的精神。^①

在过去一年中，德国东部地区右翼极端分子和仇外分子发动的袭击事件与日俱增，令联邦政府十分担忧。德国统一现状报告中提出，在拒绝接受难民这件事情上，普通公民的抗议和右翼极端分子的煽动滋事已经混淆不清。无数针对难民和难民营的袭击，以及各种暴力不法事件都成为了仇外情绪的标志。这些事件对德国东部地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报告指出：“仇外情绪、

右翼极端主义和不包容的态度都会极大危及新联邦州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只有成为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区域，让所有在此居住的人们都能安居乐业并且参与社会生活，德国东部地区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在报告中还提到，解决极端主义的问题是联邦政府需要面对的一项紧迫而且长期的任务，政府需要着手解决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挑战。^②

新联邦州特派专员伊雷斯·格莱科认为，多数德国东部地区居民并不仇视外国人，可惜的是，目前他们只是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占多数的这些人应该让大众听到他们的声音，并且教育那些右翼分子安分守己。

令人遗憾的是，此次联邦议会辩论并没能就东部地区右翼极端事件频发一事给出明确的答案。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德国统一现状报告中提到的右翼极端主义和东西部地区生活水平差异等问题，就连同在一个执政联盟的不同党派成员也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③

二、80岁老人批评德国选择党成为脸谱网明星

住在巴伐利亚州格雷斯里德的一位80岁退休老人约亨·乌尔斯特给《南德意志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批评了德国选择党

① Aykanat, Deniz: Wenn du was werden willst, musste in den Westen gehen, 30.09.2016,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bundestagsdebatte-wenn-du-was-werden-willst-musste-in-den-westen-gehen-1.3185866>, Süddeutsche Zeitung, letzter Zugriff am 30.10.2016.

② cte/AFP: Fremdenhass im Osten bereitet Regierung Sorge, 21.09.2016,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fremdenhass-im-osten-bereitet-bundesregierung-sorge-a-1113185.html>, Spiegel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30.10.2016.

③ Finthammer, Volker: Mehrheit der Ostdeutschen ist nicht fremdenfeindlich, 30.09.2016,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regierungsbericht-zum-stand-der-einheit-mehrheit-der.1766.de.html?dram:article_id=367344, letzter Zugriff am 30.10.2016.

对难民的态度，他表示“再也听不下去德国选择党对难民问题无休无止的抱怨了”。乌尔斯特鲜明的态度、清晰的语言以及恰当的逻辑赢得了众多关注，使他立刻成为了脸谱网的明星。^④

这封批评德国选择党的读者来信最初刊登在《南德意志报》周末版上，信中乌尔斯特指责了德国媒体和政界对难民问题缺乏信心。一位读者在周一时把这封信拍下来发到了脸谱网上。到周四晚上，这封信共收到4000多次点赞，被转发近9000次，并附以各种好评。或许是由于乌尔斯特清晰的立场，或许是由于他的人性和胆识，也或许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组合，使这位80岁老翁的读者来信在脸谱网上迅速引起了轰动。对此，乌尔斯特完全没有预料到。当他在周三第一次在社交网站上看到大家对这封信的反响时，他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这实在太让我惊讶了。”一周前，乌尔斯特用邮件把读者来信寄给《南德意志报》，然后就去度假了。

对于自己的信在社交网站上被广泛转发，乌尔斯特感到心情复杂。他说不喜欢脸谱网，自己从来不使用脸谱网，也对类似的社交平台保持距离。他认为，这些社交网站会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无人知晓，而对这些社交网站进行监控也很难实现。因此，乌尔斯特从未在任何社交网站注册会员。对他来说，简单的互联网和手机就足够用了。他还是喜欢从传统的印刷文献获取信息，不希望自己在网络上受到太多关注。

乌尔斯特自认为是一个热心政治的人，经常听收音机，喜欢读报纸，尽管由于眼疾问题他现在读报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我并不是一位怒气冲冲的公民”，他解释道。他

之所以提笔写了这封读者来信，主要原因是看到德国选择党在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的州大选中取得成功，以及政治家们面对极右翼党派的无能态度。“我心里积压了很多话想要说”，他这样说道。

乌尔斯特出生于乌尔姆，在蒂宾根完成医学学业，随后在美国完成了两年的专业医生培训，之后回到德国，在一所医院担任麻醉医师和急诊医师。由于工作压力极大，他几乎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家庭。“这让我完全垮掉了”，他说道。因此，他先是转行为一家医疗出版社工作，翻译并编辑英文专业文献。然后又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家到不伦瑞克，在那里的工业大学做关于航空航天生理学领域的报告。七年前，已经退休的乌尔斯特和妻子一起住到慕尼黑郊区的格雷斯里德。

乌尔斯特了解寄人篱下的陌生人所面临的处境，他对自己所经历的艰苦时日一直记忆犹新。二战即将结束时，他刚刚九岁。他的父亲在俄罗斯战场上成了战俘，一直被关押到四十年代末期，是母亲独自一人把他和他的三个姐妹抚养成人。他们的家被空袭炸弹炸毁了，乌尔斯特只能和三个姐妹跟着母亲逃到了离乌尔姆二十公里以外的农村生活。“当时，我就是个陌生人”，他回忆道，也不知怎样他们总算还是熬过来了。

针对现在的难民危机，乌尔斯特批评德国的媒体和政界太缺乏信心了。与其整天谩骂，不如立刻果断行动起来。难民当然会造成费用，可是这些难民也实在是没有出路才背井离乡的，换成德国人也一样得这么做。也许，再过上十年或者十五年，其他国家反倒会羡慕德国有这么多新的劳动力和专业人才呢。

^④ (Verfasser unbekannt): AfD-kritischer Leserbrief: 80-Jähriger wird zum Facebook-Helden, 30.09.2016, <http://www.merkur.de/politik/afd-kritischer-leserbrief-80-jaehriger-wird-facebook-helden-6799809.html>, letzter Zugriff am 30.10.2016.

在信中，乌尔斯特反对德国选择党为取得胜利而对难民政策不断进行指责和抱怨，他支持联邦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并且这样写道：“我们德意志民族难道是一群胆小鬼和缩头乌龟吗？作为基民盟的主席，我们的总理是欧洲唯一真正坚守基督教教义的领袖，那就是去帮助落难的弟兄姊妹。”乌尔斯特还提到《圣经》新约中慈悲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路加福音中也多次出现爱众人的呼吁，“慈悲的撒玛利亚人在帮助别人时，考虑过自己会失去金钱和时间吗？他们就是直接去助人了，就像我们的总理一样。”在信的结尾，乌尔斯特呼吁：“我们是经济强大的八千万人的民族，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当然能处理好难民问题，也能处理好德国选择党的问题。”^⑤

这封信让脸谱网的读者产生共鸣，“就是这样！”，“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乌尔斯特医生太棒了，他有能力去参加联邦总理的选举！”，读者们在评论中这样写道。^⑥

三、中学生希望多开设政治课

最近，德国巴伐利亚州中学生委员会代表再次呼吁，希望文化部和学校多开设政治课。学生和老师们抱怨，政治课在教学大纲中所占的比例太少。他们认为巴伐利亚州的政治课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从课程命

名来看，在这里政治课一直被称为社会学课；从课时来看，在高级中学，学生们只是在高中最后三年每周有一节政治课。而在初级中学，学生们只在毕业那年才有政治课。^⑦

目前，巴伐利亚州很多高级中学有望再回到九年学制。对巴伐利亚州中学生委员会和历史教师而言，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强化高级中学的社会学课程教学。即使在八年制中学，也应该在初中阶段就开始每周讲授两节社会学课程，巴伐利亚州政治教育协会副主席米歇尔·施罗德表示支持学生们的要求。他说：“恰恰是在当前欧盟危机、国民内战以及中东局势不稳的情况下，学校需要通过政治课来避免青少年被极端分子引入迷途的危险。此外，在学校政治教育方面，巴伐利亚州一直排在全国的末位。只有加强社会学课程以及对教师的培训，才能让巴伐利亚州有朝一日摘掉最后一名的帽子。”

巴伐利亚州绿党主席艾柯·哈利斯基也认为，中学生应该被教育成为民主人士，可是一个民主的人并不是天生的，男孩和女孩们应该在青少年大会中系统地了解民主。巴伐利亚州中学生委员会代表阿赛娅·阿克塔斯指出，仅在高级中学最后三年和初级中学最后一年讲授社会学课程根本不够，学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政治问题。^⑧

近年来，德国社会各界一直在批评年轻

⑤ Engel, Benjamin: 80-Jähriger landet Facebook-Hit mit AfD-Kritik, 29.09.2016, <http://www.sueddeutsche.de/muenchen/wolfratshausen/afd-kritik-jaehriger-landet-facebook-hit-mit-afd-kritik-1.3183705>, Süddeutsche Zeitung, letzter Zugriff am 30.10.2016.

⑥ Bleier, Claudia: Emotionale AfD-Kritik 80-Jähriger landet Facebook-Hit, 30.09.16, <http://www.berliner-zeitung.de/24829214>, Berliner Zeitung, letzter Zugriff am 30.10.2016.

⑦ Anna Günther: Der Politikunterricht ist die größte Baustelle an bayerischen Schulen, 25.09.2016, <http://www.sueddeutsche.de/bayern/bildung-der-politikunterricht-ist-die-groesste-baustelle-an-bayerischen-schulen-1.3178155>, Süddeutsche Zeitung, letzter Zugriff am 30.10.2016.

⑧ (Verfasser unbekannt): Schüler fordern mehr Politikunterricht, 28.09.2016, <http://www.sueddeutsche.de/bayern/bildung-schueler-fordern-mehr-politikunterricht-1.3182876>, letzter Zugriff am 30.10.2016.

人对政治和大选缺乏热情。例如，在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伦敦上千名年轻人抗议英国脱离欧盟，可是他们当中参加了公投的人却为数不多。在巴伐利亚州也是一样，十几年来选举参与率一直在下降，2013年选举参与率才略有提高。在这方面，政治家们是完全可以发挥积极影响的，他们完全可以激发这些未来的选民对民主以及民主的优点产生兴趣。

巴伐利亚州的社会学课程不应当只介绍宪法和政治体制方面的知识，还应该教育学生们要有自我责任感，有能力理解复杂的现实问题。这些都应当写到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和普通中学的教学大纲当中。目前开设的社会学课程完全不能满足学生们了解政治、

参与讨论、积极行动和体会民主的需求。

然而，这些呼声在巴伐利亚文化部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很多人认为，当有新的热门话题出现的时候，教师完全可以有空间灵活安排。在十年级之前，其他学科也可以承担政治教育的任务。况且，很多家长都反对学校增加新的课时，一旦增加了政治课，又该减掉哪些其他课程呢？对此，巴伐利亚历史教师协会主席大卫·丹宁格尔表示：“目前，从五年级直至高中毕业，历史课都是中学生必修课，可以把历史课往政治课方向进行一些微调。更多的社会学课程不会给学生带来负担，学生们非常愿意参与讨论，也会提出很多政治方面的问题，例如关于特朗普和希拉里的。”^⑨

作者简介：史笑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⑨ Anna Günther: Der Politikunterricht ist die größte Baustelle an bayerischen Schulen, 25.09.2016, <http://www.sueddeutsche.de/bayern/bildung-der-politikunterricht-ist-die-groesste-baustelle-an-bayerischen-schulen-1.3178155>, letzter Zugriff am 30.10.2016.

热 词 诠 释

Kreativwirtschaft 和 Gamification

徐四季

一、创意经济 (Kreativwirtschaft)

“创意经济”这个概念是由英国政府最先明确提出的。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在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报告》中首次对创意经济进行了定义：“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经济学家霍金斯(John Howkins)在《创意经济》(2001)一书中，从产业角度给创意经济做了界定，他把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知识产权有四大类：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每一类都有自己的法律实体和管理机构，每一类都产生于保护不同种类的创造性产品的愿望。霍金斯认为，知识产权法的每一种形式都有庞大的工业与之相应，加在一起“这四种工业就组成了创造性产业和创造性经济”。

自这一概念正式提出，西方理论界率先掀起了一股研究创意经济的热潮。佛罗里达(F. Florida)从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出发，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和创意经

济时代四个时期。他认为，1980年以来，虽然服务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创意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有着超越服务经济的趋势，因此创意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在创意经济时代，一国经济不再主要是由自然资源、工厂生产能力、军事力量，或者科学和技术构成，各国围绕一个中心竞争，即是否能动员、吸引和留住具有创意才能的人才；因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技术，也不是信息，而是创意。创意经济理论的核心要素是“3T”，即创意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Tolerance)。每一个都是创意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相应地，佛罗里达设计了一套衡量创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由人才指标、科技指标和宽容指标组成，三者权重各为1/3。按照他的计算，在世界各国的创意经济水平排名中，瑞典排名第一，日本排名第二，芬兰排名第三，美国排名第四，中国名列第36位。

学界评价：其一，创意经济理论建立在新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之上并声称找到了保证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知识和创意代替自然资源和有形的劳动生产率成为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其二，创意

经济理论反映了新经济竞争优势的来源和竞争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随着创意经济时代来临，“脑力”及“创意”密集型产业已渐渐取代了“土地”和“劳力”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资本也不见得是财富。今天，投资驱动型经济已经走到尽头，我们须走向创新驱动型经济与知识驱动型经济的领域。其三，创意经济理论吸收了新经济社会学等理论精华，特别强调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四，创意经济理论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

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提出了创意立国或以创意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创意产业已经被提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如德国和欧盟）发展的战略层面。据统计，2014年，德国文化和创意产业的从业者人数已经超过100万，其中包括24.9万左右独立的自由职业者和工商业企业主以及80多万有参加社会保险义务的雇员。如果将微型工作也计算在内，那么德国文化和创意产业的从业者人数将达到160万左右。同前一年相比，2014年参加社会保险义务的雇员总数增加了2%多。同年，24.9万家企业的总销售额超过了1460亿欧元。2014年，文化和创意经济实现了约675亿欧元的价值创造，对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2.3%。因此在德国，文化和创意产业已经成为能与大型工业部门（如汽车、机械制造和化工）或服务业和能源供给相提并论的行业。但和加工业（如化工、汽车和机械制造）相比，德国文化和创意经济的出口导向要弱得多，并且该产业的出口率在2009—2011年间呈现出下降趋势。

二、游戏化（Gamification）

游戏化是指在非游戏环境中将游戏的思维和游戏的机制进行整合运用，以引导用户

互动和使用的方法。游戏化可以增加受众参与度、忠诚度和乐趣，它能在互联网、医疗/健康、教育、金融等领域中影响到用户使用时心理倾向，进而促进用户的参与与分享。应用到商业上，游戏化产品借助游戏技术吸引用户，并通过鼓励、期望的行为使人们参与、沉浸到游戏中，最终反复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游戏机制是组成游戏的基础，包括点数、勋章（成就）、等级、排行榜和奖励。整合这些元素就可以为用户提供一个从入门到精通的驾驭体系；换言之，这些元素是用户在游戏中步步制胜的里程碑。游戏化是通过内部激励和外部刺激，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让用户寻找乐趣和享受的过程。下面是对游戏机制关键元素及其功能的说明：

- **点数**：点数被用来检测用户行为、记录成绩和提供反馈。从人们广为熟悉的信用卡消费积分到学区技术防范体系，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点数系统。其基本作用都是来自人们对保持分数和分享反馈的内在欲望，它们是塑造用户行为重要的游戏化工具。
- **勋章**：勋章用来作为用户达成某一特定目标结果的体现。在游戏设计中，勋章和奖杯以及其他用于表示完成度的符号，都归于“成就”的范畴当中。获得勋章能够让用户体会到成功，由此产生游戏化系统与用户之间沟通的触点，让用户欲罢不能，促使他们不断回到游戏当中。
- **等级**：等级是用户进步的结构层次，通常以渐进的数值和一定的价值标准来表示，如铜、银和金。在给定的系统中，等级以简单、快速的方式呈现用户的业绩，它的存在让用户感受到自己的进步，由此获得成就感。
- **排行榜**：排行榜通过从高分到低分以降序方式依次列出用户的排名。它能够让

用户迅速、明确地理解排名情况，激发他们强烈的竞争意识，形成有力的刺激。

- **奖励：**奖励可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即由内在自发产生的奖励和外部提供的奖励。一个优秀的游戏化系统要设计一套

能够在合理利用外部压力的同时，激发用户内在欲望的奖励机制。虽然一般的奖励系统都会提供一些现金类的物质奖励，但游戏化更多的是依靠心理和虚拟奖励来驱动有意义的消费行为。

作者简介：徐四季，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Big Data 和 Smart Data

关海霞

一、大数据 (Big Data)

Big Data (大数据), 或称巨量资料, 海量数据, 它不是一个单个的技术, 而指的是一类新发展的方法和技术集群, 通过这些手段, 可以获取、储存和分析任何不同结构和领域的大量数据。这些技术手段在 IT 行业, 以及经济、科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得以广泛使用, 是信息技术领域一个新的创新课题。大数据几乎无法使用大多数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处理, 而必须使用“在数十、数百, 甚至数千台服务器上同时平行运行的软件”(计算机集群是其中一种常用方式)。

Big Data 从本质上来讲有三个特点, 这三个特点被称为“3V”。即: 数据量 (Volume)、时效性 (Velocity)、多样性 (Variety): ^①

- 数据量 (Volume): 指由于社会不断进步的数据化进程, 我们现实生活中所有领域不断产生的海量数据并且每两年就会翻倍。
- 时效性 (Velocity): 指处理的时效。以

前, 数据可以一部分、一部分获取, 然后逐步分析。而现在, 由于网络化以及电子通信的发展, 数据都是不间断地产生, 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必须迅速、及时地进行处理和分析。Big Data 一个重要用途是做商业趋势预测, 如果处理的时效太长, 就失去了预测的意义。所以处理的时效性对于 Big Data 来说, 非常关键。比如, 500 万笔数据的深入分析, 可能只需 5 分钟的时间。

- 多样性 (Variety): 指数据来源多种多样, 比如来自社会网络、相片、影音、MP3 数据、微博、搜索引擎、推特、电子邮件、网络电话、音乐串流或智能设备的传感器等完善的结构性、非结构性的数据。

Big Data 是近来的一个技术热点, 这主要归功于近年来互联网、云计算、移动和物联网的迅猛发展。它的重要性也不在于你有多少数据, 而是在于用这些数据你能做什么。

① Deutscher Bundestag: Aktueller Begriff Big Data, 11.06.2013, <http://www.bundestag.de/service/suche?suchbegriff=Big+Data>, letzter Zugriff am 07.11.2016.

使用者可以从任何一个数据源提取数据，通过分析，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能够帮助你比如降低成本，减少时间，开发新产品或者优化产品以及做出明智的决策等。

在商业领域，大数据的经济价值被看做是除劳动力、资源和资本之外的“第四个生产要素”。因为通过对掌握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获得的信息，被看做是具有前瞻性的。在这些信息的指导下，企业可以采取更好的市场营销战略，或者通过其消费者反馈的信息和消费行为，掌握新产品的开发方向，或采取优化物流过程，减少成本。而在公共管理领域，人们可以通过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从而获得更多有效的管理手段。比如，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为了改善交通管理，政府部门把气象数据和交通数据（比如事故率、交通堵塞以及录像）关联进行分析，从而降低了20%的交通成本和排放量，机动车行驶时间也降低了50%。^②

大数据的出现提升了对信息管理专家的需求，Software AG、甲骨文、IBM、微软、SAP、易安信、惠普和戴尔已在多间数据管理分析专门公司上花费超过150亿美元。在2010年，数据管理分析产业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并以每年将近10%的速度成长。^③

二、智能数据（Smart Data）

Smart Data，中文译为：智能数据。现

在，人们都在谈“大数据（Big Data）”。但是，对于工业界、服务领域、移动通信行业、医疗业、能源行业以及其他一些行业来说，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如何从大量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④所以，数据只是“大”，并没有太大意义，关键是如何最佳地挖掘高价值的信息，使用这些数据，分析这些数据，使这些数据成为“智能数据”。

但是，在使用大量数据的时候，到底什么是“智能的”数据呢？这有几个方法：先评估数据的价值和将会产生的价值；使数据和“智能化”相关联；把数据变成具有上下文意义的灵活的数据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这些收集了的大量数据，展现一幅绚丽多彩的智能数据图。^⑤到最后，也不会再去思考大数据与智能数据有何区别，因为所有的数据都已经成为智能数据。

相比大数据只关注数据的量不同，“智能数据”是从不同的、完整的大量数据中挑选出来，在量的基础上，“智能数据”更注重数据的“质量”，即数据的安全、数据的保护和数据的使用效果。

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智能系统，就是通过智能数据建立的。我们经常提到智能手机、智能电表、智能电网、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都是希望人们使用的设备和终端能够根据人们的需要自动编程，实现自动化，尽量避免人工介入。

② Ebenda.

③ (Verfasser unbekannt) : Big Data,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3IZB82LMIZksTNyrYthOsuMkFOQQcC6q1wODr964wxNt3Xafltbqm4TZaEAOhzhKe03ZG6oMeP-bYGXgdmQw6HuY1vM-GKufUslhHvoY8nu>, letzter Zugriff am 07.11.2016.

④ (Verfasser unbekannt) : Neue Broshuere der Begleitforschung: Smart-Data-Technologien, 05.11.2015, , letzter Zugriff am 07.11.2016.

⑤ (作者不详)，从“大数据时代”到“智能数据”，2014年10月27日，<http://money.163.com/14/1027/09/A9I71V9S00253B0H.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11-1。

这样一种“智能化”，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管道化”（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是“管道化思维”），就是把所有的终端或节点全部连接起来，互相之间能够有“沟通”（即发生交互作用）；另一个是各个终端本身具备一个“小电脑”，即带有处理器芯片，可以通过软件处理和产生“智能数据”。有了这两个基本条件，就可以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智能。^⑥

智能数据将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例如一家跨国公司可以设立一个全球维修中心，全球各个分部的工厂都设有大量传感器并与网络相连，只需要在这个中心分析大量的远

程智能数据，就可以进行远程诊断和处理，而不需要技术人员到现场。

在未来，智能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智能系统每时每刻发生了什么，更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甚至还可以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基于互联网的物联网（IoT）的到来，预示了新的创新设备、新的网络形态、新的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也预示着智能数据的成千上百倍增长，智能化将体现在各种应用中。大数据必须演变成智能数据，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城市才会向“智能化”大步演进。

作者简介：关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⑥ 同上。

政治舞台

2017 年德国大选前瞻

吴 江

【摘要】特朗普的获胜促使德国各政党提前开启了2017年德国大选的序幕。围绕“政治家”和“政党”这两个大选年的常规类关键词，2017年德国大选将聚焦以下三个问题：是否继续选默克尔当总理、是否继续组成大联合政府以及是否开启三党联合执政。在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德国2017年大选同时还要面临特殊挑战。如何提防恐怖袭击搅局？如何提防虚假新闻搅局？如何走出“后真相时代”的困境？德国政界需要缜密的规划和智慧的思想。

【关键词】2017年德国大选 大联合政府 舒尔茨效应

2017年是德国的“超级大选年”：2月进行总统选举；3月和5月萨尔州、石荷州以及北威州将相继迎来州议会选举；9月中下旬将迎来联邦议会大选（以下简称德国大选）。尤其是此届德国大选将左右德国乃至欧洲今后几年的政治走向，引发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本文旨在对2017年德国大选聚焦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进行前瞻。

一、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对2017年德国大选的影响

2016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成功赢得大选，登顶美国新一届总

统宝座。一时间，德国舆论一片哗然。

德国政界对特朗普的获胜普遍感到意外和震惊。时任德国总统高克在表态中指出特朗普的获胜意味着接下去的几年欧洲将面临挑战；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其表态中强调德美只有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携手合作；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直接指出特朗普的胜利并不是许多德国人希冀的结果，并认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将会“更频繁地单干”，“许多事情将变得艰难”；德国副总理、经济和能源部长加布里尔将特朗普的当选视为“对德国人的警告”；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对此次美国大选的走向感到“强烈的震惊”；^①德国绿党议会党团两主席认为柏林墙倒塌日产生

^① Von Schock bis Jubel. Reaktionen auf den Trump-Sieg, <http://www.mdr.de/nachrichten/politik/inland/reaktionen-us-wahl-trump-sieg-100.html>, letzter Zugriff am 30.12.2016.

的这一选举结果是在提醒德国人民要坚决捍卫民主、正义以及自由。^②

不过，与多数政党对这一选举结果持保留态度不同的是，右翼民粹党—德国选择党的主席彼德里在推特上公开发文，表示特朗普的当选是“崭新的开始”，此次美国大选结果创造的机会“史无前例”。^③

西方知识精英纷纷担心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可能会埋葬一直以来由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并在世界各个区域引发难以掌控的冲击波。^④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的获胜直接在德国催生了三件事，让德国2017年大选迅速白热化，德国各政党提前开启了竞选模式。

1. 施泰因迈尔成为总统候选人

2016年6月6日，德国时任总统高克因为身体和精力的原因宣布不谋求连任，德国政坛开始了艰难的寻找总统接班人的工作。提议的人选中德国现任外长施泰因迈尔的人气指数很高，经验丰富，年龄合适，是出任总统的理想人选。但由于来自基民盟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一直希望由基民盟内部产生总统人选，对由社民党人施泰因迈尔出任总统的提议不置可否。自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正式提名施泰因迈尔为总统候选人以来，默克尔也一直三缄其口。直至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默克尔改变了看法。11月14日，默克

尔领导的联盟党赞成社民党的提名，施泰因迈尔正式成为德国大联合政府共同推荐的下一届德国总统候选人。此举被媒体视为在动荡的年代释放出的稳定信号。鉴于施泰因迈尔的能力和口碑，2月中旬赢得总统选举应无悬念。

2. 默克尔正式表态谋求连任

自2005年以来，默克尔领导联盟党在德国联邦大选中获得“三连冠”，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也使得2017年的大选是否仍旧由默克尔挂帅出征成为德国媒体2016年下半年的焦点话题。行事一贯谨慎稳妥的默克尔在是否寻求连任这一问题上一直闪烁其词，表示要等到2017年初才能正式表态。特朗普获胜后，《纽约时报》将德国总理默克尔称为“自由的西方世界的最后捍卫者”^⑤。11月17日至18日，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专程到德国进行告别访问，访问期间奥巴马盛赞默克尔，并称如果他是一名德国人，会投票支持默克尔。^⑥就在奥巴马结束德国行程的第二天（11月20日），默克尔正式表态将谋求连任。

3. 基民盟和基社盟关系的改善

长久以来，德国的基民盟和基社盟以姐妹党自称，虽然也曾有过矛盾，但大都不伤

②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trump-deutschland-103.html>, letzter Zugriff am 30.12.2016.

③ Von Schock bis Jubel. Reaktionen auf den Trump-Sieg, <http://www.mdr.de/nachrichten/politik/inland/reaktionen-us-wahl-trump-sieg-100.html>, letzter Zugriff am 30.12.2016.

④ Detlef Nolte, Pascal Abb, Henner Fürtig, Robert Kappel: Donald Trump und das außenpolitische Erbe von Barack Obama, <https://www.giga-hamburg.de/de/publication/donald-trump-und-das-aussenpolitische-erbe-von-barack-obama>, letzter Zugriff am 03.01.2017.

⑤ CDU-Spitzenkandidatur. Merkel-die Alternativlose,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merkel-kanzlerkandidatur-107.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3.01.2017.

⑥ Obama warnt Trump vor „Deals“ mit Russland,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inland/obama-und-merkel-plaedieren-fuer-14532515.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3.01.2017.

和气。不过难民危机使得由这两个党组成的联盟党内部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在有关是否设置接收难民上限的问题上两党意见不一致。就在特朗普获胜后不久，联盟党为12月初的党代会推出了纲领性提案，主要关键词为“退休金、家庭以及难民”，明确打出要争取“现代化输家”的旗号。难民政策方面明确提出绝对不允许再次发生一年之内涌入100万难民的情形，不能重蹈2015年的覆辙。基民盟和基社盟关系的改善被看做是2017年大选背景下的同仇敌忾。正如基社盟主席泽霍夫在接受德国《南德意志报》采访时提到的那样，“是我们两党寻找共同点的时候了，以便在联邦大选中同舟共济”。^⑦

二、德国2017年大选聚焦的常规话题

根据德国的选举制度，凡年满18周岁具有德国国籍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每位选民拥有两张选票。第一票用于选出选民所在选区的议员候选人，第二票用于选举政党。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一届联邦议院大选，选举自始至终绕不开“政治家”和“政党”这两个常规类关键词。2017年围绕“政治家”和“政党”展开的常规话题将聚焦以下三点。

1. 是否继续选默克尔当总理

从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2016年下半年在州议会节节失利的选举结果能够看出，一些选民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颇为不满，不希望默克尔继续执政；还有一些选民对执政12年之久、一直占据总理宝座的默克尔开始了审美疲劳，尖锐的批评者更是指责默克尔未能培养接班人。不过令这些选民纠结的是，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即使

受到指责，但基于德国特殊的历史经历，德国人很难全盘否定默克尔的“欢迎政策”；更让这些民众揪心的是无论是联盟党还是社民党，德国传统的两大诞生总理的所谓“全民党”都没有比默克尔更为合适的总理人选。而且，虽然执政12年，历经多重危机，默克尔在国内的执政地位没有受到根本动摇。这当然得益于她的个人能力、良好的口碑，尤其是近些年德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使得即便是面临执政以来的第四次联邦大选，从目前来看很难找到真正能与她匹敌的政治家。如果回顾德国战后的历史的话还会发现，来自基民盟的强势总理往往执政时间都很长，联邦德国开国总理阿登纳在位14年，德国“统一之父”科尔执政16年，默克尔有望在执政时间上追平她的“政治教父”科尔。

就在媒体普遍看好默克尔能够顺利开启第四任期的同时，默克尔遭遇强劲对手——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舒尔茨，“舒尔茨效应”使得2017年德国大选开始变得扣人心弦。所谓“舒尔茨效应”是马丁·舒尔茨担任社民党主席以及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以来德国社民党呈现出来的积极发展态势。这一积极发展态势尤以2017年2月份和3月份最为明显。当时舒尔茨受欢迎的程度一度超过了德国现任总理、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克尔，与此同时，社民党民调支持率不断攀升，一度反超联盟党，新增党员人数达到13000名。

然而，好景不长，年初的“舒尔茨效应”并未持续发挥能量，社民党没能保持住上升的势头，连续输掉了三场州议会选举，舒尔茨的支持率也大打折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德国政坛“舒尔茨效应”不再？

1) “三驾马车”带来的叠加效应不再
2017年初“舒尔茨效应”的产生是在在特

^⑦ Merkel räumt Fehler ein. Der neue Ton der Kanzlerin,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merkel-1377.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0.11.2016.

定背景下多种积极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旦背景发生变化,积极因素发生变动,效应所产生的能量注定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

这一特定背景是指社民党在年初较好地解决了总理候选人问题。社民党内部一直存在“三驾马车”的传统,尽管“三驾马车”通常都是由三位能力突出的社民党男性干将组成,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社民党在每次推出总理候选人的问题上总是磕磕绊绊,给选民和媒体留下了很多负面的谈资,也给对手联盟党留下了攻击的话柄。今年的总理候选人问题解决得则比较圆满。

1月25日,时任社民党主席、德国经济部长兼副总理的加布里尔接受《时代》周报和《明星》周刊采访时宣布放弃代表该党竞选联邦总理,同时宣布辞去社民党主席一职。加布里尔的这一高姿态为党内民意基础一直不佳的他赢得了敬意,同时也团结了社民党。该党的左翼马上发出全力支持舒尔茨的信号。可以说“舒尔茨效应”的产生离不开加布里尔退位让贤的铺垫。

2月12日,德国联邦总统选举落下帷幕,德国前外长、社民党人施泰因迈尔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胜利,成为新任德国联邦总统。社民党人施泰因迈尔出任德国总统并非默克尔的初衷,但无奈联盟党未能推出合适的人选,只能接受社民党的提议。在选民心中拥有高支持率的施泰因迈尔出任总统为社民党提振了信心,也为“舒尔茨效应”的产生积攒了人气。

3月19日,舒尔茨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率当选为社民党主席以及社民党总理候选人。

“舒尔茨效应”势不可挡。

然而,这之后加布里尔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外长的新工作之中,施泰因迈尔也不得不面对从社民党外长到超越党派的总统的转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角色的转换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两度出任外长的施泰因迈尔从外交部带来了20多名心腹和得力助手,加之新任总统在“脸书”开户,总统府人事处工作人员集体辞职以示不满。^⑧加布里尔和施泰因迈尔因为面临的新挑战各自转移了工作重心,这也使得舒尔茨无法继续仰仗年初时“三驾马车”形成的合力,而是需要单独挑起大梁。“舒尔茨效应”是否能够持续发挥效应愈来愈直接取决于舒尔茨个人的领导魅力以及社民党本身的竞选实力。

2) 舒尔茨以及竞选班底经验的缺失

德国知名政党研究专家、柏林自由大学尼德迈尔教授2017年5月24日在接受德国媒体n-tv采访时指出,社民党从一开始就缺少有丰富竞选经验的专业人员的指导,舒尔茨不能仅靠缺少竞选经验的心腹恩戈斯以及社民党总干事巴尔利来组织如此重要的选举,社民党需要组建一个更好的竞选班底。^⑨竞选班底缺乏经验导致社民党在很多重要的环节应对不足。例如2017年5月22日,社民党在竞选纲领的推出过程中就经历了一波三折,遭遇了一个“黑色星期一”,先是在日期上反反复复,后来又因为可疑邮包的干扰,社民党总部被清场长达1个半小时,待一切恢复正常后,竞选纲领由社民党总干事巴尔利、德国联邦家庭部长、社民党人施维斯格以及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奥珀曼予以推介,而非

⑧ Constanze von Bullion, Personalrat im Schloss Bellevue tritt aus Protest zurück,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schloss-bellevue-personalrat-im-schloss-bellevue-tritt-aus-protest-zurueck-1.3546852>,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07月07日。

⑨ Gudula Hörr, Der verpuffte Schulz-Effekt. “SPD braucht ein besseres Wahlkampfteam”, <http://www.n-tv.de/politik/SPD-braucht-ein-besseres-Wahlkampfteam-article19855280.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07月07日。

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德国媒体一时间惊呼社民党为何将党主席雪藏。要知道，不担任政府要职的舒尔茨和默克尔相比并没有太多在媒体露面的机会，此外由于不是联邦议会议员，舒尔茨也缺乏和默克尔直接叫板、公开辩论的最佳平台。竞选班底经验的缺失也直接与舒尔茨本人缺乏丰富的国内执政经验有关。19岁加入社民党的舒尔茨的政治生涯始于德国，1984年，31岁的舒尔茨当选为德国亚琛市郊伍尔瑟伦镇的镇长。这之后舒尔茨一直都在欧洲议会工作，2012年至2017年出任欧洲议会主席。不过，欧盟政治家在德国国内并非家喻户晓，再加上近年来欧盟面临的各种危机和挑战削弱了舒尔茨以欧盟政治家重返德国的政治资本。

3) 舒尔茨未能提出合适的竞选主张

“社会公正”一直以来都是社民党的主打牌，今年舒尔茨也不例外，仍以“社会公正”作为竞选的关键词。可是仅仅只靠“社会公正”很难真正触动选民的内心。首先，德国经济已经连续7年实现了正增长，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9个百分点，为近年来的最高值。德国良好的经济形势使得“社会公正”并非德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国际的动荡局势使得德国选民更加关注安全形势，期待政局稳定。引用德国学者冯·卢克的观点，目前的国际局势明显对舒尔茨不利。叙利亚战争以及特朗普在军事上的单干将国际安全、而不是将舒尔茨提出的社会公正这一议题置于核心地位。^⑩而在国际安全领域，现任总理默克尔显然更容易有所作为。此外，随着默克尔对难民政策的调整，德国国内对默克尔不满的情绪也已逐渐平息。

4) 社民党发展面临的瓶颈

随着在萨尔州、石荷州以及北威州地方

选举的三连败，舒尔茨和默克尔的差距越拉越大。州议会选举的失利更多的是社民党常年支持率低迷的结果，以及地方政治家在各州治理中暴露出的问题所致，有的甚至就是地方政治家的错误言行所引发。可以说，社民党面临的发展瓶颈是“舒尔茨效应”昙花一现的深层原因。

与基民盟相比，政党谱系的变化给社民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施罗德时期推出的“2010议程”使得社民党内部被撕裂，造成了许多固定选民的流失。绿党的强大和左翼党的诞生从左侧削弱了社民党的选民基础。随着基民盟往中间靠拢以及选择党的诞生，又从右侧挤压了社民党的生存空间。加之两届大联合政府中社民党均沦落为联盟党的小伙伴，更加导致社民党难以在选民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2. 是否继续组成大联合政府

德国选民并不看好大联合政府，认为大联合政府会导致极左和极右势力的产生，是民主的倒退。默克尔从2005年执政以来已经领导了两届大联合政府，日前右翼民粹党——德国选择党在德国的崛起就被许多专家解读为两届大联合政府的产物，德国媒体也已经开始在发问，德国选择党会不会发展成为邻国奥地利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FPÖ）。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些希望阻止大联合政府的选民却很有可能导致2017年再次诞生大联合政府。因为新的小党的成立和发展势必会使得选票分散，当小党无法独当一面，大党票数萎缩时，大联合政府很有可能在2017年又会是唯一能够组成多数的可行方案。

^⑩ Florian Naumann, Umfrageflaute: Warum bremst der Schulz-Zug?, <https://www.merkur.de/politik/umfrage-flaute-warum-bremst-schulz-zug-zr-8192516.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7年07月08日。

3. 是否开启三党联合执政

如果德国选择党 2017 年顺利进入议会，自民党顺利回归议会的话，那么德国议会将面临六党鼎立的局面：根据 2016 年 12 月 16 日“德国趋势”的民调结果，这六个党按照得票率的多少依次是：联盟党（36%），社民党（21%），选择党（13%）、绿党（10%）、左翼党（9%）和自民党（6%）。^①如果德国选民不愿意看到大联合政府的诞生，那么在党派增多、票数分散的情况下，2017 年的大选很有可能标志德国在联邦层面进入三党联合执政时期。然而三党联合执政是否能够保证政府的稳定性成为了选民的另一个心结。三党联合执政有不同的排列组合形式，日前被政治家和媒体讨论得最多、对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从理论上讲最具杀伤力的是由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红绿”方案。

2016 年 12 月 8 日，德国柏林市诞生了迄今为止德国第一个由社民党人主导的“红红绿”政府。柏林作为德国的首都，同时也是德国最大的城市，其政府组阁形式一直以来都对联邦层面的组阁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尽管在州一级的政府层面已经实现组阁，可是迄今为止这三个党要想实现在联邦层面的联合执政面临很多挑战。“红红绿”的组阁压力主要来自社民党和左翼党的合作，要知道左翼党曾经是作为反对社民党的抗议党而成立的，一旦成功组阁，要么面临和社民党做出妥协，冒牺牲传统选民的风险，要么持续和社民党做对，冒削弱政府执政能力的风险。尤其是外交路线上的分歧将成为社民党和左翼党在联邦层面执政的掣肘。此外，绿党内

部既有赞成与联盟党共同执政的现实派，以巴符州州长克莱迟曼为代表；也有赞成与社民党共同执政的激进派，以绿党资深政治家特里廷为代表。如此看来，如若小党之间能够做出妥协的话，由联盟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黑绿黄”政府（也被称为“牙买加”联合政府）以及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红绿黄”政府（也被称为“交通灯”联合政府）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最终是什么组阁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德国传统的两大所谓“全民党”——联盟党和社民党的较量。

不管 2017 年德国大选最终花落谁家，德国政党生态发生了重大改变已是不争的事实。“全民党”的萎缩、政党定位的趋同、找寻执政伙伴的两难、右翼民粹党的崛起……众多问题夹杂在一起，给 2017 年的大选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三、德国 2017 年大选面临的特殊挑战

在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发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德国 2017 年大选不仅要聚焦常规话题，同时还要面临特殊挑战。

1. 如何提防恐怖袭击搅局

由于周密的反恐措施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德国一直以来都不是恐怖分子容易下手的国度。不过，2016 年发生在德国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德国不再安全。与发生在德国东南部巴伐利亚州的恐袭案件（维尔茨堡火车袭击案、慕尼黑枪击案、安斯巴赫爆炸案）不同的是，2016 年 12 月 19 日卡车冲撞圣诞市场的恐袭事件旨在将恐惧带到德国的政治中心。庆幸的是柏林市大部分民众

^① Infratest dimap Wahlumfragen für die Bundestagswahl in Deutschland, <http://www.wahlumfragen.org/bundestagswahl/> Infratest_dimap-wahlumfragen_bundestagswahl.php, letzter Zugriff am 01.01.2017.

保持了冷静和克制，并未被仇恨和愤怒的情绪所控制。然而，这次恐袭事件折射出的问题，例如反恐措施的疏漏以及难民遣返制度的两难，无不为德国政坛敲响了警钟。伴随着竞选不断白热化，右翼民粹势力将继续利用恐袭带给人们的心理阴影大做文章。一旦德国再次发生类似的恶性恐袭事件，大选舆情将受到直接的干扰。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经指出，德国是一个容易受恐惧困扰、难以抵御精神变态的国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语中的“恐惧”（Angst）一词已经同“旅行背包（Rucksack）”和“幼儿园（Kindergarten）”一样被邻国的语言吸收为外来词，并且其使用频率已经超过后两个词。^⑫如何提防恐怖袭击搅局，德国需要采取更为缜密的反恐策略。

2. 如何提防虚假新闻搅局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发展一日千里。随着 WhatsApp、社交媒体平台脸书、推特以及网络论坛的推广和应用，消息的发布和传播实现了即时性和个性化。然而，实现便捷的同时未能避免新闻的鱼龙混杂。虚假新闻通过新媒体得以迅速传播，欺骗并误导难辨真相的民众，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大选舆情。2016年初，一位生活在柏林的13岁的名叫丽萨（Lisa）的德裔俄罗斯姑娘从学校失踪的消息就曾被别有用心的人包装为虚假新闻，差点酿成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一场外交事故。2016年柏林卡车恐袭案案发后不久，Whats-

App上就有人散布谣言，声称恐怖组织计划针对柏林的购物中心进行袭击。凡此种种，一旦虚假新闻侵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恐惧和紧张的情绪尤其容易被民粹分子利用，影响德国的政治生态。难怪在特朗普获胜后，德国黑森州前州长科赫就指出：政治家必须在马路上和网络上做更多的说服工作。^⑬然而在网络造势方面，右翼民粹党——德国选择党比其他政党明显略胜一筹。2016年11月德国选择党宣称该党在脸书上获得了30万个点赞，排名第二的绿党点赞数为12.9万个，基民盟的点赞数为12万个，社民党的点赞数为11.8万个。^⑭如何利用新媒体宣传真实的新闻，防止容易煽动种族仇恨、侮辱以及歧视的虚假新闻搅局，2017年大选将考验德国的治理能力。

3. 如何走出“后真相时代”的困境

2016年11月，牛津字典公布“后真相（Post-truth）”一词为“2016年度英文词汇”，2016年12月6日，德国语言协会（Die 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Sprache）也将德文“后真相（postfaktisch）”一词选为德国十大年度词汇之首。“后真相”的英文表达在2016年伴随着“英国脱欧”以及美国大选而走红，德国一开始并未广泛引用其德文概念，直到2016年9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针对她所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市议会选举中的失利在党代会上进行自我批评时指出：“近来是在说，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postfaktische Zei-

⑫ [德] 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7以及第156—157页。

⑬ Ralf Neukirch, Roland Koch : Große Koalition ist ein Symbol der Erstarrung, <http://www.spiegel.de/spiegel/roland-koch-grosse-koalition-ist-ein-symbol-der-erstarrung-a-1121924.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1.01.2017.

⑭ Manuel Bewarder, Matthias Kamann, Die macht der Lügen im Netz, https://www.welt.de/print/welt_kompakt/article160272643/Die-Macht-der-Luegen-im-Netz.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2.01.2017.

ten)。这大概就是意味着，人们不再关心事实真相，而仅仅是跟着感觉走。”^⑮ 柏林市德国选择党主席格奥尔格·帕茨德斯基（Georg Pazderski）在接受德国黑森州广播电台采访时的一句表述被认为是“后真相政治”的典型例证。当被问及为何德国选择党从未提及在德国生活的移民 98% 都生活祥和。帕茨德斯基回答道：“这里不仅涉及单纯的数据，而是涉及公民的感受。这也就是说，人们的感受也是事实。”^⑯ 靠真相驱动还是受情绪支配，德国 2017 年大选面临新的平衡挑战。

2017 年欧盟将迎来成立 60 周年的纪念日，“六十耳顺”的中国古训似乎在欧洲并不

灵验，在相继遭遇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以及多国遭遇恐袭之后，欧洲在本该颐养天年之时无奈命运多舛。近年来，德国在欧洲多重危机中一直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从目前释放的信号来看，稳定将成为德国 2017 年政坛的主要愿景。然而，这一愿景却遭遇“超级大选年”。大选与生俱来蕴含的重新洗牌的变革特性使得政治能否实现稳定充满了未知数。老问题和新挑战的叠加使得 2017 年的大选结果更加扑朔迷离。德国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为风雨飘摇中的欧洲以及西方带来稳定的希望，需要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吴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⑮ Angela Merkel und das postfaktische Zeitalter, <http://www.rp-online.de/politik/deutschland/angela-merkel-und-das-postfaktische-zeitalter-die-kanzlerin-und-die-macht-des-wortes-aid-1.6283541>, letzter Zugriff am 02.01.2017.

⑯ Ariane Focke, Das postfaktische Zeitalter. Wenn Tatsachen ignoriert werden, http://www.hr-online.de/website/radio/hr-info/index.jsp?rubrik=47572&key=standard_document_62098268, letzter Zugriff am 02.01.2017.

德国联邦议院的议会党团和各州议会政党

联盟党议会党团

联盟党议会党团（CDU/CSU-Bundestagsfraktion/Unionsfraktion）是指在联邦议院中，由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 简称：CDU）与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lich-Soziale Union 简称：CSU）的议员和支持该联盟党的非党议员所结成的党团联盟。联盟党议会党团于1949年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时产生，Konrad Adenauer为首任主席。主席一般由CDU方出任，CSU方出任第一副主席。现任党团主席自2005年起由Volker Kauder担任，第一副主席为Gerda Hasselfeldt。

西德（巴伐利亚州除外）全体基督教思想的保守主义政党于1950年正式联合为基民盟，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为首任党主席，现任党主席为默克尔（Angela Merkel）。作为CDU的姊妹党，CSU也是基督教思想的保守党，1945年于巴伐利亚州成立后单独执政，现任党主席为泽霍夫（Horst Seehofer）。鉴于独特的宗教和历史渊源，CDU认为国家应以基督教思想和民主联盟为基础，保障人的尊严，主张人人自由平等。CDU自成立起始终代表着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贯彻社会生态市场经济体制，积极融入西方价值及防御体系，致力于国家统一和欧洲一体化，如今的基本价值理念为自由、团结、公正。

CDU和CSU之所以组成议会联盟是基于两党自成立后不存在任何竞争，CSU只在巴伐利亚州活动，而CDU在其余州竞选。全国大选时，两党制定统一的竞选纲领、推选统一的联邦总理候选人。党团在每届任期初始都要更新换代，订立新的“CDU/CSU议会党团延续协议”。在党团内，CSU议员自主管理所代表州的事务，同时党团内的所有事务可适度参与。

联盟党议会党团下设党团大会、主席团、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党团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同时选举主席及专项事务负责人，成立相关委员会；主席负责在议会中领导党团，对内外代表党团，提议召开党团大会及管理相关事务；专项工作组负责研究各项法案和方针政策，并向议会和内阁反馈。

2013年大选，联盟党共获41.5%的支持率（CDU占34.1%，CSU为7.4%），与社民党（SPD）组阁为第18届黑红联盟执政党，左翼党（Die Linke）与联盟90/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为议会在野党。联邦议院席位由4年一度的大选确定，该任期内共630席，联盟党团总共310席，其中CDU占254席，CSU占56席。（郑斯榕）

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

经过2013年9月22日德国联邦议院的

选举，在第十八届立法会议任期中，社民党党团由 193 名成员组成，其中 53 名为直选，135 名出自候选人名单，还有 10 名是超额议席。81 名为女性（占比 42%），新当选 87 名（占比 45%），成员平均年龄为 49.98 岁。社民党议会党团是议会第二大党团，排在联盟党党团之后。社民党党团自 1949 年 8 月 31 日第一次进入联邦议院后便一直在议会中发挥作用。

党团中有三派。绝大多数成员属于“议院左翼”（Parlamentarische Linke）团体，约 1/3 成员属于保守的“泽海姆小组”（Seeheimer Kreis），而处于中间的“网络柏林”（Netzwerk Berlin）约有 40 名成员。“泽海姆小组”和“网络柏林”有一些重合成员，西格玛尔·加布里尔和托马斯·欧珀曼同属于这两派。

党团的核心任务是根据本党的纲领性立场，在现实和可能之间以及议会行事规则下落实具体政策。党团委员会的职责是计划、协调和组织各项工作，每周一下午进行例会，对长期目标提供意见并就议会中的工作进行准备。所有决定是议员根据委员会工作小组经过党团会议讨论后提供的信息而做出的。

自 2013 年 12 月起，托马斯·欧珀曼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他和九位副手、四位议会党团负责人以及其他 25 名成员组成了党团委员会。党团副主席的首要任务是决定特定领域政策方针，协调各自权限内工作小组的工作。党团负责人协调党团管理方面的组织问题。具体工作在委员会工作小组中开展。对于特定议题会委任特派员，社民党有 10 个特派员。在联邦议院有 23 个常设专门委员会，与此对应社民党党团有 23 个工作小组，并派出了 7 位委员会主席。

来自不同州的议员可以组成地区小组并选出发言人。例如柏林、勃兰登堡州、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萨克森州以及不来梅的议员组成了东部地区小组。（吴永德）

左翼党

左翼党（die Linke）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16 日，至 2015 年 12 月共有党员 58989 人。现任党主席为基平（Katja Kipping）和里克辛格（Bernd Riexinger）。

左翼党由原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和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选择党合并而成。民社党前身为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简称统社党）。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选择党于 2004 年成立，成员多是因不满施罗德红绿政府推行“第三条道路”的中间路线，反对社民党右倾而退党的原社民党党员。经过漫长的谈判，两党决定在 2005 年联合组成联邦议会党团参选，并赢得 54 席，2007 年正式合并。

左翼党认为拉大全球贫富差距的并非全球化，而是全球资本主义，须改变政界服务于资本家的现状，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政策方面，主张加强经济治理，发展公有经济，在企业内实行共决制。保障全民福利和免费培训，对富人增税以支援公共事业。缩短工时，完善法定最低工资和解雇保障，禁止廉价工作，取消“哈尔茨 IV”计划（Hartz IV）。消除任何基于宗教、民族、性别和社会地位的歧视，反对歧视穆斯林。提倡发展可再生能源，废除核能。在欧盟层面，呼吁建立民主、和平的“新欧盟”。对外政策上要求裁军、反战，禁止武器出口，撤回海外驻军，停止对第三世界的剥削。

左翼党未曾有过联邦层面执政经验，在 2013 年联邦议院大选中，得票率由 2009 年的 11.9% 跌至 8.6%，占 64 席，再次成为第三大党，稍领先于绿党，但远逊于联盟党和社民党。左翼党联邦议会党团现任领导团队于 2015 年产生，议会党团主席为 Sahra Wagen-

knecht 与 Dietmar Bartsch；副主席为 Heike Hänsel 与 Jan Korte；另由 Cornelia Möhring 兼任副主席与妇女政策发言人。议会党团负责人（Parlamentarischer Geschäftsführer）自 2013 年起由 Petra Sitte 担任。此外 Petra Pau 从 2005 年起任联邦议会副主席至今。

左翼党议会党团下属 6 个工作组，依次是社会福利工作组、卫生与养老工作组，机构与地方工作组，经济、就业与财政工作组，生活方式与知识工作组，民主、法律与社会发展工作组以及外交与国际关系工作组。值得注意的是，议会党团主席 Sahra Wagenknecht 与 Dietmar Bartsch，议会党团负责人 Petra Sitte 与联邦议会副主席 Petra Paul 均为前东德统社党和其继承者民社党的党员，由此看出，该党在议会内或仍将保持其一贯的左派政见。（贾金明）

联盟 90 / 绿党

德国绿党成立于 1980 年的联邦德国，现任党主席为策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和西蒙娜·彼得（Simone Peter）。80 年代后期东德也成立了绿党和联盟 90，它们分别在 1990 年两德统一时和 1993 年与西德绿党合并，并最后更名为联盟 90/ 绿党（以下简称绿党）。

合并后的绿党通过党内改革完善了自身结构，修正了过激生态主张，在 1994 年全国

大选中获得了 7.3% 的选票，一举超过自民党成为全国第三大党。此后绿党也不断调整本党主张同时寻求与社民党的联盟。1995 年，绿党在社民党的传统阵地北威州大选中一举获得 10% 的选票，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此后红绿联盟的组合不断扩大，相继扩展到德国北部的石荷州和汉堡州。这些为红绿联盟在联邦层面执政奠定了基础。^①

在 1998 年的联邦大选中，绿党以 6.7% 的选票在联邦议院获得了 47 个议席，与社民党首次组成了红绿联合政府。在下一届大选中（2002 年）绿党得票率有所上升（8.8%）并继续与社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在 2005 年的大选中，虽然绿党保持了 8% 左右的选票，但是由于社民党席位减少，红绿政府未能继续执政。2009 年，绿党首次突破了 10% 的大关在联盟议院获得了 68 个席位。在最近一次即 2013 年的德国联邦大选中，绿党以 8.4% 的选票进入了联邦议会成为反对党。^②

近几年绿党在州选的表现颇佳，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6 年 3 月巴符州的州选中，绿党以 30.3% 的得票率首次成为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并与基民盟组成了德国史上第一个绿黑政府。^③ 同期举行的另外两州州选，即莱茵兰-普法尔茨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中，虽然绿党得票率仅为 5.3% 和 5.2%，但也成功成为了执政党。至此，绿党已经在德国十六个州的十个州中参与执政。^④（蒋雯菁）

① 张钦：《德国绿党生态主张演变与影响探析》，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系，2015 年，硕士论文。

② 国际在线新闻：《德国大选最新统计结果出炉四政党或可进入议院组阁》<http://gb.cri.cn/42071/2013/09/23/6992s4262423.htm>，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20 日。

③ asc/dpa/afp: Grüne und CDU einigen sich auf Koalitionsvertrag, 01.05.2016,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baden-wuerttemberg-gruene-und-cdu-einigen-sich-auf-koalitionsvertrag-a-1090294.html>, Spiegel Online, letzter Zugriff am 20.10.2016.

④ (Verfasser und Zeit unbekannt): Neuaufstellung im Bund - regieren in den Ländern, <http://www.gruene.de/index.php?id=17531>, letzter Zugriff am 20.10.2016.

德国各州议会政党

巴登-符腾堡州

2016年3月13日在巴登-符腾堡州进行了第十六届州议会选举。绿党获得30.3%的选票，居于首位，首次成为巴登-符腾堡州第一大党。而基民盟在巴符这个“传统票仓”却仅获得了27%的选票，比2011年减少了12%的选票，创下新低，首次屈居第二，让位绿党。与此同时，社民党的支持率也有所下降。与基民盟受挫相对的是，反移民的“德国选择党”轻松跨过进入州议会5%支持率的门槛，在巴符州赢得15.1%的选票，跃居第三大党。本届州议会共有143个议席，其中绿党47席，基民盟42席，选择党23席，社民党19席，自民党12席。最终，绿党和基民盟联合执政，在巴登首次出现黑绿联合执政的局面。绿党党魁温弗里德·克莱切曼（Winfried Kretschmann）连任巴符州州长。

从二战后到上世纪末，基民盟和社民党在巴符州一直处于绝对优势，自民党也以平均10%的选票率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绿党的兴起，绿党支持率逐渐上升，在上一次2011年的州选中超过了社民党，并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取代了执政58年的基民盟政府。2016年绿党再次超过了基民盟。（王欣然）

巴伐利亚州

巴伐利亚州最近一次州选，即第17届州议会选举，于2013年9月15日举行。巴伐利亚州州议会总共有180议席，根据选举结果共有四个党派进入议会，其中执政党基社盟占101议席，社民党、自由选政党（Freie Wähler）和联盟90/绿党分别各占42、19、18个议席。目前巴伐利亚州州长为基社盟党

主席霍斯特·泽霍夫（Horst Seehofer）。自民党得票仅3.3%，无缘进入州议会。左翼党也仅获得2.1%的选票。

巴伐利亚长期以来由较为保守的基社盟统治。从1946年开始，基社盟便在此地拥有庞大优势，未曾中断过执政。由于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的绝对优势所以一般是基社盟单独执政，但在2008年的州选中基社盟取得50余年来最为糟糕的表现，仅获得92议席，使得该党不得不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尽管如此，该党在每次州议会选举中所得票数均过半。近年在巴伐利亚州州长兼基社盟党魁泽霍夫率领之下，基社党的支持率已经出现回升。

鉴于巴伐利亚州在德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该州议会选举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联邦议院选举的风向标，选举结果会对各党派角逐联邦议院选举的士气和策略产生重要影响。而其姐妹党基民盟也关注着巴州州选的结果，其结果反映着联盟党的人气。而近期由于难民问题导致两党龃龉不断，裂痕加深。巴州的下次州选举将在2018年举行，值得各界拭目以待。（王欣然）

柏林

2016年9月18日举行的第十八届柏林地方选举落下帷幕，作为首都的城市州，柏林的选举结果被认为对于观察2017年德国联邦大选具有风向标的意义。柏林是德国最大的城市，共有约250万选民。根据柏林选举组织方的数据，2016年的投票人数较上一届大增7.1%。除了最受关注的难民议题外，柏林人决定投票方向时还关注建设自行车道和住房价格等民生议题。

尽管社民党与基民盟以21.6%和17.6%的得票率保住了柏林议会前两大党地位，但较2011年上届选举分别减少6.7%和5.8%。基民盟在柏林的得票率更是创下了历史性败绩。左翼党和绿党则以15.6%和15.2%的得

票率位居其后。而2013年成立的新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延续了其此前在其他德国联邦州的迅猛势头，在本次柏林选举中一举拿下14.2%的选票，首次跻身柏林议会，成为继社民党、基民盟、左翼党、绿党之后的第五大党。老牌反对党自民党也以6.7%的选票率重回议会。总结来看，在本届柏林议会的160个议席中，社民党38席，基民盟31席，左翼党27席，绿党27席，选择党25席，自民党12席。非主流的盗版党(Piratenpartei)本次选举未能进入柏林议会。

此次选举后，除社民党一家得票率在20%以上、自民党在10%以下外，其余几家政党得票率都难分高下。这意味着社民党接下来将无法维持两党大联盟执政，而不得不寻求与两个小党一道组阁。社民党籍现任市长穆勒尽管能够继续连任，但他此次需要与两个政党联合，才能达到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日前，柏林已经组成了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的红红绿政府。(王欣然)

汉堡

汉堡州，即汉堡市，是德国的第二大城市。在2015年2月15日举行的汉堡州议会选举中，活跃在州议会的六个政党的选举情况如下：社民党得票率为45.6%，较之2011年的上届选举结果(48.4%)减少了2.8%，取得该州议会121席中的58席，失去单独组建州政府的半数优势，与绿党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基民盟比上次糟糕的得票率还低了5.2个百分点，15.6%的得票率是基民盟迄今为止在汉堡州议会选举中的最差成绩，仅取得20个席位。绿党、左翼党和自民党的支持率均未出现大的波动且有所上升，分别为12.3%(增加1.1%)、8.5%(增加2.1%)和7.4%(增加0.7%)。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获得了6.1%的选民支持，突破进入州议会的门槛，首次进入德国西部的州议会。社民党首

席候选人奥拉夫·绍尔茨(Olaf Scholz)继续当选为汉堡市市长。此外，汉堡州议会选举由4年一选延长至5年一选，下一届选举将在2020年进行。(聂嘉雯)

不来梅

不来梅州由原汉萨同盟城市不来梅市和不来梅港组成。在2015年5月10日德国最小的联邦州不来梅州的州选中红绿两党继续联合执政，但议席均有所减少。社民党的得票率为32.8%，比2011年减少5.8个百分点，取得该州83个议席中的30个，仍旧是不来梅市州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绿党选民流失较为严重，丧失了7.4%的选票，只获得了15.1%的选民支持，取得了14个议席。基民盟则以22.4%的得票率从第三大党上升至第二大党。左翼党与上届相比得票率增加了3.9%，以9.5%的得票率稳定了其在州议会中的地位。自民党比上一届2.4%的支持率有所增加，6.6%的得票率使之重新进入到州议会中。值得注意的是，德国选择党首次参与该州州选举就获得了5.5%的选民支持，达到进入议会的5%门槛线。该州州长为社民党首席候选人卡斯腾·西林(Carsten Sieling)。不来梅城市州每4年举行一次州议会选举，下一届选举将在2019年进行。(聂嘉雯)

勃兰登堡州

勃兰登堡州环绕柏林，形成德国的“首都区域”。在2014年9月14日举行的勃兰登堡州州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和基民盟均领先，但都没能获得足够单独组阁的支持率，继续由社民党与左翼党联合执政。社民党的支持率虽然较上届选举减少了1.1个百分点，但仍凭借31.9%的得票率维持了该州第一大党的地位，在该州88个议席的州议会中锁定30个议席，由该党首席候选人迪特马·沃伊德克(Dietmar Woidke)担任勃兰登堡州州长。

基民盟的得票率为 23%（增加 3.2%），锁定了 21 个席位。左翼党遭遇较大滑坡，丧失了 8.6% 的选票，下降至 18.6%，仅取得 17 个席位。绿党的支持率略有上升，达到 6.2%（增加 0.5%）。另外，德国选择党表现强势，首次参选便获得了 12.2% 的高人气支持率，成功跻身该州议会。（聂嘉雯）

萨克森州

萨克森州是德国东部人口最多的联邦州。萨克森州州议会共有 126 个席位，每五年选举一次。最近一次的选举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举行。与 5 年前的州选举相比，大多数政党的得票率都有所下降。其中自民党得票率仅为 3.8%，下降了 6.2%，下滑程度最大，丢掉了州议会的席位。基民盟作为萨克森州传统的最大政党得票率下降了 0.8%，但仍以 39.4% 的得票率保持在该州的领先地位。左翼党尽管得票率下降 1.7%，仍然是萨克森州第二大党和最大的反对党。而 2013 年新成立的德国选择党表现强劲，获得了 9.7% 的支持率并获得了议会 14 个席位。该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右翼阵营的选票。

在新一届的州议会中，各党派议席数为：基民盟 59 席，左翼党 27 席，社民党 18 席，绿党 8 席，德国选择党 14 席。基民盟依然在萨克森州议会中占据领先地位，并与社民党组阁。来自基民盟的斯塔尼斯拉夫·提里希（Stanislaw Tillich）任萨克森州州长。（王惠中）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东部，其州议会共有 87 个席位。最近一次的州议会选举于 2016 年 3 月 13 日举行。在这次选举中，德国选择党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获得了第二高的支持率（24.3%），仅次于基民盟（29.8%），并获得了州议会的 25 个席位，成

为州议会的第二大政党。大多数其他政党的得票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社民党得票率下降了 10.9%，左翼党 7.4%，基民盟 2.7%，联盟 90/绿党 1.9%。

在新一届的州议会中，各党派议席数为：基民盟 30 席，德国选择党 25 席，左翼党 16 席，社民党 11 席，联盟 90/绿党 5 席。基民盟与社民党和联盟 90/绿党组阁。选举后 4 月，基民盟的哈迪·古绍（Hardy Güssau）出任州长，随后 8 月份因被发现参与掩盖施滕达尔选举丑闻而下台。9 月 1 日起，来自基民盟的加布里尔·布拉克布什（Gabriele Brakebusch）担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王惠中）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简称北威州）位于德国西部，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州。目前该州由红绿联合政府执政。作为稳定的多数派政府，社民党和绿党分别占据了 99 个和 29 个议会席位。州长是来自社民党的汉娜洛勒·克拉夫特（Hannelore Kraft），她是北威州第一位女州长，也是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三个女州长。基民盟在 2012 年 5 月 13 日举行的选举中遭遇大滑坡，仅拿到 26.3% 的选票，与 2010 年相比下降了 8.2 个百分点，最终收获了 68 个议会席位，也是自 1947 年以来最差成绩。有分析人士称，基民盟失败原因主要是，许多选民反对默克尔的财政紧缩政策。此外，自民党占据 22 个席位；2011 年才组建的盗版党也越过了 5% 的“议会门槛”，获得了 18 个议会席位。而左翼党在选举中仅收获 2.5% 的支持率，无缘进入议会。

北威州约有 1320 万选民，超过德国选民的 1/5，素有“迷你版”联邦议院选举之称的北威州选举，2017 年的选情也将成为 2017 年秋季联邦大选的方向标。而作为北威州第一大党的社民党在近几年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变

化的同时，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因此在联邦大选中仍面临巨大挑战。（陶晨）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位于德国西部。在欧洲难民危机的背景下，2016年5月13日举行的州议会选举引起了很大关注。

最终投票结果显示，社民党成为州内第一大党，拥有36.2%的支持率，获得39个议席。而基民盟损失三个百分点，获得31.8%的投票率，收获35个议席，失去了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主导权。此前的民意调查中，基民盟候选人朱丽叶·克勒克纳（Julia Klöckner）也不敌社民党候选人玛露·德莱尔（Malu Dreyer）。五年前未能进入议会的自民党再次以7个席位的成绩进入议会。绿党勉强跨过5%的议会门槛，仅取得6个席位。左翼党更是未能取得5%的进入议会的票数，失去了州议会政党身份。引人注目的是，德国极右派的德国选择党是此次选举的最大赢家，首次便以12.6%的得票率进入议会，占得14个州议会席位。

德国选择党此次大获成功，主要归因于它在难民问题上利用民意，对联邦政府的发难，并有希望在2017年选举中进入联邦议院。选举结束的两个个月后，社民党、自民党以及绿党正式组成了由玛露·德莱尔出任州长的“交通灯”联合政府（Ampelkoalition）。此举也避免了大联合政府执政下，德国选择党将成为州内最大反对党的不利情况。（陶晨）

萨尔州

萨尔州（Saarland）位于德国的西部，是德国16个联邦州中最小的一个地区州。萨尔州宪法规定，每五年举行一次议会大选。在2012年3月25日举行的选举中，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领

导的基民盟在选举中获胜，收获35.2%的选票，占据19个议席，继续保持州内第一大党地位。而之前与其一起执政的自民党只赢得1.2%的选票，未能进入州议会。反对党社民党在民调中，支持率与基民盟不相上下，最终获得30.6%支持票，拥有17个议席。左翼党也超过自民党和绿党，成为第三大党，收获9个议席。绿党和盗版党分别拥有2个和4个议会席位。

选举结束的六个星期后，基民盟和社民党就组成联合政府达成一致，克兰普-卡伦鲍尔继续担任萨尔州州长。（陶晨）

黑森州

黑森州的州长一直由社会民主党人担任，黑森州也因此经常被称为“红色黑森”。在2003年的州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第一次获得了议会中绝对多数席位（56席）。1999—2010年，基民盟领导人罗兰·科赫（Roland Koch）担任黑森州州主席。2013年9月22日，黑森州举行了第19次州选。在此次选举中，基民盟以38.3%的选票占据了州议会的47个席位，社民党以30.7%的票数占据了37个席位，绿党获得11.1%的选票和13个席位，左翼党和自由民主党分别以5.2%、5%各占据6个席位。德国选择党第一次参加州选并获得4.1%的选票。选举结果是：基民盟和绿党作为黑森州第一届黑绿联盟共同执政，州长为福尔克·布菲耶（Volker Bouffier）。福尔克·布菲耶是基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担任联邦参议院第69任主席。黑森州的每届选期为5年，因此下一次州大选将在2018年年底举行。（李媪）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

1990年10月26日，就在德国统一23天之后，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议会。在2016年9月4日举行的第7届州选中，选择党得到了将近21%的选票并占据了州议会的18个席位，成为该州第二大党。这已经是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州选中获得的第九次胜利，在上半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中选择党也取得了类似的成绩。社民党以近30%的选票占据了26个席位，但比2011年失去了5%的选票。基民盟的成绩也由23%下降到19%，排在选择党之后。左翼党的票数（13.2%）下降了5.4%，而绿党（4.8%）和自民党（3.0%）甚至未能进入州议会。国家民主党（NPD）也没有进入州议会，该党几乎在2016年的州选举中全面败北。在前波莫瑞州的36个县中，社民党赢得了26个县的选举，比2011年多两个；基民盟赢得了7个县，比2011年减少了5个；同时选择党赢得了3个县的选举。前州长埃尔温·塞勒林（Erwin Sellering）是社民党领导人，在此次大选中又被推举为州长候选人，并获得了92.6%的有效票数。从目前来看，黑红联盟或者社民党与左翼党联合执政的可能性较大。（李婵）

下萨克森州

下萨克森州的最近一次议会选举，即该州第17届议会选举于2013年1月20日举行。在此次大选中，基民盟的票数（36.0%）比2008年减少了6.5%，但仍然是第一大党，并占据了州议会的54个席位。紧随其后的第二大党是社民党（32.6%），获得了49个席位，成绩略有上升。绿党和自民党分别以13.7%和9.9%的选票获得20和14个席位，值得注意的是，绿党的选票有较大增加（5.7%）。而其他党派如左翼党、盗版党等的得票均未超过5%。选举结果是社民党与

自民党联合执政，州长为社民党领导人斯特凡·魏尔（Stephan Weil）。下萨克森州的前任州长中有联邦前总理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 SPD）和现任德国联邦副总理、德国联邦经济及科技部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 SPD）。该州的下一届选举将在2018年举行。（李婵）

图林根州

图林根自由州的州议会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上一次于2014年9月14日（下一次计划于2019年春季）举行。2014年选举结果如下：基民盟以高达33.5%的支持率获得了34个议席，左翼党以28.2%的支持率获得了28个议席，德国社会民主党12个席位（12.4%），德国选择党11个席位（10.6%），绿党获得了6个席位（5.7%）。目前图林根州是左翼党、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现任州长为博多·拉莫洛（Bodo Ramelow）。（冯媛媛）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州议会选举同样也是每五年举行一次，上一次于2012年5月6日举行（下一次将在2017年5月7日）。2012年选举结果如下：基民盟和社民党分别以30.8%和30.4%的支持率各获得了22个议席，绿党以13.2%的支持率获得了10个议席，盗版党和自由民主党各获得6个席位，而区域性政党南石勒苏益格选民协会（SSW）也以4.6%的选票成为该州第六大党派，占据3个议席。目前该州是社民党、绿党和南石勒苏益格选民协会联合执政，现任州长是来自社民党的托斯滕·阿尔比希（Torsten Albig）。（冯媛媛）

作者简介：郑斯榕、吴永德、贾金明、蒋雯菁、王欣然、聂嘉雯、王惠中、陶晨、李婵、冯媛媛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外交观察

欧洲难民危机的由来及其对德国和欧盟的深远影响

梅兆荣

【摘要】201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中东、北非战乱地区形势的急剧恶化，欧洲受到来势凶猛的难民和移民潮冲击，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欧盟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由于默克尔总理处置失当，德国也就成了搅动欧盟内部矛盾的主导因素；不仅如此，德国执政的联盟党内部爆发了公开争论，民众对难民的态度由开始时的“同情”和“欢迎”转变为“厌恶”和“恐慌”，被分配接受难民的州、市、县、镇因不堪重负而怨声载道，代表排外极右势力的“德国选择党”应运而生，一举改变了德国的政党生态，号称“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女强人”默克尔焦头烂额，民意支持率明显下降。总之，难民问题成了困扰德国的重要棘手问题。

【关键词】难民潮 公平分摊 巴尔干通道

201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中东、北非战乱地区形势的急剧恶化，欧洲受到来势凶猛的难民和移民潮冲击，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欧盟面临的最严峻挑战。难民来自叙利亚的居多，但也有来自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的，还有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巴尔干地区乃至巴基斯坦的“经济移民”。作为经济条件最好、对难民态度“最宽容”、保障难民权益的法律“最完善”、提供难民待遇“最丰厚”的德国，成了“难民”和“移民”最向往的目的地国。而由于默克尔总理处置失当，德国也就成了搅动欧盟内部矛盾的主导因素；不仅如此，德国执政的联盟党内部爆发了公

开争论，民众对难民的态度由开始时的“同情”和“欢迎”转变为“厌恶”和“恐慌”，被分配接受难民的州、市、县、镇因不堪重负而怨声载道，代表排外极右势力的“德国选择党”应运而生，一举改变了德国的政党生态，号称“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女强人”默克尔焦头烂额，民意支持率明显下降。总之，难民问题成了当前困扰德国的重要棘手问题。

一、欧洲难民危机的由来

欧洲难民问题是美国及西方国家为输出西方民主而在中东、北非推行“政权更迭”

造成的恶果。美、西方打着支持“民主派”推翻“独裁统治”的旗号，通过赤裸裸的干涉，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愈演愈烈的内战，使原有的国家秩序遭到破坏。在此过程中极端主义势力乘机做大肆虐，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流离失所，不得不向国外逃亡求生。这是中东、北非难民潮产生的根源所在，美国及西方国家难辞其咎。

战乱中无辜平民为生存而逃亡国外，应受到国际社会庇护，这是日内瓦难民公约规定的原则。但安置难民通常以有序和就近原则为宜。由于自然环境、生活习惯、文化语言相同或相似，临近的约旦、黎巴嫩、土耳其收容了数百万难民，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德国前总理科尔不久前在为其著作《忧虑欧洲》匈牙利文版撰写的前言中也指出，就近安置中东、北非难民是合理的，欧洲不可能成为数百万叙利亚难民的故乡。只是由于国际社会援助不足，许多难民营无法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正是在这个时候，2015年9月4日，默克尔总理批准满载未经登记和甄别的难民专列从匈牙利驶入慕尼黑，安排了“热烈欢迎”的场面，并高调宣称接受难民“不应设限”，“我们能做到”，做出了张开双臂、敞开大门欢迎难民的姿态。德国舆论指出，这等于是向中东、北非难民发出了一个向欧洲特别是德国进军的信号，鼓励了不少难民冒险渡海一搏，甚至一些非战乱国家的“经济移民”也加入了难民的行列。因此，欧洲难民危机的形成与默克尔的上述言行不无关系。

二、默克尔难民政策背后的考虑

人们不禁要问，一向精于算计、处事谨慎的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如此胆大自信，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对此，德国前总统

赫尔佐克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对她从不为自己政策做明确说明的执政风格也颇有微词。据知情人透露，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长泽霍夫曾私下质问她究竟是怎么想的？默克尔始终不肯袒露心扉，只是要求给她一些时间，设法减少进入德国的难民数量。综合各方面的分析和推测，普遍认为她内心深处有两大盘算：首先是出于道义的算计。旨在顺应德国民众出于对历史的反思而同情难民的心理，借以塑造个人人道主义精神领袖形象，并展示德意志民族的“善良人性”，洗刷德国历史上的污点；第二是出于德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算计。德国人口由于自然生育率低而不断下降，专家估计每年需要新增30万至50万劳动力才能确保其经济持续增长。据媒体报道，戴姆勒公司总裁曾为借收容难民解决廉价劳动力问题而欢呼；德意志银行的研究报告也认为，接受难民可为德国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一些经济专家们也曾给默克尔出过这方面的主意。

三、欢迎难民的政策酿成严重后果

但是，默克尔敞开大门欢迎难民的姿态和言论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

首先是涌入欧洲的难民都是要求去德国，数量之多超出预料。难民认准德国是唯一公开欢迎难民的国家，欢呼“默克尔妈妈”，欧洲其他国家也就顺水推舟把难民转送德国。结果是涌入德国的难民急剧增加，2015年进入德国的难民和“经济移民”高达110万，相当于2014年的四倍，且大多未按“都柏林协议”规定在进入欧洲的第一站进行登记和甄别。德国虽然不缺乏资金，但由于事先缺乏足够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大量难民的涌入使一些地方当局应接不暇，叫苦连天。如何使难民融入德国社会则更是个难题。有分析

称，难民中大约有 10% 可以较快融入，30% 须经 6—7 年才能勉强融入，其余均无法融入。事实上，默克尔本人曾公开说过，德国希望把土耳其人融入德国主流社会的努力已经失败。为了使难民融入，首先要让他们学习德语，然后进行职业培训，但能胜任教难民德语的教师奇缺，即使有此能力者愿意干的人也不多。特别是 2015 年除夕夜科隆发生难民抢劫和性侵妇女的群体性事件之后，民众对难民的态度急转直下，而科隆地方当局为维护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开始时隐瞒真相，谎称当晚“平安无事”，后来真相曝光使当局深陷被动，不得不撤换警察局局长以平息民愤。在此情况下，代表极右排外势力和民粹主义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飙升，在全国各政党中民意支持率升到第三。

第二是事先未与执政联盟伙伴商议，引发姐妹党基社盟以及受难民冲击最大的巴伐利亚州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应当指出，包括社民党在内的左翼政党不少人或多或少赞成默克尔的人道主义精神，但鉴于难民潮造成的一系列实际困难和民众的不满情绪，也强烈呼吁大力减少难民进入。即使在基民盟内部，也曾有 40 多名议员联名致函默克尔要求限制接收难民。而反应特别激烈的是巴伐利亚州前州长施托伊伯和基社盟主席、现任州长泽霍夫，他们公开指责默克尔发出了“错误的信号”，犯了“长期威胁我们的错误”，指出德国“不久将面临失控局面”，要求默克尔在 2016 年 3 月底前必须使难民数降下来。否则将有一场“摊牌斗争”。2016 年 1 月 26 日，泽霍夫在一封致默克尔的公开信中提出最后通牒式要求：在欧洲层面上有效管控边界和公平分摊难民；在欧盟边界得到有效控制之前立即管控德国边界；确保所有进入德国的难民必须登记；在欧洲层面上达成有效解决办法之前，确定德国接收难民的年度限额为 20 万人；不再接收欧洲安全国家转送过

来的难民；如果上述措施不能立即采取，巴州政府保留权利向联邦宪法法院对联邦政府提出控告。面对执政伙伴的上述要求和民众的情绪，默克尔不得不对其难民政策做出某些调整，主要是：宣布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为“安全国家”，来自这三个国家的难民申请者将被遣返；战争难民在其原籍国恢复社会秩序后应返回故乡；降低犯罪难民的遣返门槛，即犯罪程度仅够判处缓刑的也应立即押送出境；通过非法途径从土耳其进入德国的第三国难民将被送回土耳其；难民身份被确认后，两年之内暂缓允许其家属跟进；适当降低难民“待遇”，等等。但默克尔的基本政策思想未变，即（1）接收难民数“不设限”的原则不变，以彰显德国的人道主义精神；（2）尽量减少难民进入，主要办法是争取与土耳其合作，从欧盟外部边界阻止叙利亚难民进入欧盟国家；（3）进入欧盟的难民应按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和面积以及失业状况和已接收难民的数量“公平分摊”已滞留在希腊和意大利的约 16 万难民，以体现欧盟的团结互助精神；（4）反对欧盟成员国之间互相封锁边界，以不破坏“申根协议”这个欧洲一体化的巨大成果；（5）寄希望于美俄推动叙利亚各派和谈实现停火，从根子上阻止或减少叙难民外流。但是，以泽霍夫为首的基社盟领导人并不认可默克尔的上述想法，认为把解决难民危机的希望寄托在靠不住的土耳其身上或寄希望于美俄促成叙利亚和平谈判实现停火是幻想。

第三是事先未与欧盟成员国商议，就宣布接收难民“不设限”，之后又宣布要在欧盟层面上按比例“公平分摊”难民，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引起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先是东欧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即匈、波、捷和斯洛伐克）拒绝执行欧盟理事会在德国主导下做出的“公平分摊”难民的决定，匈总理欧尔班公开抨击德国的做法是

推行“道德帝国主义”，威胁匈将举行全民公投，让匈人民决定是否同意。通常同德国保持一致的奥地利也不再跟随德国，宣布每天只接受 80 名难民，2016 年以接收 37500 人为限，随后即控制与马其顿的边界。马其顿是难民从土耳其渡过爱琴海进入希腊后转往欧洲腹地的通道，为了防止大量难民进入后无处可去，便在匈牙利等国支持下封锁了与希腊的边界，从而堵死了通往欧洲的“巴尔干通道”。法国总理瓦尔斯则在 2016 年 2 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布，除已接收的 3 万难民外，不再接收更多难民，并称默克尔的边界开放政策“无法持续坚持”。一向标榜自己是人权卫士的瑞典政府也采取严厉措施管控边界并强制遣返难民。所有这些，都与默克尔的主张背道而驰。马其顿封锁与希腊边界的措施大大减少了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使德国内部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尽管这些措施都曾遭到默克尔政府的尖锐批评。

四、为谋求土合作付出高昂代价

在欧盟层面上“分摊难民”的方案无法落实之后，谋求与土耳其合作，以便从欧盟外部边界堵截难民的方案便成了默克尔的唯一希望。早在 2015 年 9 月中旬，默克尔就紧急造访土耳其寻求支持和合作，土方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欧盟必须提供 30 亿欧元，用以资助土安置难民；二是欧盟重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三是为土公民进入欧盟提供“签证方便”。这三条均非德国一家所能决定，且具有“敲诈勒索”的味道。但鉴于别无他途，欧盟在德国力主下不得不原则接受。之后又经过多次谈判，在德国的大力推动下双方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终于达成协议，具体内容是：(1) 从 3 月 20 日开始，所有从土耳其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希腊的难民将被遣返回土耳其；(2) 从希腊每遣返回一名叙利

亚难民回土耳其，欧盟将从土耳其接收另一名叙利亚难民在欧盟境内合法安置，但以 7.2 万人有限；(3) 土耳其承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蛇头在爱琴海路线被关闭后可能开辟新的路线；(4) 只有“非法难民”进入欧盟的路线被关闭或者至少“非法难民”数量大幅减少之后，欧盟的安置计划才会生效；(5) 欧盟将加快土耳其居民进入欧盟国家的签证自由化进程，在土方达到欧方规定的 72 项标准的情况下，最迟在 2016 年 6 月底之前解除签证要求；(6) 欧盟加快向土耳其发放 30 亿欧元用于与难民相关的项目，并于 2018 年底前启动额外的 30 亿欧元资金，这表明，土方的资金援助要求已翻了一番；(7) 2016 年 7 月 1 日之前重启入盟谈判。对欧土这一协议，欧洲舆论反应不一，负面的居多。有人批评双方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指责土耳其利用难民危机“勒索”欧盟；也有人指责欧盟向土耳其“转嫁难民危机”，德国绿党议会党团主席指该协议是“对人道主义的背叛”；联合国难民署官员和一些人权组织认为，该协议“无法保障难民依据国际法应享有的权益”，并有“集体驱逐难民”之嫌，也不符合欧盟法律和国际法。此外，双方对相关协议的解释不尽一致，反映出双方充满了“互不信任”，能否顺利落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五、一首讽刺诗引发一场政治风波

欧土协议对默克尔是一根救命稻草，但也成为媒体热炒的话题。基于对土总统埃尔多安“专制统治”的反感，德国舆论大多倾向于指责土乘机勒索欧盟，对土方能否兑现承诺持怀疑态度，认为默克尔为摆脱困境而屈服于土的敲诈。受这样的舆论气氛影响，4 月初德国电视二台讽刺节目主持人杨·波默曼在节目中朗诵了一首点名辱骂土总统的

“诽谤诗”，引起土方的强烈反应。埃尔多安总统不仅以个人名义向德国检察院对波默曼提出控告，而且要求德国政府批准检察院按照德国刑法第 103 条调查此案，以“侮辱外国元首罪”给波默曼判刑或课以罚款。对如何处理土方这一要求，联邦政府内部出现分歧，社民党主张不予批准，默克尔则动用总理权力宣布批准检察院受理，施泰因迈尔外长为此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批准检察院受理“完全是多余的，不必要的”。虽然默同时声明，这一批准绝对不意味着对波的“预判”，并宣布该刑法第 103 条已不合时宜，将启动法律程序于 2018 年予以废除。这立即引起了舆论的哗然，因为该决定触犯了新闻和言论自由，被认为是默讨好土总统的表现。不仅如此，默被揭在同土总理达武特奥卢通话中曾称该讽刺诗是“故意伤害”，从而被认为是做了“政治定性”。这场风波来势不小，德国电视二台台长宣称将支持波默曼到底，指责默克尔为了取得土在难民问题上的合作而对土破坏言论自由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不明确表明立场，并称 80% 的被调查者支持这一观点。北威州社民党政府的司法部长还提议，以州政府名义向联邦参议员紧急动议快速废除该刑法第 103 条，使土总统的诉状无法可依。面对一片责备声，默克尔 4 月 23 日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把该讽刺诗说成是“故意伤害”是个“错误”，并表示“人权和新闻自由不可或缺”，她访土时将谈及人权问题，但仍辩解称批准检察院受理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上述表态对她的困境有缓解作用，但她的声誉已进一步受到损伤。

至此，难民危机对德国和欧盟的深远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进入德国各地的 110 万难民，首先要进行登记、甄别，然后是安置或遣返，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警力。虽然需要很长时间，但凭借德国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

力，是可以办得到的。问题是两个：一是伊斯兰难民融入德国主流社会的难度较大，而且事实上已搅得人心不安，袭击难民的暴力事件有增无减，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二是难民中混进伺机实行恐怖袭击的极端分子，从而构成安全隐患。事实上，2016 年德国已发生四起暴力恐怖事件，都是“难民”所为。据报道，2016 年 6 月，从联邦国防军中已经揪出 24 名潜伏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分子。监控暴恐分子已成为德国安全部门的头等大事。

2. 德国政治生态已发生重大变化。突出地反映在基民盟和社民党这两大执政党在 3 月中旬举行的巴登-符腾堡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萨克森-安哈特州的选举中大量失票上，这是民众不满默克尔难民政策的直接反应。而代表极右排外势力的“德国选择党”则以高票进入州议会，2016 年 3 月份的民意支持率一度升至 14%，成为德国第三大党，从而改变了德国传统的政党格局。基民盟和默克尔的民意支持率继续下挫，社民党始终在低点上徘徊。特别是基社盟一向垄断右翼保守选民，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与它争夺右翼选民的政党，且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深感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据此，各党都为 2017 年大选的结果担心。如何应对“新崛起”的“德国选择党”，保住 2017 年大选后继续组阁，已成为联盟党的当务之急。实际上，基社盟之所以激烈反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难民危机使欧盟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状态，开启了成员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行其是，敢于抗拒德国主导的先河。德国基社盟的智库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笔者，德国表面上在欧洲很风光，实际上在欧盟内部很孤单。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不可能在一体化道路上取得新的进展，就是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很费劲。这是一个值

得注意的新发展。这应验了意大利一位前政要在2016年10月对笔者说的话：作为欧洲人，我从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不希望看到“德国的欧洲”。德国人的实力和影响力我们赶不上，但我们可以抵制，起牵制作用。

欧土“协议”虽已达成，双方都做了庄严承诺，但对各自承诺的解读和履约程度常出现分歧。比如2016年4月23日默克尔偕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等访土时，土总理就再次敦促默克尔要按时兑现土公民进入欧盟的免签待遇，默则指出，土需全面完成申根协定规定的72项标准，迄今土方只完成了20多项；土总理则称已完成50多项，并说“欧盟如不给土公民免签，难民协议就不复存在”。而围绕给土公民免签问题，德国基社盟主席泽霍夫仍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只能“放宽”而不能“完全免签”，否则，大量受压迫的土耳其库尔德人将涌入欧盟，从而把土国内的冲突带进欧盟。至于重启入盟谈判，双方更是同床异梦，欧盟难以满足土方要求，因土在民主、自由和民族宗教问题上不够入盟标准。凡此种种，导致“欧土协议”难以落实。据媒体最近报道，从希腊遣返土的“非法难民”进展不大，与新进入希腊的难民数量基本持平，希腊承受的难民压力依然如故。不过，由于“巴尔干通道”已被封闭，加之欧盟成员国普遍对本国边界实行了管控，2016年内进入德国的难民数量明显减少，这使基社盟与默克尔的矛盾趋向缓和。

但是，大量难民引发的问题仍持续发

酵，特别是难民犯罪和排外势力袭击难民的事件日渐增多，加上对暴力恐怖袭击的恐惧有增无减，据民意调查80%左右的民众认定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犯了错误，使默克尔和基民盟的民意支持度严重受损。最新的表现是，2016年9月梅前州和首都柏林两个州选中基民盟连遭惨败，迫使默克尔在党内压力下不得不“承担责任”，公开承认在处理难民问题上“不是所有做法都正确”，声称“如有可能，真希望时间倒流许多年，以便同整个内阁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好”，但也辩称“‘我们能做到’这句话是正确的。本意是表达一种态度和目标，但被过度解读，今后不再讲了”。一些媒体评论称，默的上述表态只是向民众做自我批评式的解释，以造成她的难民政策已发生变化的印象，并谋求同基社盟妥协，共同度过2017年大选难关。

不过，迹象也表明，默克尔不得不承认欧盟各国管控边界和关闭“巴尔干通道”产生了实效，也不得不向东欧四国拒不执行“分摊难民”的态度妥协，但仍指望借助土耳其把叙利亚难民挡在欧盟国界之外，并试图争取同北非一些非战乱国家达成遣返“非战乱国难民”的协议，因为进入德国的一百多万难民中有50多万已被确认为不够“战乱国难民”资格，须予以遣返原籍国，但迄今收效甚微，多数国家拒绝接受这些难民。总之，难民危机虽有所缓和，但并未根本解决，其后果和影响将在很长时间内依然困扰德国和欧盟。

作者简介：梅兆荣，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德国外交研究在中国

刘立群

【摘要】从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中国学术界对德国外交的研究开始起步，尤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愈益丰硕的成果，共出版学术专著和论文集约30部，发表论文共约500余篇，涉及德国外交各个方面，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为中国的德国研究做出了有益贡献。中国和德国的国际地位都在上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研究德国外交对于了解德国、对于中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尤其是对欧盟外交政策、加强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各国的交往十分重要。本文较全面介绍和梳理中国学术界对德国外交研究的概貌。

【关键词】德国外交研究 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

一、基本情况

从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中国学术界对德国外交（本文所说的“德国”仅指联邦德国）的研究开始起步，尤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愈益丰硕的成果。2017年为中德建交45周年，笔者写作本文作为纪念。迄今中国学术界共出版研究德国外交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约30部，学术论文共约500多篇，涉及德国外交各个方面，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和德国的国际地位目前都在上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研究德国外交对于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尤其是对欧盟的外交政策十分重要。以往懂德语的研究人员不多，有的研究人员主要靠用英语去研究德国，而现在研究德国外交问题的人员都懂德语，从而可以全面了解和准确理解德

国政府的政策主张以及德国各界的态度和背景。

中国从事德国外交及德国问题研究的主要机构，即智库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简称“中国德国研究会”）是中国欧洲学会下属的二级分会，都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领导。中国德国研究会于1985年成立，是联系和协调国内对德国当代政治、外交、经济等研究的学术团体，截至2016年已举行年会15次，共出版年会论文集12本。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是目前中国唯一有德国外交专业硕士和博士点的高等学校，已培养出10位德国外交方向博士，还有8位

在读；每年招收德国外交和经济方向硕士生平均 10 人，其中约一半学生的硕士论文为外交方向，至今已近 20 年。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及中国国际关系学院也分别培养德国外交方向的博士、硕士生和硕士生。

通过长期研究，中国学术界现已普遍认识到，德国虽属于西方一员，其总的外交方向和西方基本一致，但主要在手段和策略上与其他西方大国有明显差异，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设想也和西方其他大国有一定差异，在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其政治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愿意与中国等国一道在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上做出更大贡献。

二、学术著作

近 30 多年来，我国对德国外交的研究从无到有，不断扩展和深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以下对学术著作依次做简要介绍：

1. 《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潘琪昌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348 页）

这是中国学者撰写并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德国外交专著，堪称开山之作。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是“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1981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即今国际关系学院），也是我国第一位德国外交方向的硕士。此书有 10 章，系统阐述了 1949—1990 年联邦德国外交政策发展的主线。标题分别为：1）有关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2）阿登纳的向西方一边倒政策；3）哈尔斯坦主义；4）危机年代；5）过渡时期；6）大联合政府的东方政策；7）新东方政策的蕴含；8）新东方政策（此章最长，有 11 节、66 页）；9）重返国际舞台——施密特政府时期；10）科尔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补记：德国统一问题的突变（写于 1990 年 4

月）。作者在收集材料过程中得到德国瑙曼基金会资助，走访了包括埃贡·巴尔（德国社民党新东方政策设计师）、瓦尔特·谢尔（先后任外长和总统）等在内的多位德国政要，得到很多宝贵的第一手德文材料和信息，使中国学术界得以较为全面准确地了解和理解截至 1990 年的联邦德国外交政策。

2. 《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探索”》（连玉如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554 页）

此书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1984 年毕业），柏林自由大学博士（1995 年毕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此书分三部分，共 12 章，另有“导论”和“结论与前景”。德国前外长根舍和中国前驻德大使王殊为此书作序。三部分的标题分别是：“政治价值上皈依西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制度”“外交战略上皈依西方——‘波恩共和国’外交政策（1949—1989 年）”“西方一体化的巩固——‘柏林共和国’外交政策（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统一以后）”。此书参考和引用了大量中文和德文学术著作，是个人独著部头最大、分量最重的德国外交专著。此书完稿于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 30 年的 2002 年。

3. 《百年中德关系》（潘琪昌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405 页）

此书是潘琪昌、戴继强、时雨三位资深研究人员合著的力作，对 20 世纪中德关系史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全书分为四编，每编有 2 至 4 章不等。各编标题分别为：第一编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德关系；第二编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第三编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第四编 20 世纪 90 年代中德关系的新发展。书末附有“百年中德关系大事记”。

4. 《统一以后的德国外交政策（1990—2004）》（熊炜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192 页）

此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

而成的，主要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角色理论去分析德国统一前后德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及转化等；论及德法关系、德俄关系、德国的联合国政策等，但没有论及德美关系。

5.《德国人权外交研究》(李文红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54页)

此书是作者在北外德语系撰写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书中着重研究德国人权外交的发展,分析了人权外交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对德国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进行剖析,以默克尔为突破口,探讨制约和影响新时期德国人权外交的各种因素,认为德国人权外交经常陷入两难境地。

6.《德国外交通论》(殷桐生主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589页,共17位作者,其中10位北外德语系教师)

此书是迄今部头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涉及时间最长、阐述最为系统的德国外交专著。书末列出参考文献中文约230种,德文约240种。此书分为19章,其标题分别为:1)绪论;2)1945年以前的德国外交;3)冷战时期的联邦德国外交;4)德国统一后外交框架条件的变化;5)德国的欧盟政策;6)德国对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政策;7)战后德法、德英、德俄双边关系;8)德国的美国政策及欧美关系;9)德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10)德国对亚、非、拉各国的外交政策;11)德国的联合国政策;12)德国的发展政策;13)德国的经济外交;14)德国的人权外交;15)德国的外部移民政策;16)德国的环境外交;17)德国和欧盟的安全与防务政策;18)德国的对外文教政策;19)德中关系。

7.《德国外交战略研究(1989—2009)》(武正弯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

此书是作者在北外德语系撰写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其主要观点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冷战后德国新外交战略是以位于欧洲

中心的中等强国、文明力量的国际角色定位为出发点,综合运用多种外交手段,全方位发展对外关系;力争发挥超越中等强国的影响力,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建构者之一;推动国际关系文明化、法制化,维护自身的利益,推行西方色彩的价值观;使德国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机制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8.《德国与欧洲一体化》(张才圣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此书作者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此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其主要观点是:德国是欧洲主要大国之一。战后欧洲一体化的起步、发展和壮大离不开德国的参与和支持。分析和探讨了战后欧洲一体化运动及德国在这一过程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预见,统一后的德国还会在欧洲联合的道路上继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9.《国际政治与德国》(连玉如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32页)

此书是作者的论文集,分为五部分,标题分别为:1)冷战时期的“德国问题”;2)“新德国问题”的对外维度;3)“新德国问题”的对内维度;4)德国传统外交政策的重点;5)德国新外交政策的重点。包含“阿登纳与欧洲”“统一德国的大国作用与相互依存”“‘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统一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连续性刍议”“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外交与欧洲政策辨析”“中德‘天然盟友’关系刍议”等。

10.《德国的国际角色与外交政策》(于芳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233页)

此书是作者博士论文。内容简介:德国的文明力量理论秉承了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集体安全体系,提出应由文明力量(符合该角色特征的

西方发达国家)运用文明手段(外交、经济手段)来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默克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文明力量角色的色彩:1)强调价值观导向,一方面同欧美国家建设价值共同体;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援助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促进。2)强调非军事手段解决国际问题,但不完全放弃军事手段,主张建立亲西方政权,以保护人权之名掩盖了对现实利益的考虑。3)对日渐崛起的新兴国家,提出了建构力量方案,旨在与新兴国家共同影响未来的全球化趋势,使之朝着对德国有利的方向,维持和加强德国及欧洲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

11.《平衡的艺术:红绿联合政府的外交政策(1998—2005)》(吴江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此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以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时期的德国外交政策为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剖析了德国外交在单极和多极之间、利益和道义之间、外交和内政之间的平衡术。德国红绿联合政府时期的外交平衡术不仅是社民党和绿党联合组阁的产物,更是责任文化和克制文化交织共生的结果,对新时期的德国外交产生了延续影响。

12.《列国志·德国》(顾俊礼编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版,2015年增订版,478页)

此书相当于一部德国小百科,其中有“军事”和“外交”各一章,分别系统而简明扼要介绍了联邦德国的军事和外交概况。

对德国外交的介绍及研究成果还体现在两个系列年度研究报告中:1)《欧洲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和中国欧洲学会共同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自1997年至今已出版20册,每册都有对上年度德国外交情况的概述,由德国问题研究专家撰写。2)《德国发展报告(蓝皮书)》(同济

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从2012年起出版,每年一册,至今已连续出版5册,每册都专文详细阐述和分析上年度德国外交情况,由德国问题研究专家撰写。

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的年会论文集迄今共出版12部: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探索——中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6月,非正式出版物,收入论文28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三篇,有关经济的论文占多数);2)《联邦德国经济政治纵横》(王殊、裘元伦、吕耀坤、顾俊礼编,1989年,非正式出版物,收入论文23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4篇);3)《德国与世界》(裘元伦、顾俊礼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收入论文23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5篇);4)《世纪之交的德国、欧盟与中国》(顾俊礼、刘立群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收入论文27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13篇,包括德国前外长根舍一篇);5)《迈入21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顾俊礼、刘立群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收入论文25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8篇);6)《新世纪的德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李乐曾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收入论文26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12篇);7)《新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纪念中德建交三十周年》(刘立群、孙恪勤主编,时事出版社2003年,收入论文32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15篇);8)《德国在扩大的欧盟中》(朱绍中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收入论文35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12篇);9)《德国·欧盟·世界》(刘立群、连玉如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收入论文39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15篇);10)《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中德关系》(刘立群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收入论文 27 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 8 篇）；11）《中德建交 40 周年回顾与展望》（顾俊礼主编，杨解朴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收入论文 23 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 10 篇）；12）《欧债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欧盟》（刘立群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收入论文 25 篇，其中有关外交的论文 10 篇）。

创刊于 1985 年的《德国研究》杂志（季刊，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主办）每期有关德国外交的论文平均约 4 篇，每年四期，共约 15 篇，已出版 31 年，总计约 400 篇。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编《德意志文化研究》共出版 9 辑，《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迄今已出版 7 辑，每辑有德国外交论文平均约 5 篇，总计约 80 篇。需要指出，有些论文既发表在刊物上，也发表在论文集中。此外，《欧洲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等刊物也刊载少数关于德国外交论文。除了中国学者之外，《德国研究》和《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也刊载少数外国学者有关德国外交的论文，如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施塔克（Michael Staack）、席斯勒（Peter Schisler）以及若干美国学者等的论文。依此估算，近 30 多年来发表有关德国外交的学术论文总计约 500 篇。

三、研究重点及热点讨论问题

迄今国内对德国外交研究的重点及近些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如下：

1. 有关德国外交政策特点和变化，论文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发展》（潘琪昌）、《走向大国的努力与挫折——施罗德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孙恪勤）、《在多边机制中实现国家利益——战后德国多边外交特点及成因分析》（杨焱、王道云）、《默克尔政府 2007 年外交政策的得与失》（刘立群）、《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调整及发展趋

势》（戴启秀、王志强，文中“新政府”指 2013 年起默克尔第三届政府）、《欧债危机后德国的外交政策：更积极，更有为，更全球化？》（[德]施塔克）、《德国政府“积极外交政策”评析》（李超）等。

2. 有关德美关系问题，论文有《德美矛盾的发展变化》（沈国梁）、《默克尔政府对美政策述评》（沈国梁）、《从伊拉克战争看冷战后的德美冲突》（高红梅、杨焱）、《德国政党和公众如何看美国外交》（黄萌萌）等。

3. 德俄关系问题，论文有《浅析德国统一之后对俄罗斯的外交战略》（李文红）、《论从疏远到对抗的德俄伙伴关系》（陈新明、宋天阳）、《德国的“俄罗斯形象”》（李微）等。

4. 德法关系问题，论文有《德法关系：从宿敌到盟友》（刘立群）、《法德在中东欧的不同关切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启示》（马骏驰）等。

5. 有关中德关系的论文较多，包括《中德关系 35 年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梅兆荣）、《新思维与稳定的中德关系》（顾俊礼）、《中国与德国的“天然盟友”关系刍议》（连玉如）、《德国对华政策的特殊性及其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刘丽荣）等。

6. 有关德国的安全政策及北约政策，论文有《使命与能力：德国联邦国防军的转型与域外行动评析》（刘惜戈）、《恐怖主义和德国的反恐政策》（于芳）、《德国与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于冬冰）、《美国国安局窃听事件对德美信息安全合作的影响》（田佳峰，此两篇均以硕士论文为基础）。

7. 2013 年起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论文有《乌克兰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童天齐）、《从乌克兰危机看德国外交新姿态》（刘立群、李微）、《德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的独特作用》（刘立群、李倩媛、王海涛）等。

8. 2015 年起爆发的难民危机，论文有《欧洲难民危机背景下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角

色》(郑春荣,是《德国发展报告2016年》的“总报告”)、《德国难民危机政策探析》(黄萌萌、刘立群)等。

9. 德国的欧洲政策及德国在欧洲的作用,论文有《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政策变化》(史世伟)、《“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问题新考》(连玉如)、《战后德国欧洲政策的历史演变》(吴志成、常婧)、《欧债危机以来德国在欧洲的角色探析》(于芳)、《德法与欧盟差异性一体化》(陈洁、袁建军)等。

10. 德国的亚洲政策,论文有《德国政府亚洲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孙恪勤)、《浅析德国黑黄联合政府关于阿富汗驻军的讨论》(吴江)等。

11. 其他问题,如《土耳其入盟:基民盟/基社盟与自民党的不同立场分析》(郑春荣)、《德国对中东政策》(孙立昕)、《浅析德国的全球治理观与其争常之路》(李晓海)、《英国退欧公投计划与德国各方反应析论》(李倩媛、刘立群)等。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讨论与德国外交有关的热点问题较多,突出的有:1)“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问题,主要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连玉如教授对此问题有数篇论文。她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坚持“欧洲的德国”是原则性问题,搞“德国的欧洲”则是具体操作;在“欧洲的德国”框架中搞“德国的欧洲”是着眼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迎接全球化的挑战^①。2)在中德关系方面:连玉如在其著述中提出中德是“天然盟友关系”的观点,认为中德都视对方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都一致认为联合国作

为最重要的多边机制在预防和应对全球性和地区性挑战、危机和冲突方面具有核心作用^②。

笔者的观点是:中德在外交方面有一些相近和相似之处,有一些共同利益,中德关系十分重要,存在某种程度的特殊性和很大合作空间,但定位为“天然盟友关系”则不大恰当,因世界上各大力量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各自的优先顺序并不对等,而且和不同领域有关,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都具有某种特殊性,很难进行准确的量化比较。

四、结语

迄今国内对德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并要继续努力。关于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笔者提出以下若干思考。

1. 德国外交一方面确实在不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德国外交的力量依然是有限的,始终深植于欧盟及西方的外交之中。我国学者在研究德国外交时需要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不宜过度夸大德国外交的特殊作用,但也不应忽略德国外交的特点、把它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加区分。应当注重研究德国与其他国家、首先是欧盟各国的关联与互动,应当力求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去考察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2.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与内政往往密不可分,研究德国外交应当力求与对其内政问题的了解和研究相联系。除了各政党的态度和政策之外,民

① 连玉如:《“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问题新考》,顾俊礼主编《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

② 连玉如:《国际政治与德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

意对包括外交决策在内的政治决策产生较大影响，所以需要关注民意调查结果及民意变动。

3. 外交政策主要属于政治领域，在很多情况下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密不可分，研究德国外交应当力求与对其经济问题的了解和研究相联系。德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所以德国政府及各界十分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4. 对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应当力求与理论问题研究相联系。迄今对德国外交研究的不足主要是对德国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较为薄弱，著述不多。笔者在“新理论视角下的世界新格局”一文中提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它主要包含两个维度并力

图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一是东西方矛盾与南北方矛盾的维度；二是利益矛盾与观念矛盾的维度。由此出发对德国外交的特点做出一种新的概括：“在发达国家中，德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很特殊，它更多起到缓和南北矛盾的作用，也包括缓和仍存在的东西方矛盾（主要是与俄罗斯的矛盾）。”^③

德国反对伊拉克战争、没有参与利比亚战争、对打击“伊斯兰国”主要提供后勤保障和侦察行动、尽可能阻止乌克兰危机恶化、在难民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等都可以作为德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积极、更有作为的例证。笔者相信，研究德国外交大有可为，我国学术界必将取得更多优秀成果。

作者简介：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③ 刘立群、李倩瑗、王海涛：《新理论视角下的世界新格局》，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第28页。

Deutschland in der EU-Flüchtlingskrise

Von LIAN Yuru

1. Deutschlands führende Rolle bei der Bewältigung der EU-Krisen

Das Thema „Deutschland in der EU-Flüchtlingskrise“ bezieht sich im Kern auf die Stellung und Rolle Deutschlands zur Bewältigung der Krisen, die sich in Europa in den letzten Jahren angehäuft haben, insbesondere die Ukraine- oder die Flüchtlingskrise. Während die EU-Apparate bzw. deren Führungspersonlichkeiten mit deren Bewältigung überfordert zu sein schienen, zeichnete sich eine deutlich herausgehobene und in mancherlei Hinsicht auch unverzichtbare Rolle Deutschlands in Europa ab. Es ist nicht nur interessant, die zahlreichen und teilweise ganz unterschiedlichen Bewertungen hierzu kennenzulernen, darüber hinaus ist es natürlich auch von großer Relevanz, wie sich Deutschland selbst dargestellt hat.

In der wichtigsten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schen Publikation, dem „Weißbuch“ zur Sicherheitspolitik, das im Sommer 2016 verabschiedet wurde, wird Deutschland als „aktive Gestaltungsmacht“ bezeichnet. Mehr noch, es wird auch als ein Land beschrieben, das in Europa „als zentraler Akteur wahrgenommen“ wird. Dem will die Bundesregierung mit der erklärten Bereitschaft entsprechen, „Verantwortung zu leben und Führung zu übernehmen“.^① Als vor zehn Jahren das letzte „Weißbuch“ beschlossen wurde, sah die damalige Bundesregierung für Deutschland lediglich „eine wichtige Rolle für die Gestaltung Europas und darüber hinaus“.^②

Dass Deutschland eine führende Rolle für die EU Entwicklung spielt, bezweifelt niemand. Auch ich habe Entsprechendes dazu in meinen wissenschaftlichen Beiträgen aus den Jahren

① Näheres dazu siehe Weissbuch 2016 zur Sicherheitspolitik und zur Zukunft der Bundeswehr, downloads über: https://www.bmvg.de/portal/a/bmvg/!ut/p/c4/04_SB8K8xLLM9MSSzPy8xBz9CP3I5EyrpHK9pNnydL3y1M-zI4qTS5Ay9IPzyvJz8xJRi_YJsR0UAIHdqGQ!!/, letzter Zugriff am 20.09.2016.

② Vgl. Gunther Hellmann, Zwischen Gestaltungsmacht und Hegemoniefalle – Zur neuesten Debatte über eine „neu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28-29/2016, 11. Juli 2016, S. 4.

2012 und 2014, geäußert.^③ Entscheidend ist die Frage, ob sich die deutsche Rolle positiv oder negativ auf die EU-Integration auswirkt. Es ist nicht zu übersehen, dass die gleiche Dominanz deutscher Macht zu ungleichen Ergebnissen bei Krisenbewältigungen der EU geführt hat: Während die Führungsrolle des Merkelschen Deutschlands bei der Beilegung der Ukrainekrise anerkannt wurde, wurde es jedoch bei der griechischen Schuldenkrise als unerträglicher Hegemon perzipiert. In der Flüchtlingskrise trat es schließlich als ein eigenwilliger Einzelgänger hervor; die Begrüßungskultur im Rahmen der deutschen Flüchtlingspolitik wurde sogar mit einem „Moralimperialismus“ identifiziert.^④ Nun stellt sich die Frage, warum hat die gleiche Dominanz deutscher Macht zu ungleichen Ergebnissen bei Krisenbewältigungen der EU in den letzten Jahren geführt?

Drei Erklärungsmuster bzw. Lösungsansätze

können hierzu präsentiert werden.

Das erste wird von Hans Kundnani vertreten. Nach ihm bleibt die Vorstellung, Deutschland könnte Europa „führen“, eine gefährliche Fantasie. Deutschlands Größe und seine Mittellage machten es fast zwangsläufig zu einem destabilisierenden Faktor; Deutschland wird seinen Willen nicht durchsetzen, denn die wichtigste Triebkraft hinter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war die Einschränkung der deutschen Macht.^⑤

Die zweite Variante ist mit dem Namen Ulrike Guérot verbunden. Nach ihrer Analyse war die deutsche Übermacht keine Ursache, sondern die Folge des Versagens der EU-Maschinerie; hinzu kam für sie noch die Asymmetrie in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Beziehungen zuungunsten des französischen Tandem-Partners. Als Lösung des Problems schlägt sie die Gründung einer föderalistisch-politischen Union Europas vor.^⑥

Diese Vision für die EU-Zukunft wurde

③ Vor vier Jahren konzentrierte ich mich auf das Begriffspaar von „deutschem Europa“ oder „europäischem Deutschland“, welches von Thomas Mann 1953 in seiner Ansprache vor Hamburger Studenten herausgestellt und von mir in Bezug auf die Gegenwart wie folgt interpretiert wurde: Wir erleben gegenwärtig ein auf der operativen Ebene „Deutsches Europa“ in einem auf der prinzipiellen Ebene „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 D.h. die führende Rolle Deutschlands findet unter dem Dach oder im Rahmen der EU statt. Vor zwei Jahren ging ich dem Charakter der EU nach. Dazu vertrat ich folgende Meinung: Die EU ist ein Staatenverbund, der sich von dem Subsidiaritätsprinzip leiten lässt; dieses Prinzip verfolgend wirkt Deutschland an der Entwicklung der EU mit. Näheres dazu siehe Lian, Yuru, „Neue Gedanken über die Frage vom ‘Deutschen Europa’ und ‘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 in: Gu, Junli (Hrsg.), *Retrospekt and Prospect of 40 Years’ China-Germany Diplomatic Relations*, Shehui Kexue Wenxian Verla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2, S. 174-192 und ders., „Abermalige Reflexionen über die Frage vom ‘Deutschen Europa’ und ‘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 in: *Guoji Zhengzhi Yanjiu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r.6, 2014, S. 1-12.

④ Siehe dazu Hans Kundnani: Ein deutsches Europa – oder ein chaotisches?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52/2015, S. 16.

⑤ Ebenda, S. 12-17.

⑥ Ulrike Guérot, Von Normalität über Übermacht zur Ohnmacht? Betrachtungen zur deutschen Rolle in Europa,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52/2015, S.19-22.

nach dem BREXIT ziemlich populär, als das Ergebnis der britischen Volksabstimmung als Warnung für die EU Zukunft interpretiert und die Stimmen für ein stärkeres und demokratischeres Europa lauter wurden. Auf der „Mehr-Europa-Seite“ plädiert man für eine weitere Stärkung der Institutionen der EU, also eine Vertiefung der Institutionalisierung Europas. Hierzu zählen der Präsident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Juncker und der Europaparlamentschef Martin Schulz.

Schulz wollte z.B. seit der 2014 durchgeführten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wahl zusammen mit Juncker die EU-Kommission zu einer „wahren europäischen Regierung“ ausbauen, so dass die EU-Kommission mehr Macht erhält und der Rat der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an Einfluss verlieren würde. In einem Gastbeitrag für d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schreibt Schulz in diesem Sinne Ende Juni 2016, eine echte EU-Regierung, die aus der EU-Kommission hervorgeht, solle „der parlamentarischen Kontrolle des Europaparlaments und einer zweiten Kammer, bestehend aus Vertretern der Mitgliedstaaten, unterworfen“ sein. Das sei den Menschen aus ihren Nationalstaaten bekannt und werde „politische Verantwortlichkeit auf der EU-Ebene transparenter machen“. Unzufriedenheit mit der EU führe dann nicht mehr dazu, dass sie grundsätzlich infrage gestellt werde. Vielmehr könnten die Bürger „durch Wahlen eine europäische Regierung durch eine andere ersetzen“.^⑦

In diesem Sinne schreibt auch der angesehe-

ne Kommentator „Jakob Augstein“ des Spiegels am 30. Juni 2016: „Die Demokratie, die Europa braucht, ist eine andere als die bestehende. Wir kennen sie. Wir wissen, wie sie funktioniert: Es ist die repräsentative Demokratie der westlichen Staaten. One man, one vote. Das unmittelbar vom europäischen Volk gewählte Parlament setzt eine europäische Regierung ein. Die Staaten entsenden ihre Vertreter in eine zweite Kammer. Eine europäische Föderation. Die muss sich beileibe nicht um alles kümmern - Stichwort Subsidiarität. Aber wenn sie sich kümmert, muss das Prinzip der demokratischen Verantwortlichkeit gewährleistet sein. Wir wollen weder das Europa der Konzerne noch das Europa der Populisten. Sondern einfach ein demokratisches Europa.“^⑧

Nach meiner Einschätzung orientiert sich die Darstellung Kundnans zu sehr am Balance-of-Power-Szenarium des 19. Jahrhunderts, wobei die fast 7 Jahrzehnt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und deren Erfolge nach dem 2. Weltkrieg vernachlässigt werden. Auch stellt die von Guérot angebotene Lösung der deutschen Dominanz-Frage und die von Schulz und Augstein vertretene Vision eines parlamentarisch-demokratischeren Europas wenn nicht eine Utopie, so doch zumindest eine ferne Zukunftsmusik dar. Demgegenüber präsentiere ich meine Überlegungen dazu als eine dritte Perspektive zur Lösung der EU-Krisen bzw. des deutschen Dominanzdilemmas. Sie besteht im Kern darin, dass die Führungsstellung und Rolle des deutsch-fran-

⑦ Näheres dazu siehe „Nach Brexit-Referendum Martin Schulz fordert ‘echte europäische Regierung’“, in: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europaeische-union/nach-brexite-referendum-martin-schulz-fordert-echte-europaeische-regierung-14321815.html>.

⑧ Siehe dazu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brexit-die-eu-muss-sich-aendern-jakob-augstein-kolumne-a-1100552.html>.

zösischen Tandems wieder hergestellt werden muss. Diese binationale Leitung ist für die Lösung des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Dilemmas entscheidend.

2. Die Bedeutung des deutsch-französischen Tandems für die EU und ihre Begründung

Warum ist die deutsch-französische binationale Leitung für die EU Entwicklung entscheidend? Dazu werden drei Thesen herausgestellt.

Erstens, die EU Mitgliedstaaten wollen keine Föderalisierung Europas, sondern bestenfalls einen nach dem Subsidiaritätsprinzip funktionierenden Staatenverbund. Sie klaffen mit ihren jeweiligen Zielsetzungen, Interessenlagen, Entwicklungsständen usw. zu sehr auseinander, so dass eine supranationale Gruppierung Europas keine Alternative für die Zukunft sein könnte. Vielmehr ist die Trennung in gleichsinnige oder -lagige Staatsgruppen die neue Normalität in der EU. Wie z.B.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Alt- und Neu-Europa nach dem Eintritt der Mittel- und Osteuropäischen Staaten in die EU 2004, zwischen dem reichen Norden und dem armen Süden seit dem Ausbruch der griechischen Staatsschuldenkrise usw. Nach dem BREXIT ist wiederum sichtbar, dass neue Allianzen in der krisengebeutelten EU Ansprüche anmelden.^⑨

A. „Club Med“, vertreten durch die Mittelmeerstaaten Frankreich, Italien, Spanien, Griechenland, Malta, Zypern und zusätzlich Portugal. Diese Staaten trafen sich am 9. September 2016 auf Einladung des Griechen Alexis Tsipras und fanden sich zu einer echten eigenständigen Grup-

pe zusammen, die ein neues Selbstbewusstsein gegenüber Brüssel an den Tag legt. Frankreichs Staatschef Hollande will ein Wachstumsprogramm, Italiens Regierungschef Renzi einen 50-Milliarden-Euro-Fond. Es sind nur zwei Forderungen, im Grunde geht es um eine neue Politik, die die angeschlagenen Staaten aus der wirtschaftlichen Krise holen und bei der Flüchtlingssituation helfen soll. Dabei fordern sie genau das Gegenteil von der vor allem von deutscher Seite proklamierten Sparpolitik.

B. Visegrad-Staaten mit Ungarn, Slowakei, Tschechien und Polen, assoziativ auch Österreich.

In Bezug auf die EU Flüchtlingspolitik weigern sie sich, bei der Verteilung von rund 160.000 Altflüchtlings aus den Anlandestaaten Italien und Griechenland in der EU mitzumachen. Stattdessen verlangen sie lautstark einen schärferen Grenzschutz und halten seit Monaten eine Blockadehaltung gegen die vor allem durch Deutschland dominierte Flüchtlingspolitik aufrecht.

C. Arraiolos-Gruppe (Ortsname von einem portugiesischen Städtchen)

Die so genannte Arraiolos-Gruppe ist ein informeller Zusammenschluss von nicht-exekutiven Staatsschefs in parlamentarischen Regierungssystemen innerhalb der EU, wie etwa Bundespräsident Joachim Gauck. Dazu gehören die Staatsoberhäupter Deutschlands, Finnlands, Italiens, Lettlands, Österreichs, Polens, Portugals, Sloweniens, Ungarns und Bulgariens. Diese 10 Staatspräsidenten sehen Sicherheit als vordring-

⑨ Siehe dazu http://www.focus.de/politik/ausland/eu-gipfel-in-bratislava-diese-neuen-allianzen-greifen-nach-der-macht_id_5944384.html.

lichste Aufgabe für die Union an. Die Staaten des Westbalkans hätten Priorität für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betonte Bundespräsident Joachim Gauck, dabei gehe es auch um die Erweiterungspolitik als Motor der Entwicklung. Auch wenn die Staatsoberhäupter höchstens nur eine repräsentative Funktion haben, hat ihr Wort in den jeweiligen Heimatländern großes Gewicht.

D. Anti-Brüssel-Staaten

Es verlaufen auch andere Risse durch die EU. Die Anti-Brüssel-Staaten sind der Meinung, dass die Eurokraten verantwortlich für alles Übel auf dem Kontinent seien. Dabei geht es um Fragen wie: Was darf die EU-Kommission bestimmen? Wieviel Einfluss hat das Parlament? Und worüber sollen allein die Einzelstaaten entscheiden? Über möglichst viel, meinen die Osteuropäer. Die Kommission solle sich zurückhalten, denn die „wirkliche Legitimität“ liege bei den Mitgliedsländern und Parlamenten, sagt Tschechiens Regierungschef Bohuslav Sobotka.^⑩

Zweitens, trotz der vielfältigen Krisen der EU, die seit langem schwelen, wobei der BREXIT in manchen Augen sogar eine Existenzkrise für die Union mit sich brachte, wird die EU nicht zusammenbrechen. Der BREXIT ist auch nicht

der Anfang eines Zerfalls der Gemeinschaft, wie manche es gern voraussagen. Das Merkelsche Deutschland und der Europäische Rat haben sich bisher sehr um die Bekämpfung der Krisen bemüht. So trafen z.B. am 17. September 2016 die verbliebenen 27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der EU zur Bewältigung der Herausforderungen zusammen. Auch hat die deutsche Regierungschefin Merkel in ihrem Redebeitrag in der Haushaltsdebatte im Deutschen Bundestag vom 7. September 2016 die bisherige Mühe um die Lösung der Flüchtlingsfrage dargestellt.

Zuerst hat Merkel die Situation bei der Bewältigung der Flüchtlingskrise als vielfach besser als 2015 bezeichnet. Dann präsentierte sie den Haushaltsplan 2017 und sagte, dieser Plan sei ein Gestaltungshaushalt und gebe Antworten auf die Probleme der Zeit – und das ohne neue Schulden.^⑪ In der Flüchtlings Sache betonte sie auch, dass das Abkommen der EU mit der Türkei ein Modell für weitere solche Abkommen sei. Zum Schutz der EU-Außengrenzen und der Sicherung der Freizügigkeit in der EU sei es notwendig, mit schwierigen Nachbarländern zu reden, so Merkel. Die Solidarität in Europa lasse zu wünschen übrig, daran müsse weiter gearbeitet werden, kritisierte sie mit Blick auf die Weigerung einiger EU-Staa-

^⑩ Ebenda.

^⑪ Der Haushaltsentwurf sieht knapp 19 Milliarden Euro zur Bewältigung der Zuwanderung und zur Bekämpfung von Fluchtursachen vor. Für die Aufnahme von Asylbegehrenden und die schnelle Abwicklung der Asylverfahren stehen rund eine Milliarde Euro bereit. Bei den Integrationskursen verdoppelt der Bund sein Engagement auf 610 Millionen Euro. Für die Arbeitsmarktintegration stehen 2017 mehr als 1,5 Milliarden Euro zur Verfügung, für den berufsbezogenen Spracherwerb 410 Millionen Euro und für Arbeitsgelegenheiten in Flüchtlingsintegrationsmaßnahmen (FIM) 300 Millionen Euro. Und zur Bekämpfung von Fluchtursachen bekommen das Auswärtige Amt und das Entwicklungshilfeministerium zusätzlich 2,8 Milliarden Euro. Näheres dazu siehe Dr. Angela Merkel, die Menschen haben Vertrauen in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n: Das Parlament – Nr. 37-38 -12. September 2016, DEBATTENDOKUMENTATION, S. 3-5.

ten, Flüchtlinge aufzunehmen.^⑫

Für Merkel ist es die wichtigste Aufgabe und das Gebot der Stunde der EU, dass Europa wieder erfolgreich ist; ein Europa also, an dem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teilhaben können, mit dem sie sich identifizieren können und das ihr Leben spürbar verbessert. Das ist eine Aufgabe für die Institutionen der EU und die Mitgliedstaaten gleichermaßen.^⑬ Im Kern will Merkel die EU primär über die Chefs der Nationalstaaten führen, also eher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n Regierungen, nicht die Übertragung immer neuer Kompetenzen auf die EU-Kommission. Dies korrespondiert mit ihrer Auffassung, wonach die EU-Kommission und ihr Chef Juncker eher Teil der aktuellen Probleme der EU als Teil deren Lösung sind.^⑭ Insbesondere sah Merkel bei Juncker einen Machtappetit, der für sie ein Grund war, warum die Briten sich in der Abstimmung mehrheitlich von Europa abgewendet haben.

Während Merkel dies nicht ausdrücklich sagte, erläuterte dies jedoch ihr Finanzminister Schäuble anfang Juli 2016. „Europa müsse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den Beweis antreten, dass es handlungsfähig sei... Im Zweifelsfall muss das Intergouvernementale stärker in den Vordergrund

treten. Beim Euro-Rettungsschirm sei dies vorge-macht worden. Das Prinzip könne bei Bedarf auf weitere Bereiche ausgedehnt werden.“^⑮

Drittens, Deutschland ist objektiv und subjektiv bereits eine Gestaltungsmacht der EU geworden. Die führende Stellung und Rolle Deutschlands kann der EU aber, wie schon erwähnt nur zugute kommen, wenn das deutsch-französische binationale Tandem wiederbelebt und tatkräftig eingesetzt wird.

Es ist bekannt, dass, während sich Europa und die Welt in einem kritischen Zustand befanden, Deutschland mit allen sozioökonomischen Daten hingegen ein positives Bild abgab.^⑯ Das ist unverzichtbar für die weitere Entwicklung der EU. Aber eine operative Erfolgsperspektive hängt wesentlich von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binationalen Führung in der EU ab. Diese binationale Motorfunktion bestimmte di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s europäischen Einigungswerks seit den 50er Jahren des 20. Jahrhunderts. Sie muss auch beibehalten bleiben. Das ist nicht nur unabdingbar für den Bestand und weiteren Erfol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vielmehr bedeutet sie auch den endgültigen Bruch von einem histo-

⑫ Näheres dazu siehe Dr. Angela Merkel, Die Menschen haben Vertrauen in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n: Das Parlament – Nr. 37-38 -12. September 2016, DEBATTENDOKUMENTATION, S. 3-5.

⑬ Ebenda.

⑭ “Teil des Problems – Auch Deutsche fordern nun Junckers Abgang”, in: <http://www.krone.at/welt/auch-deutsche-fordern-nun-junckers-abgang-teil-des-problems-story-518237>, letzter Zugriff am 12.10.2016.

⑮ Schäuble, „Europa muss sein Rendezvous mit der Realität bestehen“, <http://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Content/DE/Interviews/2016/2016-07-03-WamS.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2.10.2016.

⑯ In Deutschland seien die Finanzen geordnet, die Wirtschaft stark, der gesellschaftliche Zusammenhalt gut und die geringste Arbeitslosigkeit seit 25 Jahren. Die Kaufkraft sei gestiegen, ebenso die Renten und das BaföG. Die Sozialausgaben steigen auf 187 Milliarden Euro. Näheres dazu siehe Dr. Angela Merkel, Die Menschen haben Vertrauen in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n: Das Parlament – Nr. 37-38 -12. September 2016, DEBATTENDOKUMENTATION, S. 3-5.

risch tief verwurzelten Alptraum. Dieser drückt sich bei Frankreich in der Angst vor der eigenen fallenden Führungsrolle, und bei Deutschland in der Angst vor der geopolitischen Isolation aus.

Kurzum,

1. Eine supranationale Föderation Europas ist eine Utopie.

2. Der Zerfall der EU ist auch unwahrscheinlich.

3. Deutschland spielt eine führende Rolle bei der Bewältigung der EU-Krisen, besonders der immer noch aktuellen Flüchtlingskrise. Diese kann aber nur gelöst werden, wenn Deutschland mit Frankreich zusammen die operative Führung übernimmt, wie sich bei dem Mitte September 2016 stattgefundenen EU-Gipfeltreffen in Bratislava gezeigt hat.

作者简介：连玉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Die EU im Zeichen der Krisen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Teil 2)

Von Peter Schisler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in der Europäische Union

Die Dimension der europäischen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soll im Folgenden unter zwei Perspektiven analytisch betrachtet werden.

In der ersten Perspektive geht es um das Problem des unorthodoxen Zuzugs der Flüchtlinge in die EU, der eigentlich durch eine gemeinsame Außengrenze – in Verbindung mit den unkontrollierten Übergängen zwischen den EU-Ländern (bzw. des Schengen-Raums) – so nicht vorgesehen war.

In der zweiten Perspektive wird die Problematik des Dublin-Abkommens und die misslungene Verteilung der Flüchtlinge, die bereits in der EU angekommen sind, behandelt.

Das nach der Gemeinde „Schengen“ im Großherzogtum Luxemburg benannte Schengener Abkommen war ursprünglich eine internationale

Vereinbarung zur Abschaffung der ständigen Personal-Grenzkontrolle an den Grenzen zwischen den teilnehmenden Staaten. Obwohl sich der Anwendungsbereich der aktuellen Schengen-Regelungen nicht nur auf die EU-Mitgliedstaaten (wenn auch nicht alle, wie z.B. Großbritannien, Irland und Zypern), sondern auch auf Nichtmitgliedstaaten der EU (wie Island, Norwegen, die Schweiz und Liechtenstein) erstreckt, wurden die diesbezüglichen Bestimmungen in EU-Rechtsakte übertragen und sind somit geltendes EU-Recht.

Da im Schengen-Raum die Grenzkontrollen für Personen (außer mögliche mobile Stichproben hinter den Landesgrenzen) aufgehoben wurden, werden nun Einreisende an den Außengrenzen des Schengen-Raums nach einem einheitlichen Standard (dem SIS – Schengener Informationssystem) auf das Vorliegen von Einreisevoraussetzungen kontrolliert. Dies gilt generell nach der Rechtslage an allen Land- und Wassergrenzen

des Schengen-Raums. Für Ausnahmefälle^① wurde festgelegt, dass die Kontrollen an den nationalen Binnengrenzen aus jeweils gegebenen Anlässen wie bei G7- bzw. G8-Gipfel zeitweise wieder eingerichtet werden können.

Weiterhin gibt es – auf deutschen Wunsch hin – seit 2013 einen – bisher noch nicht genutzten, aber aktuell für Griechenland erwogenen – Notfallmechanismus^② für Schengen-Staaten, bis zu 2 Jahren (für besondere Fällen) Personenkontrollen an den nationalen Landesgrenzen einzuführen. Diese Personalkontrollen müssen zuvor zwingend vom Rat der EU auf Empfehlung der Kommission bewilligt werden. Dies soll nur geschehen, wenn ein oder mehrere Staaten trotz vorgängiger EU-Hilfen nicht in der Lage sind, die Außengrenze des Schengen-Raums zu sichern. Vorab müssen unterstützende Maßnahmen, etwa durch die Grenzschutzagentur Frontex, in Betracht gezogen werden. Die Staaten können den Mechanismus nicht selbst aktivieren; zuvor muss die EU-Grenzschutzagentur Frontex eingebunden werden.

Diese gesamte Rechtslage wurde aber von der Wirklichkeit im Jahre 2015 in Frage gestellt und damit wird ein krisenhaftes Element in der EU offenbar. Was war geschehen? Die seit Jahren über das westliche Mittelmeer in die EU kommenden Flüchtlinge wurden in Italien und Spanien registriert und hatten dort auch ihren Asylantrag zu stellen. Im Jahr 2015 kamen – wie erwähnt – aus der Türkei als Transitland (primär für Syrier), über das östliche Mittelmeer mehr als eine Million Flüchtlinge auf der Türkei naheliegenden Insel in Griechenland als Außengrenze

der EU an.

Die meisten Flüchtlinge wollten aber nicht nach Griechenland, sondern nach England, Schweden und vor allem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Bald waren die vorgesehene Registrierung und erst recht die Asylantragstellung auf den griechischen Inseln, auf denen die Flüchtlinge ankamen, organisatorisch auf Grund der überraschend großen Anzahl der täglich dort ankommenden Flüchtlinge nicht mehr vollständig möglich. Die Flüchtlinge wurden mit Fähren nach Athen, also zum griechischen Festland gebracht und zogen von dort meistens unregistriert weiter über die Balkanländer bis nach Österreich. Über Österreich kamen sie dann in Deutschland im Bundesland Bayern an. Von dort wurden sie in Deutschland nach dem erwähnten Königsbergerschlüssel weitergeleitet oder sie reisten nach ihren Wunschländern wie Dänemark und Schweden weiter.

Innerhalb des Weges von Griechenland in ihre Wunschländer wurden die Flüchtlinge in den Transitländern – auch auf dem Balkan – aus humanitären Gründen mit Bussen oder Eisenbahn transportiert. Dennoch gab es bald die ersten Grenzabschottungen. Am 3. September 2015 ließ Deutschland auf Veranlassung von Frau Merkel und in Einvernehmen mit dem österreichischen Exbundeskanzler Faymann die in Ungarn gestrandeten Flüchtlinge nach Deutschland – ohne vorherige individuelle Kontrolle – einreisen. Diese aus humanitären Gründen erfolgte „Grenzöffnung“ wird ihr bis heute als ein Verhalten wie in einem „Unrechtsstaat“ von dem CSU-Chef und Bayer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 Seehofer öffent-

① Siehe http://www.asyl.net/fileadmin/_migrated/content_uploads/grenzkodex.scr.pdf (24.03.2016).

② Siehe http://ec.europa.eu/home-affairs/doc_centre/borders/docs/C_2006_5186_F_de.pdf (24.03.2016).

lich in polemischer Absicht angekreidet.^③

Ungarn zog bereits im September und Oktober 2015 einen Schutzzaun zu den Balkanstaaten – zuerst zu Serbien und dann zu Kroatien, so dass sich die Flüchtlinge einen Weg um Ungarn herum suchen mussten. Dies führte zu einer Überforderung der nun betroffenen Länder auf der Balkanroute, die im Lauf der Monate ihre Grenzen verstärkt kontrollierten oder sogar teilweise unkontrollierte Grenzübergänge durch die Ziehung von Zäunen schlossen.

Deutschland nahm in der Asylfrage eine Sonderrolle ein. Das deutsche Grundgesetz garantiert jedem Flüchtling die Gewährung von Asyl, wenn er parallel zu den Kriterien der Genfer Flüchtlingskonvention^④ politisch verfolgt wird. Zusätzlich wurde faktisch auch den Bürgerkriegsflüchtlingen aus Syrien dieses Recht gewährt, obwohl ihnen nach der Genfer Flüchtlingskonvention nur eine (einschränkende) „subsidiäre“ Asylgewährung zustehen wurde. Da bei jedem Flüchtling zur Identifikation von nicht-asylberechtigten Wirtschaftsflüchtlingen (in der EU Migranten genannt) die jeweils persönlichen Gründe der Flucht geprüft werden müssen, können alle Flüchtlinge erst einmal nach Deutschland einreisen und wurden dort auch aufgenommen. Für ihre Unterkunft und den Lebensunterhalt wurde und wird gesorgt.

Im Ergebnis der Ereignisse von 2015 funktioniert das Schengen-Abkommen im Hinblick auf

die Sicherung der Außengrenze der EU faktisch nicht mehr (vollständig). Alle Staaten beriefen sich bei ihren nationalen Grenzsicherungen bzw. -kontrollen auf die im Abkommen vorgesehenen Ausnahmeregelungen. Permanentes Ziel bleibt es für den Europäischen Rat, die EU-Kommission und alle beteiligte Länder, die Schengen-Regelungen bezüglich der Außengrenze 2016 wieder voll zur Wirkung kommen zu lassen. Aber über das „wie“ wurde auch vor dem EU-Gipfel Mitte Februar 2016 gestritten. Dabei wurde überraschend von Österreich erwogen, Griechenland zeitweise aus dem Schengen-Gebiet auszuschließen und dann die Abschottung zur EU für die Flüchtlinge auf dem Balkan – an der Grenze zwischen Griechenland und dem Nicht-EU-Land Mazedonien zu verlegen.^⑤

Obwohl alle von Flüchtlingsströmen betroffenen Länder partiell oder temporär nationale Grenzkontrollen im Rahmen ihrer verbliebenen nationalen Souveränität eingeführt haben, blieben sie nominell im Kontext der bestehenden Ausnahmeregelungen. Dabei haben die unterschiedlichen und z. T. kaum abgestimmten Ausnahmeregelungen im Schengen-Abkommen zu einer auf Dauer nicht haltbaren Gesamtsituation geführt. Es wurde allen EU-Staaten klar, dass, wenn das Schengen-System zusammenbrechen würde, und an allen nationalen Landesgrenzen wieder Grenzkontrollen eingeführt würden, dies zu einer schweren Schädigung des europäischen Binnen-

③ <http://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deutschland/seehofer-und-unrechtsstaat-partefreunde-gehen-auf-distanz/12945000.html> (24.03.2016).

④ http://www.unhcr.de/fileadmin/user_upload/dokumente/03_profil_begriffe/genfer_fluechtlingskonvention/Genfer_Fluechtlingskonvention_und_New_Yorker_Protokoll.pdf (24.03.2016).

⑤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fluechtlinge-oesterreich-bietet-soldaten-fuer-grenze-in-mazedonien-an-a-1078974.html> (24.03.2016).

marktes führen würde, was letztlich kein EU-Staat, keine EU-Institution und kein seriöser Regierender verantworten könne.^⑥

Grundsätzlich gilt nach dem Dubliner Übereinkommen,^⑦ das die Gestalt eines völkerrechtlichen Vertrags aufweist, dass der Staat, in den der Asylbewerber nachweislich zuerst eingereist ist, das Asylverfahren durchführen muss. Das Dubliner Übereinkommen wurde am 15. Juni 1990 von den damals zwölf EG-Mitgliedstaaten unterzeichnet und trat am 1. September 1997 in Kraft. Das aktuelle Dublin-Abkommen gilt nun in der 3. Fassung und wurde im Juni 2013 ergänzt durch das von allen teilnehmenden EU-Staaten ratifizierte Gemeinsame Europäische Asylsystem (GEAS), welches einheitliche Schutzstandards für Flüchtlinge, ein verkürztes Asylverfahren und einen vereinfachten Zugang zum nationalen Arbeitsmarkt sicherstellen soll. Das Dublin-Abkommen und das GEAS gehören somit zum gemeinsamen Bestand des gültigen Europäischen Rechtssystems. Auf Grund der problematischen Erfahrungen mit dem Dublin-Abkommen im Jahre 2015 wurde die supranationale EU-Kommission beauftragt, bald eine Revision des Dublin-Abkommens für den EU-Gipfel vorzuschlagen.

Im Prinzip bedeutet dies, dass die Länder ohne EU-Außengrenzen (von einreisenden Asylbewerbern über Flughäfen und Häfen abgesehen) kaum Asylanten registrieren und deren Anträge bearbeiten müssen. Dieses System führte bereits in der Vergangenheit zu einer Überbelastung der Mittelmeerstaaten Italien, Spanien und Griechenland.

Nun kamen die Forderungen nach einer Lastenverteilung bei der Aufnahme der Flüchtlinge auf; die EU konnte sich aber im Rahmen des vergemeinschafteten Souveränitätsbereichs nicht auf eine feste Quote der Verteilung der Flüchtlinge auf die Mitgliedsländer einigen. Das betrifft schon den Kern der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der EU^⑧ und führte 2015 zur krisenhaften Zuspitzung: Durch die große Anzahl der aus Syrien und dem Irak durch die Türkei auf den ostägäischen griechischen Inseln ankommenden Flüchtlinge konnten diese nicht mehr alle registriert werden und haben damit auch keinen Asylantrag in Griechenland gestellt. Die Flüchtlinge reisten somit unregistriert (also faktisch illegal) in die EU ein und zogen über den Balkan zu ihren Zielländern (Deutschland, Schweden usw.) weiter. Dieser Vorgang wurde polemisch als „Durchwinken“

⑥ Und wohl auch kein Bürger der EU will. Einen erschreckenden Vorgeschmack (Staus, Kontrollen, Wartezeiten) bekamen die Bewohner der deutschen Grenzstädte zu Frankreich für mehrere Monate als nach dem Attentat in Paris am 15.1.2015 z. B. an der Europabrücke als Grenze zwischen Straßburg (Frankreich) und Kehl (Deutschland) genau kontrolliert wurde. Siehe <http://www.schwarzwaelder-bote.de/inhalt.kehl-auf-der-europabruecke-gibt-es-wieder-grenzkontrollen.5a5b14d6-25f5-487b-a81f-3cef7158a2a6.html> (24.03.2016)

⑦ Das Dubliner Übereinkommen wurde am 15. Juni 1990 von den damals zwölf EG-Mitgliedstaaten unterzeichnet. Es trat am 1. September 1997 in Kraft und ist nun in seiner 3. Fassung gültig. http://www.asyl.net/fileadmin/user_upload/gesetzetexte/Aenderung_Dublin_VO.pdf (24.03.2010).

⑧ In diesen Sinnen äußerte sich auch die Bundeskanzlerin Merkel in Ihrer Regierungserklärung am 7.02.2016 vor dem EU-Gipfel zur Flüchtlingsfrage.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Bulletin/2016/02/18-1-bk-regerkl-bt.html> (24.03.2016).

gebrandmarkt. In den Zielländern wurden alle Flüchtlinge letztlich (ggf. nochmals) registriert. Zu diesem Zweck wurden gemäß der Ausnahme der erwähnten temporären Ausnahmeregelung nach dem Schengen-Abkommen nationale Grenzkontrollen wieder eingeführt – so auch von Deutschland. Nach der Registrierung und Aufnahme in dem Zielland konnten und können sie dort einen Asylantrag stellen – gemäß einer spezifischen Regelung in der erwähnten Dubliner-Verordnung. Der Ruf der betroffenen Länder nach einer solidarischen und fairen Lastenverteilung in der EU blieb allerdings weitgehend unbeachtet.

Auf eine Verteilung der zuvor schon in Italien und Griechenland registrierten 120.000 und plus 40.000, also insgesamt 160.000 Flüchtlinge hat sich der EU-Ministerrat der Innenminister nicht einstimmig, sondern mit der qualifizierten Mehrheit bereits am 22. September 2015 gegen die Stimmen von Slowakei, Tschechien, Ungarn und Rumänien geeinigt; aber erst im Frühjahr 2016 wurde diese Verteilung, allerdings nur unwesentlich umgesetzt.^⑨ Dies war keine grundsätzliche Einigung, sondern eine singuläre Entscheidung. Da Ungarn und die Slowakei jeweils rund 2.300 Flüchtlinge (zum Vergleich Deutschland 31.000 Flüchtlinge) aufnehmen sollten, erhob zuerst die Slowakei und dann auch Ungarn^⑩ Klage beim Europäischen Gerichtshof (EuGH) –

mit dem Ziel der Aufhebung dieses Mehrheitsbeschlusses des EU-Ministerrates.

Nachdem auch Frankreich neben den Visegrád-Staaten (also Polen, Tschechien, Slowakei und Ungarn) einer über diesen Beschluss hinausgehenden Aufnahme von Flüchtlingen eine Absage erteilt hat, ging es Anfang 2016 in der politischen Praxis nur noch darum, welche EU Staaten wieviel Flüchtlinge freiwillig aufzunehmen bereits sind.

Die allseits erhobene Forderung nach einer Wiederherstellung des geordneten Verfahrens (vollständige Registrierung an der EU-Außengrenze – mit der Abnahme von Fingerabdrücken – und Asylantrag in dem Land, das die Registrierung vorgenommen hat) wurde ergänzt durch die Forderung der Kommission an die Mitgliedstaaten, einer fairen, solidarisch begründeten Verteilung der Flüchtlinge auf alle EU-Mitgliedstaaten zuzustimmen. In den EU-Mitgliedstaaten wird ergänzend unisono die Forderung erhoben, die Anzahl der Flüchtlinge – wie auch immer – ab 2016 deutlich zu reduzieren.

Der EU-Gipfel am 18. und 19. Februar 2016 sollte (neben der Frage der Verhinderung des Brexit) im Rahmen der erwähnten merkelschen „Unionsmethode“ – einen diesbezüglichen Lösungsweg aufzeigen. Es wurde jedoch lediglich ein neuer Sondergipfel des Europäischen Rates mit der Türkei für den 7. März 2016 vereinbart.

⑨ In diesem Kontext beklagte der deutsche Entwicklungsminister Gerd Müller (von der CSU), dass von den 160.000 Flüchtlingen in Italien, die die EU im Herbst 2015 Monaten umzuverteilen beschloss, seien gerade einmal rund 400 verteilt worden sind. Die EU-Gremien erinnerte er an ihre Aufgabe, die diesbezüglichen Beschlüsse zu implementieren. Siehe http://www.focus.de/politik/ausland/entwicklungsminister-gerd-mueller-alle-verzweifeln-an-syrien-er-nimmt-schon-die-naechsten-krise-ans-visier_id_5282417.html (24.03.2016).

⑩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5-12/europaeischer-gerichtshof-ungarn-klage-fluechtlingsquote> (24.03.2016)

Die Fortsetzung der Zusammenarbeit mit der Türkei soll entscheidend dazu beitragen, die Zahl der in der EU ankommenden Asylsuchenden erheblich zu reduzieren. Auf die Thematisierung einer nicht durchsetzbaren festen Quotenregelung wurde zu Gunsten einer kleinen Koalition der Willigen um Deutschland auf dem nächsten EU-Gipfel verzichtet. Ganz offensichtlich versagt die „Unionsmethode“, die bis dato noch in der Euro- und Griechenlandfinanzkrise erfolgreich war.

Das Kernproblem der EU bei der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In der politischen Diskussion offenbart die aktuelle Frage nach täglichen, monatlichen oder sonstigen Obergrenzen der Aufnahme und Asylgewährung von Flüchtlingen das Kernproblem in Deutschland und anderen Mitgliedsländern der EU. Die Einführung von Obergrenzen wäre – wie auch immer – aus deutscher Sicht – nur eine Scheinlösung, denn sie würde unausweichlich eine Kettenreaktion auslösen. Durch die Nennung von Obergrenzen befände sich kein Flüchtling weniger auf dem Weg nach Europa. Vielmehr sind Rückstaus auf der Balkanroute leicht absehbar, so dass zu – ohne entsprechende Vorsorge –

befürchten wäre, dass die Flüchtlinge, die noch über das Mittelmeer von der Türkei kommen, in Griechenland stranden würden.

Der befürchtete Effekt wurde bereits für Griechenland fatal sichtbar, als sich Ende Februar 2015 quasi als Vorbereitung für den EU-Gipfel am 7. März 2016 einige Balkanländer und insbesondere das nicht zum Schengen-Raum gehörende Mazedonien dazu entschlossen, ihre Grenzen für Flüchtlinge vom Schengen-Land-Griechenland zeitweise vollständig bzw. für einen Teil der Flüchtlinge (Afghanen) zu schließen.^⑪ Zur Verdeutlichung, die an dieser Grenze aufgehaltenen Flüchtlinge wollten vom erreichten Schengen-Raum in Griechenland über das Nicht-Schengen-Land Mazedonien wieder in den Schengen-Raum eintreten, wenn sie Mazedonien auf der Balkanroute weiter in Richtung Westeuropa verlassen würden.

In d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am 17. Februar 2016 benannte sie drei Zielvorstellungen^⑫ bezüglich der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Bekämpfung der Fluchtursachen, Sicherung der EU-Außengrenzen und Steuerung des Flüchtlingszuzugs. Von einer Abschottung der EU oder Deutschlands oder gar Obergrenzen des Zuzugs von Flüchtlingen ist in

⑪ http://www.focus.de/politik/ausland/idomeni-lage-an-der-griechischen-grenze-droht-ausser-kontrolle-zu-geraten_id_5330335.html (24.03.2016).

⑫ „Die Bundesregierung setzt an drei Punkten an:

Erstens. Wir bekämpfen die Fluchtursachen.

Zweitens. Wir stellen den Schutz der EU-Außengrenze zwischen Griechenland und der Türkei, also an der für die Flüchtlingsbewegung zumindest im Augenblick entscheidenden Schengen-Außengrenze, wieder her und teilen die Lasten. Und

Drittens. Wir ordnen und steuern den Flüchtlingszuzug.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Bulletin/2016/02/18-1-bk-regerkl-bt.html> (24.03.2016).

dieser Erklärung keine Rede. Frau Merkel befindet sich damit im Einklang mit der EU-Kommission, die mit Recht darauf verweist, dass Obergrenzen gegen die Genfer Flüchtlingskonvention für Flüchtlinge und den Artikel 18 der Charta der Grundrechte der EU verstoßen. In Deutschland würde die Einführung einer Obergrenze außerdem das erwähnte individuelle Grundrecht auf Asyl missachten. Würde Deutschland – ohne Grundgesetzänderung – eine Obergrenze für Flüchtlinge einführen, wäre dies ab des ersten abgewiesenen Flüchtlings eine gravierende Rechtsverletzung. Dennoch wird eine Obergrenze innenpolitisch vor allem von den rechten Parteien und aus Teilen der mitregierenden Partei CDU und vor allem der CSU massiv gefordert.

EU-weit wird von vielen Nationen auf der staatlichen Seite anhaltender Rechtsbruch – im Februar 2016 auch Österreich mit seiner Obergrenze von 80 Flüchtlingen pro Tag – begangen. Dies wiegt umso schwerer, weil sich damit nicht nur eine Entsolidarisierung zeigt, sondern unverhohlen die Beschlüsse und vertragliche Regelungen im vergemeinschafteten Souveränitätsbereich aus ideologischen Gründen in Frage gestellt wer-

den.^⑬

Die EU versteht sich nicht nur als ein großer funktionierender Binnenmarkt mit geteilten Lasten und großem Einfluss in der Welt, sondern auch als eine Wertegemeinschaft, in der das Recht aus geschlossenen Verträgen gilt und die sich supranational auf die Menschenrechte und – wie erwähnt – auf die Genfer Flüchtlingskonvention als gemeinschaftliche Wertebasis bezieht.

Die große Anzahl der Flüchtlinge, die im Jahre 2015 in Europa Zuflucht suchten und vor allem in Deutschland fanden, stellte primär ein großes logistisches Problem dar, das die rechtlichen Regelungen im Rahmen der EU-Grenz- und Migrationsvorkehrungen überforderte. Das Ausmaß der Überforderung relativiert sich allerdings bei einem Vergleich mit den Flüchtlingszahlen in den Nachbarländern von Syrien.^⑭

Auch bilden diese real festzustellenden partiellen Überforderungen nicht den Kern der strukturellen krisenhaften Probleme der EU. Es war das unsolidarische starre und nationalegoistische Verhalten einiger EU-Mitgliedstaaten, die das so verstandene nationale Interesse über die gemeinsamen Werte in der EU stellten und noch

⑬ So lehnte z. B. der ungarische Regierungschef Viktor Orban auch noch Anfang März 2016 eine feste Quote für eine europaweite Verteilung der Flüchtlinge rigoros ab. “Schon die Zahl eins wäre für uns zu viel”, sagte Orban. “Wir würden keine Vereinbarung akzeptieren, die einen Transfer von Migranten aus der Türkei nach Ungarn vorsieht.” Die ungarische Regierung glaube, dass Europa fähig sein solle, “die Grenzen luftdicht zu versiegeln”. Siehe http://www.focus.de/politik/deutschland/fluechtlingskrise-im-news-ticker-eskalation-an-griechisch-mazedonischer-grenze-polizisten-tasern-fluechtlinge_id_5335236.html (20.03.2016).

⑭ Der Libanon beherbergt nach der UNHCR bei 5,8 Mill. Einwohner 1 Mill. Flüchtlinge, Jordanien bei 6,8 Mill. Einwohner 0,6 Mill. Flüchtlingen und die Türkei bei 79,5 Mill. Einwohner 2,5 Mill. Flüchtlinge. Die EU rechnet bis 2020 (im Vergleich nur) mit ca. 3 Mill. Flüchtlingen bei über 500 Mill. Einwohner. <http://data.unhcr.org/syrianrefugees/regional.php> (24.03.2016).

stellen.¹⁵ Faktisch wurden die sich aus den vergemeinschafteten Souveränitätsbereichen ergebenden rechtlichen und solidarischen Pflichten vorsätzlich torpediert und partiell oder total bewusst missachtet. Diese Diagnose korrespondiert mit dem Ansinnen des ungarischen Regierungschefs Orbán zusammen mit gleichgesinnten Staaten, die EU so umzugestalten, dass generell die Nationalstaaten supranationale Vorgaben der EU ablehnen können.¹⁶ Zu Ende gedacht, würde damit letztlich aus einem Staatenverbund der EU lediglich ein Staatenbund mit gemeinsamem Binnenmarkt. Die EU würde wohl ihre Einzigartigkeit und Zukunftsfähigkeit einbüßen.

Die bis Ende März 2016 noch eindeutig erkennbare und wohl abschbar unverrückbare Position der Ablehnung der Aufnahme von (weiteren) Flüchtlingen durch die als unsolidarisch wahrgenommenen EU-Länder (so die Bezeichnung dieser Länder in den Medien und damit in der Öffentlichkeit) ist der Kern der strukturellen Krise der EU; aktuell und konkret findet sie in der fehlenden Bereitschaft vieler EU-Mitgliedsländer zu einer europäischen Flüchtlingsquote ihren unübersehbaren Ausdruck.

Ein Weg zur Verminderung der drückenden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war die allseitige Erkenntnis, die Anzahl der Flüchtlinge in Europa bzw. in den noch aufnahmebereiten EU-Mit-

gliedsländern drastisch reduzieren zu müssen. Gleichzeitig entschärfte sich dadurch – zu mindestens quantitativ –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Quotenregelung für die Verteilung der Flüchtlinge in der EU. Dies impliziert insbesondere die konsequente Beseitigung der rechtlich unhaltbaren Situation, dass die Flüchtlinge ohne Kontrolle, also irregulär auf dem Weg über den westlichen Balkan (Balkanroute) von Land zu Land bis zu ihrem Zielstaat „weitergereicht“ wurden.

Eine Reduzierung der Flüchtlinge löst aber nicht den in der Problematik der Flüchtlingsverteilung sichtbar gewordenen strukturellen Konflikt der EU-Mitgliedstaaten. Die unterschiedlichen Vorstellungen und Zielsetzungen über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dem nationalstaatlichen Souveränitätsanspruch und dem intergouvernementalen und supranationalen Regelungsanspruch der EU sorgen für weitere Konflikte in gegebenen konkreten Situationen.

Deutschland und die EU-Kommission setzten auf die Mitwirkung der Türkei, um die Anzahl der Flüchtlinge, die in Griechenland ankommen, auch mit Hilfe eines Nato-Marine-Verbundes unter deutscher Führung zur Unterstützung der türkischen Küstenwache bei der Verhinderung von Bootstransporten mit Flüchtlingen durch elektronische Fernaufklärung drastisch zu reduzieren. Zugleich konzipierten primär Österreich

¹⁵ Exemplarisch für den Versuch mit nationalstaatlichen Mitteln verbindliche Entscheidungen in der EU im eigenen Land vertragswidrig zu umgehen, kann das vorgestellte, aber noch nicht terminierte Referendum von Ungarn herangezogen werden. Die sich selbsterklärende Fragestellung ignoriert am konkreten Fall grundsätzlich die Regelungskompetenz in der EU: “Wollen Sie, dass die Europäische Union verpflichtende Kontingente für die Aufnahme von nicht-ungarischen Bürgern in Ungarn vorschreibt - auch wenn das Parlament dem nicht zustimmt?”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orban-referendum-101.html> (24.03.2016).

¹⁶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viktor-orbans-europainitiative-wir-muessen-bruessel-stoppen-a-1080420.html> (24.03.2016)

und die Westbalkanstaaten als „Allianz der Vernunft“¹⁷ zuvor parallel und alternativ einen von der EU unabhängigen nationalstaatlich legitimierte Lösungsweg. Sie gingen davon aus, dass die Schengen-Grenze zur Türkei für die Flüchtlinge durchlässig bleibt und weiterhin eine erhebliche Anzahl von ihnen nach Griechenland kommt, und wollten zur dauerhaften Unterbrechung der Balkanroute insgesamt eine gemeinsame militärisch gesicherte Absperrung an der Grenze von Griechenland zu Mazedonien zu errichten.

Nachdem auf dem EU-Sondergipfel am 7. März 2016 die Türkei den überraschenden Vorschlag unterbreitet hat, alle nach Griechenland illegal einreisenden Flüchtlinge aus Syrien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zurückzunehmen, wurden dieser Vorschlag grundsätzlich aufgegriffen und weitere intensive Verhandlungen über ein umfassendes Paket zur Bewältigung der Flüchtlingskrise mit der Türkei angekündigt. Nun sollte auf dem EU-Gipfel am 17. und 18. März 2016 eine Vereinbarung mit der Türkei verabschiedet werden. Eine Bedingung der Türkei ist, dass für jeden der zurückgenommenen „illegalen“ Flüchtlinge, ein in der Türkei sich aufhaltender syrischer Bürgerkriegsflüchtling legal von der EU aufgenommen werden muss.¹⁸ Dies erfordert eigentlich eine vorgängige Klärung der Quoten-Problematik in der EU. Hierzu erklärte

Ungarns Regierungssprecher Zoltan Kovacs: „Er (der unga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Viktor Orbán) hat ein Veto eingelegt gegen den Plan, wonach Migranten und Asylbewerber direkt aus der Türkei nach Europa umgesiedelt werden“.¹⁹ Kurz danach und unabhängig von dem EU-Gipfel am 7. März 2016 orientierten sich die Staaten²⁰ Slowenien und Serbien sowie nun auch Kroatien und Mazedonien auf der Balkanroute bereits genau an den Schengen-Regeln und gestatteten kein „Durchwinken“ mehr.

Am 18. März 2016 kam es zu der von Frau Merkel im Rahmen ihrer Unionsmethode gewünschten Regelung, die nur 2 Tage danach schon in Kraft trat. Nun sollten keine Flüchtlinge mehr über das Mittelmeer von der Türkei aus nach Griechenland gelangen. Auch das Schlepperunwesen sollte dadurch beendet werden. Wenn es einigen Flüchtlingen gelingen sollte, nach Griechenland zu kommen, würden sie nach einer kurzen Prüfung in der Regel in die Türkei zurückgeschickt; rechtlich wurde dazu die Türkei von Griechenland zu einem sicheren Herkunftsland erklärt. Die EU nimmt im Gegenzug erst einmal für jeden von Griechenland in die Türkei zurückgeschickten syrischen Flüchtling einen sich bereits in der Türkei befindenden geflüchteten Syrer legal auf, der zuvor keinen Versuch der illegalen Einreise in die EU unternommen hat. Die Anzahl der so aufgenommen legalen Flücht-

¹⁷ So die Innenministerin von Österreich. U. a.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johanna-mikl-leitner-die-balkanroute-bleibt-geschlossen-a-1081541.html> (24.03.2016).

¹⁸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tuerkei-eu-treffen-zur-fluechtlingskrise-gipfel-beendet-loesung-vertrag-a-1081135.html> (20.03.2016).

¹⁹ <http://www.freiewelt.net/nachricht/viktor-orban-legt-veto-gegen-tuerkei-deal-ein-10065831> (24.03.2016).

²⁰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fluechtlings-slowenien-und-serbien-machen-ihre-grenzen-faktisch-dicht-a-1081334.html> (24.03.2016).

linge wurde auf 72.000 beschränkt. Die ersten aufzunehmenden Flüchtlinge kamen aus einem schon zuvor mit der Türkei vereinbarten Kontingent von 54.000 Flüchtlingen und danach kamen noch 18.000 weitere.

Über Flüchtlinge aus anderen Ländern wie Afghanistan, Irak, Eritrea usw. wurde kein entsprechender Austausch vereinbart; sie werden aber auch in die Türkei zurückgeschickt. Die Türkei erhält als Gegenleistungen für seine Bürger ab Mitte 2016 Visumfreiheit im Schengen-Raum, beschleunigte EU-Beitrittsverhandlungen sowie erheblich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von insgesamt mindestens 6 Milliarden Euro. Diese Mittel sollen für eine gute Versorgung der bis 2,5 Millionen Flüchtlinge in der Türkei eingesetzt werden, damit sie in der Türkei bleiben und nicht in die EU illegal einzureisen versuchen.

Nach dem EU-Gipfel vom 18. und 19. März 2016 sagte Frau Merkel auf einer Pressekonferenz in Richtung auf die sich noch in der Türkei befindlichen Flüchtlinge wörtlich: „Wer sich auf diesen gefährlichen Weg begibt, riskiert nicht nur sein Leben, sondern hat auch keine Aussicht auf Erfolg.“ Damit hat sie sich letztendlich mit ihrer Politik, den Flüchtlingsstrom schon an der türkischen Quelle zu unterbinden, gegen die von Österreich angeführte Strategie der nationalen Grenzsicherungen durchgesetzt.

Obwohl damit die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in der EU seit einiger Zeit als im Wesentlichen bewältigt gelten kann, ist die Verteilung der in der EU legal ankommenden Flüchtlinge auf die EU-Mitgliedsländer nach wie vor ungeklärt. Insbesondere, da die primär nur ihre eigenen Nationalinteressen beachtenden EU-Staaten weiterhin keine Flüchtlinge aufnehmen wollen. Ihr Verhalten mit der partiellen Missachtung

der EU-Regelungen sowie das punktuelle Ignorieren der gemeinschaftlichen Rechts- und Werteordnung der EU können nicht ohne Wirkung auf den zukünftigen Zusammenhalt der EU bleiben.

Wie ist abschließend die deutsche Rolle in der Krise zu bewerten?

Deutschland kann auch als das wirtschaftlich leistungsstärkste Land in dem Staatenverbund der EU keine Mitgliedsländer verpflichten, getroffene Regelungen einzuhalten oder sich solidarisch zu verhalten – wie bei der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zu beobachten war und ist. Obwohl Deutschland bis vor kurzem öfters als Hegemon in der EU beschrieben wurde, zeigt sich die Begrenztheit des deutschen Einflusses bei der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 im Gegensatz zur Euro- und Griechenlandkrise – unübersehbar.

Deutschland dominiert als europäische Zentralmacht zwar ökonomisch die EU, aber bei anderen Fragen, in denen Deutschland eine spezifische Position einnimmt, ist Deutschland auf die Mitwirkung der anderen EU-Staaten angewiesen. Zur Lösung vieler wichtiger Fragen und Probleme in der EU hat sich bisher das Duo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wenn sie gemeinschaftlich auftreten, schon mehrfach bewährt; in der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verhält sich Frankreich jedoch zunehmend wie die **Visegrád**-Staaten. Deutschland kann mit seiner humanen und rechtstreuen Asylpolitik sodann nur auf einen kleinen Kreis von willigen EU-Mitgliedstaaten bei der zukünftigen Bewältigung der weiteren (aber dann deutlich reduzierten) Flüchtlingszüge nach Europa hoffen.

Unabhängig davon, wie sich die Flüchtlingsproblematik in der EU weiterentwickelt und wie sie mittel- und langfristig in der EU und national gelöst wird, wird sich die Beibehaltung des unsolidarischen Handelns einiger EU-Staa-

ten, die partielle Missachtung supranationaler sowie intergouvernementaler Regelungen sowie das punktuelle Ignorieren der gemeinschaftlichen Werteordnung nachhaltig negativ auf die Zukunft der EU auswirken.

Autor: Dr. Peter Schisler, ehemals Professor und Studiendekan an der IB-Hochschule Berlin

德国对英国脱欧的评估及欧盟未来发展前景

李文红

【摘要】如今的欧洲存在多元危机，难民、移民和暴恐等问题层出不穷。而英国脱欧又使欧盟雪上加霜。德国采取了对英国脱欧后的补救措施，设法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挫折降到最低程度；减少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负面影响；防止欧盟内部其他国家效仿英国脱欧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德国对英国脱欧后对欧盟未来发展前景有着新考量，德国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加强欧盟核心六国的作用。英国脱欧是欧洲的政治转折，目前难民政策陷入危机。英国脱欧带来的德国权力增长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的担忧。

【关键词】英国脱欧 德国评估 欧盟前景

2017年2月1日，英国议会下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法案，为英国政府按计划于3月底正式开启“脱欧”谈判铺平了道路。英国政府公布的“十二点脱欧纲要”显示了一个“决绝的硬脱欧”方案，重点是：英国将全面掌握本国边境控制权和立法、司法主权，拒绝欧盟的“人口自由流动”原则以及来自欧洲法院的司法权威；英国将完全退出欧洲单一市场。“脱欧就是脱欧，不是半走半留的状态，也不留恋欧盟的单一市场地位”。

之前，外界对英国脱欧影响的担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脱欧”的具体安排；如今，在“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呼声

甚嚣尘上，“全球化”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的时刻，英国政府以“决绝的硬脱欧”姿态提出自己的脱欧方案，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前景无异于雪上加霜。英国的这一做法，必将对欧洲2017年接踵而至的荷、法、德等国大选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带来了“效仿者”，在欧盟内再出现一个或者多个“英国”，那么欧盟将造成致命的折损；“欧盟瓦解或者变成一个松散的、柔性的联盟”的担忧，将演变为现实的危险。德国作为欧盟内最大的经济体、欧洲经济发展的引擎、推动欧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欧洲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必然面临英国脱欧后对欧盟未来发展前景的新考量。

一、德国对英国脱欧的反应

1. 英国脱欧的原因和背景

对于欧盟组织定位的理解在德法与英国的理解中一直是大相径庭的。从德法来讲，欧洲共同体和后来的欧盟建设伊始，欧共体及其继任者就被定位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或共同市场，而且赋予了重要的政治使命。英国虽然早已看出这一点，但还是故意看轻欧盟的政治重要性。英国公投是西方社会变化的后果，欧洲一体化是一个精英的事业。冷战后西方国家社会过去由精英统治的时代逐步衰落，经济形势不景气，老百姓对精英政治逐渐失去信任。政治家把重大政治议题交给公投，孕育着很大风险。

英国一直被认为是欧盟里的“棘手的伙伴”。当年英国没有第一时间加入欧共体，英国加入欧共体相对较晚，1973年加入，当时还众说纷纭，以至于1975年在下一届的政府中又通过公投决定留在欧共体。当时加入欧共体，不是出于认同欧洲身份，完全是经济上的考虑，加入欧共体的核心也是首先看中了欧洲内部大市场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而一个政治的欧盟的目标对大部分英国人来说还是很陌生的。^① 英国的现实务实主义主要是同经济利益的“务实”考量密切相关。它意图借助欧洲市场能给英国提供就业、投资、贸易利益。英国既不是欧共体创始成员国，也不是欧元区成员国，身处欧洲，英国的欧洲认同感很弱。作为地理上的岛国，英国在

文化上和欧洲其他大陆国家有区别。英国看欧共体或者欧盟首先出于现实利益，很少像德国和法国那样更多是道义上的。英国很少把欧盟整体放在眼里，也就是说很少关注欧盟整体的发展和团结。^② 2002年欧元正式诞生之时，英国没有加入欧元区，没有在申根协定上签字，更谈不上欢迎或支持欧洲政治一体化，英国与欧盟向来保持着一种不离不弃的状态。

如今的欧洲存在多元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等新问题层出不穷。而此次英国“脱欧”，最焦点的问题是移民和恐袭问题。移民问题的集体焦虑促使“脱欧论”成为主流。移民这个问题在英国已经政治化和民粹化了。^③ 外来移民对英国就业机会的竞争，以及对社会福利费用的消耗，都引起了英国居民的强烈不满。目前英国接纳的欧盟净移民量超过50%，英政府目标是将每年移民数控制在10万以内，但净移民的实际数量超过30万，由于欧盟内可以自由流动，英国无法控制移民数量，脱欧派认为这也为恐怖分子进入英国提供便捷，英国居民的这种不满情绪就被进一步强化了。^④ 更加影响了英国对欧盟看法和立场的转变，脱欧背后显示了英国对欧盟的不信任。英国在各种危机中，加快了脱欧的脚步，从而走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2. 德国对英国脱欧伤心

英国“脱欧”在全世界引起人们的震惊。时任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的西格马·加布

① Almut Möller: Politische Folgen des britischen EU-Referendums, <http://m.bpb.de/internationales/europa/brexit/228804/politische-folgen>., 最后访问日期为2016年4月7日。

② Almut Möller: Politische Folgen des britischen EU-Referendums, <http://m.bpb.de/internationales/europa/brexit/228804/politische-folgen>, letzter Zugriff am 07.04.2017.

③ 陈琦:《英国“脱欧论”有复杂的政治动因》，载《文汇报》2016年5月/30日，第006版，国际。

④ 潘英丽:《英国“脱欧”的利与弊》，载《中国经济时报》2016年7月4日，第008版。

里尔在社交媒体表示“伤心”：“对欧洲而言，这真是糟糕的一天。”这是对英国“脱欧”的一句伤心话。德英法曾是欧盟“三驾马车”，是欧盟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支柱。德国全力推动欧洲一体化，面对英国“脱欧”除了伤心之外，还有更为深深的忧虑。“英国‘脱欧’对所有欧洲人来说是一场灾难。”，这是德国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拉策对英“脱欧”后的一句铿锵有力的结束语。从经济上说，英国是德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英国与欧洲内部市场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会削弱德国的经济增长动力，由此给德英贸易带来负面影响；其次，从欧盟财政上说，英国每年向欧盟预算缴纳的会费达 70 多亿欧元，约占欧盟总预算的 12.57%，英国“脱欧”后这个缺口不得不由德国来填补；再从欧盟对全球的影响力来说，英国作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的退出，必将影响欧盟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而且，欧盟内部团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更使民粹主义在欧洲再次兴风作浪。在荷兰和法国已经出现举行“脱欧”公投的呼声，丹麦、瑞典等国家也频现“疑欧”声音，希冀步英国的后尘。所有这一切都让德国很头疼。

3. 减少英国脱欧对欧美关系的负面影响

英国“脱欧”削弱了欧美之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也伤害着英美长期保持的“特殊关系”。虽然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对英国脱欧大加赞赏，但对英国来说，最大难题是，英国以后对美国的重要性是大不如前了。英国退出欧盟，美国想通过英国这个“忠实代理人”控制和主导欧洲的能力会被削弱，英国在欧盟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上的份量将大大减轻。英国脱离欧盟后，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岛国，同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随着英国脱欧，德国在欧洲更重要，美国不得不断加强和德国的关系，美国希望自己最好的朋友能在欧盟发挥作用。

二、德国对英国脱欧后的补救措施

欧洲一体化进程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启到如今拥有 28 个成员国，英国脱离欧盟使其损失一个重要且居欧盟成员国排行老二的这么一个重要伙伴，不得不说是伤到了欧盟的筋骨了，英国脱欧对欧盟的打击是很大的。

1. 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挫折降到最低程度

在欧盟内，英国是仅次于德国的经济体，是欧盟可以在联合国发声的常任理事国。防务方面，英国最强，欧洲主要看上英国的核大国地位和军事实力。欧盟的国际影响力，有没有英国大不一样。英国脱欧的冲击波震荡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乃至国际政治和国际格局。尤其欧洲的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国际恐怖袭击几乎缠身，英国“脱欧”更使焦头烂额的欧盟雪上加霜。

但欧洲一体化不会走向终点，德法将重新改革欧盟，推动欧盟新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他们将下决心搞一个核心欧洲，将真正愿意让欧盟往前走的国家在欧盟内部组成一个新的联盟和先锋集团，重大议题由几个国家先团结统一思想。这次事件让法德有很大的危机感，会刺激其他国家的离心倾向。过去欧洲是团结集体决策，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集体往前走确实很困难，未来欧盟将会分成核心和外围，脚穿拖鞋慢慢向前挪动。

2. 防止欧盟内部其他国家效仿英国脱欧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欧盟领导层的第一大要务就是阻止英国脱欧所造成的负面作用。欧盟成员国内不断增强的右翼民粹政党势力将从脱欧中受到鼓舞，未来几年许多欧盟成员国都面临着怎样对付右翼民粹政党势力不断增长的问题。如果欧盟某个成员国内的右翼民粹政党一旦上

台，就有可能加速该国与欧盟的脱离过程。在难民潮之前，20个德国人中只有一个人支持选择党，但去年在德国东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得票率竟达到21%，把默克尔的基民盟挤到第三位。^⑤

所以，欧盟领导层的第一大要务就是阻止英国脱欧的地震波扩散，防止出现形成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现象。

今年年初，据有关机构对欧洲8个国家的6000多人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其中有近半数的民众愿意仿效英国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盟。另据ICM调查公司2016年5月31日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有近1/3的德国人将会投票支持德国脱离欧盟。是年6月初，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超过6成的法国选民对欧盟持否定态度，几乎有一半的德国、西班牙和荷兰选民也持同样的观点，欧洲未来的一体化进程将在充满荆棘坎坷的道路上缓慢前行。

2016年6月25日在德国首都柏林紧急聚会的欧盟核心六国外长一致向英国表达了强硬态度，强烈要求英国应该“立即启动脱欧进程”。参加柏林会议的欧盟领导人也同时呼吁其他欧盟成员国保持镇静，以避免欧盟陷入“抑郁和瘫痪”。欧盟核心六国一致对英国表达强硬态度主要是为了稳定人心，同时也试图对考虑脱欧的势力示警。

3. 加强欧盟核心六国的作用

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肯定是一个挫折，欧盟继续推进一体化的进程会受到压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能会推动欧盟进行改革。英国脱欧表明欧盟其他成员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德国还回到过去欧洲共同体

的六个国家，加强这六个国家的团结一致，发挥这六个国家的核心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再吸收和扩大开放那些愿意遵守欧共体条约的国家加入欧盟。法德两国将计划开展更多领域的合作，如防务、国内安全等。^⑥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1952年共同创立了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共同体，这六国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

欧盟剩余的国家能否团结到一起，面对英国脱欧，主要取决于德国的领导。默克尔在一次政府会议上警告从结果中得出迅速的或者简单的判断，号召要冷静和耐心。欧盟剩余的27个国家面临着两个尴尬。从理论上讲，“保持冷静，继续前行”这个建议非常好，但是实际上要往哪个方向走，必须达成一致。另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就是让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形态多样化。换言之，要把它看做一个过程，而非过渡性阶段，要自我减压，不一定要到实现一个所谓的“更紧密的联盟”，而且要向有可能最终加入一体化但目前落伍或掉队的国家敞开大门。对德国来说，有四件事情是当务之急：加强欧盟剩余27个成员国的力量，防止进一步的分裂，“用一个统一的欧洲声音来对待英国问题”，也就是说，“欧盟内部团结起来，用统一立场，应对英国脱欧”，拟定出一个欧盟未来的计划。这就是德国不得不考量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对德国领导能力的一次测试和考验！德国前总理科尔在他的传记《出于对欧洲的担忧》一书中，呼吁欧洲国家要积极进行一体化。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和后代要拥有一切机遇去过一种幸福和自主的生活，并让这种生活拥有除和平和自由之外的一切，即民主、人权、法治国家、社会稳定和富裕，那么，在

^⑤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6.02.12.，《参考消息》2016年2月23日。

^⑥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8期，《英国脱欧的五大后果》。本文译自英国《金融时报》2016年6月24日文章，俞平译。

政治统一的欧洲中拥有和平和自由则永远是其前提条件。”^⑦

三、德国对英国脱欧后对欧盟未来发展前景的新考量

欧洲的政治转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一个共同文件中公开号召为“欧洲的政治转折”作好政治、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德国担心，这种“欧洲的政治转折”可能引起公民中更多的反对意见以及各成员国不愿意参与执行。这份文件不仅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德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欧盟成员国，急需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以防止欧盟出现多米诺效应，走向四分五裂的状态。

英国脱欧打乱了欧盟内部的平衡状态，影响了欧盟的凝聚力、信心和国际声望。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英国脱欧将破坏西方崇尚自由开放的政治与经济秩序，损害西方所拥有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而这却是英国、欧盟乃至西方世界硬要死守力保的东西。^⑧

1. 权力增长后的德国在欧盟负起更大的责任

德国目前有理由担心，如果其他国家已经开始讨论所谓的“德国问题”的话，这个讨论在英国脱欧后会更加激烈，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欧盟其余的成员国对于德国的立场谅解程度与其合作的意愿都会降低。目前欧洲就已经出现了很强烈的批判声，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促发了在关键时刻英国脱欧的决定。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德国不仅要寻求和法国的团结，而且德法主导的话语权要向

其他的欧盟伙伴开放。在关于欧盟的未来的紧迫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这是来构成欧盟各成员国广阔的共同认知的最好的方法。同时德国不应该只同欧盟核心成员国积极合作，而且也要让其他成员国参与其中，而且越快越好。默克尔在展望下一届的议院选举，德国右翼民粹势力在增长和发展，默克尔面临挑战。不管英国脱欧决定是否标志着欧盟的结束，还是其他欧盟成员一起坚持团结下去，这一切将取决于德国的领导能力。

英国脱欧对德国意味着权力扩大，但这种权力扩大并非德国情愿。作为欧盟成员国的一个领导人，默克尔的重要性更大了。对她来说，主要在于团结剩余的27个成员国。批评德国在欧盟的主导地位是很多脱欧派的主要动机之一。默克尔显然不愿继续让人产生类似这样的感觉。英国退出欧盟，德国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力将能够加强，一个没有英国的欧盟，德国的地位显然将会更加稳固和强化。英国脱欧后，德国在欧盟的政治与经济主导势力会更强，而这是其他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德国政府也担心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担心和猜忌。英国脱欧后，德、法等主流国家的主张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得到认可和达成一致意见将会变得更容易，欧盟的决策程序和过程也会更少障碍和变得更加顺畅。

欧盟内的力量格局也随着英国脱欧势必有所调整，德国因为在欧盟内的领导地位的突出将在欧盟内以致在世界上要付出的更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做出更多的投入。为了不引起其他欧盟成员国对德国领导地位的猜忌和怀疑，德国会比此前更需要与法国联手领导和建设欧盟。然而，由于德国的经济实

^⑦ Helmut Kohl: Aus Sorge um Europa Ein Appell Droemer Verlag, 2014, München.

^⑧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8期，《英国脱欧的五大后果》。本文译自英国《金融时报》2016年6月24日文章，俞平译。

力优势和居欧洲中心地位的特点，批评德国“主宰”欧洲的批评声音会更加强烈，甚至给疑欧派提供仇德的筹码，这是人们不得不警惕的。

2. 应对欧洲的难民政策

尽管德国在过去几年里碰到各种各样的危机时都不断成功地维系住了欧盟的团结，而且恰恰是在难民危机上看到，维系欧盟团结这个目标多么重要，然而欧盟仍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退步。更糟糕的是：由于赞成脱欧的人把英国脱欧归咎于德国的难民政策，因此，批评德国难民政策的人增多。

2015年1月7日，一伙武装人员袭击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总部，开启了欧洲新一波暴恐袭击。此后，不断扩大的难民潮对欧洲形成巨大压力，对欧洲和德国构成重大冲击。德国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与其盟国持有一致立场和共同行动。加强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以及与邻国和盟国间的反恐合作。在欧洲先后受到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德国决定参与欧盟共同防务框架下军事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虽然不直接参加空袭，但是提供了后勤支援。因此，德国也可能成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攻击目标之一。据德国《图片报》报导，德国在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里少里夫的领事馆于11月11日深夜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120多人伤亡。^⑨2014年9月，默克尔表示支持美国对叙、伊境内的“伊斯兰国”进行空袭。默克尔在2016年3月16日的政府声明中强调：“我们必须从对抗导致人们背井离乡的危机原因的原则出发。我们也要用这一原则做到明显减

少来欧洲和德国的难民，这样可以让人们在当地或者家乡附近免受战争和迫害，存在为自己和家人能生存下来的前景。”^⑩

3. 德国对英国脱欧的评估及欧盟未来发展前景

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将有一个重建新秩序的过程及英国和欧盟相处的问题。英国和欧盟将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始退盟谈判，预计整个过程将会长达两年或更长时间。《里斯本条约》在内容设计上不利于想要退盟的国家；欧盟可能会借机“惩罚”英国，防止其他成员国效仿英国的做法。

英国脱欧虽能在“移民和财政”两方面获得收益，但整体上弊大于利。首先，英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权利将被减弱或剥夺；其次，总部设在英国的金融机构将被迫迁走，这对以金融为主业的英国非常致命；最后，英国不再享受与欧盟达成自贸协议的国家的優惠待遇。英国脱欧后，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抑或被削弱。欧洲智库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刊文指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欧盟GDP占全球比重将从17%降至14.6%；在全球贸易中，按现行价格和汇率测算，欧盟出口份额将从33.9%降至30.3%。^⑪

欧盟及其27个成员国领导人虽然都赞成对欧盟进行改革，但都不愿对复杂的欧盟条约进行全面彻底的修改。欧盟成员国与政府首脑改革欧盟的目标是更好地保障欧盟的安全、就业、经济增长以及使年轻人享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德法意三国领导人在柏林会晤中已就此提出了欧盟未来共同行动的三个

⑨ 《环球时报》2016年11月12日。

⑩ Regierungserklärung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Regierungserklaerung/2016/2016-03-17-regierungserklaerung.html>.

⑪ www.fx168.com 2016.6.23.

优先领域，即强化欧盟内部和外部安全，进一步加强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为年轻人制定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促进计划以及强化欧盟内部和外部安全。

然而，“核心欧洲”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一些反对“核心欧洲”的人士看来，建设一个“核心欧洲”更加削弱欧盟机构的作用，加剧欧盟成员国各自为政、再国家化趋势。他们认为危机当头，更应显示欧盟层面的团结一致，而不是给欧盟民众一种它将分裂为各个小集团的感觉。疑欧乃至反欧人士认为，建立一个“核心欧洲”的思想和主意是从英国脱欧公投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与此相反英国脱欧公投恰恰发出了警示信号，要求欧盟把某些权力返回给成员国。欧洲议会6月

28日特别全会的决议反映出其成员国对欧盟未来的不同期待。该决议写道：一些成员国选择放缓或减少一体化，但是，欧盟的核心应得到增强，并避免“菜单式”的解决方案。从中可以看出，英国脱欧公投已经再次引发了有关欧盟未来的争论。说到底还是“需要更多的欧洲一体化，还是更少的欧洲一体化”，是建立一个“核心欧洲”还是所有成员国相互争争吵吵，像蜗牛一样缓缓向前爬行的欧盟，这些痼疾依然历历在目。欧盟究竟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才能“使欧盟能够提供欧盟公民所期望的东西”。^⑫ 面对美国新总统特朗普这个“对世界而言最大的安全风险”^⑬，欧盟的这种改革如何进行，结果如何，欧盟自己心里是否有数，人们翘首以待。

作者简介：李文红，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⑫ 郑春荣：《欧盟未来的发展前景预判》，载《人民论坛》2016年08月11日。

⑬ 《参考消息》2017年2月15日。

难民危机管理对德国在欧盟中地位的影响

邹露

【摘要】难民危机管理既直接关系到欧盟的利益，也是德国的重要关切。2015年德国接纳了约100万难民，在难民危机管理中承担重要的国际责任。但欧盟内部的矛盾导致一致的难民政策很难达成，难民配额的确定一再受阻。同时，难民危机给欧盟成员国的社会稳定与安全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受到争议，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本文将以难民危机为切入点，分析国际危机管理视角下德国的表现及其在欧盟地位所受的影响，引入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理念，并在结尾对德国在欧盟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难民危机 德国 国际危机管理 欧盟

近年来，欧盟面临的国际危机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欧债危机余波尚未平息，乌克兰危机又给欧盟带来挑战，而最新也最难解决的危机要属欧洲难民危机。对德国而言，这些危机对其国际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也赋予了德国更多的国际责任。作为欧洲历史上一次大难民危机，是否能得到有效管理，既直接关系到欧盟的切身利益，也是德国的重要关切。

2015年德国接纳了近100万难民，是欧洲接收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难民危机管理中承担重要责任，但欧洲难民危机不可能仅凭德国一己之力解决。然而欧盟内部的矛

盾导致一致的难民政策很难达成，难民配额的确定一再受阻，德国的开放态度和不设上限的做法饱受争议，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此外，在国家层面，难民危机给欧盟成员国的社会稳定与安全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德国为何如此坚持“欢迎文化”，德国在欧盟的地位是否会受到撼动，这些问题要从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中寻找答案。为此，本文将以难民危机为切入点，分析国际危机管理视角下德国的表现及其在欧盟的地位所受的影响，引入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理念，最后展望德国在欧盟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欧盟框架下德国的难民危机管理及难民危机的欧洲属性

与乌克兰危机相比，德国在此次难民危机管理中表现得较为从容。这是由危机性质所决定的：乌克兰危机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德国在美俄之间进退两难；而难民危机的欧洲属性决定了其危机管理分析的范围可以限定在欧盟内部。德国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加上国家政治地位逐步提高，在此次危机管理中表现得较为自信，在欧盟层面的协调能力和德国国内危机管理能力经受住了考验。

1. 德国在难民危机管理中的表现及评价

难民危机虽然对欧盟各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德国“欢迎文化”一开始便站在了道德高地上，德国的难民政策成了欧洲难民危机管理的风向标。作为难民的救助方，欧盟各国的矛盾在难民配额和安置问题上，并非完全拒绝接收难民，因而在欧盟层面进行危机管理的协调工作，对德国而言并不是高屋建瓴，毫无根基。再加上德国民众强烈的同情心和在危机爆发初期团结一致的开放态度，德国国内的难民危机管理在初期实施得比较顺利，尽管有些党派质疑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后来由于难民危机引发出社会问题，一些民众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持怀疑态度，甚至有反对意见，但这可以看做是危机管理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在危机解决之前没有矛盾是不实际的。

虽然德国在难民政策实施过程中一度遭到欧盟的孤立和联盟党的反对，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德国在难民危机管理中的出色表现：无论是德国在欧盟层面的国际危机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还是在国家层面的管理与各州之间的协调配合，抑或是从欧盟与德国国内的政策与法规调整中，都可窥见一斑。

与欧盟最初的混乱和被动局面相反，德国国内针对难民危机现状，对难民政策与法规作出一系列修改，并推出一揽子政策，德国国内难民接纳和安置能力逐渐提高，难民处境逐渐变好。在欧盟层面，在德国的积极努力下，难民危机管理的措施也在不断完善。

欧盟在混乱和分歧之下，重提分配指标问题，推出有约束力的难民摊派方案，这要归根于德国在欧盟内影响力提升的事实。今天的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德国利益、理念、模式和战略的影响，例如在欧债危机中，德国凭借其稳定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担当起危机管理的主要责任，不少国家甚至敦促德国承担欧洲的 leadership 角色。

近年来，德国在国际危机中的表现进一步证实了德国在处理欧盟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在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在欧盟各国相争不下、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在欧盟管理层束手无策时，德国主动承担重任，努力推进危机管理进程，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说各国对德国的认同实际上是超出欧盟机构的。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德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欧盟其他成员国。冷战结束后，德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在欧债危机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震荡的情况下，德国的经济仍然保持稳定，为带动其他成员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成为了欧盟经济实实在在的领头羊。此外，在欧债危机中德国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较强的协调能力，始终将欧盟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始终不放弃任何欧盟成员国，赢得了更多信任，因而认同德国来主导欧盟的危机管理。另一方面是政治地位不断的提高。德国通过多年的努力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欧洲稳定与发展为己任，行事低调稳妥，“尚文不尚武”的形象。在众多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德国始终保持谦逊低调的姿态，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其他国际制度，努力避免使用军事手

段和武力干涉，甚至不惜在一些事务中得罪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德国对这些国际危机管理原则表现出来的执著和肯定打消了国际上的疑虑，欧盟成员国也在政治层面增强了对德国的信任。不仅如此，德国通过多年以来在国际和欧盟事务中对维护和平的坚持、尊重他国主权以及向脆弱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行为，向欧盟及世界证明了德国的综合实力。因此，即便这个“谦逊”的国家自己想要维持低调的姿态，国际社会也要将其拉上政治舞台。

德国在此次难民危机中既有地缘安全和经济利益因素考量，也有价值观方面的考量。第一，此次移民潮中有一部分是由南北差异引起，德国希望通过接纳难民，维持欧洲周边国家的稳定，维护整个欧洲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并最终实现世界格局的稳定。第二，德国劳动力老龄化需要吸纳外来劳动力，难民潮主要来源国与欧洲国家距离较近，劳动成本低于欧盟国家，可减轻欧盟的劳动力市场压力。第三，德国多年来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经济救援和文化外交等方式，努力获取其他国家对其价值观的认同。因此，面对已经到达家门口的难民们，德国处于人道主义因素考虑也是无法拒绝的。而此次难民来源国多为经济发展落后、政治体制不完善的国家，对德国体制和价值观抱有希望，这正是德国价值观得到推广的有利时机，以增强德国的国际认同。

2. 难民危机根源：南北差异

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武装冲突中近一半发生在地球南边的非洲地区，其中贫困是各种矛盾的源头，其本质是南北经济差异悬殊，并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首先，由于地中海南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结构状况存在天壤之别，造成大量经济难民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进入欧洲，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

福利保障。其次，由于社会结构差异，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更加成熟与稳定，民主、公平得到保障，社会腐败问题得到有效约束，法制更加健全，因而成为长期忍受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的“南方”民众的向往之地。再次，正是由于国内政治体制不健全，民主等价值观得不到普及，因而遭到西方大国的干涉，导致中东、北非地区许多国家常年发生大规模动荡，民众为躲避战火，不得不逃往距离较近且更加稳定的欧洲。

南北差异首先体现在经济的发达程度上，其次是文明的发展程度和文化的包容性。欧洲国家一直倡导人权高于主权，这种价值观对次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饱受苦难的人们而言是一座精神上的灯塔，因而冒着生命危险借难民危机奔赴欧洲的人们比比皆是，甚至不惜花高价买船票来实现这个目标。但进入欧洲之后，融入又成了一个要面临的新问题。

由于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即便社会对难民包容和接收，依然有很多人自己无法融入到发达国家的文化中。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难民与当地国民之间，甚至不同国家的难民之间，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给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隐患。要想真正让这些难民融入到德国的社会中，除了语言和技能培训，还要创造条件使其从心理和文化上融入到这个新的环境中。

3. 难民危机：价值观危机

德国在危机管理中的表现暴露了德国曾经引以为傲，现在看来却是难民危机的根源：价值观危机。

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中，各种文明相互了解不断加深，人们也有了自己的辨别能力，对以平等、人权、民主、自由、博爱为主的价值观自然是趋之若鹜，难民危机正好为深处苦难之中的人们打开了通往更高文明的一扇门。

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更高的文明代表着更优越的社会福利和生活条件，德国的福利体系是欧洲国家中最有利于公民的，因而也成为经济难民们的首选居留地。欧洲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却也无法削减，欧洲价值观也是骑虎难下。德国首当其冲，敞开胸怀迎接难民，然而德国的价值观根基是否会被此次难民危机侵蚀，还要看最后的结果。

诚然，德国的价值观（民主、平等、自由）在世界以欧洲为中心的时期为其赢得了国际认同，但也成为难民危机中的最大障碍。在宣扬了多年的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等价值观之后，德国无法开口对难民的涌入说“不”，因为这等同于打自己的嘴巴。控制难民数量，限制边界就更难以开口。

然而，本次涌入的难民可能由于宗教、信仰、价值观等差异被极端组织或势力所吸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此外，较多难民信奉伊斯兰教，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能否接受政教分离、法制社会、男女平等、宗教自由的思想，对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难民融入德国社会提出了挑战。

德国对难民的接受程度也是有限的。随着难民数量越来越大，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德国开始收紧这一“高尚的行为”。这表示，在价值观和利益发生冲突时，德国最终选择了利益。由此可见，一直以来奉行的价值观外交不过是一种外交手段，一种实现德国根本战略目标的手段，无非是加上了高尚的道德外衣，给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向往。

4. 难民危机对欧洲一体化成果的考验

欧盟在此次难民危机管理中的表现力不从心，既不能限定边界，也无法在欧盟内部达成一致，有效控制难民潮。欧盟各国维护自身利益，决策过程阻力重重，因而危机管

理效率并不高。

尽管德国一直以来强调人权保护，但在欧盟层面，当难民危机挑战到国家的经济稳定、宗教认同和社会安定时，欧盟成员国之间立刻产生两派——支持广纳难民和限制吸收难民，德国和瑞典属于前者，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属于后者。这是可以理解的。首先，难民危机伴随许多潜在的安全隐患，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对民众心理造成严重一击，欧盟想推行难民分摊政策更是难上加难。其次，难民安置需要大量物资，对希腊这种经济本已疲软的国家而言是雪上加霜。再次，申根区作为欧洲一体化最大成果，却背离了它的初衷。不设过界检查，人员自由流动，使欧洲国家无法阻挡来势汹涌的难民，导致各国通过加强边境控制来自保。最后，难民问题挑战了欧盟的统筹管理能力，一旦分摊难民政策被强加到各国头上，势必会引起各国的反感，加大欧盟的裂痕，甚至各国有可能选择打破现有政体结构来对抗这种秩序。

在难民危机面前，欧盟的团结和凝聚力遭受质疑。在自身利益和欧盟整体利益面前，大部分成员国选择了前者，致使欧盟推行任何一项决议都困难重重。围绕着欧洲难民分配方案，各国坚持本国立场，以维护民族认同为由拒绝接收难民，把难民安置的责任推给德国、瑞典这些富裕国家。这也反映出欧洲一体化的不彻底，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机构，缺乏统一的领导能力，欧洲一体化成果堪忧。

二、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

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是以德国的政策性纲领性文件为依据，包括“民事危机预防、解决冲突与巩固和平”行动计划（2004），德国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的未来白皮书

(2006)^①，联邦政府 2015 行动纲领^②。其中，“民事危机预防、解决冲突与巩固和平”行动计划（2004）及两年一次的执行情况报告（2004—2006，2006—2008，2008—2010，2010—2014 年合为一次）是本文的重要参考依据，这是德国在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方面较为完整的政策文献，包含基本理念和行动策略两方面。本章将对这些报告中的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进行梳理，并对其特点和问题进行总结。

1. 德国国际危机预防总纲

“民事危机预防”最初是作为国家和非国家外交、安全和发展政策方向制定的。90 年代中期以后在国家层面、欧盟内和多边框架下提出了许多更加重视危机预防的新理念。据 1998 年联合执政协议，联邦政府“全力以赴开发和使用危机预防与和平解决冲突的有效策略与工具”。2000 年夏天联邦政府通过了“民事危机预防、冲突解决与和平巩固”总纲，其中总结了危机预防的九条基本原则，成为 2004 年“行动计划”的重要理论基础。^③这九条基本原则也公布在 2004 年“行动计划”中，如下：

1) 联邦政府正在投入开发和应用针对危机预防、和平化解危机及巩固和平的有效的战略和工具。目的是在潜在的危机和冲突地区及早展开预防工作，阻止已经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扩散，以及在武装冲突结束后通过有效地巩固和平与重建措施防止新一轮冲突的

爆发。

2) 危机预防、冲突解决和危机后巩固措施的战略方针是广义的安全理念，包括政治、经济、生态和社会稳定因素在内。战略基础是尊重人权，社会公正，法治国家，参与型决策，保护自然资源，在所有世界区域的发展机遇，以及和平冲突解决机制应用。

3) 危机预防、冲突解决及巩固和平必须看做一个整体。这一点无论是在结构性冲突还是过程性冲突，抑或是各自投入的其行为手段，无论是在国家间还是在国内的危机与冲突中都适用。

4) 民事危机和冲突管理需要国家和国际上协调一致、针对具体情况制定整体政治战略，综合运用外交、安全、发展、财政、经济、环境、文化和法律政策的手段。这要求个体解决方案以及在民事和军事方法中迅速协调。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经济界、教会等）应当尽量参与其中。

5) 德国将始终与其伙伴及全球国家联盟的行为体协商行动。德国外交政策的行动框架与其欧盟和大西洋联盟的伙伴紧密相连，与国际组织的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欧洲委员会。

6) 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冲突解决的合法化（国际犯罪和仲裁），人权政策作为预防性和平政策，以及民事谈话手段的加强，都是总战略的一部分。在总战略框架下，发展政策的任务是在相关伙伴国通过改善经济、社会、生态和政治关系来遏制或消除冲突的

① BMVg: Weißbuch 2006 zur Sicherheitspolitik Deutschlands und zur Zukunft der Bundeswehr. URL: [http://www.bmvg.de/portal/a/bmvg/!ut/p/c4/Dca7DYAwDAXAWVgg7unYAuicYCVp-Qrnsz7omqObfoUnPHfUwo-lOuhx2u4zN0xuFC_IGQddWEzqi4eLF1i7mqXFkKf-WQNUOF6jFY_sAY_7e5g!//](http://www.bmvg.de/portal/a/bmvg/!ut/p/c4/Dca7DYAwDAXAWVgg7unYAuicYCVp-Qrnsz7omqObfoUnPHfUwo-lOuhx2u4zN0xuFC_IGQddWEzqi4eLF1i7mqXFkKf-WQNUOF6jFY_sAY_7e5g!/)

② BMZ: Aktionsprogramm 2015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Armutsbekämpfung. URL: www.bmz.de/themen/imfokus/download/ap2015_lang.pdf.

③ Bundesregierung: Aktionsplan „Zivile Krisenprävention, Konfliktlösung und Friedenskonsolidierung“, Berlin, 12. Mai 2004, S. 8.

结构性根源，以及推进非暴力冲突解决机制。同时，裁军、军备控制和武器出口控制也是重要的危机预防手段，特别适用于在许多危机地区预防小型武器的积聚与扩散所导致的不稳定。国际裁军、军备控制和武器出口控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用来预防危机、应对危机和巩固危机。这些手段加剧了武装冲突化解的难度。德国将利用其在多边委员会中的政治地位来增强民事危机和冲突管理的能力。

7) 受国家支持或认可的德国行为体的理念和措施，应当纳入到联邦政府的政策中来。在不同领域中加强融入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以及非国家和国家领域的有效对话，对民事危机和冲突管理的连贯性战略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8) 联邦政府将推动预防文化和对话文化的形成。和平与冲突研究必须加强，国际教育政策、外交文化政策和媒体政策要将重点放在消除敌对形象、跨文化对话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上。

9) 联邦政府提供针对性培训，放宽在危机预防、危机应对与和平巩固领域的民事工作人员投入的前提条件。目的是为所有相关领域提供部际高水平人员或通过利用全社会资源而达到要求的人员。^④

关于政策调控的可能性，“行动计划”总结如下：

1) 联邦政府在外交部的领导下以及其他部门参与下，针对不同危机类型制定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面对解决威胁性冲突还可建立国家对话小组（Ländergesprächskreise）。

2) 通过各职能部门的不同职责范围实现与非政府组织的协调任务。必要时可以

设立共同联络站，为信息交流提供一个平台，以保障合作的持续性以及实现人员的全面中转（包括使用登记册）。

3) 危机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根本方向由联邦内阁制定。^⑤

2. 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的特点

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宗旨是维护国际社会及周边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最终消除贫困，实现国际社会的良性发展，目的是在潜在的危机和冲突地区及早展开预防工作，阻止已经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扩散，以及在武装冲突结束后通过有效地巩固和平与重建措施防止新一轮冲突的爆发。德国国际危机管理强调国际合作，通过建立可信的国家结构，创造社会和平潜力，建立生活基础，参与多边国际组织等方式，在联合国、北约、欧盟、欧安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框架下，推进国际危机管理进程。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手段体现了“文明力量”三原则：1) 处理国际事务时，奉行合作主义和多边主义；2) “文明国家”在外交实践中尽量不使用军事手段，武力只是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一种处理对外纷争的工具，而且这种使用还必须符合国际法规范的要求；3) “文明国家”应努力推动超国家机构的发展，维护集体安全并且愿意向超国家机构让渡主权。

在前文对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详细介绍的基础上，本文将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特点总结如下。

1) 注重融入国际组织。

由于各国对危机的界定、对危机管理的理解不同以及国家政策、国家结构等差异，

^④ Bundesregierung: Aktionsplan „Zivile Krisenprävention, Konfliktlösung und Friedenskonsolidierung“, Berlin, 12. Mai 2004, S. XVI-XVII.

^⑤ Ebenda.

各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也有差异。从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理念总纲和执行报告对其行动的总结中可以看出，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的最大特点是注重融入国际组织。“德国至今坚定地融入国际组织，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通过推动欧洲一体化，来进一步加深向国际组织的融入。”^⑥原因如下：

(1)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危机一般波及范围广，管理难度大，靠一个国家独立解决是不可能的，因而需要各相关国共同完成，国际组织为各国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提供平台。

(2) 国际危机管理需要用到大量资源，包括生活物资、基础设施、人员安排、派遣警力和兵力、资金等，而各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各种资源方面的优势略有不同，因而需要合力才能聚集危机管理所需的所有资源。

(3) 德国特别重视国际性法律框架，例如联合国宪章和欧盟法规。德国政府在行动中坚持以国际性法律框架为导向，因而在国际危机管理中将国际性法律视为危机管理的重要依据和目标，即通过国际危机管理加强国际性法律的规范力量；在解决欧洲内部问题时，重视遵循和加强欧盟的法律法规的力量。

(4) 德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沿袭。德国精英在很长的历史上（主要是1945年以后）注重合力，不提倡单边主义，这也体现在日后德国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努力上。

2) 注重危机预防。

危机预防是德国2004“行动计划”总纲领的首要理念。及早发现和预防危机，在危机发生之前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危机扼杀在

萌芽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避免和平遭到破坏。同时，与危机中的不可预测性和危机结束后恢复难度大相比，危机预防任务的管理难度相对较小，可控性较高，因而是国际危机管理的最佳方案。此外，危机预防计划必须是长远地、针对危机发生的根源制定的，因此要制定长期危机预防计划，任何短期计划都会失败甚至加剧危机恶化的速度。

3) 民事危机管理手段优先于军事手段。

在危机预防、冲突应对与巩固和平过程中，民事手段始终优先于军事手段。民事手段是非暴力手段，包括对话、谈判、调解等和平外交手段以及制裁等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相比，其手段较为平和，对危机各方损害较低，对危机国家周边区域的波及较小，因而是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手段中最为优先考虑的。

联邦政府将推动预防文化和对话文化的形成，加强和平与冲突研究，通过国际教育政策、外交文化政策和媒体政策来消除敌对形象，推动跨文化对话。此外，在危机第一线的冲突各方通常会被敦促以非武力形式解决危机，外交与安全政策用于预防和缓和危机，制裁、军备控制和武器出口控制是缓和军事冲突的重要手段。外部行为主体则从辅助层面去保持或建立和平，并保持中立的态度及文化敏感性，因为外部行为主体会对和平与暴力解决危机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此外，德国在支持联合国和北约等国际组织的行动方面，主要提供财政支持，除非必要，否则尽量不参与军事行动，并且德国的军事预算与国际上许多大国相比并不高。

^⑥ Maull, Hanns W.: Deutschland als Zivilmacht. In: Schmidt, Siegmund / Hellmann, Gunther / Wolf, Reinhard (Hrsg.): Handbuch zu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 GWV Fachverlage GmbH, 2007, S. 77.

4) 国际组织的显性地位和德国的隐性地位。

在国际危机管理方面，德国融入国际组织的特性，说明它倾向于隐藏在国际组织背后，因而国际组织呈现出显性地位，而德国则主动将自身置于隐性地位。

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原因导致。鉴于深刻的历史教训，为消除盟国和国际社会对德国政治野心的疑虑，德国一贯坚持克制文化，在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事务中保持低调的行为方式，不主动参与其中。德国在支持联合国和北约等国际组织的行动方面，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主动参与军事行动，并且德国的军事预算与国际上许多大国相比并不高。以上是德国避免在国际舞台上凸显自身政治身份与地位的一个表现。

另一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个体独立发展空间有限，区域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德国意识到只有在欧盟这个区域组织的保护下，才能够有更长远的发展。正是及早意识到这一点，德国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并在一体化过程中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此，德国强调欧盟的显性地位，避免提及本国的主体地位。

然而，从目前德国在这几次国际危机管理中的表现看来，随着德国在欧盟和国际舞台上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逐步提高，不管德国主观上希望与否，国际社会希望德国承担更重要的国际危机管理责任，因此，德国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显性特征已经初见端倪，未来将越来越多地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出现在国际危机管理的舞台上。

5) 强调各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德国在国际危机管理的各个阶段，强调国家、国际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表决和协调的重要性，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行为体都要将其潜力捆绑与协调，集中发力。因为在国

际危机管理中，任何单一的行为体都不可能掌握所有危机管理的策略和手段，合作是唯一的出路。此外，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国际危机管理行为主体多样，危机总是平行或交错出现，再加上地域问题和危机种类（国家、双边、多边矛盾引起的危机）的多样性，因此协调是国际危机管理的重要问题。

德国危机管理相关职能部门之间需要交叉合作，各职能部门如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及其下属机构以及负责部际协调的委员会或危机处理领导小组等。此外，国家行为体也要与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国际行为体联合国、欧盟、欧安组织、欧洲委员会、北约等协调与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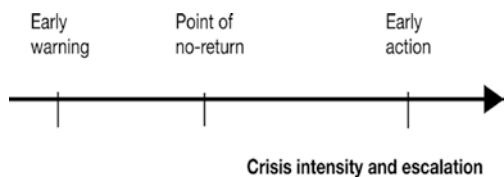
三、欧盟框架下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的“双重政治问题”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已经不是以个体的身份存在，而是存在于一个相关度极高的国际关系网中。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德国在国际危机管理中，首先是以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其次才是作为国家层面的行为主体。当前国际危机管理主要是从国家和国际体系两个层面来研究，将其单独割裂开或笼统地混为一谈，都是不科学的。因此，本文对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理论的分析，分别从国家和国际层面着手，最终将二者结合起来。

国际危机管理是一件复杂且有争议的事情。其复杂性一方面是由危机的性质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人”的本质导致的。这里的“人”指的是一个组织，如欧盟。对他们而言，每个国际危机的不同原因都会归结为这几个问题：首先，解决危机的外部客观条件是什么？这涉及迫切所需和可用的政策工具。其次，内部问题是组织自身的问题：国家应如何自我组织以发挥最大效力？如何调动政

治意愿来分担风险和任务？尽管在过去几年北约已将自我组织流程制度化了，但联合国和欧盟对于是否参与共同行动的决策依然是在单一民族国家层面上。国际危机管理是由政府间合作来支配的。

所谓“冲突预防的悖论”就概括了这个问题。越早干预，成功的几率越大，干预的成本就越低，但团结各方政治意愿的难度也就越大。考虑到问题的紧迫性、对危险性和威胁性的认识，以及岌岌可危的国家利益，要迅速就危机管理方法达成一致，是非常难的事。实际上，在动员和应用足够的资源方面，各国的意愿通常是有差异的。结果导致达成共识的那一刻已经错过了危机管理的最佳时间。结果就是，鉴于目前的自我组织方式，欧洲的国家间组织最有可能按照危机管理模式对危机做出应对。^⑦



图：早期预警和尽早行动^⑧

共同行动的另一个阻碍是各行为主体面对的威胁程度不同，或同一危机给各行为主体带来的危险程度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各行为者不仅要克服搭便车的问题，还要设法谈判以分配任务。很明显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

从本文分析的案例来看，作为欧盟中综合实力最强和责任最大的国家，德国的国际危机管理是在欧盟框架范围内进行的，因此

德国在国际危机管理中要考量的因素不仅是德国本身，还有欧盟整体及其成员国。此外，由于国际危机的波及范围远不止欧盟范围内，任何地缘政治因素、外交因素都要纳入考虑范围，因而除了还要考虑联合国、北约等国际组织的框架条件外，“远亲与近邻”的地缘政治意义、经济利益、价值观意义也是德国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危机管理行动中，欧盟内部的问题再次被反映出来，原因可以归于欧盟政治一体化的不完善，这可以解释德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危机管理所遇到的重重阻碍。这里提到的双重政治问题正是德国面临的“危机”——若克服“冲突预防悖论”提出的挑战，那么危机对欧盟和德国的发展而言是机遇，若被欧盟成员国的组织方式所累，那么就是真正的危机了。

四、国际危机管理视角下德国与欧盟的前景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内部矛盾曾经的“主旋律”是德法之争，而现在，随着德国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提高，这个矛盾已经逐渐淡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增强欧盟内部凝聚力，促进政治一体化，才是欧盟进一步发展的重点，也是德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然而欧盟内部分歧在不断扩大，继欧债危机扩大南北欧成员国之间的鸿沟之后，难民危机使得东西欧成员国之间出现巨大的立场分歧。难民危机使欧盟政治一体化的缺失暴露得更为彻底，各国之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乘欧盟政治体

^⑦ Houben, Marc: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The approach of European St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S. 3-4.

^⑧ Zit. n. Elster (2000), in: Marc Houben: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The approach of European Stat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S. 4.

制不完善之便，钻法律的空子，各自设立屏障，给欧盟的危机管理造成阻碍。

难民危机反映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欧盟的发展理念与欧洲各国的实际需求背道而驰。过高的精神追求和实际能力不匹配，导致在任何危机面前欧盟各国都很难达成一致，由此导致无法迅速对危机做出反应，容易错过危机管理的最佳时期。对此，本人认为，欧盟应该从实际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各方利益的同时，将一体化目标分步实施，不要过分执著于其“多元文化”的信仰，而这恰恰是欧盟一厢情愿的地方，入欧移民对于融入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积极，由于宗教信仰问题，文化融入甚至只能算空想。

第二个问题是德国在推动政治一体化的目标时操之过急，尤其默克尔在难民危机爆发初期，高尚地打开德国大门，同时要求其他欧盟国家打开国门。在这里德国忽略了两点：第一，欧盟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同，大部分国家都不如德国发展速度快，没有能力完全开放，也不能安置那么多难民。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切国家，未免有些强人所难。实际上，最终各国还是坚持不下去，重新实施边境控制。第二，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其相对条件，德国恰巧将“普世”贯彻到了一切政策上。例如“普世”价值观并不代表要接收世界各地所有难民，各主权国家有权利根据能力决定接收多少难民，这与价值观无关。

尽管其他欧盟国家对开放政策持反对意见，但只有英国适时地脱欧，也脱离了难民分摊的配额，但从这个狭义的角度去看，英国脱欧对自身有利。时至今日，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发生，整个欧洲陷入不安，默克尔自己应该也在后悔。目前看来，德国只有改掉

上述两个错误，不再强制摊派，收紧难民政策，并加强安保系统，完善国际危机管理机制，难民危机管理才能看到出路。

德国需要一个强大、自信的欧盟，一个在参与建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坚决维护和平、自由和富裕的欧盟。德国将努力增加欧洲统一事业的信心。各国之间互信合作是共同成功的必要条件。兼顾中小成员国的利益也是德国欧洲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⑨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增强欧盟内部凝聚力，促进政治一体化，才是欧盟进一步发展的重点，也即德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欧盟如今是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但是，其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然而政治一体化则举步维艰，从而给人造成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印象。难民危机正好是一个契机，促进欧盟及其成员国完善其现有难民政策与法规。

这次危机也提醒了欧盟，单凭各国经济利益的融合，很难实现真正的一体化。想要在今后的国际危机管理中提高管理效率，迅速达成一致，那么必须要有一套得到欧盟各国认可的制度，以便在类似于欧洲难民危机的情况下，能够提高欧盟整体应对能力，减少内耗，增强整体行动能力，提高欧盟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为欧洲在国际上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虽然从目前看来，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从欧洲一体化层面看，难民危机也许是个契机，在主导欧洲难民危机管理过程中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恰巧是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催化剂，等到难民危机过去，或许欧洲的凝聚力会加强。然而，这一切乐观前景的前提是，欧盟各国

^⑨ Bundesregierung: 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 -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SPD, 18. Legislaturperiode, S. 164.

必须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和难民识别机制，及早识别恐怖主义计划，以安民心。

从这几次德国在国际危机管理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出，未来欧盟和德国会更加重视国

际危机管理体系的发展，德国将在国际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层面引导欧洲，并在维护欧洲一体化成果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德国对欧盟的积极作用不会停止。

作者简介：邹露，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德土关系最新发展与挑战

梅霖

【摘要】德国与土耳其长期以来维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但进入2016年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土耳其直接受恐怖主义的威胁，国内安全形势严峻；土耳其入盟因免签分歧再遭坎坷；德土之间摩擦不断，先有土耳其总统状告德国主播人身攻击，后又因德国议会亚美尼亚决议引土不满。面对难民危机引起的内忧外患，德国政府只能在坚持欧洲基本共同价值观的原则上，向土耳其示弱，以换得欧盟土耳其协议的继续。土耳其未遂政变又给德土关系增添新难题，德土关系未来仍充满诸多不确定性。

【关键词】德土关系 难民危机 欧盟土耳其协议 土耳其政变

德国与土耳其长期以来维持着良好且亲密的双边关系，德国外交部网站这样定义德土关系：“两国拥有特别丰富且非常深厚的双边关系，这样的关系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① 现有近三百万土耳其裔居住在德国，其中一半以上拥有德国国籍，他们深入参与到德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为德国的发展注入不可小觑的力量。对土耳其而言，德国是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从1980年起稳居最大外来投资国地位。同时，土耳其还是德国人最喜欢的旅行地之一。然而，一直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近来却面临诸多挑战。

一、土耳其境内安全形势严峻

自2016年初起，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重要城市伊斯坦布尔发生多起重大袭击事件，死伤众多。2016年1月12日，伊斯坦布尔旅游景区苏丹艾哈迈德广场发生自杀式袭击，造成11名德国游客遇难。13日，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与时任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共同看望了本次袭击的伤者。3月19日，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独立大街再次发生爆炸袭击，造成5人死亡，20人受伤。在此之前，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已发生3起恐怖袭

^① Auswärtiges Amt: Beziehungen zu Deutschland, 09.2016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Laender/Laenderinfos/Tuerkei/Bilateral_node.html#doc336370bodyText2, letzter Zugriff am 20.10.2016.

击事件。德国紧急关闭了在土耳其的使领馆和学校。6月7日，伊斯坦布尔老城区发生汽车爆炸，造成至少11人死亡。

一方面，土耳其由于地理原因直接受恐怖主义威胁；另一方面，来自土耳其国内矛盾也使这个德国人心中的旅游胜地不再安全。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部分军官企图发动军事政变。16日早上，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宣布，政变已经被彻底挫败，“局势完全在掌控中”。7月20日土耳其开始实施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并于10月3日宣布将紧急状态延长至2017年1月。与此同时，土耳其当局发起了大规模整肃行动，清除未遂政变带来的“流毒”。迄今，当局已经逮捕了6000名军人，数十名将军等待受审。此外，还有9000名警官遭解雇，大约3000名法官被停职，总理办公室也有250名雇员被撤换。清洗行动后扩大到了教育领域，超过15,000名教育工作者遭到停职。鉴于土耳其内部的紧张局势，德国外交部建议在土耳其的德国游客注意人身安全，要求长期居住在土耳其的公民在德国驻土代表处网站登记信息，不建议德国公民前往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拉克边境处旅行。

二、土耳其入盟谈判步履维艰

土耳其20世纪60年代成为欧盟联系伙伴国，1987年申请加入欧盟，12年后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谈判经过了10年，但土耳其入盟仍遥遥无期。2015年底，受叙利亚战争影响，大批难民涌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2016年3月18日，欧盟与土耳其就合作解决难民危机达成协议。为阻

止非法难民从土耳其入境欧盟，双方同意自3月20日起，所有从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非法难民将被遣返回土耳其；每从希腊遣返回土耳其一个叙利亚难民，将参照联合国相关标准，从土耳其安置另一个叙利亚难民进入欧盟境内；土耳其将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新的难民进入欧盟的海路或陆路通道；欧盟成员国在自愿的基础上适时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欧盟加快向土耳其发放30亿欧元用于资助卫生、教育等难民相关项目，并于2018年底启动额外的30亿欧元资助资金；欧盟与土耳其共同努力以改善叙利亚的人道状况等。双方还同意，加快土耳其居民进入欧盟国家的签证自由化进程，在达到所有标准的情况下，最迟在2016年6月底之前解除签证要求。

合作解决难民危机协议的达成是否代表土耳其入盟有望实现？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土耳其不会在近几年成为欧盟成员国。^②而就土方要求的履行对土耳其公民旅游签证免签条款，由于目前土耳其只满足了欧盟全部72项条款中的67项，也无法在2016年内实现。土耳其欲获欧盟免签待遇，现仍需要满足以下五项条件：根据欧盟的建议制定防止腐败的措施；将土耳其有关个人资料保护的全国立法与欧盟标准看齐；欧洲刑警组织需与土耳其执法部门达成协议；土耳其需要在所有涉及刑事案件的问题上与欧盟成员国合作；欧盟标准修订反恐法案（针对库尔德人的条款）。

就在免签问题相持不下时，土耳其未遂政变又为入盟增添不利因素。8月，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大规模公众集会上表示，如果得到议会和公众的批准，他同意重新引入死刑。在此之前，土耳其为争取加入欧盟

^② Zeit Online: Türkei will den EU-Beitritt zum 100. Geburtstag, 19.08.2016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6-08/tuerkei-eu-beitritt-hundert-jahre-geburtstag>, letzter Zugriff am 21.10.2016.

于2004年废除死刑。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明确表示：“任何留有死刑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加入欧盟的。”^③

三、德土两国外交摩擦不断

2016年4月1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人以受到侮辱为由对讽刺节目主持人伯默尔曼（Jan Böhmermann）提起刑事诉讼。3月31日，在德国电视二台播出的讽刺节目“Neo Magazin Royal”中，主持人伯默尔曼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开涮。他读了一首攻击埃尔多安的恶俗诗文，里面出现埃尔多安“对库尔德人和基督教徒拳打脚踢，同时看着儿童色情片”以及“变态、肮脏、恋兽癖”等字眼。埃尔多安的诉讼是根据德国刑法第103条“对外国元首、因职因公逗留德国的外国政府成员、或在德国境内被承认的外国代表进行侮辱，处3年以下监禁或罚金；进行诽谤性侮辱的，处3月以上5年以下监禁。”美因茨检察院10月4日判定伯默尔曼无罪，认为他的讽刺作品受艺术创作自由的保护。埃尔多安的代理律师当即对美因茨检察院的判决表示不满，汉堡法院将于11月再次对本案进行审理。

2016年6月2日，德国联邦议会做出决议，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规模杀害亚美尼亚人事件定性为“种族屠杀”。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于当天宣布召回驻柏林大使，并表示德国议会这项决定是错误的。受联邦议会亚美尼亚决议的影响，土耳其6月底拒绝了德国议会代表团对驻扎在土耳其的联邦国防军的访问要求。德国国防军自2015年底派兵驻扎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参与国际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IS）的斗争。国防部此后表示，考虑将旋风侦察机、空中加油机及其250名士兵从因吉尔利克迁往约旦或塞浦路斯。联邦议会认为，国防军是其派出的部队，议员应有权力访问自己派遣的部队。

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政变失败后，土当局扣押了9名德国公民，其中包括左翼党政治家坎利（Canli），她当时正在爱琴海边的家中度假。现仍有3人处在关押当中，包括坎利在内的另外6人已被释放。他们被逮捕的原因不明，有可能是被怀疑支持库尔德组织，也有可能被怀疑为土政府所认定的政变主导者居兰的支持者。另外，经德国内政部证实，迄今为止至少有3名土耳其外交官向德国提出政治避难请求，这令原本就处于冰冻期的德土关系雪上加霜。土耳其外交部在16日撤销了数百名外交官护照的效力，其中包括8名驻德外交官。根据土方媒体报道，曾驻柏林的土方军事官员及其夫人失踪，很有可能向德国申请庇护。政变发生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17日在科隆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对于涉及土内政的集会在德国上演，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这是“来自土内部的紧张局势蔓延到德国”。此前，埃尔多安曾准备在游行集会中向支持者发表视频讲话，但该请求遭到了德方的拒绝，土耳其青年与体育部长阿基夫·恰阿塔伊·克勒奇（Akif Cagatay Kilic）发表讲话抨击了德国政界与媒体对待埃尔多安的态度。

2016年8月，德国电视一台（ARD）披露了被划定为机密级别的政府文件，这是德国联邦政府此前对在野党左翼党于联邦议院提出的质询时使用的书面回复。文件中德国联邦政府将土耳其称作“伊斯兰激进组织的

^③ Tagesschau: Kein EU-Beitritt mit Todesstrafe, 18.07.2016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tuerkei-putsch-139.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5.10.2016.

核心活动平台”，还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积极支援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军事组织。在这份书面回复里，德国政府认为，“安卡拉政府多年来和极端主义分子有合作。土耳其的执政党伊斯兰保守派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及总统埃尔多安与埃及在意识形态上相近（ideologische Affinität）”。^④ 德国电视一台还引述这份联邦政府的书面回复说，“自2011年以来逐步走向伊斯兰化的土耳其内政和外交政策的一个结果就是，土耳其成了中东地区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核心活动平台。”^⑤ 回复里具体指出，土耳其对叙利亚的伊斯兰激进派武装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都有支持行动。这份文件的曝光再为德国和土耳其之间增添紧张气氛。

2016年9月5日，德国之声时政专栏节目“冲突区域”（Conflict Zone）的主持人弗里德曼（Michel Friedman）在安卡拉对土耳其青少年和体育部部长克勒奇进行了采访。问题涉及7月土耳其的未遂政变、其后的大规模撤职和逮捕浪潮、新闻自由以及妇女在土耳其社会的地位。该节目以其直面不讳、追根问底的风格著称。克勒奇在采访时显然认为主持人的问题过于挑衅。在克勒奇在结束采访离开房间后，他的新闻发言人出人意料地表示，德国之声不能播出这一采访。主持人弗里德曼及其编辑对此提出抗议，体育

部的工作人员随即没收了采访的录像资料。德国政府对电视台表示了支持，并要求土方还回录像带。政府发言人赛波特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新闻自由对我们而言是一项重要且不容商榷的权利”。^⑥

四、德国政府积极消除双边矛盾

面对两国间不同层面的摩擦，德国政府反应沉稳且迅速，尽可能消除双边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就造成两国关系持续数月紧张的联邦议会亚美尼亚决议，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外长施泰因迈尔都没有出席此次议会投票。总理默克尔第一时间表示，德国政府将促成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就此事进行讨论。根据德国明镜在线报道，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艾德和（Martin Ederer）以及外交部政策司司长米夏埃利斯（Andreas Michaelis）连续几周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寻求此矛盾的解决方案，土方明确要求德国政府对德国联邦议会亚美尼亚决议不予认同。德国政府发言人赛博特在此后代表政府表态：“联邦议会的决策对德国政府不具有法律效力。”^⑦ 随后，默克尔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否认了不认同议会决策的说法，但同时也重申了“亚美尼亚决议不具备法律效力，仅是政治表述。”^⑧

土方对赛博特的回应表示欢迎，由联邦

④ Tagesschau: Türkei “Aktionsplattform” für Islamisten, 16.08.2016,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tuerkei-619.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1.10.2016.

⑤ Ebenda.

⑥ Spiegel Online: Bundesregierung unterstützt Deutsche Welle gegen Türkei, 07.09.2016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tuerkei-bundesregierung-stellt-sich-hinter-deutsche-welle-a-1111287.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1.10.2016

⑦ Spiegel Online: Bundesregierung steht zu Armenien-Resolution, 01.09.2016 <http://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16-09/angela-merkel-armenien-resolution-bundestag-tuerkei?page=14>, letzter Zugriff am 21.10.2016.

⑧ Bundesregierung: Keine Distanzierung von Armenien-Resolution, 02.09.2016,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6/09/2016-09-02-seibert-armenien.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1.10.2016.

议会各党团代表组成的访问团最终于10月4日抵达了土耳其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议会代表团负责人拉莫斯(Karl Lamers)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出访，在这个关键时刻，访问成功象征着两国关系回归正常化。”^⑨在此之前，德国国防部继续支持在土空军基地驻扎的联邦国防军，投入5800万欧元用于德国侦察机飞行基地、移动指挥部以及士兵宿地的建造，也为两国关系走出冰冻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10月7日，土耳其当局在亚美尼亚决议后召回的驻德大使也重新回到了柏林。

就土耳其要求欧盟加快对土公民旅游免签，并拿难民合作协议相威胁，德国政府在不放弃原则的基础上，积极与土耳其展开对话，谋求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总理默克尔9月初在杭州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希望其与欧盟能继续就免签事宜进行讨论。此外，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土耳其欧盟代表与欧盟外长会议后表示出协议继续执行的希望，并称双方已告别“相互争论”(Übereinander-Reden)，进入到“共同讨论”(Miteinander-Reden)的阶段。^⑩此外，欧洲委员会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土耳其拒不更改反恐法的条件下，欧洲委员会作为非欧盟机构表示，如果土耳其能在其他方面例如新闻自由等方面有所改善，双方在免签问题上将可以取得进一步发展。这无疑为难民协议的继续实施创造了条件。

五、难民危机巨大压力迫使德国政府示弱

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北非地区笼罩在战火阴影之下，加之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扩张，造成叙利亚、利比亚等地民众流离失所、被迫逃离家园。而他们逃亡的最终目的地，就是与他们隔地中海、黑海相望的欧洲大陆。欧盟国家开始面临严重的难民危机。德国政府于2015年9月5日决定向滞留在匈牙利的数千名难民开放边境，自此大批难民涌入德国。仅至2015年底，德国就接收了100多万难民，远远超过之前预计的80万。

难民的不断涌入为默克尔政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科隆新年大规模性侵案件以及愈加频繁地发生在欧洲国家的恐怖袭击事件，都使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广受诟病，就连联盟党内部也不乏对其的讨伐之声。同时，默克尔本人的支持率也不断下降，更使其所领导的联盟党在其家乡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选举中仅获19%的选票，低于极右翼政党选择党。面对家乡失利，默克尔也不得不松口表示应在做出开放边境决策前做好应对难民危机的准备。同时，欧盟国家也饱受难民危机之苦。德国政府一直努力在欧盟内部达成难民分配政策，希望各国共同承担庇护难民的国际责任。然而欧盟很难在难民政策上达成一致，英国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对欧洲难民政策的担忧就是第一原因。同时，不仅德国，整个欧洲都面临着以排外和反欧洲一体化为

^⑨ Spiegel Online: Deutsche Türkei-Delegation “zu defensiv”, 05.10.2016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tuerkei-besuch-linken-politiker-kritisiert-deutsche-delegation-a-1115184.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4.10.2016.

^⑩ Tagesschau: Vorsichtige Zeichen der Annäherung 03.09.2016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bratislava-115.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4.10.2016.

特点的极右翼政党的冲击，民粹势力的抬头必将影响 2017 年多国大选的形势，欧盟一体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土耳其达成解决难民危机的合作协议，成为在欧盟边境阻截非法难民以外，从源头上遏制难民进入和遣返非法难民的重要举措。因土耳其与叙利亚北部接壤，其与希腊之间的爱琴海海域最短距离不足五公里，故土耳其被视作叙利亚难民前往欧洲避难的主要跳板。2015 年进入欧盟的 100 多万难民中，大多都是借道土耳其，横渡爱琴海进入欧洲门户希腊。因此，如果能以经济援助换取土耳其的帮助，欧洲的难民危机就会大为缓解。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外长施泰因迈尔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欧盟土耳其协议”（EU-Türkei-Deal）的重要性。其实早在 2015 年 8 月，默克尔就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讨论过与土耳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以改善欧盟外部边境保护，减少难民流入并最终解决难民危机。默克尔表示：“我从未改变我的政策，而是将其付诸实践。”^①

迫于一系列由难民危机引起的内忧外患，默克尔政府绝不会放弃“欧盟土耳其协议”，这个消除难民危机的关键一环。为此，德国政府只能在不涉及自由、民主等基本原则的问题上，尽可能放低姿态向土耳其示弱，以保障合作的继续。在伯默尔曼事件发生后，默克尔与时任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通话，两位政府首脑一致同意：“节目中播出的是一个蓄意中伤的文章。”^② 在土耳其

对联邦议会亚美尼亚决议不满并拒绝联邦议员代表团访问驻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的联邦国防军时，默克尔不得不派出发言人进行表态，强调联邦议会决议对联邦政府的行为不具有约束力。此外，在对土耳其免签问题上，德国政府虽然坚持要求土耳其满足欧盟提出的条款，但同时强调双方对话不能停止，且积极参与并推动与土耳其的谈判。

六、土耳其当局与欧盟价值观矛盾深重、缺乏互信

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已近 20 年，随后提出申请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早已先一步成为欧盟成员国，就连前南斯拉夫国家克罗地亚也于 2013 年先一步加入欧盟。欧盟迟迟不肯接纳土耳其的首要原因，是其伊斯兰国家身份，虽然已经十分世俗化，但欧盟各国已是完全世俗化国家并且以基督教为主流。其次，土耳其的经济水平与主要欧盟国家仍有差距，而土耳其国内的人权状况也长期受欧盟诟病。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后愈加严重。比起未遂政变本身，西方媒体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政变失败后，土耳其政府发起的“大清洗”上。土耳其历史上有军事政变的传统，土耳其军队被认为是开国元勋凯末尔建立的世俗化共和国的捍卫者，现行土耳其宪法也赋予了土耳其军队维护土耳其世俗化社会不被破坏的职责。每当军队认为政府过于伊斯兰化，就会通过政变形式将伊斯兰化的土耳其拉回世俗社会。

① Bundesregierung: Kein Kurswechsel in Flüchtlingspolitik Merkel: Ich habe meine Politik nicht geändert, 01.10.2016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6/10/2016-10-01-merkel-kein-kurswechsel.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4.10.2016.

② Spiegel Online: Wie geht es weiter in der Affäre Böhmermann? 04.10.2016 <http://www.spiegel.de/kultur/tv/jan-boehmermann-wie-geht-es-weiter-in-der-affaere-um-die-erdogan-beleidigung-a-1115152.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8.10.2016.

1946年施行多党制后，军方曾发起过三次政变和一次军事干预。然而这一次的军事政变的结果却与之前不同，总统埃尔多安更在政变后大搞对政府反对者和居兰支持者的肃清运动，引起西方乃至国际社会的担忧。

土耳其当局认为，美欧国家对此次政变态度暧昧，并未表现出对土耳其政府的支持。土耳其驻欧盟大使叶尼尔（Yenel）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道：“一开始我们十分失望，我们并没有从欧盟国家收到所期待的支持。”^⑬ 不仅如此，西方媒体用“镇压”“报复”“清洗”等词形容土耳其政府的“善后”行动，也引起了土方的不悦。此后总统埃尔多安欲重新引入死刑的言论，更是触动了欧盟在人权问题上的红线。德国政府发言人赛博特对此表示：“我们严厉拒绝死刑。执行死刑的国家是无法成为欧盟成员的。”赛博特还说道：“欧盟是一个价值观共同体，欧盟国家一致认为死刑不符合其共同价值观。”^⑭ 此外，欧盟以土耳其未按要求修改现行的反恐法，而拒绝对土免签。土耳其现行的反恐法依然认定南部库尔德工人武装为恐怖主义，双方的武装冲突持续了20年。而欧美西方国家则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与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土耳其武装展开合作，以打击这一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双方在库尔德问题上的矛盾不

可调和，土方多次表示不可能对这一法律进行修改，欧盟则将其看做对土免签的前提条件。

事实上，土耳其当局与欧盟国家间互不信任由来已久。2016年初伊斯坦布尔发生对德国旅行团的自杀式袭击事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发出谴责，并表示袭击者系来自叙利亚地区“伊斯兰国”组织成员。但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马森（Hans-Georg Maaßen）则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IS策划了这场恐怖袭击，“我们都知道，土耳其现在有诸多内部矛盾，其中之一就是与伊斯兰国的矛盾。”^⑮ 欧盟与土耳其之间的互不信任在土耳其未遂政变后进一步加深。政变发生后，美欧不仅未在第一时间宣布支持文职政府，更指责总统埃尔多安排除异己，德国内政部发言人还就三份政治避难请求表示：“鉴于土耳其国内对政府批评人士的追捕，必须仔细谨慎审核避难申请。”^⑯ 土当局对西方盟友失望不已，转而向原本关系紧张的俄罗斯示好。总统埃尔多安将政变发生后的首次出访选在了莫斯科，含义颇深。10月10日，土耳其与俄罗斯签署天然气管道建设协议，被称为“土耳其线”（Turkish Stream）的“南线”输气管道项目此前因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而停滞，它的建设可以减少对途经乌克兰的“北线”的依赖，向东南欧国

^⑬ Tagesschau: Türkei glaubt an schnelle Visa-Einigung, 30.09.2016,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eu-tuerkei-visumsfreiheit-101.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5.10.2016.

^⑭ Welt: Bundesregierung erklärt die Todesstrafe in Türkei zur roten Linie, 18.07.2016 <https://www.welt.de/politik/article157124814/Bundesregierung-erklaert-Todesstrafe-in-Tuerkei-zur-roten-Lini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0.10.2016.

^⑮ Südkurier: Zahl der Festnahmen nach Anschlag in Istanbul erhöht sich auf sieben, 14.01.2016 <http://www.suedkurier.de/nachrichten/politik/Zahl-der-Festnahmen-nach-Anschlag-in-Istanbul-erhoeht-sich-auf-sieben;art410924,8438274>, letzter Zugriff am 21.10.2016.

^⑯ Tagesschau: Türkische Diplomaten suchen Schutz in Deutschland, 07.10.2016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diplomaten-tuerkei-schutz-101.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0.10.2016.

家送气。虽然该项目的达成也将客观上对欧洲的能源供应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表现出土耳其与欧盟的信任度不断降低。

七、德土关系未来短期内发展前瞻

2016年6月，德国国防部出版最新《德国国防白皮书》，书中一改往日军事克制形象，表示要积极参与全球建构、承担国际责任并在欧盟中担任领导角色，德国的身份认同与欧洲紧密相连。这也将是德国未来在欧洲以及世界的角色定位。且从历史来看，德国政府的政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因此可以推断，德国在未来短期内将继续实行现有的难民政策，并积极在欧盟内推动对难民安置方案的统一。面对仍未平息的难民危机，欧盟与土耳其达成的协议将是欧洲切断难民来源的关键一环。因此，德国政府将不得不在与土耳其产生摩擦的问题上做出妥协，以保证合作的继续。

与此同时，欧盟与土耳其当局的矛盾将进一步深化，双方互信继续下降。就欧盟方面来说，欧盟不会在免签和入盟问题上降低对土耳其的要求，在涉及人权、自由等本质

问题上不会做出让步，只要土耳其不在修改反恐法上做出妥协，就无法获得欧盟免签待遇，而入盟也将遥遥无期。但为解决眼下欧洲一体化面临的重大危机，减少非法难民并将遏制难民涌入欧洲，德国政府和欧盟各机构不会放弃与土耳其进行谈判，土耳其入盟进程还将继续。从土耳其方面来看，土当局加入欧盟的意愿和可能性都在走低。现总统埃尔多安致力于将土耳其改为总统制国家。2016年5月，埃尔多安亲信耶尔德勒姆接任土耳其总理，而前总理达乌特奥卢正是“欧盟土耳其协议”的积极推动者。此外，作为冷战时期与苏联对立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近期却不断向俄罗斯示好。土俄关系的正常化无疑标志着土耳其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疏离。土耳其近期在伊拉克地区干预从“伊斯兰国”手中解放摩苏尔的行为，也被视作其成为地区大国的意愿。即便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意愿不如往昔，但土当局不会放弃与欧盟的谈判，因为无论免签待遇还是提供安置难民资金都有利于土耳其的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德土双边关系未来发展仍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仍将面临安全形势和国内外矛盾等问题的挑战。

作者简介：梅霖，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经济 视野

德国的科研创新政策（下）

殷桐生

VIII. 德国科研创新的特点

一、维护科研创新体制基本结构的稳定

长期以来，德国的科研创新体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主要变在外围，基本结构则保持稳定，如高额投入、重视合作、重点支持这些原则数十年不变。这样做的原因很多，需要强调的是，这同德国的产业结构变化有关。

与其他各国相比，德国的服务业比重为68%，不如其他国家那样高，二产（包括采矿业）的比例仍然高达31%，特别是某些科研密集型工业部门，也就是德国的工业强势部门依然保持了强劲发展的态势，如汽车、机械、化工、电子、药物和飞机制造等部门。这就为保持德国研发创新的基本结构创造了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产中大量的是中小企业，它们同样重视创新和出口，从而提高了对知识和技术的转让需求。

2006年，德国通过了高科技战略，试图建立一种长期重点的一体化科研体制，但重新拟定重点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于是依然套用旧的重点，维护了创新体制基本结构的稳定，高科技战略也没有成为各部门在贯彻政策框架内协调内涵的真正阀门。于是不少人怀疑该战略是否能真正成为指导未来的重点战略，或者只是换汤不换药。

二、经济界是创新的主力军

德国的研发创新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经济界担任主力军。这表现在下列几个主要方面：1）德国的科研实力60%以上在经济界，德国的企业无论大小都把创新和技术开发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许多德国大企业都设有独立的研究实验室。2）创新投入巨大，无论是经费还是人员的投入，企业都列首位。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企业不断增加了其自身研发投入，从1999年的334亿欧元增加至2012年的512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67%提升到1.94%。^① 2011年，经济界

① 陈强，霍丹：《德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举措及对中国的启发》，载《科技创新导报》，2014年，第20期。

的科研创新投入为 514 亿欧元，是政府投入的 2.2 倍，约占全部投入的 68%（有的统计为 65.6%）；在全部科研人员中经济界占了 61.6%，是高校的 2.8 倍。3）主持的科研项目最多。在科研创新执行主体上，近几年经济界的最高占比为 69.2%，最低也达到 66.9%，远远高出国家机构和高校的占比。4）为高校内和高校外科研机构提供资助。高校内科研机构经费的 14% 和高校外科研机构经费的 10% 均是由企业来提供的。^② 5）企业认为自己承担着把创意转化为创新的重任，因而积极主动获取外部的技术转移服务，并将其迅速转变为创新产品，投入市场，取得了科研创新的主动权和优势地位。如今，1/3 的创新企业都把科学界纳入创新的进程之中，1/2 的企业都同科学界建立了合作关系。^③ 6）在研发创新中企业能获得政府各方面的支持，从而强化了自己的科研创新主力军的作用。

三、通过行业结构改革来推动科研创新，但发展很不平衡

从 1995 年开始德国大规模进行了科研体制的改革，使德国研发率（R&D-Quote）有了明显的提高，跃居世界各国的前列。据统计，到 2004 年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过像德国这样的研发体制结构改革。根据 1995—2006 年研发率增长的分析，在企业的结构制约研发率上只有爱尔兰、芬兰和日本超过德国，但没有一个国家研发体制的结构变化对研发率的影响能超过德国。

德国不断改革科研体制，提高科研成果的出版和获得专利的数量和质量。过去，德国高校内科研机构的人均出版和获得专利的数额远高于高校外的水平。如今，通过改革，两者的数额已经拉近，个别的甚至倒转。在千人获得专利的标准上四大高校外研究机构已超过了高校内研究机构，2004—2006 年期间为 30:25，人均发表于 SCI 刊物上论文的数量为 0.65:0.82。其中弗劳恩霍夫协会遥遥领先，获得 72 项专利，亥姆霍兹联合会大致接近高校内科研机构的水平。在高校外科研机构内部，马普学会的人均出版率最高，为 1.40，莱布尼兹科学联合会则接近高校的水平。^④

德国的加工业是德国经济中附加值最高的产业，也是德国进行研发体制改革的重点。方针是对中等研发力度的部门实施专门化，同时改善顶尖技术。改革之后，该行业的研发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创新区位，但行业内的发展依然参差不齐：如汽车业是德国经济中专门化最高的部门，改革后其研发投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研发平均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从而提高了整个德国的研发格局；然而，机器制造、化工行业、电力、仪表、数据加工和软件部门尽管也属德国传统的强势行业，但在研发力度上都要低于汽车业。

四、既强调专门化，更强调合作

德国在科研创新中非常强调部门的专门

② Joanneum Research, Technopolis, ZEW: Das deutsche Forschungs- und Innovationssystem: Endbericht, Studien zum deutschen Innovationssystem Nr. 11-2010, Kurzfassung.

③ Joanneum Research, Technopolis, ZEW: Das deutsche Forschungs- und Innovationssystem: Endbericht, Studien zum deutschen Innovationssystem Nr. 11-2010.

④ Ebenda.

化，特别是高校外科研机构的明确分工。这种分工大大提高了各科研机构的专门生产率。以高校外科研机构为例，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四大任务群：

1. 纯基础研究，主要由马普学会承担；
2. 应用研究和向科学体系内外转让科研成果，主要由亥姆霍兹联合会和莱布尼兹科学联合会来承担；
3. 提供政策咨询和为公共科学服务，如测试、审核、批准商品、提供信息和资料以及基础设施等，主要由联邦的专门科研机构和“其他（科研）机构”来承担，莱布尼兹科学联合会的一半工作也是从事此类任务；
4. 向经济界实施技术转让，主要由弗劳恩霍夫协会研究所和“其他（科研）机构”来承担。

如此明确的分工使主管者、行为主体和合作伙伴对自己的定位了如指掌，从而提高了对科学家的刺激，并降低了寻找合作伙伴的费用。这一模式在其他国家很难找到，因而也成了各国仿效的榜样。

德国虽然强调分工，强调专门化，但更强调合作，更强调各科研机构的总体目标、宏观目标是一致的，因而需要紧密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但表现在政府、科技界、高校和企业之间，还表现在高校科研机构内部，高校外科研机构内部，也表现在高校内科研机构同高校外科研机构之间。

德国科研的一个重大优势是科技界、高校、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紧密合作，特别是科研机构同企业之间的合作，使科研成果通过知识和技术的转让迅速变为财富，突出了“科研是第一生产力”的真谛。

近年，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促使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结成密切合作的“创新伙

伴”，并要求已结成“创新伙伴”的单位制定出创新计划，承担相应的创新项目，使产、学、研各环节有机地联成一体，缩短了创新知识到新产品的转化过程。

德国政府也主动为企业创新提供所需的各种信息，主要方式有：设立技术创新咨询部门、专业情报系统、情报传播联络处、专利陈列机构、免费提供专利说明书、让企业参加各种学术讨论和信息会议等。政府还规定对企业为技术创新咨询费用提供40%的补贴，若5年内接受同一咨询机构咨询，凡不超过15天的，政府皆负责50%的费用。

政府不断推出各项法规，支持经济界从事科研创新活动，如先后颁布了《质量保障计划》、《中小企业远程工作计划》、《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分担计划》及《中小企业创新与未来技术计划》，支持中小企业建立完善质量保障系统，促使中小型企业形成联盟，将技术资助作为继续开发的重点，建立和改善有利于企业创业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拓宽德国创新型初创企业的融资途径。^⑤

德国规定，在科研机构开始一个科研课题之前，必须考虑市场需求及能否为企业所用而实现产业化；同时，还规定任何国家级大型科研项目必须至少有一个中小企业参加，否则不予批准。

德国重视通过联合研发和委托科研来推进创新合作。在已同科研单位建立创新合作的1/3企业中科研单位负责为新产品和新工艺流程提创意，1/4的企业愿意把科研机构作为本企业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的合作者。企业也愿意同科研部门搞联合研究和委托研究，以便获得学术专门技术。双方也会采取灵活的方式来深化合作，例如请科研机构帮助辅导企业工作人员撰写硕士和博士论文，

⑤ 陈强，霍丹：《德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举措及对中国的启发》，载《科技创新导报》，2014年，第20期。

提供学术和科技咨询，为企业职工提供进修和培训的条件，还可共同建立网络和各种交流关系。这种联合研发和委托科研已经成了科研单位同企业合作的重要形式，也是知识和技术转让的主要途径。

建立技术转让服务机构和大批中介机构，使科研成果能够迅速转移到企业，让德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保持明显优势。德国主要的技术转让服务机构有德国技术转让中心、史太白技术转让中心和弗朗霍夫协会。大批的中介机构则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因为大型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研发机构。这样就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科学界和经济界的合作关系。

高校内和高校外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样也十分常见，如马普学会就经常带领八大“顶尖高校”的各研究所一起从事科研合作。高校外科研机构则从不把专业大学视为自己的竞争伙伴。

由于高校外科研机构的研究特点相对近似，合作也就更多了一些。如马普学会、莱布尼茨研究所和亥姆霍兹联合会的研究特点就比较相似，弗劳恩霍夫协会则同“其他（科研）机构”比较雷同。它们之间的合作就非常之多，大多数高校外科研机构之间的跨单位合作要超出单位内部的合作，各单位都十分乐于成为其他单位的合作伙伴。只有少量的联邦专业研究机构在独立作战。

五、重知识和技术的转让

知识和技术转让的关键是知识产权问题，这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很大麻烦。在这方面美国高校通过1980年的《拜杜法案》

(Bayh-Dole Acts)^⑥做出了样板。2002年，德国修订了《雇员发明法》，取消了高校特权。此后高校的教师也必须向本校报告自己的发明，由学校决定，是学校来使用该发明，还是让发明人来决定如何使用。于是各类专利使用公司纷纷成立，以协助高校来申报专利和使用专利，从而提高了高校科研的专利申请比例。于是，报专利、使用专利、提高高校科研的专利申请比例已经成了各校的时尚，如今已经达到50%。

无论是高校内还是高校外都有很多科研机构是以转让知识和技术为导向的。从高校来看，主要是理工大学和拥有相关专业的专业大学；从高校外科研机构来看则主要是弗劳恩霍夫协会和许多“其他（科研）机构”，它们都是以技术转让为导向的。此外还有1/3的亥姆霍兹联合会研究所和某些莱布尼兹科学联合会的研究所也都从事知识和技术的转让工作。总体来看德国高校外科研机构中约有1/4是主要从事此类转让业务的。^⑦

另一个推动创新和知识、技术转让的重要渠道是科学家创业，或是创办企业来使用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这一方面德国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2000年开始，德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如EXIST-Programm、spezifische AUFProgramme、Länderprogramme等）来推动科学家创业，如今每年由科学家新建和参建的企业约为6000—7000个。

六、提高科研精品是各科研机构的重中之重

所谓科研精品就是指在著名刊物上发表

⑥ 维基百科：《拜杜法案》是美国两位参议员 Birch Bayh（民主党）和 Bob Dole（共和党）提议由参议院于1980年12月12日通过的。该法允许所有使用联邦经费从事科研的机构有权使用这些研究成果。

⑦ Joanneum Research, Technopolis, ZEW: Das deutsche Forschungs- und Innovationssystem: Endbericht, Studien zum deutschen Innovationssystem Nr. 11-2010, Kurzfassung.

的优秀论文和获得的优秀专利，因此提高科研精品便成了各科研机构共同奋斗的目标，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措施便是引进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和培养后起之秀，其次是抓好现有科研人员的进修，改善知识和技术的转让渠道以及优化科研条件和环境。

七、争取获得第三方资助

所谓第三方资助就是指科研机构获得研究基金会、官方管理机构、企业以及欧盟的资助。如今，德国高校内和高校外科研机构人均获得第三方资助的能力基本持平，但结构不同。在获得研究资助经费上最关键的是拿到德国研究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的资助经费。马普学会以人均年获 14,000 欧元的资助位居高校外科研机构的首位，但仍然明显低于高校内科研机构的 25,000 欧元的数额。

弗劳恩霍夫协会获得的联邦应用性专业项目资助最多，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和亥姆霍兹联合会人均获得的第 6 届欧盟框架计划资助相当。在获得此类第三方资助经费上所有高校外科研机构都超过了高校内科研机构。在人均获得经济界第三方资助上弗劳恩霍夫协会和“其他（科研）机构”表现更为突出。

八、以集群创新、高科技和关键技术引领转型创新

德国通过一百多年的创新努力不仅在传统工业领域，而且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在全球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尤其以集群创新、高科技和关键技术来驱动转型创新有效地提升了产业的创新能力。

推进集群创新是德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途径。联邦政府通过 BioRegio（生物区）

计划推动生物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并带动德国其他产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1999 年，政府又以区域创新理论为指导，在东部地区实施 InnoRegio（创新地区）计划，通过创新网络促进集群主体间的合作；2005 年，又通过 GA-networking（Genetic Algorithm-networking，基因规则网络）计划，加强了对重点和平行发展的集群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协调。这样德国便通过组建单个集群、集群内部主体间的合作、集群整体的创新转型到集群之间的合作和对各创新集群的协调管理达到了区域均衡，并提升了德国高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

2006 年，联邦政府首次推出《新高科技战略——为德国创新》计划，2010 年又发布了《创意·创新·增长——德国 2020 高科技战略》。这两份纲领拟定了高科技领域的创新目标，尽管对其功能和作用的认识还存在分歧，但其实施的效果已经证明，在“高科技战略”中，某些特定技术领域已经明确地被认为有益于产生新的知识和技术，有助于解决重要社会问题并促进创新及社会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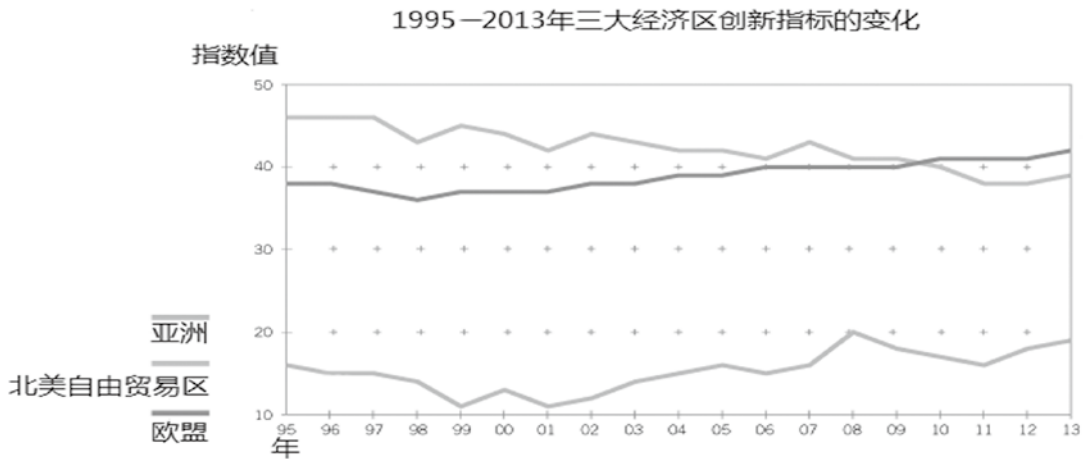
德国重视“关键技术”的发展，关注本国的“关键技术”能否占据国际领先地位。所谓“关键技术”是指生物与纳米技术、微纳米电子学、光学技术、微系统技术、材料与生产技术、航天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以及服务研究等技术。它们是重要的创新驱动动力，是新产品、新工艺以及新服务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尤其是能确保经济和就业增长的重要基础。德国经济的未来正是取决于这些关键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它们也将对德国的整个科研创新产生重大的影响。

IX. 加强国际合作

当前的世界各国都加强了科研创新的力度。2011 年，全世界对研发投入达 14,350 亿

美元，亚洲占 34%，北美洲占 32%，欧洲为 24%。从国际的发展总趋势来看，欧盟保持着稳定的发展，亚洲在经历了 1995—2001 年的

下滑和波动后总体呈上升趋势，北美自由贸易区则显示出式微的势头。



资料来源：Deutsche Telekom Stiftung/Bundes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 u.a.: Innovationsindikator 2014, 10.2014.

为积极参与全球的科技合作和竞争，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德国政府及其研究机构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战略。该战略坚持四大目标，显示四大特点。这四大目标是：1) 加强与国际先进国家合作；2) 在国际范围内开发创新潜能；3) 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科技合作；4) 承担国际义务，应对全球挑战。^⑧ 四大特点则是：1) 建立完善的科技合作顶层规划；2) 发展形式多样的国际科技合作活动；3) 根据合作对象特点量身定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4) 大力开展科技营销活动。^⑨ 通过实践的检验，该战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突出的表现是德国一半的学术论文已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德国直接从事科技国际合作的机构是联

邦教研部下属的德国研究基金会、国际事务办公室 (Internationales Büro, IB)、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DAAD)，此外还有高校内和高校外的科研机构，特别是德国大学校长会议 (HRK) 和高校外的四大学会。

德国研究基金会积极支持国际合作项目，在 2014 年仍在运行的科技项目中，国际合作计划项目和金额分别为 1136 项和 2340 万欧元，其中资助建设国际合作 553 项，330 万欧元；德国-以色列项目合作 38 项，620 万欧元；向国际组织交款 47 项，530 万欧元；在德国举行国际学术活动 498 项，860 万欧元，约占全部 29,781 个仍在运行科技项目的 4%，以及总额为 27,298 亿欧元的仍在运行科技项目金额的 0.85%。2014 年，新增的项目和金额

⑧ BMBF: 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globalen Wissensgesellschaft stärken: Strategie der Bundesregierung zur Internationalisier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 Bonn, Berlin. 8-10, letzter Zugriff am 26.07.2015.

⑨ 陈强等：《德国国际科技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科技管理研究》，2013年，第23期。

分别为 831 项和 2310 万欧元，其中资助建设国际合作 283 项，310 万欧元；德国-以色列项目合作 8 项，660 万欧元；向国际组织交款 42 项，490 万欧元；在德国举行国际学术活动 498 项，850 万欧元，约占全部 6938 个新项目的 12%，以及总额为 15,427 亿欧元新增科技项目金额的 1.5%。^⑩

在 2011 年国际事务办公室资助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德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项目数及金额均占绝大多数。从合作对象国来看，项目数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顺序如下：俄罗斯（123）、印度（122）、南非（94）、中国（85）、韩国（58）、智利（55）、土耳其（54）、乌克兰（53）、巴西（49）、埃及（45）；金额（单位：万欧元）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顺序如下：俄罗斯（206.5）、土耳其（129.9）、中国（113.8）、印度（87.6）、韩国（80.2）、日本（66.1）、南非（50.7）、智利（43.2）、澳大利亚（43.1）、（越南（36.5））^⑪

德国资助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从 2007 年的 732 个上升到 2011 年的 1374 个（其中亚洲 414 个，北美和南美 224 个，非洲 264 个，独联体 225 个，中东欧 99 个，西欧 4 个，跨国 144 个）。金额从 2007 年的 568.1 万欧元上升到 2011 年的 2310 万欧元，外加 430 万欧元的职教项目资助。从亚洲的合作对象国来看，排名次序是印度（122 项）、中国（85 项）、韩国（58 项）、越南（39 项）、日本（11 项）、印尼（10 项），但对中国的资助金额最高，为 113.8 万欧元，印度为 87.6 万欧元。^⑫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成立于 1925 年，代表德国 231 所高校和 128 个大学生团体，是

德国文化和高等教育政策的对外执行机构，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教育交流机构之一。它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 14 个办事处，为当地提供信息和咨询。它的主要任务是支持德国和其他国家大学生、科学家的交换项目以及国际科研项目，并以此来促进德国大学同国外大学的联系。目前已有大约 68,000 名大学生和科学家接受过 DAAD 的资助，将近 500 名大学教授被派往世界各地授课。

德国的高校内和高校外的科研机构，特别是高校内的德国大学校长会议和高校外的四大学会，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们同世界各国同行建立了广泛的校际和学术交流关系。

德国大学校长会议现已拥有 268 所高校，包括 94% 的大学生，其国际部是负责同世界各国高等院校进行国际合作交流的执行机构。德国大学校长会议自 1949 年成立以来，已同世界各国就两国高校合作、科研创新、联合科研、师资进修和培训、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相互承认学历、高校国际化以及评审等问题签署了各类交流和合作协定。^⑬

四大学会奉行“立足德国，遍布世界”的理念，推进全球科技合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弗劳恩霍夫协会，它在德国之外开展了很多国际科技合作活动。

德国积极推行“面对世界的科学”活动，大力邀请和引进外国的学者和学生来德国学习和从事科研活动。2011 年就有 32,000 名外国研究人员在德国工作。2012 年仅在马普学会工作的 49% 的博士生、86% 的博士后和 31% 的主任（Direktoren）都来自外国。在精英计划中工作的共有 5750 研究员，其中 80%

^⑩ DFG: Jahresbericht 2014, Aufgaben und Ergebnisse, letzter Zugriff am 25.07.2015.

^⑪ Internationales Büro des BMBF: Jahresbericht 2011, Bonn, September 2012, letzter Zugriff am 25.07.2015.

^⑫ Ebenda.

^⑬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auf einen Blick, letzter Zugriff am 25.06.2015.

是年轻人，25%来自国外。

X. 问题与改革建议

德国的科研创新体制和政策有很多优点和特点，因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优点就会有缺点，有成功就会有失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德国的科研创新体制与政策究竟有些什么问题 and 缺点，应该如何来加以纠正。

一、要始终坚持科研创新的正确决策理念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智慧的民族，但也是一个“迟到”的民族。这一点同样反映在科研创新领域。我们既看到德意志民族在这一方面的惊人成就，也能看到她在不少重大科研创新决策中的踌躇和迟疑，因而错过大好机遇，落在了先驱者的身后。好在只要她一旦发现自己的落后处境便会迎头赶上，甚至超过别人，进入领先的行列。这一点特别反映在德国对待新经济的政策和态度上。当美国的克林顿政府通过发展新经济保持了美国经济112个月的持续增长时，世界各国都群起而效仿，德国却始终处于经年的踌躇之中，以致一举被甩下了好远，直到施罗德上台才把发展新经济作为科研创新的重点予以推动，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人们也看到，德国的这一迟到的决策让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撕开的伤口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愈合。

科研创新不是赌博，需要科学、智慧和稳健，但科研创新又是一种机遇，它稍纵即逝，需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需要有失败一百次还敢试验一百零一次的勇气和理念，这就要求人们从繁重、复杂的科研中要智慧，从风险资本中要保障。提出这一点，既是对

德国科研创新决策的反思，也是对德国科研创新的一种警示。

二、要对教育体制进行深入的改革

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德国教育有了改进，在PISA考试的排名有了提高，高校毕业生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有了增长，但同教育领先的国家相比距离还是很大，这一直是德国科研创新的短板和软肋。

长期以来德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受制于条块的分割，联邦和各州不能在这一领域合作。如今这一规定虽然已经有了局部松动，但仍难言理想，需要进一步的改革。联邦同各州都应该把教育政策视为共同的任务，需要更为有效的合作机制。

各联邦州执行不同的教育政策已大大影响了人人应享有的教育公正，因而也就影响了教育作为创新力量的重要意义。

高校的经费不足一直是困扰德国高校的另一突出问题，由此派生出来高校是否应收取学费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学生、学生家长及广大人民群众对高校的信任，但至今没有圆满解决，而因“债务刹车”各州不准借债的规定同样阻碍了教育领域的结构创新。

由于上述这些主要原因，德国教育的发展滞后于其他领域，教学、科研质量不高，PISA考试长期处于中下游水平，新建专业少，不少任课教师知识老化，国际一流学者短缺，人才流失日益加剧，至今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因而大大影响了科研创新的产出和科研创新接班人的培养。即便是一直为世界乐道的职业教育也显出颓势：培训岗位短缺，相当一部分学员成绩不好，特别有天赋的年轻人得不到特殊的资助，对职业教育培训专业过于专门化，培训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等。

德国政府是深知这些弊端的，也下过决

心进行深入的改革，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往往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地走走过场而已。现在已经到了德国高校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三、要进一步改革科研创新体制和政策

德国虽然对研发体制进行了一些结构改革，但仍有很多问题和不足：

1. 行业内部研发的力度没有提升，这首先是因为在以往的改革中，德国的刺激和框架条件没有能使企业明显改变对待增加单位研发投入的态度；其次是德国的经济结构没有朝着要提高研发力度（FuE-Intensität）的方向改革，因此虽然从事科研的单位增加了不少，但研发力度并没有上去。

2. 德国经济研发支出的增长力度落后于某些先进国家，在支持企业应对创新风险上已经落后。德国必须加大这一支持，因为加大税收上的研发支持力度是支持企业从事科研创新的决定性激励，是改善德国在国际区位竞争地位的重要筹码，也是阻止大型企业进一步将其创新潜力转移至国外的一个重要手段。

3. 某些单位虽然加大了科研创新的力度，改善了学术领域的框架条件，增加了科研机构研究人员数量，然而投资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产出，没有相应提高科研机构出版物和专利的数量。

4. 科研密集型企业都是追求顶尖科技水平或是高附加值技术的，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的科研密集型企业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的比重都下降了。这是因为此类企业在经济发展良好时没有像增加营业额那样来相应增加研发的投入，后果就是，缺乏高素质科技人才，缺乏风险投资，市场结构差强人意，企业战略不当等等。

5. 某些领域的创新数值有轻微回落，因此，为了提高德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必须改善

某些部门和领域的框架条件，决不能躺在成绩簿上睡大觉。

6. 风险资本市场是德国创新体制的软肋。尽管德国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对新企业的早期融资力度仍然低于许多国家。因此，德国一方面要改善风险资本的框架条件；另一方面需要更多新的企业家来从事创新活动。

7. 创新政策一向属于联邦政府和大多数州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其地位高，划拨的费用也多。这并不是所有工业大国都能做到的。德国创新政策的资助手段多、干预的形式也多，这就在创新过程中造成市场和体制的失灵。资助的工具愈多，政策的主管单位也就愈多，加上项目的承担单位原本就多，而且各有自己的实施结构，这就造成了创新管理和实施的复杂性，运作很不灵活，每个行为体都要竭力来捍卫自己的地位。

8. 改革资助方针。德国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实施了重大的结构改革以创建尖端技术领域。现在全球对尖端技术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对德国尖端技术产品的需求同样也在增加，创新政策的需求也同时发生着变化，然而对尖端技术的资助额度却丝毫没有改变。为了提高德国经济的科研力度和发展新技术领域，德国不应该停留在资助某些技术领域或是某些使用该技术的企业和部门上，而应该为所有愿意加大科研力度以提高竞争力的企业创造良好的框架条件。

四、要加强统一领导

今天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家大多已经取消了科学同技术的分野，统称为科技，而德国起先依然将其分在两个部里：经济技术部和教育科研部，后来则取消了含技术的部称。按说，像德国这样一个联邦制国家，各部又设司、处、项目负责人和计划分管等各类名目，更由于德国各科研机构之间分工细致，

理应有各类协调机制，以便协调各技术领域、各主管部门之间的工作，特别是涉及科研和创新的长期目标时。这种统一领导和管理的缺失已经造成了科研计划的固化和科研的山头作风而呈现出一个异质实施结构。政出多门，项目林立。一个集群成了一个山头，各自为政。这一体制潜在的好处是适用于小型项目，但有明显的弊端，很难实施跨部门的合作，不利于迅速实施大型科研和创新计划。项目负责人没有调整计划的权力，而且经常会出现角色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从中干预、改变原有程序、更换新的途径和措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产生了德国创新体制中的所谓“惯性”。这种“惯性”可以防止过快地改变政策理念和措施，但也不利于及时做出必要的重大改革。这对创新活动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创新常常是长线工程，不做及时的、重大的改变和调整往往是不可行的。因此必须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导思想，成立一个统一领导科研创新的中心机构，如德国创新公司（Deutsche Innovationsgesellschaft, DIG）之类的领导机构不失为一种正确的应对之举。这样可以统一指挥，可以拟定统一的科研方针，使其既能适用于创新的不同阶段，也能适用于不同的干预形式。这样

也可以很好地迅速协调科研和创新的各类手段，提高资助的灵活性。

五、要继续强调科研的专门化方向，但精品导向不应牺牲成果转化

如今，各科研机构都把提高学术精品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尽管学术精品也是顺利进行技术转让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不能把精品导向变为低估，甚至忽视其他任务的理由。

科研要有激励机制，德国搞科研专门化和精品导向是一种激励机制，也为世界所乐道，但绝对不应以偏概全，忽视建立其他方面的相应激励机制。精品需要，一般产品也需要，也要激励，特别是要把激励机制同成果评估、考评以及下达的资助费用结合起来。

六、改革评估体制

在各相关部设立中心评估单位，改革评估体制。要改变目前把评估集中在改善现有计划建议的做法，加强新举措的研究，并把这一评估的经验向各有关机构介绍以便形成相应的新政策。

作者简介：殷桐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主德国经济失败原因探析^①

王 涌

【提要】民主德国经济失败的说法只能在相对意义上才能站得住脚，即相对于西方国家经济，主要是联邦德国。正是由于经互会国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劣势，使得其中的佼佼者面对联邦德国才显出失败的态势。这个态势不能笼统归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而是具体由内部外部多方面原因导致。内部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因素对经济的绝对主导，以致出于意识形态缘故而不惜违背经济规律，使得计划完全脱离市场，成了不顾事实的主观任意行为；外部原因主要是苏联的控制和整个经互会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前者使得其无法从民族经济利益角度去看待经济问题，后者使得其外贸强项的实际经济值大幅下降。所以，民主德国经济在与联邦德国的同比中最终被舍弃，不能简单归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它与多方面因素相关。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命里注定要失败的，就像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命里注定会成功的一样，关键在如何计划和如何市场。

【关键词】民主德国 计划经济 经济改革 政治经济 经济政治

民主德国最终解体，被联邦德国合并，原因大多被归为经济失败。这也确是事实，但是，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民主德国曾经“自诩已跻身于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列”。^②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最终因经济因素而走向垮台呢？问题应该有其复杂性。民主德国经济最终失败不仅有其内部

和外部原因，也有经济本身和非经济方面的原因。正是在这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民主德国才最终支撑不下去，走向解体。

一、经济方面原因

一般而言，人们都会将民主德国经济失

^① 本论文系王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德国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变化研究”（批准号09BSS016）的阶段性成果。

^② 肖辉英，陈德兴：《德国：世纪末的抉择》，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

败的原因归结为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这当然无可厚非。迄今世界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事实已表明：凡是走单一计划经济道路而不引进市场因素的经济体制由于将计划弄成一种脱离实际的强制，最终都面临困境。但是，不能由此就将计划经济本身判为万恶之源，更不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普遍失效而否认计划本身。民主德国经济的最终失败单就经济因素而言，有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内部因素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但是，体制是人为设定的，并不是一个凝固的、封闭的东西。因此，在具体层面上，民主德国经济失败的原因应该在没有把握机会，适时调整，从而将计划错误地变成只顾原则不顾实际的教条，最终使计划变成一种强制，无视市场的声音。外部因素在于其所依赖的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经互会国家整体走向衰败，这就使得由此而来的评价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整体上呈劣势，即便在这个体系中成为佼佼者，也会被整体的衰败而拉下水。

东西德地区本来是一个国家，其间经济能力基本一致，差别不是很大。因此，二战刚结束时，在1945—1947年间，东部地区的生产总量甚至还超过西部地区。这一状态使得东占区的苏联信心百倍地拒绝了西占区在全德国建立统一经济体制的提议，一意孤行决定在东占区奉行计划经济。于是，拒绝西部地区的货币改革，1948年6月24日实行自己的货币改革，发行东德马克取代帝国马克。1949年3月19日东德宪法出现，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奉行计划经济，价格和工资都由中央统一制定。建国初期的这些举措本身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失败先例的情况下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计划经济本身天生有

着伦理方面的亲和力。但是，当时人们没有或者不愿看到，战后头几年东部经济总量的提升不是靠生产率，而是靠大量劳动力的投入。这使得对东部经济一开始就带着一些盲目的信心，以致问题出现时不愿正视，而是一味坚持计划经济原则，没有适时进行调整。问题在刚建国到了1950年时就已出现，此前经济基础不比西德差的东德经济立即被西德赶上。^③ 1950年西德生产率已经高于东德20%—30%。这本来应该看到，经济发展要将重点放在提高生产率上。当时，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东德的重视，人们怀着前几年建立的自信，依然热衷于从原则而不是现实出发的国家计划，不顾实际出现的问题，刻意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原材料和重工业上，忽略了作为生产率根本的人，忽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说忽略了与之相关产业的发展。50年代早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消费品立即出现紧缺局面。于是，1953年6月17日便出现了动乱（Unruhen）。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还是一如既往地将重点放在重工业上而忽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结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0—1955）没有达标。本来，这时应该重新考虑计划体制问题，修正计划经济无视市场而成为了一种强制的弊端，尤其是波兰1956年秋，匈牙利1956年10—11月因此出现的政治波动，更应促使当局认真审视经济领域的偏废。可是，当局还是一味坚持原来的计划，将其变成了一种强制，对于老百姓的不满则用提高工资去安抚。恰恰这一违背经济规律的举措，即不是改善生产而是单一增发货币，使得问题雪上加霜，社会上出现了有钱买不到东西的局面，物品价格上升。为了应对，东德政

③ Ritschl, A. :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Wirtschaft der DDR - Ein Zahlenbild 1945-1989, S.17, in: JbW(1995), S.21-22.

府还是不在体制上做调整，而是在1957年10月13日，进行了第2次货币改革，强行压制市面流通资金。做法是每人可以1:1换300马克新货币，其余钱必须存银行，而且对于流通资金严格审查来源，看是否来自黑市。这近乎将国家干预推向了极端的做法，结果只能是人为而刻意地减少了市场流通资金，价格上升却无法遏止。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政治摇摆，一批“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en）包括著名哲学家布洛赫（Ernst Bloch）以及一些政府官员主张正视经济政策的失误。这时，迟迟出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虽不再实行，但取而代之的七年计划还是没有将重点放在改革和调整上，而是进一步沿袭了原有的计划，对于50年代末出现的改革呼声不惜用政治手段强行压下去。直到重新制定的七年计划又失败的事实摆在面前时，政府才在1963年1月15日的第6次党代会上开始讨论改革问题。

一年后，出台经济改革方案，旨在“用中央计划与经济杠杆的结合去代替计划管理和中央命令式领导”。^④ 由此开启了60年代的经济改革时期，所谓“经济试验”。试验的主要内容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入一些市场经济因素，如中央不再单独硬性计划，而是开始顾及经济和市场规律，要求企业将盈利放在重要位置，做到经济上自主盈利等等。这场改革使得当时五年计划的实现程度都比50年代要高，东德经济开始出现明显好转，思路和做法开始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民营经济的比重明显提升，甚至在1971年中旬召开的第8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是以后计划的主要任务。但是，由于50年代人才大量流失，劳动力缺乏成了

遏止60年代东德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高质量劳动力的流失又成了提高生产率的重要瓶颈。这场改革虽然使得东德经济明显好于50年代，但还是没有将改革后的经济发展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本来，60年代的经济调整已经姗姗来迟，而且成效还没有完全出来，在恰恰需要延续的70年代上半叶，却有人担心国家由此变色。70年代中昂纳克上台后基于这样的担心又开始强调中央调控，将改革中引进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剔除了出去。从此，五年计划又开始脱离实际，又开始了只有计划没有兑现的时代，东德经济又进入下滑通道。由于强化了国家，忽略了市场。在生产下滑的情况下又增发工资，社会重又回到产品不足的困境，有钱买不到东西。同时，出于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又必须强撑社会福利。于是，通过海外贷款（主要是苏联）来扩展社会福利，贷款额甚至达到了国家根本无以偿还的地步。由此，东德经济进入了崩溃的边缘。

因此，民主德国经济最终失败的原因从经济角度看，并不单纯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而在太执著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太固守计划经济的一些原则，以致没有适时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进而不断违背经济规律。早在5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推行后生产迅速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就理应采取调整措施，适当引进一些市场因素，以激发经济活力。60年代出现的改革虽然在内容上基本沿着此方向前行，但一者由于出现得太晚，二者由于时间还不够长，这就使得其无法从根本上将民主德国经济推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出现得太晚”是因为当时民主德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尤其是大量劳动

^④ Berg, Michael von : Die Wirtschaft der DDR, in: „Neue Zueriche Zeitung“, Nr.224 und 225 vom 16.und 17.8.1968.

力已经流失。这就更加要求改革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显出效果。可是，在这样的时间到来之前，昂纳克上台，改革又中断，并相当程度回到了从前。这就使得民主德国经济在1989年时较之于联邦德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落差。早在两国经济刚刚起跑时，联邦德国就已经迅速领先，到1989年时，巨大的落差使得民主德国的老百姓不再愿意接受自己的国家。国家解体，民主德国的计划经济自然消失。

表面上看，问题似乎又在计划经济上。诚然，民主德国太固守计划经济的一些原则是其经济失败的原因所在。但是，如此不顾实际地固守计划经济的一些原则，并不是计划经济的本来面貌，无论就体制还是计划本身而言，都是这样。计划经济完全应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适时调整，即便体制本身也是可以修正与改善的，因为计划本身就有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之分，同时又有结合实际与脱离实际之分。60年代民主德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抛弃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而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了一些市场性因素，使计划开始贴近实际，开始对基层不具有原先的绝对强制性。其效果也是明显的，只是开始得太晚，所以欠债太多，以致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从根本上见效。这样说并不是指此后昂纳克的经济政策是民主德国经济走向失败的罪魁祸首。昂纳克的经济政策较之于60年代的经济改革固然又强化了中央集权和强制性计划，但那不是简单回到50年代的计划经济，而是在进行了改革的新条件下实施计划经济，不仅比50年代更看重与市场经济因素的结合，而且还由国家募集资金（海外贷款）来改善福利条件，如住宅建设。昂纳克刚上台强化计划经济不久，于1978年也开始进行改

革，如：“改革国民经济管理组织机构，取消中间环节，实行工业部，联合企业两级管理体制”^⑤；“规定联合企业是工业，建筑业和其他国营经济部门从事物质生产的基本单位，在联合企业内部建立相对完整的再生产过程”；“扩大总经理的管理权限，实行管理人员的严格责任制”；“建立和完善联合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和调整工业品价格”；“完善联合企业中的党组织，改进党组织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法”；“进一步完善国家经济领导机关的经济领导工作”等。这些都表明，昂纳克推行的计划经济较之于50年代，更加尊重经济规律，开始“注意慎重处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注意行政方法与经济手段的结合”，“注意集中领导与分权经营的统一”，“注意处理经济改革与实现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等等。这些明显是对原有计划经济有了调整和改善。昂纳克时期，这样的调整不断出现，如“1986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注重提高生产的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规定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内技术产品要增长50%。”^⑥可惜，由于长期积蓄的问题太多，加上中央层面缺乏对应的改革，到了80年代末，东德最终解体。昂纳克应该是导致东德经济失败的直接原因，但不是最终原因。最终原因是在计划经济问题上过于教条，没有适时进行调整，而且即便晚到的调整也不够彻底，仅是停留于经济运行层面，而没有深入到顶层，深入到体制内部，没有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进行调整。如昂纳克的改革就没有深入到中央计划层面，以致民主德国经济在结构上始终失衡。比如，1989年时，“民主德国的褐煤产量是联邦德国的2.7倍”。如此这般的过度开采

⑤ 肖辉英，陈德兴：《德国：世纪末的抉择》，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

⑥ 上述引言均摘自肖辉英，陈德兴：《德国：世纪末的抉择》，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

固然是为了减少进口，因为外汇紧张。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反而会使国民经济因结构失衡而越来越糟。同样，社会福利方面不惜举债大规模建设住房这一点，撇开其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过度开展福利建设的偏废暂且不论，就如此力推住房建设这一点来看也是脱离当时国民实际而是非常失策的，因为住房只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此重点发展住房建设，也就只是将人民生活维系在最低的基本需求层面。70—80年代民众出现不满，觉得赶不上西德时，国家还是将有限的财力大量投入建房，如此失衡的福利建设最终还是不能让百姓满意，因为其他严重落后，仅有住房是无法让人对生活满意的。众所周知，80年代末东德百姓走上街头表达的不满，不是住房，而是其他生活用品的困乏，尤其是日常生活用品。这些都是顶层脱离实际的强制性计划所带来的后果。

因此，昂纳克的经济政策虽然在很多方面已经有所改革，但由于没有深入顶层，没有深入到体制内部，即国家计划经济的失误，最终还是无法解决问题。所以，就民主德国经济失败的原因来看，不能笼统地归因于经济体制本身，而应具体看到体制内的错误计划才是根本失误所在。恰是不顾实际一味只看原则的计划使得民主德国经济最终远远落后于联邦德国，以致最终被整合。从社会角度看，计划经济理应有其利于宏观调控的长处，但是，脱离实际，脱离经济规律的计划，反而将此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抽去。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与计划本身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计划经济体制有赖于合理的计划来支撑，合理的计划又有赖于特定的体制来贯彻，这个体制必然是计划经济的。民主德国经济失败的原因应该在于不顾经济事实，违背了经济规律，没有适时对体制进行调整，以致最终失去了进行有效改革的良机。这里应该看到的是，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彻底抛弃计划

经济，完全走市场经济道路，其间还有一条两者结合的中间道路可走。

二、非经济方面原因

起初，协约国想在东西部不同占领区建立统一的经济体制。但是，苏联从自身政治考虑出发，在1945年7月21日没收了其占领区内所有银行的财产，同年9月3日没收了所有私人财产，9月30日将所有工业和贸易设施收归国有。1946年4月21—22日又迫使苏占区原来的德国社民党（SPD）和共产党（KPD）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die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即SED。1946年6月30日苏占区关闭了通往所有其他占领区的边界，1947年6月14日成立德国经济委员会（Deutsche Wirtschaftskommission），简称DWK，1949年开始将农民土地收归国有。由此，东部地区走向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因此，民主德国的经济道路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从经济考虑，而首先是政治因素的产物。此后整个经济发展同样首先不是由经济因素本身，而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运行总体上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这应该是民主德国经济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也就是说，非经济方面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是其走向失败的最终原因，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本身。同样，有人也认为，联邦德国在经济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最终根源同样也不单纯是在经济体制本身上，而是与之相反，由经济因素本身出发，而不是由政治出发，去运作经济。

对于民主德国经济失败的原因，一般共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重工业比重太高。殊不知，这在当时恰是政治考虑高于经济因素的产物。早在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初的50年代，这一问题就已经通过消费品奇

缺凸显出来，而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失败已从根本上表明：计划经济有其明显弊端。当时，人民大众，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和随之而来的移民联邦德国的浪潮，应该足以促使当政者进行适时的经济调整。但是，出于政治原则方面的考虑，政府一味坚持原有的做法，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途夭折以及紧接着的七年计划失败后，才姗姗来迟地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但那不是体制方面，而是管理方面的改革。即便这样有限的改革也在经济方面立见成效，使得60年代至70年代初民主德国经济较之于50年代明显好转。这次改革是“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在改革中探索民德自己的发展道路。”可是，又是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这个还有很多发展空间的改革又不得不中止。正如国内学者肖辉英和陈德兴所言，这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中止“并不完全是由于改革本身带来一些弊端，而是与当时民德所处的环境，人们的认识以及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都有关系。”具体来讲，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在改革问题上，党内认识不统一，存在着矛盾”；“第二，改革过程中出现比例失调，营私舞弊等问题，引起经济混乱和困难”，如改革中“过分强调化工，电气电子，冶金加工（后改为仪器制造），机器制造等四个部门的发展”；“第三，苏联施加压力，遏制民主德国的经济改革”。所有这些都与政治有关，即便比例失调也是行政命令的产物。总之，“主要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内部对改革有严重分歧，有些人担心经济改革专家和知识分子掌握了党的基层权力，动摇党的地位”。可见，好不容易出现的这次

改革，最终又被政治上的考虑扼杀。昂纳克时期进行的一些改革或调整本身也始终被政治考虑所统摄，其间虽在经济管理方面有其合理性，但主导框架中的政治考虑还是使其坚持了一开始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并出于政治考虑不惜向民众隐瞒国家经济实情，制造国家经济繁荣的假象，如通过贷款来扩充国家福利建设。当这个假象被揭穿后，国家解体，民主德国经济彻底失败。

可见，民主德国经济失败最终归结于政治因素至上，不尊重经济规律而只考虑政治利益。进一步看，“他们没有真正处理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强大经济力量在两种制度较量中的威力和作用。”^⑦ 同比而言，联邦德国就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由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成就来达到政治目的。国内政党是否更替，一切以经济为核心。可以说，民主德国奉行的是政治经济，联邦德国是经济政治，一个政治为先，一个经济为先。在民族统一问题上，民主德国也过于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而不是民族利益，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所在。^⑧ 所以，民主德国计划经济的失败并不笼统在体制本身，而在于不顾经济实际，不尊重经济规律，说到底在于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不顾经济实际”就是由于政治原则领先的缘故。本来，经济体制上的计划和市场就是一对孪生姐妹，其间并不是相斥的关系。计划经济也罢，市场经济也罢，其实谁都离不开谁。唯有二者的交互作用，互相制衡，才能使经济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民主德国由于意识形态介入的缘故，使得其计划经济中融不进市场因素，

⑦ 肖辉英，陈德兴：《德国：世纪末的抉择》，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

⑧ 吴友法，邓红英：《从主张德国统一—寻求民族分离——1949—197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政策的演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最终走向失败。相反，联邦德国经济的成功也不能笼统归入其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其中融了计划因素（国家调控）的缘故。可以说，民主德国经济的受挫也从反面给联邦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教材，提升了其领先的机遇。正如国内学者所说：“民主德国历次求索的失败，都为联邦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和提高社会福利方面显示其暂时的优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⑨此外，50年代大量高素质东德人进入西德，也明显给联邦德国经济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势头，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立后，联邦德国便开始出现缺乏素质较高劳动力的问题，此后进入西德的南欧人，整体教育背景远不如东德人。

三、外部方面原因

战后德国被分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本身就是外部因素所致，它不是德意志民族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各自命运都很大程度与这些外部因素有关。就民主德国而言，长期以来其成就和失败被看成是莫斯科的产物，就充分说明这一点。民主德国经济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也很大程度来自外部，来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来自联邦德国的挑战。总体而言，这个外部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苏联的控制；其二，经互会经济的整体失败；其三，联邦德国经济成就给予的压力。

民主德国建国后，隶属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之列，政治和计划经济模式都来自苏联。

“由于依赖苏联和国家主权没有完全恢复，在制定重要政策时，民主德国积极主动与苏联协商一致。从皮克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民主德国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与苏联协商后做出的。”^⑩实行计划经济伊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以及国家经济结构的建立就是在苏联的首肯下实现的。50年代经济出现问题时，仍坚持原有的做法，经济结构也不做调整，就是当时苏联老大哥的意志使然。60年代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出现成效时，也是由于苏联方面施加了压力才突然中止。在具体经济问题上，也基本是苏联的意志成为主导，尤其是外贸价格的制定。在经互会范围内，民主德国主要是一个出口国，但出口物品的价格要按照苏联的意志来。这就使得外贸价格为了满足苏联的要求往往牺牲了民族经济的利益。如，民主德国出口到苏联的机器产品的价格不能按照市场来定，而苏联出口到民主德国的原油价格则可以按照市场因素来。这就使得苏联原油价格的提升远远超过民主德国机器产品价格的提高。^⑪所以，“在苏联完全控制华沙条约组织成员的情况下，统一社会党实际上没有回旋空间，以解决因不同利益而产生的问题。”^⑫因此，苏联的控制是民主德国经济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便民主德国的最终解体也与苏联密切相关，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开始放弃由来已久的控制并让社会主义国家对自己的事务自主决定。这时，早就由无法偿还的外国贷款支撑的民主德国经济已经无力自救，当1989年动荡期接替昂纳克上台的克伦茨

⑨ 肖辉英，陈德兴：《德国：世纪末的抉择》，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

⑩ 邓红英：《民主德国政策的演变（1949—1990）》，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张炳杰编著：《德国——历史与现状》，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⑪ 张炳杰编著：《德国——历史与现状》，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⑫ 辛蕾：《融入欧洲：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Egon Krenz) 还想用转向市场经济来拯救民主德国经济时, 为时已晚。不仅人民没有了信心, 国家经济实力也无法支撑起这样的一个改革了。

整个民主德国经济发展中, 就官方公布的数据看, 民德经济似乎并没有那么糟, 1950—1970年工业生产年均增长8%, 1971—1989年年均增长5%, 工业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商品的90%。昂纳克时期公布的数据甚至可以使民主德国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国之列。收入方面, 民主德国“人均实际收入每年增长4.5%左右。”^⑬ 但是, 这些数据中有着相当大的水分, 这个水分不是由于统计有误, 而是主要来自经互会国家经济的整体下滑。民主德国如此之高的工业产品出口主要是出口到“经互会”国家(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撇开外贸价格的不合理性因素外, 按照经互会价值和价格体系计算出的增值, 很大程度被世界经济范围内越来越糟糕的整个经互会国家经济所抵消。国际货币系统中, 东德马克的实际贬值就是鲜明体现。可以设想, 如果经互会国家经济没有整体下滑, 民主德国的经济也许不会那么快垮台, 毕竟它是经互会国家中最具经济实力的。

苏东集团中, 民主德国经济还面临着一个特有的问题: 联邦德国。人民不由自主地会将本国经济与联邦德国经济放在一起比较。这给民德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压力。稍有问题, 人口就会移向联邦德国。战后头几年, 东部地区经济的出色表现就是由于投入大量劳力所致。1950年之后民主德国经济发展过

程中, 大量劳力去了联邦德国, 尤其是高素质的劳力流失尤为明显, 这给民德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创。即便最后到了1989年时, 民德经济固然已经很糟, 但还没有遭到让人活不下去的地步。恰是联邦德国的榜样使得民主德国人民不愿意再接受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国家最终垮台。民主德国经济几十年的发展一直在与联邦德国比, 人民这样, 国家也这样。正是这种对比使得民主德国最终放弃努力, 走向垮台。

因此, 民主德国经济走向最终垮台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经济的和非经济的, 内部的和外部的, 不能简单将之归为计划经济本身造的孽。国内有学者认为, 昂纳克上台后在70—80年代初进行的工业体制改革本可以拯救民主德国的经济, 这种观点是有些片面的, 它没有看到影响民德经济的多方面因素。昂纳克的改革是消除了一些不利经济发展的因素, 撇开其还没有引进市场性因素这一点而言, 遏制民德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没有根本改变, 民主德国经济不可能出现令人满意的好转。加上昂纳克根本上还是坚持和强化了政治经济的原则, 没有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 这就根本上排除了民德经济健康发展的可能。因此, 在经互会国家状况整体上没有好转, 自身计划经济原则总体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很难设想, 民主德国经济能走出困境, 也就是说, 不引进市场经济因素的计划经济一般不会奏效, 更何况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很难再让民主德国公民安于自己的经济实验了。

作者简介: 王涌, 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 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⑬ 吴友法等著:《当代德国》,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第365页。

瑞士金融监管实施政策新探

任丁秋

【摘要】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于2014年颁发了新的金融监管实施政策，取代了自2009年以来一直实行的金融监管实施政策。监管实施政策富有战略意义，遵循金融监管战略的核心目标，即保护债权人、投资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实施政策的要点是：加强对金融市场准入、金融市场行为、金融服务供应商以及破产、收购、披露的监管，开展金融监管的国内外合作。瑞士金融监管局内设立了专门的监管实施部门，业务人员已占员工总数的15%。新的金融监管实施政策颁布以来，瑞士金融监管局在反对内部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制止金融中介的非法业务活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关键词】瑞士 金融监管 实施政策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于2014年颁发了新的金融监管实施政策，取代了自2009年以来一直实行的金融监管实施政策。“实施”一词，是指由瑞士金融监管局进行的所有针对违反金融市场法规行为的调查、诉讼以及采取的措施^①。金融监管实施政策的范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支持主管权力机构的监督管理；第二，反对内部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第三，制止金融中介的非法业务活动。金融监管实施政策的目的是解决金融市场出现的问题和缺陷，通过对违法活

动的制裁，使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符合有关的法律规范。

一、瑞士金融监管实施政策的背景

瑞士金融监管局于2009年成立，随后制订了金融监管战略（2009—2012）。瑞士统一金融监管之后进入第一个战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战略目标包括以下7个方面：减少系统性风险和复杂性；增强客户保护；完善法律法规；增强监管的有效性，提

^① finma : Annual Report 2014, https://www.finma.ch/finmaarchiv/gb2014/download/2014/en/Downloads/Finma_AR14_En.pdf, letzter Zugriff am 05.12.2016.

高监管效率；实行持续的市场监管和有效执行；促进国际稳定和国内市场的统一；强化瑞士金融监管局作为监管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其中，执行持续的市场监管和有效的监管实施作为金融监管的战略目标之一。

根据金融监管战略目标，瑞士金融监管局颁布了第一个金融监管实施政策，内容包括 13 项原则，作为实施金融监管的行为规范。它确立了金融监管局关于监管实施的一般原则及内部组织形式，还包含信息对外公开的原则；针对个人的诉讼解释；与检察官、与其他行政机构及自律组织的合作等。

2013 年，瑞士跨入第二个金融监管战略时期（2013—2016）。这一时期的战略目标是^②：

通过审慎的金融监管，加强金融稳定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在业务经营方面，推动一体化、透明度和客户保护；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并有效地进行国内合作；依据监管目标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规范化管理；强调金融监管局作为监管机构的有效性和开放性。

金融监管第二战略期的目标确立之后，2014 年金融监管局便出台了新的金融监管实施政策。与第一战略期的情形不同，关于金融监管实施的内容并未从字面上列为战略目标之一，但是实质上，金融监管实施政策已经完全具有战略意义，操作性的事务已经转移给其他的政策工具来处理。例如之前的信息交流工作，目前已经制定新的交流政策，确立了交流的原则。

这一时期，金融监管实施政策已经具有战略意义，明确实施政策作为工具，遵循和服务于金融监管的总体战略目标。为了增强

监管实施的威慑力，金融监管局已经开始针对严重违反监管法律的个人采取行动，特别是打击证券市场欺诈和内部交易行为，重点是被监管的机构及其雇员，同时关注和发现那些未经批准设立、没有营业执照的金融中介机构，坚决采取有力措施。

二、瑞士金融监管实施政策的要点

瑞士金融监管局于 2014 年颁布的金融监管实施政策有以下要点^③：

1. 对金融市场准入的监管

瑞士金融监管局的实施政策，首先是加强对金融市场准入的管理，对营业执照持有人进行监管。瑞士金融监管局针对严重违法活动，特别是针对严重违反业务经营法律的活动，采取目标行动，促使金融业务部门及从业人员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2014 年全年，瑞士金融监管局针对执照持有人及其雇员和管理层，进行了 128 次初步调查，发布了 35 个指令。瑞士金融监管局还对若干比特币交易进行了初步调查，操作购销比特币的交易平台也需要取得银行业执照。

2. 对金融市场行为的监管

在瑞士证券市场上，金融监管局的实施活动，针对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包括持有营业执照的市场参与者及其雇员乃至管理层。监管局打击严重违反证券市场统一规定的非法行为，打击市场操纵、市场欺诈、内部交易等违法行为。2014 年，瑞士金融监管局针对可疑性市场操纵，开展了 109 次初步调查，

② finma: Strategic Goals 2013 to 2016, <https://www.swiss-compliance.com/wp-content/uploads/2012/12/finma-strategy-2013-2016.pdf>, letzter Zugriff am 05.12.2016.

③ finma : FINMA enforcement policy, 25 September 2014.

有个别立案进入关于市场操纵的诉讼程序。对于银行外汇交易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促使外汇交易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

3. 对金融服务供应商的监管

瑞士金融监管局不仅管理营业执照持有人，同样，对未经批准营业的金融服务供应商也负有责任。金融监管局设立了关于未经批准业务或非授权业务活动的指标，将未经批准的业务活动归属于不符合金融市场立法要求的业务活动。2014年，瑞士金融监管局收到429份关于存在未经批准活动可能性的报告。经过初步调查，大部分情况是没有发现供应商的可疑业务活动；一部分情况是存在某些问题，但经过监管部门下达指令，或自律组织加以管理，可以纠正供应商的错误行为；剩余的一小部分就是存在未经批准业务的情况，只能启动正式的实施或执行程序。除了对机构供应商，瑞士金融监管局还针对严重违反监管法律的个人采取目标行动。

4. 对破产、并购、披露的监管

对于机构或个人无力清偿债务或破产的情况，瑞士金融监管局负责下达和采取措施。不仅是针对依法拥有营业执照的机构或个人，对于无照经营的机构或个人，金融监管局都有权力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措施，并主要是由监管局指定的外部清算人来执行破产程序。2014年瑞士金融监管局处理了第一个人寿保险公司的破产案。

5. 金融监管的国内外合作

在国内合作方面，金融监管局为实现其监管目标，保证与检察部门以及与其他权力机构的合作；在国际合作方面，瑞士金融监管局认为，快速提供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是对全球的一个重要贡献。金融监管局履行

其功能，特别是在关于市场监管和对未经批准业务活动的监管方面发挥作用，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统一。

三、瑞士金融监管实施政策的组织

2009年瑞士金融监管局发布第一个金融监管战略目标时，金融监管实施政策的内容深受当时金融危机形势的影响。金融监管局还没有设立单独的实施或执行部门，金融监管实施的功能是由监管局内部的多个职能部门来承担的。瑞士金融市场监管法也只是创设新的金融监管实施工具，如行业指令，有权力下达指令追回被侵吞的不法利润。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建立统一的监管方法，限制公众对于新的工具会被跨界使用的预期，但很少顾及金融监管实施的战略导向。这一时期，金融监管实施没有独立的机构部门及人员，同时，金融监管实施也缺乏战略目标的指引。

2014年金融监管实施政策出台之后，瑞士金融监管局内设立了专门的监管实施业务部门，有关业务人员也增加到80人，约占金融监管局员工总数的15%。瑞士金融监管局设实施委员会，由执行董事会的成员组成，直接领导金融监管实施业务活动。该实施委员会向监管实施部门布置工作任务，如启动关于未经批准业务与可疑活动的诉讼程序、下达预防性措施、发布关于破产的裁决，以及国际合作等。

四、瑞士金融监管实施政策的工具

瑞士金融监管局有权使用的实施工具范围较宽，包括采取预防措施、纠正违法行为、发布制裁令、行业指令、停业和歇业指令、停止交易指令、公布裁决令、没收非法利润、吊销营业执照、清算和破产，以及观察清单

或观察名单、业务操作信函^④。

采取预防措施。瑞士金融监管局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应对投资者、保单持有人、贷款人面临的风险，或整个金融市场形成的风险。经金融监管局批准成立的调查机构，根据有关监管法令，实施金融监管局下达的措施。如果金融监管局使用某调查机构，且该调查机构已登记注册，金融监管局会在其网站上发布有关该机构的信息。如果发现银行、证券交易商或保险公司行将破产，或存在流动性问题，或不符合资本充足性要求，金融监管局可以采取预防措施。预防措施可以立即执行，但不能长期使用。

纠正违法行为。瑞士金融监管法第 31 条要求，当被监管机构侵犯金融市场法律或者其他违法情况发生时，金融监管局应采取行动。该法授权金融监管局发布裁决，针对存在问题采取措施。相对于该法第 32—37 条关于实施工具的条款，第 31 条只适用于并非严重违反监管法的情形。金融监管局通过调查或实施程序来纠正违法行为。根据被监管对象违法或违规的性质，金融监管局可以责令其调整组织机构或内部程序，暂时或永久地严格管理其业务活动，或者限期改变公司的最高管理层结构。

发布制裁令。根据瑞士金融监管法第 32 条，金融监管局可以发布制裁令，以惩罚被监管个人或团体的严重违反监管法行为。制裁令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官方制裁方式，主要意图在于鞭策市场参与者遵守金融监管法，防止出现一再违法的情形。

发布行业指令。瑞士金融监管法第 33 条关于行业指令的规定，旨在保证金融市场的正确功能，保护贷款人、投资者和保单持有

人。行业指令有预防的效果，目的是防止有关个人和金融市场参与者反复出现或发生相似的违法行为。这种措施的特点是针对严重违反监管法的个体采取目标行动。金融监管局的首要目标是防止未来的损害，而并非惩罚过去的错误。

发布停业和歇业指令。对于未经授权而经营的金融市场参与者，金融监管局发布停业或歇业指令。如果证券交易商的雇员严重违反证券交易法，金融监管局也有权发布停业或歇业指令。这样的指令明确地警告个人不得再从事未经授权的业务活动。金融监管局的首要目标和最终目的都是要提醒投资者当心这些未经授权而经营的个人。

发布停止交易指令。金融监管局发布指令，针对证券从业人员严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责令其暂时或永久不得从事证券交易。证券业高管人员、业务操作人员、证券交易商、从事证券交易银行的雇员等，都会以这种方式受到管制和约束。

公布裁决令。根据金融监管法第 34 条，金融监管局可以公布最终裁决，并点名有关人员，以保护投资者不受非法活动的侵害。公布的文件主要是关于停业和歇业指令，用以限制那些从事未经授权业务活动的特定个人，目的是提醒投资者警惕这样的个人。金融监管法第 22 条规定：除非特殊需要，金融监管局通常不公布个人诉讼程序的细节。

没收非法利润。金融监管局可以没收被监管机构或高管人员通过严重违反监管法所获得的利润。任何没收的资产归联邦政府，不得支付给受损害的一方。金融监管法第 35 条授权金融监管局没收非法利润，保证市场参与者受到公平和同等待遇，以保护贷款人、投资者和保单持有人，加强金融市场的正当

^④ finma : FINMA enforcement instruments.

功能。没收非法利润还有预防效果，可以消除非法得利，恢复合法经营。根据证券交易法，任何个人或法人团体如有严重违法行为，如市场操纵、内幕交易，或不符合披露要求，也可以没收其利润所得。金融监管局不仅有权力没收非法利润，也有权力没收通过违法所避免的损失金额。如果非法利润或非法避免的损失金额难以确切计算，金融监管局采取估算的方法来处理。

吊销营业执照、清算和破产。如果个人和法人团体不再符合授权要求，或者严重违反监管法律，金融监管局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持有营业执照但已不符合授权要求的公司要接受清算。由于公司偿付能力不足，或者在清算程序中确定公司有过度债务负担，金融监管局吊销其营业执照，对该公司启动破产程序，并指定清算人。对于无授权经营的金融市场参与者，金融监管局最经常使用的办法也是吊销营业执照。

另外，可以用于个人或机构的关键工具还有：观察清单或观察名单以及业务操作信函。被监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应符合金融市场法关于正当经营的规定。这些规定旨在保持一般公众对于监管机构的信心，维护金融部门的声誉。

观察清单或观察名单。金融监管局日常收集关于业务经营有问题的、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个人信息，可以将这样的个人列入观察

清单。观察清单只包括特定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是评估有关人员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个人信息。观察清单的法律依据是金融市场监管法第 23 条，以及金融监管局关于数据加工的法规。观察清单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只有那些符合正规业务操作要求的人员，才有资格从事金融机构的战略或行政的管理。

业务操作信函。业务操作信函是金融监管局发送给进入观察清单人员的函件。业务操作信函不是一个裁决令，它所表达的含义是：如果某人可能被任命一个特殊的岗位而本身存在问题，金融监管局有权审查其是否符合要求。如果金融监管局通过审查程序确定某人不符合要求，则有权下达裁决令。

瑞士金融监管实施政策，对我国的金融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仍采取分业监管的模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种分业监管体制适合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状况和整体发展水平。随着金融全球化和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金融业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金融业态的电子化、多样化、综合化发展对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严峻的挑战，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未来改革与创新的方向应是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整体规划阶段性的金融监管战略，并根据战略目标的总体要求，制定金融监管实施政策。

作者简介：任丁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定位的研判 ——多元竞争下的视角

张 凯 徐丽莉^①

【摘要】自2014年成立以来，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总体进展比预期要缓慢。结合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趋势以及目前在欧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发展看，法兰克福的相对竞争优势在于依托中德贸易的清算支付业务。因此，坚持差异化发展，增强清算核心业务，逐步确立欧元区人民币清算中心，再慢慢扩展到贸易融资领域应该是现阶段法兰克福离岸中心市场定位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法兰克福 人民币国际化 离岸市场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分别在世界主要金融和贸易中心布局人民币离岸中心，设立清算银行，以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德国法兰克福率先成为欧元区中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作为欧元以及欧洲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汇集了欧洲的主要金融决策管理和监管机构，也吸引德国、欧洲以及国际各类金融机构落户于此。自2014年成立以来，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清算、支付以及各类人民币债券业务等运行平稳，但总体进展比预期要缓慢。

本文将对中心成立后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并结合2015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调整以及其他欧洲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新发展，分析法兰克福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所面临的竞争挑战，并研判其市场定位。

二、文献综述

从国内现有针对离岸市场的研究文献看，有从人民币在海外的供需角度进行的研究，其中多以香港地区为例。如巴曙松、郭云钊（2002）以香港为例，认为试办人民币业务

^① 本文由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年院系自主项目资助。

的初期阶段应建立“安全有效的渠道，让各种形式的人民币资金在内地政策允许的范围”实现在香港和内地流通目标，同时分析预测离岸市场的效果与风险。巴曙松（2009）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潜力巨大，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则起着试点与示范的作用。在研究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回流问题方面，许心鹏（2009）认为，以香港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利于建立一套海内外人民币流动的完整机制。在离岸中心的布局方面沈卿芸（2006）认为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在金融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构建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金融发展极”不宜过多。在对法兰克福离岸市场的研究中，张凯、李冰溪（2014）分析了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优势与发展定位，得出的结论为首先确立其在欧元区和欧洲的清算和结算中的领导地位为根本，再进一步拓展双向投资和融资市场为辅。

从国外文献成果看，关于离岸市场形成和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Hewson（1982）认为离岸市场快速发展的前提是它们的相对成本优势使得业务开展条件优于国内的同行。Richard Mevich（1989）用定量分析法对几大金融中心进行“制度管制”研究，制度管制越高，离岸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难度就会增加。按照Hampton（1996）的理论，对离岸中心的监管存在漏洞，在监管、政策、财税以及保密四个方面都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这使得离岸市场被洗钱、逃税、转移财产等非法勾当所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的研究表明，如果国际金融机构监管不力，离岸银行因其货币创造乘数较高，在短期资本流动过大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在岸市场泡沫，离岸会引发在岸市场上的通胀效应。

综上所述，有关离岸市场的研究在国内和国外都是学术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从目前

文献研究的结果看，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研究还主要围绕着香港，对美元离岸市场研究也多以最大的伦敦市场为例，而对德国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法兰克福离岸中心成立两年后有必要对目前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和评估，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策略的调整重新研判市场定位并对未来的道路进行规划性研究。

三、发展现状

2014年11月德国与中国及中国香港地区的人民币支付往来跨越了双边支付总额的“10%人民币河界”，达到11.2%。对比2013年4月的数据，人民币占比仅为4.8%。在一年半的时间中，随着德国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人民币在双边支付体系中的使用额增长了151%，其支付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这是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以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业务为例，2015年的人民币结算额接近1.252万亿元人民币，同期增加了1/3。但这之后，法兰克福离岸市场的发展却并未延续之前的增长势头，反而出现了停滞和倒退的状况。2016年8月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双边支付总额的占比小幅下滑到10.9%，同期下降了24%。欧元以80%的比例依然为主导支付货币，港元和其他货币约占9%。

尤其是对比欧洲其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蓬勃发展，德国法兰克福离岸市场的发展状况并不如预期设想。成立时间略晚的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在此期间都后来居上，其中伦敦市场在欧洲与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人民币支付总额占比达到67.3%，巴黎市场占14.1%，而德国只为6.3%，其他欧洲国家合占12.3%。法国与中国的支付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近一半的支付

都是通过人民币来完成的，港元占比约为30%，欧元占比约为20%。^② 伦敦市场在人民币支付使用中表现极为抢眼，从2016年6月的数据看，英国占中国离岸人民币支付金额的24.4%，同期人民币的使用量增幅为7%，超过新加坡成为中国香港以外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而德国的人民币使用量则同期下降了5%。英国与中国内地/香港的支付业务40%以人民币结算，远远超过位于第二和第三位的港元（24%）和英镑（12%）。^③

除了清算业务外，在贸易和投资融资以及各类债券业务中，法兰克福离岸市场在此期间也表现平平。从全球贸易融资业务的数据看，欧元的比例持续增长，而人民币从2014年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在2013至2016年间，人民币贸易融资金额下降了66%，从份额8.66%排名第二跌至4.61%排名第三，居欧元之后。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本应在中欧贸易融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从目前市场发展状况看，这方面的业务开展得并不顺利。

同样在投资融资业务上，法兰克福市场也未能大显身手。在过去的三年间，中国推动“走出去”战略，大量推动在欧、在德的投资和并购。2014年，中国在欧洲投资额突破180亿美元，2015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30亿美元。对欧元区区的直接投资增长37%，从125亿美元上升至171亿美元。意大利因倍耐力（Pirelli）和中国化工（ChemChina）达成的79亿美元交易排名第一。法国在旅游和基础设施行业获得36亿美元投资。中国对德投资额为13亿美元。但在中国对欧投资不断创新高的时期，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投资融资并未推广开来。

四、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新动向

2009年人民币开始跨境贸易结算试点，逐步开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期间已经建立了19个人民币离岸中心，并先后与36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额度为30,325亿元（不含已失效未续签）。2011年12月，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正式实施。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成为其计价货币之一。现在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七大储备货币及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自2015年8月人民币实行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出现了放缓的趋势。

受国内经济下行、美元加息升值通道开启同时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大的影响，境外机构已开始减持在岸和离岸人民币资产。到2016年6月末，累计减持了1.23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减持了8764亿元。虽然2016年二季度出现了小幅增持股票和债券的情况，但贷款和存款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依然继续下降。尤其是在央行加息预期增大的情况下，机构和个人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进一步减少，转而进行美元资产配置。

离岸市场人民币资金存量持续下降，离岸利率自2015年下半年后明显高于在岸利率，且波动幅度增大。这使得离岸市场的资金供给和需求同时出现了问题。较高利率提高了境外融资的成本，减少了对境外人民币的需求，也使得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吸引力有所下降。同时境内外的汇率差价也引发了大量的套利交易，人民币回流规模加大，挤压了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流动性。为打断境

^② 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 SWIFT《人民币追踪》2016年9月。

^③ 人民币国际化：在成为全球货币的道路上稳步推进，<https://www.swift.com/file/29121/download?token=fxdAUGvT>。

内外投机套利，央行实行了一系列监管措施，主动减少了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规模。离岸市场资金短缺使得当地业务出现“无米之炊”的窘境。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波动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恰恰相反，缓慢前行提供了更多的探索机遇、调整思路以及构建基础的时间。“一带一路”的战略推行为人民币尝试区域化使用提供了良机。随着人民币清算交易体系 CIPS 的不断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硬件建设也就更进了一步。

五、来自其他欧洲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竞争

欧洲人民币离岸市场分设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苏黎世、卢森堡五个金融中心。从目前的发展看，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得最迅速，以 24.4% 的市场份额稳居中国香港以外地区的最大离岸人民币市场。它不仅在离岸人民币支付业务上表现抢眼，同时伦敦也利用其作为最大的美元离岸中心的丰富经验，在债券发行方面大显身手。2015 年 10 月中国央行在伦敦发行 50 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成为首次在中国以外地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央行票据。2016 年 5 月中国财政部在伦敦发行 30 亿元人民币国债，成为中国首次在香港以外地区发行离岸国债。伦敦离岸中心也在积极争取以人民币计价的丝路债券的发放。法兰克福在此方面就逊色不少，除了中心成立之初发行的几支债券便没有后续的行动了。一方面必须承认法兰克福作离岸中心的经验与实力和伦敦还是有差距的；另一方面，德国和英国在金融方面的监管程度也是不同的。德国对于债券发行

的审批和监控都是十分严格同时程序较为繁琐，这对有意在欧洲市场上发行债券的中方机构来说是个消极信号。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收购和投资海外企业进行人民币直接投资也是离岸市场主要的融资与投资业务。并购投资在欧洲的企业投资路径选择往往是跟随“合理避税”这根指挥棒的。常用的三种路径有着不同的缴税方案：一是从中国直接对德投资，需中国缴纳 25% 公司盈利税同时在德国也要征收 10% 的股东分红资本收益税；二是通过先在香港设立分公司，再由分公司对德投资，由于德国和中国香港还未签订双边税务协定，因此需在德国缴纳包含团结税在内的资本收益税，共计 26.375%；第三种方式是先在香港设立分公司，由香港分公司在卢森堡设立子公司，再由这个子公司收购德国企业，由于卢森堡税务体系不对外国投资者征收分红预提税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对在欧盟内部的子公司体系实现免资本所得税，所以这种投资并购的方式最受欢迎。

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卢森堡进入欧盟的外资投资占欧盟整体的三分之一。卢森堡在全球直接投资接受国排名第三。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即使收购的对象是德国公司，但最优避税投资渠道却是经香港转卢森堡再转德国。三一重工联合设在香港的中信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正是通过第三条路径实现的。

除了在投资收购方面占有极大优势外，卢森堡在离岸人民币债券“点心债”^④的发行和交易方面也具有优势。截至 2016 年上半年，卢森堡上市交易的点心债共有 81 只，总

④ 香港人把粤式点心的概念挪用到金融市场上，创造出“点心债”这一可爱的专有名词，用来指称近年兴起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同粤式点心颇受茶客青睐一样，自从 2007 年国家开发银行首发这种以人民币定价、人民币结算的债券以来，所有的点心债都获超额认购，被一抢而空。

规模为 335 亿人民币。卢森堡已经成为亚洲之外点心债发行的第一大离岸中心。另外，卢森堡是全球第二大投资基金聚集地，欧洲 27% 的投资基金汇聚于此，居欧洲各国之首，而德国占比仅为 14%。卢森堡投资基金持有人民币计价资产规模为 1743 亿元人民币，卢森堡基金约占投资于中国内地的全球资产的 1/3。卢森堡对中国业务极为重视，政策上也灵活配合，力图最大限度吸引中资投资者和人民币的各类业务落户于卢森堡。显而易见，在人民币投资基金、债券以及并购投资方面，法兰克福与卢森堡相比是处于劣势的。

2015 年 1 月成立的苏黎世人民币离岸中心是目前欧洲五个离岸中心成立最晚的。瑞士是欧洲首个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在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是中欧贸易的重要桥梁，中瑞两国在金融领域中的合作潜力巨大。苏黎世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提供完善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在金融创新领域结合人民币推出更多的人民币产品，尤其在财富和资产管理和大宗商品交易领域有着突出的优势。依靠着可靠的法律体系和严密的监管规则，得到瑞士苏黎世离岸中心认可的人民币资产在海外更具吸引力和可信度。

巴黎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人民币存款达到 300 亿元，贷款规模 280 亿元，位居欧洲第二。法兰克福离岸中心虽最早成立，但人民币存款只有 120 亿元，贷款 150 亿元，整体人民币业务规模要远远小于巴黎。巴黎的人民币业务侧重于服务实体经济，主要和贸易融资相关，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与非洲的交易。同时中法双边贸易结算中采用人民币结算的比重迅速提高，达到 50%。欧元区超过 40% 以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在法国完成。巴黎的另一个优势领域为公司债的发行，其市场规模为欧洲第一。法国的企业债总额占到欧洲总量的 33%，英国占 27%，德国仅占 10%。另外巴黎还拥有欧元区内最大的股票市

场——泛欧交易所，其市值占欧元区的 41%，两倍于德国证券交易所的市值。

六、新形势下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定位

综合分析其他在欧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业务优势，可以看出，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正处于一个多元竞争的局面中，每个中心都在暗中较量，力图争夺人民币在欧洲更多的业务。英国脱欧后，在英国的众多金融业主体开始筹备进入欧盟市场的替代方案。这使得这场较量中又增加了吸引来自英国金融业的主体。今后伦敦是否会彻底退出人民币和欧元相关的产品业务也为竞争增添了更多的利益砝码。如何扬长避短，发挥自身优势，适应人民币国际化当前的节奏成为今后法兰克福人民币离岸中心发展规划的中心。

法兰克福离岸中心的发展根基是中德两国的贸易。作为世界两大贸易强国，贸易中的人民币支付比例是否能从根本上提升关系到法兰克福中心未来在欧洲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目前双边支付中人民币占比仅为 10.9%，还依然是以欧元为主导支付手段的状况实在不能令人满意。这种局面主要归因于在中德贸易中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比较低端，在贸易中的定价权掌握在德方手中。在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大的情况下，德国进口商自然地更多地使用欧元作为交易货币。因此，中国企业可以加大提升出口产品层次，争夺更多的定价权，以人民币交易折扣引导德国进口商更多转向人民币支付。加强法兰克福作为人民币在欧洲和欧元区的清算支付中心的地位，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后，欧元与人民币清算业务是否能逐步归总到法兰克福，这对今后法兰克福中心的发展十分重要。

今后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加快，离岸市场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中的作用会相对减弱，

因此现阶段如果能在人民币海外的其他领域中确立一定的优势地位，将抢占人民币离岸市场上的先机并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这种优势。从目前在欧洲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发展看，德国不可能也不必与其他中心在投资融资、

债券等领域进行更多的竞争。坚持差异化发展，增强以贸易为依托的清算核心业务，逐步确立欧元区人民币清算中心，再慢慢扩展到贸易融资领域应该是现阶段法兰克福离岸中心市场定位的最佳选择。

作者简介：张 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徐丽莉，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德国与二十国集团（G20） 及中德两国在 G20 中的合作^①

李倩瑗

【摘要】2017年7月7日至8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德国汉堡举行。鉴于G20的“三驾马车”机制和中德经济治理理念的相似之处，汉堡峰会将延续2016年中国杭州峰会的重点议题，并在具体措施上继续推进。笔者从全球治理的概念和体系治理中心模式的角度出发，论述德国历年来在G20机制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并从全球治理指数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德两国在全球机制维护中力图发挥一定作用。且中德两国在结构性改革和发展问题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参与G20机制等方面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关键词】G20机制 结构性改革 共享增长

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领导人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2017年由于德国大选，G20峰会提前于7月在德国汉堡举行。中德两国将在“三驾马车”制度^②（2002年新德里会议确定建立“三驾马车”治理机制）下合作。本届峰会主席国在上届和下届主席国的支持下，负责同各成员充分沟通协商并制定全年峰会筹备路线图，包括峰

会和重要筹备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峰会议程设置等，并确保前后峰会的连续性框架下，合作致力于将G20从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应急机制转变为全球金融和经济合作的论坛。

笔者从全球治理的概念和体系治理中心模式的角度，论述德国在G20机制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并从全球治理指数分析中德两国在维护全球治理机制中力图发挥一定作用，

① 本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刘立群教授指导，并参考殷桐生教授2016年9月27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研究生论坛上所做的题为《G20杭州峰会的经济蓝图及德国的态度》的报告。本文错漏之处由作者自负责任。

② 金钟夏等著：《中国与G20：全球经济治理的高端博弈》，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证明在结构性改革和发展问题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参与 G20 机制等方面有较大的合作空间。德国重视结构性改革的特点使得中德两国在这两届二十国集团中有了高度合作契合点，德国特别重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非洲的合作，这也将是德国 2017 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和体系治理中心模式

1. 全球治理的概念

G20 目前是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平台之一。很多中外学者都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过阐释，笔者在此引用中国学者俞可平和蔡拓的定义。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认为：“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③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蔡拓教授认为，全球治理是指在全球化时代受到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影响的人们，以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意识为主要思维方式，就共同面临的公共事务进行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而达成的原则、制度、规范和决策程序等。^④

有新兴经济体参与的 G20 在主导世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应急机制转变为全球

金融和经济合作的论坛。其主要议题是金融事务，同时包含广泛的、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相关的经济问题，还讨论其他热点问题如渥太华会议上关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行动的计划、安塔利亚峰会关于反恐的声明、圣彼得堡峰会上美俄关于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达成一致、杭州峰会中关于巴黎气候大会和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议题。所以，G20 是目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2. 体系治理中心模式 (The Model of Systemic Hub Governance)

体系治理中心模式这一概念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G20 研究中心主任约翰·J·柯顿 (John J. Kirton) 提出。他认为，二十国集团通过运作层次的整体升级，所涉政治事务和全球治理内容范围的扩大，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体系中心。二十国集团能广泛、有效、合理地开展全球治理，首先是因为不断蔓延的经济金融动荡已波及所有成员国，使各成员国均表现出一种新的、超越国界的共同的脆弱性。除此之外，全球治理中心向新的二十国集团转移的原因有：1) 传统的多边组织和较新的多边机构无法独立应对此类经济金融动荡；2) 七国集团成员国以外的国家的相对能力和民主程度在不断提升和加大；3) 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在国内政治管理、资本、连续性、能力和承诺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二十国集团成为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网络的中心。^⑤

他认为，二十国集团的概念、建立和前期运作得如此成功，归因于体系治理中心模式。二十国集团是国际体系内重要国家对互

③ 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20—32页。

④ 蔡拓：《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视角与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95—96页。

⑤ John J. Kirton: 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p.42-45. (相关内容还可参见郭树勇翻译的中译本第19页)

相联系的、复杂的、不确定的一连串动荡和共同脆弱性的世界做出的回应。^⑥ 二十国集团集合了全球占主导地位、内部均衡的国家，并且拥有灵活性和类似全球治理网络中心的横向、纵向联系。这个领导中心以其敏锐性、合法性、及时性和对称性的行动立足于日益全球化而又危机四伏的世界。G20 由七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其他七个重要经济体（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阿根廷）以及欧盟组成，杭州峰会上还邀请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列席会议，其体系治理中心地位显而易见。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将不同的、国际体系内重要国家集合起来，让各国首脑、部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紧凑型集团的非正式对话。

二、德国与二十国集团

德国作为七国集团（简称 G7）和二十国集团的创始成员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建构作用。德国重视 G20 框架下的全球经济对话，并将对话内容延伸到经济及金融监管等经济议题之外，在推动 G20 的建立和发展中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99 年 6 月，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德国科隆举行。七国集团财长在德国科隆峰会上提交给七国集团领导人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我们将努力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具有系统重要性国家之间非正式对话的新机制，以使得现有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⑦ 1999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国际体系内最重要的 19 个国家和欧盟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齐聚柏林，首届二十国集团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在德国柏林正式召开，这是二十国集团的创始会议，标志着 G20 机制的诞生。柏林创始会议在 G20 机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标志着 G20 机制的诞生，而且开创了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新模式。

2004 年 11 月，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柏林召开。柏林会议在专业领域是非常成功的，在相对严格的金融监管核心领域表现出色。在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协作的议程设定和政策调整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包括汇率、债务重组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此次会议的主席为二十国集团创始人之一、德国前财长汉斯·艾歇尔（Hans Eichel），他表示：“二十国集团尚未完全挖掘潜力——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在未来某个时候看到各国首脑齐聚二十国峰会。”^⑧ 艾歇尔的议程设计得到了其他集团创始人如时任加拿大总理的保罗·马丁（Paul Martin）等四位创始人的支持。二十国集团五位创始人的出现以及德国集中在专业领域的议程设置，使得此届柏林峰会取得了巨大成功。

2007 年 6 月，德国担任八国峰会主席国期间，总理默克尔推动“海利根达姆进程”对话机制即“G8+5”对话机制，与墨西哥、巴西、南非、中国和印度启动为期两年的对话，将 2005 年诞生的“G8+5”机制化。德国所推动的“G8+5”进程不光是构想和建议，而且落实在峰会机制上并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担任秘书处的工作。

2009 年 9 月匹兹堡峰会召开期间，主席

⑥ 约翰·J. 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郭树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9页。

⑦ Report of G7 Finance Ministers to the Koln Economic Summit, 1999, <http://www.g8.utoronto.ca/finance/fm061999.htm>, letzter Zugriff am 28.09.2016.

⑧ 约翰·J. 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郭树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4页。

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同布朗、萨科齐以及默克尔进行会晤，发布了关于伊朗问题的公开四方声明。在该声明中，四位领导人谴责了伊朗的核计划，并标明四国将发起新一轮制裁。此时，二十国集团已间接地进入传统的政治安全领域。峰会声明第九条提出将继续对默克尔提出的“可持续经济活动宪章”进行研究。根据该“宪章”，通过包括操守、诚信和透明度等在内的“可持续经济活动核心价值观”，并将为“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提供支持。^⑨该文件附件对可持续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观做了详细说明，这也与德国实施的主要经济政策、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等相一致。

在2010年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上，美国希望联合其他国家施压，使人民币升值。而德国也认为人民币应该进一步升值，但应分阶段逐步进行。此外，美国还批评中、德等贸易出超国家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意图设定规则加以限制，即今后所有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不应该超过GDP的4%。对此德国表示反对，默克尔认为：“仅仅用一个指标无法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平衡性，我们需要用多个标准予以衡量，应主要通过全球经济增长来解决经常项目失衡问题。”美国这项提议最终并未获得通过。^⑩

三、中德两国在 G20 中的合作空间

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杭州召开。2017年7月，这一峰会将在汉堡

召开。作为现任和候任主席国，全球都对中国和德国在二十国集团表现的关注度提高，相关议程设置也备受关注。

本文着重从全球治理指数、结构性改革和重视公平即重视发展政策等方面阐述中德两国的合作和在峰会中的指引作用，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以下简称“杭州峰会公报”）“杭州共识”中关于经济治理“综合施策”和“包容发展”的原则。总体来说，中德两国在经济治理道路的选择上有一定共识，并且都对在G20框架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有建构的意愿。德国2017汉堡峰会将延续杭州峰会的重点议题并在具体措施上继续推进。

1. 全球治理指数

中国和德国都希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全球治理指数这一量化标准可以体现各国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在全球机制创设、全球机制维护、全球决策参与和全球责任承担等几个方面的表现。“全球治理指数”（全称“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指数”，英文为State's Participation Index of Global Governance，简称SPIGG指数）项目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于2014年启动。该指数系全球首次以指标体系的方式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状况展开评估。其中全球治理指数的总分和分项得分前25位的国家包括了G20除欧盟外的19国，对研究G20机制和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⑨ G20 (2009): Leader's Statement – The Pittsburgh Summit, http://www.g20.org/Documents/pittsburgh_summit_leaders_statement_250909.pdf, letzter Zugriff am 08.10.2016.

^⑩ G20-Gipfel in Seoul: Merkel und Obama scherzen ihren Streit beiseite,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g-20-gipfel-in-seoul-merkel-und-obama-scherzen-ihren-streit-beiseite-a-728647.html>, letzter Zugriff am 08.10.2016.

表 1 全球治理指数：2015 年总分和分项得分^①

排名	国家	全球机制 创设	全球机制 维护	全球决策 参与	全球责 任承担	总分	与上一年的 排位变化
1	美国	518.53	234.50	704.83	196.94	1654.80	0
2	英国	438.93	247.53	519.11	185.56	1391.14	2
3	法国	376.38	290.59	516.42	145.14	1328.53	-1
4	中国	282.25	234.17	503.14	136.90	1156.46	1
5	俄罗斯	295.43	256.54	466.25	118.97	1137.20	-2
6	德国	233.27	265.05	330.39	132.11	960.82	1
7	印度	335.29	226.33	224.82	136.52	922.96	-1
8	加拿大	317.35	215.68	186.79	111.53	831.34	8
9	日本	88.22	195.27	348.76	193.65	825.90	0
10	意大利	176.85	226.06	213.11	97.45	713.47	-2
11	巴西	265.41	223.44	169.94	45.18	703.98	8
12	韩国	106.45	193.48	218.14	101.88	619.95	0
13	阿根廷	239.42	156.19	164.91	22.95	583.47	10
14	印度尼西亚	203.20	148.82	130.00	87.05	569.07	6
15	丹麦	174.12	209.39	29.34	144.32	557.17	-2
16	澳大利亚	98.71	159.00	166.96	125.03	549.69	6
17	土耳其	131.00	200.94	107.77	83.40	523.11	1
18	埃及	111.13	177.67	122.54	98.35	509.69	-4
19	波兰	94.80	234.96	98.56	74.21	502.52	-8
20	墨西哥	138.56	192.70	149.42	19.00	499.67	-10
21	南非	135.89	155.81	118.46	89.45	499.61	0

①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全球治理指数2015年度报告》，2015年12月，http://psi.ecupl.edu.cn/spigg/2015/SPIGG2015_finale.pdf，第8页和第10—11页，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年11月9日。

续表

排名	国家	全球机制 创设	全球机制 维护	全球决策 参与	全球责 任承担	总分	与上一年的 排位变化
22	哈萨克斯坦	110.46	171.59	52.27	80.07	414.38	2
23	沙特阿拉伯	114.80	145.52	101.02	27.41	388.75	2
24	以色列	69.77	106.02	138.26	72.36	386.42	-7
25	马来西亚	64.74	180.89	34.39	78.96	358.98	-10

从上表来看，德国的全球治理指数排在第六位，仅次于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参与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并还希望继续扩大这一作用。在分项得分中，德国在全球机制维护中表现出色，仅次于法国排位第二（见表1）。中国是唯一跻身前五的非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并在每一个一级指标的排名都比较靠前。中国不仅是全球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也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履行全球性的责任者，并参与或主导建立若干全球性的机制如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以及已投入运作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亚投行”）等。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仍旧是在制度化的框架内实现的，在寻求变革的同时并不颠覆或抛开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⑫ 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和德国都希望在制度化框架内实现。所以说，G20机制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对中德两国在全球机制维护、决策参与和责任承担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

2. 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德之间的合作空间

在振兴全球经济的方式上，G20国家间存在分歧：以美联储、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为代表（还包括刚刚决定脱欧的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认为“量化宽松”更有利于刺激全球经济；以中国和德国为代表则认为“结构性改革”更有利于使得全球经济回暖。两者之间一直在进行激烈的博弈，试图影响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向。^⑬ 中国和德国都更加倾向于发展实体经济和推动结构性改革。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认为：“中国和德国在G20框架下的良好合作对这个机制的成功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中，中德双方有很多共同点。”^⑭

中德两国分别担任2016年和2017年G20轮值主席国，以此为契机在议程设置中强调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其重要性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2016年7月，在中国成都举

^⑫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全球治理指数2015年度报告》，2015年12月，http://psi.ecupl.edu.cn/spigg/2015/SPIGG2015_finale.pdf，第6—7页，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年11月9日。

^⑬ 辜学武：《G20杭州峰会：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强有力动力》，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9期，第9页。

^⑭ Xinhua: China seeks more cooperation with Germany under G20 framework: Chinese ambassador, 2016.08.30,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hangzhoug20/2016-08/30/content_6636137.htm.

行的 G20 财长会议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表示结构性改革和自由贸易是“必要的”^⑮。在书面声明中，拉加德指出结构性改革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广泛分享利益的重要一环，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显示“设计良好的结构性改革”可以促进短期和长期的成长，也能令“成长更加地包容”。

杭州峰会首次提出以创新和结构性改革推动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取代货币金融刺激经济的短期方针。并就此达成共识写入公报：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战略对于促进实现共同增长目标同样重要。结构性改革是本届峰会的一项重点议题，也是 G20 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的关键之一。结构性改革对提高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生产率、潜在产出以及促进创新增长起到关键作用。^⑯峰会制定了由一套指标体系组成并将继续逐步完善的量化框架，以帮助监测和评估各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努力、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这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指标包括：跨境贸易指标、创业指标、研发总支出占 GDP 比重、投资占 GDP 比重、就业率、基尼系数、劳动生产率等。^⑰《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也确认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结构性改革首要目的是整合资源、提高利用率、促进发展。但欧美主要还是进行货

币政策调整的短期治理应对。这是两种不同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其调整和治理的工具也不尽相同。金融海啸后法德领导人发起改造既有的国际金融体制、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 2”的倡议，学界则开始反思“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弊端。^⑱德国是“莱茵模式”的典型代表，与英美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着极大不同。德国政府也十分重视推动结构性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与中国杭州峰会的议题设置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取得这一共识，中国和德国起了很大作用。随着这个“结构性改革”路线的执行和深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可能慢慢被稳健的财政政策、宽松的税收政策和严格的债务政策所取代^⑲。

联邦德国从建国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第一次经济危机前基本不存在结构问题，但此后结构问题便越来越严重，只是碍于它的全局性和复杂性，历届政府并未在此方面比较大的举措，直到施罗德执政时期提出的《2010 议程》才把结构问题放在了较为适当的位置。2005 年，默克尔领导的大联盟政府拟定的《联盟条约》的经济政策部分多处曾出现“结构”两字，说明大联合政府已感觉到结构问题的严重和普遍，并准备动用行业结构调整工具、市场调节工具、市场要素调节工具和国家财政干预等手段来实施结构性改革。^⑳

⑮ 《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结构性改革》，2016年7月24日，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6/07/160724_china_g20_chengdu，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年10月20日。

⑯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2016年9月5日，http://www.g20.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06_3392.html。

⑰ 《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2016年9月8日。

⑱ 袁鹏：《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42页。

⑲ 辜学武：《G20杭州峰会：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强有力动力》，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9期，第8—11页。

⑳ 殷桐生：《德国大联盟政府经济政策剖析》，载《国际论坛》，2006年，第4期，第64—68页。

2016年2月,上海财长会议公报着重强调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主席国主动推动并得到G20国家广泛支持的倡议。很多与会国家代表指出,仅靠货币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推动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而且结构性改革反过来还能使短期的需求侧政策更加有效。这次会议将二十国集团对结构性改革的关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在参加2016年2月在上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时对中国将结构性改革作为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表示欢迎,并承诺2017年德国担任主席国时将会继续就这一话题深入探讨。他认为现行系统中对经济的刺激已经足够。^⑲默克尔在G20峰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对杭州峰会议题设置这样评价:“我认为中国在担任主席国期间把重点放在不同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上又对又好。”^⑳

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梅斯纳认为^㉑,G20成员国正同时面临着四种类型的结构性改革:一是搭建稳定框架条件,促进增长和就业;二是需要在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实施数字化新战略;三是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必须保持稳定和透明,例如打击避税和危险的投机性泡沫;四是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挑战需要G20成员国大规模减排、提高能源生产率并以循环经济为方向可持续地

发展经济。

G20确定的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其中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鼓励创新、改善基础设施等九大优先领域:1)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作为首个非欧盟国支持欧洲投资计划,中国通过丝路基金投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另外,中国正式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股东。同时,德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也成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股东。这些都有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对接。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研究员罗尔夫·J.朗哈默尔(Rolf J. Langhammer)2016年3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德G20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合作》^㉒中强调了中德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的重要性,并指出这一合作主要集中在生态保护、社会经济和金融等三方面,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这一投资合作搭建平台。2)中德两国对创新合作也十分重视:2014年《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第三部分专列了两国的创新合作,深化工业、城镇化及农业等领域的创新合作,深入开展在研发领域的创新合作,扩大始于2011年在中德创新政策平台框架下的对话,着眼基建、环保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加强在交通领域的创新合作,通过中德气候变化工作组以及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等非正式论坛推进环保领域的创新工作,

⑲ Schäuble warnt vor Konjunkturprogrammen, 26.02.2016, <http://www.faz.net/aktuell/wirtschaft/konjunktur/g20-staaten-schaeuble-warnt-vor-konjunkturprogrammen-14091707.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1.10.2016.

⑳ Pressestatement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anlässlich des Gipfeltreffens der G20-Staaten am 4. September 2016, 04.09.2016,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Mitschrift/Pressekonferenzen/2016/09/2016-09-04-statement-bkin-g20.html>.

㉑ 《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梅斯纳:世界经济将会实现深度变革》,载《经济日报》,2016年09月02日,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609/02/t20160902_15508190.shtml.

㉒ Rolf J. Langhammer: Chinese-German G20 Cooperation for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http://www.global-economic-symposium.org/about-the-ges/council-of-global-problem-solving/recommendations/chinese-german-g20-cooperation-for-sustainable-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letzter Zugriff am 28.10.2016.

在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及就业政策等领域共同寻求应对老龄化等本国和全球性问题的创新措施。^{②5}2016年《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中谈到继续在中德创新平台框架下深化创新对话,不断加强和丰富中德在电动汽车、清洁水、生命科学等创新平台下的合作。^{②6}经历了欧债危机,德国比以往更加意识到创新对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将深化德国模式重视科技创新的特点,德国将按照“欧洲战略”所倡导的灵巧增长目标以及通过实施“数字欧洲”等项目,强化和引领本国在后危机时代的灵巧型经济增长。^{②7}

3. 中德两国在发展问题和新兴国家参与G20机制等方面的共识

首届在德国柏林正式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央行行长会议便确立了“惠及各国的包容性增长”的原则。“杭州峰会公报”的“杭州共识”中也提到了“包容发展”^{②8}的原则: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共享,满足各国和全体人民尤其是妇女、青年和弱势群体的需要,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消除贫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不让任何国家、任何人掉队。这一原则也将发展政策和平等原则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成为G20杭州峰会上的重要议题之一。

杭州峰会是目前为止最多发展中国家参与G20机制的一次峰会。包括乍得总统代比、

埃及总统塞西、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老挝国家主席本扬、塞内加尔总统萨勒、泰国总理巴育等,这些国家参与峰会可以更好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因为它们在发展中国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乍得是非洲联盟的轮值主席国,塞内加尔是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老挝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轮值主席国,泰国则是7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②9}。而埃及与哈萨克斯坦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此外,杭州峰会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地位,发起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此届G20峰会最大创新之一是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其框架并制定了《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③0},其中谈到关于发展问题,G20关注工业化问题特别是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相关情况,这有助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其第九条(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G20正在探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以可持续、包容和透明的方式向工业化转型的方法,帮助其促进增长,创造就业,推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③1}

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化与世界经济项目主任克劳迪娅·施穆克尔(Claudia Schmucker)表示:“中国和德国面临着许多类似的

^{②5} 《中德合作行动纲要》,2014年11月18日。

^{②6} 《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2016年06月13日。

^{②7} 丁纯,李君扬:《试析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社会的表现——兼议德国模式的作用及其前景》,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28页。

^{②8}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2016年9月5日。

^{②9} 阮宗泽:《发展中国家是G20杭州峰会上的“亮丽风景”》,2016年9月2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902/c1003-28685058.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年10月23日。

^{③0} 《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2016年9月6日。

^{③1} 同上。

问题，杭州 G20 峰会的议题多数都将会在 2017 年德国 G20 峰会中得到延续。可持续增长议题将不仅是此届 G20 峰会的主要议题，也将是 2017 年德国 G20 峰会的主要议题。”德国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ustainability Studies）高级研究员孔安德（R. Andreas Kraemer）表示，德国希望全球携手应对发展问题，当下经济环境及全球问题也对德国将要举办的 G20 峰会提出挑战，包括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加剧，全球气候变暖等。在孔安德看来，G20 推进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平衡高速经济发展需求和有限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③②}

在发展政策方面，德国与中国都致力于让更多非洲国家参与到 G20 中，德国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支持者，希望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搭建 G20 和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合作桥梁。联合国系统职员学院可持续发展知识中心（UNSSC Knowledge Cent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也位于德国。

德国也非常重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共享增长”是默克尔对于杭州峰会的最重要目标的表述。9 月 5 日，G20 杭州峰会结束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在联合记者会上，两人均谈到了这一议题^{③③}。默克尔认为，《非洲协议》（Compact for Africa）在解决移民 / 难民问题上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她就此举例：“虽然非洲人口数量是欧盟的两倍，但欧盟内部的直接

投资是整个非洲的十倍，而且非洲的平均年龄也远低于欧洲。由此便可看出加大向非洲各国进行私人投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且仅靠国家发展援助是根本不够的。德国政府也需要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现在或即将）与德国在难民问题上有紧密合作的国家进行合作并制定相关的行动纲领。默克尔强调，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积极因素，与不平等现象做斗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所有国家都应该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包括发达国家、门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安全紧密联系，此次会议强调发展应该是让所有民众获益的发展。

联邦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在记者会上也就此话题和德国 2017 年 G20 会议议题设置做出了表态^{③④}：将改善非洲的投资环境，并在德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起草《非洲协议》。这将帮助非洲国家与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就增加在非洲开展投资活动等问题进行协商并签署相关协定。这也符合“气候金融”“绿色金融”和这次杭州峰会中双方都特别强调的经济发展更多惠及门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原则。

德国政府在这一议题上的重视也可从默克尔 2016 年 10 月为期约一周的非洲之旅中看出。默克尔 10 月 9 日至 14 日访问非洲的马里、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等国并在德国接见了来访的尼日利亚和乍得的国家领导人，并表示非洲在德国举办的 G20 中将作为“未来的大陆”（Zukunftskontinent）发挥重要作用^{③⑤}。

③② 赵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议程，中国展现出引领世界发展的潜力》，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08 月 08 日。

③③ Pressestatements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und Bundesfinanzminister Schäuble zum Gipfeltreffen der G20-Staaten am 5. September 2016.

③④ Ebenda.

③⑤ Afrika - wichtiger Partner der EU, 14.10.2016,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 Artikel/2016/10/2016-10-13-merkel-afrikareise.html](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6/10/2016-10-13-merkel-afrikareis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20.10.2016.

2016年10月11日，默克尔在访问非洲联盟的讲话^{③⑥}中提出要在2017年G20汉堡峰会上提出一个与非洲相关的全面的提案，德国-非洲商业峰会（German African Business Summit）也在筹办中，预计将在内罗毕召开。

10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了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和IMF和世界银行2016年秋季年会。7日上午，2016年G20主席国中国和2017年G20主席国德国的财长楼继伟与朔伊布勒举行联合记者会。^{③⑦}朔伊布勒表示，向非洲投资将是德国担任主席国的工作重点之一，其中《非洲协议》就是这个框架下的计划之一。

四、结论

根据全球治理指数（表1），中国和德国在全球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并且其影响还有上升的趋势。创建治理体系的著名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曾经提出，在一个权力不断经历着重新配置——对外向超国家实体转让，对内向次国家集团转移——的世界上，就没有政府的治理如何实现已经势在必行。^{③⑧}G20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并且根据体系治理中心模式的概念，全球治理中心正逐渐向G20机制转移。G20机制从短期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

型，需要更好地发挥G20“三驾马车”机制，充分发挥现任主席国和前后任主席国的联动合作机制，保证其议程和政策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德国的G20政策和担任主席国的各方面表现与杭州峰会达成成果的推进和各行动纲领的落实情况可谓息息相关。

中德在此方面的合作也显得尤为重要。2016年6月中德政府进行第四轮磋商。磋商过程中也讨论了双方在G20框架下的合作，《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中有关于中德双方在G20框架下合作的相关内容（详见声明第5条）^{③⑨}：中德将加强在G20框架下的沟通合作，共同推动两场峰会取得成功，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双方将同其他成员一道，努力通过结构性改革、创新等方式提升增长潜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包容、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1. 中德两国在经济治理道路选择方面的相近之处决定了其在G20峰会会议设置中更倾向于强调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总体来说，中德双方在经济治理道路选择上具有共识，并且双方也对在G20框架下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有建构的意愿。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博士认为，德国很可能拥有发达国家中与中国最为接近的发展观，这首先体现为一种由经济发展推动社

^{③⑥} Rede von Bundeskanzlerin Dr. Angela Merkel bei der Übergabe des Gebäudes für Frieden und Sicherheit an die Kommission der Afrikanischen Union am 11. Oktober 2016 in Addis Abeba, 11.10.2016,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Bulletin/2016/10/118-1-bk-uebergabe-gebaeude.html>, letzter Zugriff am 16.10.2016.

^{③⑦} Black, Jeff/Buergin, Rainer:

Germany Takes on G-20 Growth Challenges With Dive Into Detail, October 7, 2016,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10-07/germany-takes-on-g-20-growth-challenges-with-dive-into-detail>, letzter Zugriff am 20.10.2016.

^{③⑧} 詹姆斯·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③⑨} 《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2016年6月13日。

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工具理性。德国从德国经验出发为欧洲经济开出的药方着眼于结构性改革和紧缩的财政政策，迥异于南欧国家奉行的刺激性财政政策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中国和德国的经济表现也都相当依赖对外贸易和对外出口，并且两国都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高额的外贸盈余而在国家层面上饱受攻击。^{④①}

德国应对欧债危机的道路选择与中国G20杭州峰会的重点议题设置是基本一致的。德国重视制造业、依托出口为经济发展重心和坚持平衡财政和创新推动的增长方式。随着欧债危机期间和其后外围条件的嬗变和内部的逐步应变德国经济增长动力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转变：转向追求以出口引领为主、兼顾内需、突出创新作用、平衡发展的综合增长路径。^{④②}

2017年汉堡峰会也会继续就这一议题进行讨论，包括结构性改革量化标准的实施情况和重点领域的具体行动纲要等，杭州峰会G20“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工作组”制定的《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中确立的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及获取教育与技能、鼓励创新、改善基础设施、促进财政改革、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改善并强化金融体系、增强环境可持续性、促进包容性增长）和量化框架即指标体系都为汉堡峰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7年担任G20峰会主席国的德国同样将结构性改革作为核心议题之一，并进一步优化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指标和评估体系。

2. 中德两国在发展政策和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合作方面也有较大合作空间。

从全球治理指数表格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有上升的趋势，如中国和印度排在前十名，巴西、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三国与上一年的上升幅度为6—10名。尤其金砖国家这样的新兴大国更是随着国力的提升，开始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寻求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在全球责任承担方面，像中国、印度与俄罗斯这些新兴大国的表现甚至要超过西方国家。所以，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是推动全球治理的助推器。

G20机制属于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交流平台。在发达国家中，德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很特殊，它更多起到缓和南北矛盾的作用。南北矛盾和东西矛盾的共同根源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问题和观念问题。要解决好世界各种矛盾，关键是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秩序、进行全球治理，其实质内容就是尽可能解决好各种利益矛盾。^{④③}G20机制在协调南北方国家利益矛盾特别是协调成员国经济和金融政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对推动全球治理和南北方国家对话等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而中国和德国作为“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中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的代表，在G20机制中的合作本身就是“南北合作”的典范。

全球治理的主要制度平台从G7到G20的转变，深刻地反映了曾经被边缘化的行为体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关键角色，新兴大

^{④①} 胡春春：《从国际智库看G20框架下中德两国合作》，2016年9月21日，http://www.guancha.cn/HuChunChun/2016_09_21_374950.s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年10月20日。

^{④②} 丁纯，李君扬：《试析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社会的表现——兼议德国模式的作用及其前景》，载《欧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9页。

^{④③} 刘立群，李倩媛，王海涛：《新理论视角下的世界新格局》，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第26—29页。

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从根本上改变着全球治理格局，引发了国际体系结构和全球治理结构的深刻变化。^{④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对抗金融危机的影响本身就是 G20 机制产生的原因之一。所以，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本就应属 G20 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相比美国，欧洲国家似乎更易于承认和接受这种全球范围内权力分散与转移的趋势。欧洲更愿意作为积极的参与者，通过与新兴力量广泛的合作，争取自己的构想受到更广泛的支持。新兴经济体愿意接受与发达国家共治的全球治理模式，构建一种公平合理、平等合作并能够真正反映其切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实现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④④}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在“使全球治理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G20 和联合国”的会议报告^{④⑤}中谈到，德国试图将发展中国家吸收到全球治理平台中，如“海利根达姆进程对话机制”，即“G8+5”对话机制。德国承认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地位，认为将他们纳入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和国际

组织中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国家就会更加致力于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和环境保护。

杭州峰会将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大会协议纳入 G20 机制框架中，也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德国汉堡峰会将继续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协议与 G20 机制的对接，并将起草《非洲协议》，推动和非洲国家的合作特别是推动向非洲国家的私人投资活动。

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并没有将 G20 机制作为其政策重点，所以 G20 能否在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和德国能否合力推动至关重要。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杭州峰会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有一定的引领作用。而德国作为中等力量和地区大国，虽然在国际舞台一直发挥其斡旋作用，但作为世界性引领力量的实力尚显不足。在两国对 G20 在全球经济治理道路选择等方面共同点大于分歧点的情况下，德国会继续推进杭州峰会的重点议题，将这些议题具体细化并推动落实和完善各行动纲领。

作者简介：李倩媛，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④③ 刘贞晔：《全球治理》，陈岳，田野主编：《国际政治学学科地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9页。

④④ 洪邮生，方晴：《全球经济治理力量重心的转移：G20与大国的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3期，第38—46页。

④⑤ Zheng Chunrong: Germany and the G20, August 25, 2016, <http://www.g20.utoronto.ca/biblio/zheng-sisu-2016.html>, letzter Zugriff am 7.11.2016.

21 世纪德国政府产业创新政策研究 ——以制造业为例

陈 扬

【摘要】不断以创新保证实体产业的核心份额和竞争力，是德国保持经济增长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不二法门。特别是已成趋势的开放式创新，提高了制造业的创新层次和活力。德国科研型和非科研型制造业的创新表现各异；四大支柱性产业的创新优势稳定，但尖端技术领域的创新力滞后。德国是社会福利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政策是影响制造业创新成效的重要因素。21 世纪德国的制造业创新政策围绕“政府—经济界—科研界—大众”创新四螺旋，促成了创新 2.0 模式在制造业的生根发芽。为补齐制造业的创新短板，政府应参照创新理论，正视并完善其产业创新政策在理念、设计、内容等方面的不足，使创新 2.0 模式顺利地开花结果。

【关键词】德国 制造业 产业创新政策 创新 2.0

与诸多欧美国家不同，21 世纪的德国经济在一系列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仅有短期下行，此后开始增长乃至强势反弹，成为欧盟国家的经济领跑者。^①除了财政收入可观和内需旺盛等流动性因素外，这更要归功于德国的双重身份——既是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强国，又是名副其实的创新型国家^②。工业是创新的载体，创新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二者相得益彰，确保了德国制造业的创新实力。笔者

将以创新理论和德国制造业创新表现为基础，介绍分析政府的制造业创新政策的亮点和不足。

一、理论基础

创新理论的发展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创新性破坏力”（kreative Zerstörungskraft）决定了工业国的经

① 2009 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5.1%；2010 年和 2011 年经济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4.0%、3.3%。

② 2015 年，德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位列第六；在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发布的创新指数中位列全球第五。

济实力。此后又有经济学家完善了创新理论的产业中观维度：

1. 创新扩散

埃弗雷特·罗杰斯（E.M. Rogers）认为创新扩散由创新成果、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联系四要素组成，依次经过大众的了解、说服、决策、应用和确认五个阶段。产业的生产要素构成及其流动性、参与者对创新的认同度影响创新的扩散进程。

2. 产业集群^③理论

现代产业集群指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特定产业的众多企业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如高校、科研机构、相关服务业等），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积聚体。波特（Porter）认为，该空间经济组织形式将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创新产生和扩散的效率和经济效益，从而提升产业竞争力。

3. 钻石模型

波特借此形象地表示决定国家及其产业竞争力的国别六要素及彼此间的制约性影响：生产要素（特别是有关创新的人力资源、知识和基础设施）、国内市场需求、关联性产业^④和龙头产业发展、企业内部因素^⑤是四大核心要素；政府角色和偶然事件则是两大外因。

4. 创新 2.0 模式

数字化下的知识经济使得创新“民主

化”：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传统科技创新模式，被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开放创新为特点的创新 2.0 模式取代。该模式下，创新成果的产出和扩散更为高效，也更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该模式的核心主体是政府部门、经济界、科学界和大众^⑥构成的创新四螺旋模型（Quadruple Helix Model）。

二、德国制造业创新表现

德国长期保持其产业的结构性优势和重视创新的传统。2014 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22.3%，与 1994 年的 23% 鲜有差异，远高于欧盟的 15.3%；同时，德国同芬兰等四国同属欧盟国家的创新排头兵。就制造业而言，德国创新表现呈如下特点：

1. 传统支柱性产业优势明显，但不均衡

德国制造业的创新实力主要以传统支柱性产业的改良式创新为依托。化工、电子电气、机械和汽车制造四大产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优势明显，自 2000 年以来的创新者比例和近六年的创新参与度均超过 65%，遥遥领先于多数服务业和低端制造业产业；2016 年创新支出预算为 1025 亿欧元，相比于 2000 年的 480 亿欧元有显著增长，而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只有微弱增长。

然而，四大产业的优势分布并不均衡。汽车制造业和化工产业存在较多亮点，特别是汽车制造业：2014—2016 年间高端制造业创新支出的增长有一半来自汽车制造业（约

③ 在马歇尔 1890 年的《经济学原理》中首次出现“集群”概念，它是指企业或产业在某一空间的区域性集聚。

④ verwandte Industrien，即技术或产品重合或相关的产业，以及处在相同产业链不同端和处在相邻产业链的产业等。

⑤ 创新策略、企业文化、竞争对手表现等。

⑥ media-based and culture-based public，即以媒体和社会文化为依托的公众。

64亿欧元)——其10%的创新强度^⑦和9%的创新型产品占销售额比重居制造业榜首;在高端产品出口收入及其占比上不仅存量优势明显,而且流量增长领先(从16.9%到18.1%),而其余三产业在2011年后出口表现平稳,甚至有小幅回落;在创新者比例上,汽车工业(56%)略逊色于其他三产业(均超过60%);就科研参与度^⑧而言,化工行业以76%居制造业榜首。

2. 尖端技术产业^⑨ 创新活力不足

不同于以改进式创新为主流的高附加值产业,德国尖端制造业激进创新(radical innovation)成果的市场化比例长期偏低,五大尖端技术产业的平均科研支出比例明显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据科斯特尔公司(Questel)^⑩的专门化指数(Spezialisierungsindex)^⑪调查,德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专利申报也很不活跃,指数从2000年的负30跌至2013年的负45,而中国、瑞典、美国等国则几乎保

持连年正值。德国信息、纳米、生物等核心技术(Schlüsseltechnologien)领域的创新实力与世界顶尖国家的差距较大,产业化仍是进行时。

3. 研发型^⑫ 和低端制造业各有所长

2014年研发型产业的创新者^⑬比例高达80%,且侧重以核心创新为核心的产品创新和混合创新:其中79%的创新者从事产品创新,40%二者兼有,且研发型制造业从事合作式创新的企业比例^⑭高于低端制造业^⑮近20个百分点。而低端制造业58%的创新者以改善式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见长:其中约60%的创新者从事流程创新,高于高端产业54%的比例。与上述差异相对,高校和科研机构是整个制造业最受欢迎的合作伙伴,而私人客户和供应商作为创新合作伙伴的地位日益提升。市场和组织创新则是整个制造业的创新热点。



⑦ 指创新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

⑧ 指用以进行科研活动的科研支出比例。

⑨ 按照经合组织的归类,尖端技术产业包括制药产业、计算机、电子产业、光学仪器技术和飞机制造。

⑩ 全球知名知识产权服务提供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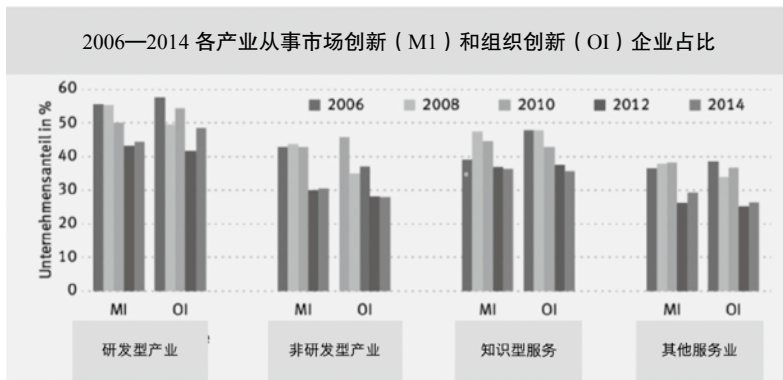
⑪ 以世界范围内的跨国专利申报数量为参照,正负值表示该国高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⑫ 研发强度高于3.5%的产业。

⑬ 创新者是指在过去的三年内,至少引入一项创新类型的企业。

⑭ 由2010年的36%降为2016年预期的29%。

⑮ 该比例低于20%。



图表来源：2015 创新调研参数报告，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4. 高产而多元的产业集群

德国产业集群以高产值和多样化为特征。有效的市场竞争和政府的适度激励带动一批高产值尖端集群的形成，它们多为能源环保、健康经济、物流和数字化生产等具有未来发展前景的技术领域。多样化体现在集群间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互联互通：基于同样技术创新成果的一些高端产业间形成了集群联盟；处在同一产业链不同端的制造业产业也越来越多地通过集群建立联系，实现产业链维度的融合；此外，有近一半的产业间融合发生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

三、政府制造业创新政策亮点

联邦政府的产业创新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趋成熟，逐步与现代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相向发展：在不断适应技术创新水平的同时，又兼顾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社会诉求。

1. 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功能政府^{①⑥}

1) 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

政府首先遵循“尽可能少而必要”以及“创新政策为主，产业政策为辅”的原则；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手抓，促进创新的创收和扩散两手抓，跨主体、跨行业、跨区域合作三管齐下。21 世纪以来，联邦政府大幅减少产业结构性政策开支^{①⑦}，提高了技术开放型资助项目的比例，不断扩大在创新的标准化、规范化、创新型融资、创新网络建设、科研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①⑧}。

2) 政府是合伙融资人

除无偿补贴，coparion 和 ERP/EIFGrowth Facility 两项新的金融创新工具^{①⑨}扩大了风险资本市场。

3) 政府是动议者和需求方

政府搞好创新政策的“顶层设计”：一方面开展创新主体间的对话，促进多维合作；另一方面参与承办创新竞赛及奖项评定，以激励创新。自 2007 年以来，政府开始通过针

①⑥ 以联邦教育部、经济能源部、财政部、环保部和交通部为主。

①⑦ 高技术战略也仅列举出有前景的产业技术领域，并未规定产业间的资源配置和比例关系。

①⑧ 2016 年的科研预算为 158 亿欧元，相比于 2005 年增长约六成。

①⑨ 由政府同欧洲投资基金 (EIF) 和复兴信贷银行 (KfW) 合作推出，以风投基金和私募基金为主。

对性采购^⑩，拉动对关键领域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4) 政府是监督者和审查员

政府通过《反限制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法》和最新生效的《简政放权法》(Bürokratieentlastungsgesetz)^⑪及“官僚主义刹车/同进同出规定”(Bürokratiebremse/One in, one out-Regelung)^⑫等维护创新友好型的市场环境，减免冗杂的申请程序和行政成本；通过科学委员会等智库定期评估资助项目的成果。

2. 促进创新高效产出和扩散——创新 2.0 模式

1) 协同创新、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并重

数字化时代下，高技术战略^⑬不再局限于促进核心技术创新^⑭，而是容纳了更多协同创新和社会创新要素。2010年高技术战略中的“创新对话”版块，首次将公民参与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4年出台的《高新技术战略》将以实体物理系统(CPS)为核心，以用户创新^⑮和技术融合为要素的“工业 4.0”确立为未来十大任务之一。此外，使创新型职业多样化、使工作环境更具创意等措施，更加强调创新资助的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

2) 推动创新平台建设

为推进创新 2.0 模式，政府支持产业内、产业间和集群间的创新平台网络建设。“创新发电厂(Innovationskraftwerk)”是德国首家开放式创新平台；德国研究和创新之家(deutsche Wissenschafts- und Innovationshäuser)负责联通海外的德国科研机构；科学技术合作协议(WTZ)促进国际性科研合作；“工业的未来联盟”(Das Bündnis „Zukunft der Industrie“)促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协会及工会的协同创新。而“工业 4.0 平台”^⑯可谓创新 2.0 模式的最佳体现：客户端和产业链的企业参与者就实施中存在的保护数据等技术性难题以及劳动力配置等社会议题群策群力，且研讨报告最终可直接递交总理府。可以说，创新平台不仅是各界创意碰撞、创新共享的舞台，也往往扮演着智库角色。此外，“联邦政府、经济界和学术界间的创新对话”，“研究峰会”等实体对话平台和服务热线等也实现了创新的多方参与。

3. 重点支持潜力技术市场和跨行业技术

联邦经济能源部将健康、智能交通、气候资源保护/能源和环境、生产技术、新材料确定为具有发展和创新潜力的五大主导型技术市场，将生物、生产技术等十三项技术领

⑩ 在创新采购能力中心 Kompetenzzentrum innovative Beschaffung (KOINNO) 的协调下，采取招标或直接订购的形式。

⑪ 2016年1月1日生效。

⑫ 2015年1月1日生效。

⑬ 自2006年起，每四年出台一次。

⑭ 2006年出台的高技术战略包括以下三大领域：1. 健康和安全生活：健康研究、医疗技术、安全技术、能源技术、环境资源保护技术等；2. 信息化和机动化：通信技术、交通和汽车制造技术、航空航海航天技术及相关服务业；3. 跨行业综合技术：纳米、生物、微观系统、光学、材料和生产技术。

⑮ 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冯·希贝尔(Eric von Hippel)教授于1986年首次提出。

⑯ 由德国机械及制造商协会(VDMA)，德国信息技术、通信与新媒体协会(BITKOM)，德国电子电气制造商协会(ZVEI)于2013年4月合作设立，并开设了相应的互联网门户网站。

域确立为制造业的关键技术予以重点支持。对此，政府在宏观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单个战略，如数字化议程、航空研究计划等；微观上通过“MINT 创造未来”倡议、小科学家工作室、青少年竞赛等，提高 MINT^{②7} 学科的潜在人才储备；中观上则促进市场化的核心技术集群化和产业化。

4. 对创新主体的可持续性资助

1) 高校及高校外研究机构^{②8}

联邦教育研究部牵头出台了一系列全面且有针对性的资助计划：“教学质量一揽子协议”和“教师培训行动计划”旨在提高教职人员资质和改善学生学习条件；“德国科研协会总计划（DFG-Programmpauschale）”对高校研究提供长期支持；“高校协定计划 2020”旨在扩大在校生的数量和质量；2005 年启动的“德国大学卓越计划”通过竞争提高高校的尖端研究水平，与之平行的“科研和创新协定”^{②9}则解决高校外研究机构的资金瓶颈。此外，德国四大研究协会分别以基础或应用

研究为主要领域^{③0}，为前沿技术和市场的科学预测以及创新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对校外研究机构提供全额资助，并逐年提高科研补贴比例。2014 年，五成以上的科研津贴发放到了高校外研究机构。

2) 创新型中小企业

鉴于中小企业创新强度和创新支出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现状，经济能源部于 2016 年发布的《中小企业未来行动纲领》提供了诸多资助项目，帮助不同成长期的企业创业^{③1}或融资^{③2}，提高企业人才和资金储备能力。此外，政府适时对中小企业创新核心计划（ZIM, 2008）和中小企业创新计划（KMU-innovativ, 2007）进行调整：自 2015 年 4 月 15 日起，德国的中小企业将不受地域限制，均可申请 ZIM 包含的三类资助项目^{③3}；此外，ZIM 新增的促进优质产品和服务出口、建立开放的合作网络等措施，旨在提高中小企业合作式创新水平；KMU-innovativ 计划则用以资助研发型中小企业。

②7 数学、信息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

②8 包括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四大非盈利性研究机构（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协会、赫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茨联合会）、博物馆、研究院等公立研究部门。

②9 该计划于 2005 年启动，目前处于 2016—2020 的第三期，平均每年提供 1.5 亿欧元扶植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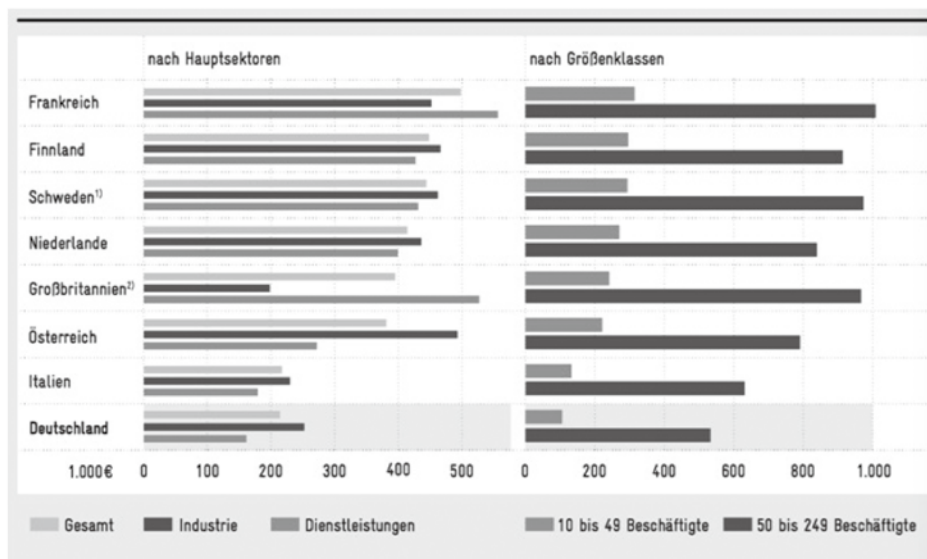
③0 马普学会负责基础研究，与高校研究相独立但合作密切；弗朗霍夫协会从事应用研究，直接面向企业和社会需求；赫姆霍兹联合会以大科学研究为主要领域；莱布尼茨联合会从事跨学科基础研究。

③1 科学创业基金（EXIST），包括创业者资金（EXIST-Gründerstipendium）和研发转移基金（EXIST-Forschungstransfer）。

③2 高科技创业基金（HTGF），面向创新力极高、技术导向型的成立一年之内的企业。此外还有天使基金、小额夹层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融资等。

③3 2008 年启动，包括 1. 合作性项目（企业间或企业和研究机构）；2. 单个项目（旨在提高企业内部创新能力，无技术和行业范围限制）；3. 创新网络合作项目。

2008—2012 年欧盟六国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支出（均数）



图表来源：欧盟统计局。

四、政府产业创新政策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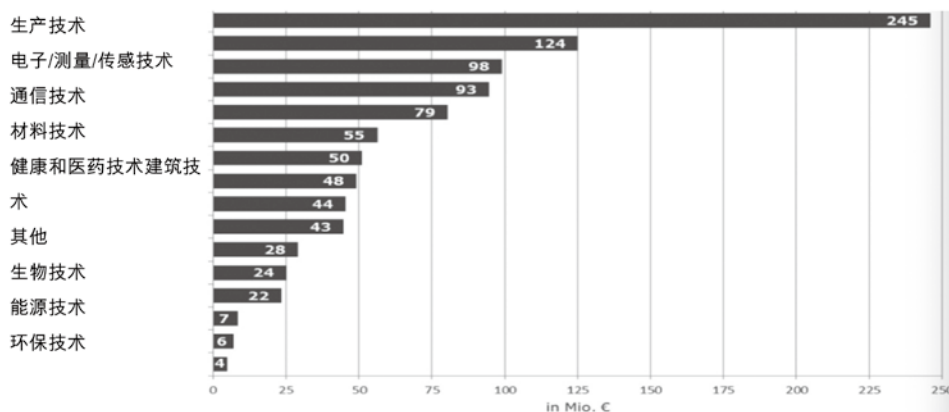
联邦政府通过强化“政府—经济界—科研界—大众”的四螺旋主体在创新 2.0 模式中的作用和促进优质和创新集群建设，提高了制造业创新成果的创收质量和扩散效率。然

而，创新表现增长乏力等问题表明，政府的产业创新政策仍有不足。

1. 宏观创新研究决策的设计保守

长期以来，政府的宏观创新决策缺乏先锋意识，对以革命性成果为主的新经济产业

2015—2016 政府对不同技术门类的财政补贴预算



图片来源：联邦经济能源部。

投入不足。生产技术精良，尖端技术落后，产业结构僵化，使得德国长期以“世界装备制造厂”，而非“工业创新先锋”闻名。为能引领世界范围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政府应转变固有的战略思维理念，不应总吃传统优势制造业的老本，必须提升尖端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企业创业水平，加快步伐补足同英美日等国在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前沿产业的短板。

2. 教育体制竞争力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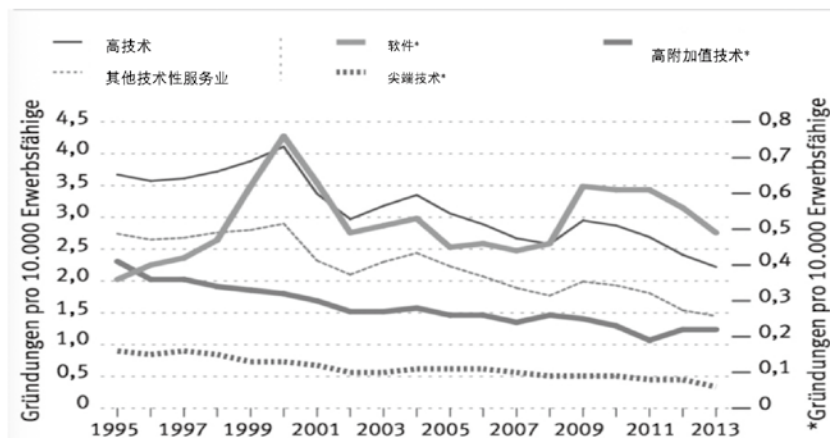
21世纪以来，德国先后通过设立高校管理委员会、实行博洛尼亚进程等改革原有的僵化低效的高等教育体制，其成效虽然显著，但新旧问题仍有不少：1. 初等教育体制缺乏弹性，不利于因材施教；2. 录取生源未能实现教育公平^{③④}；3. MINT学科在规格、师资力量和学生数量上均落后国际领先水平：2013年，德国全职研究型从业者的等效值（Vollzeitäquivalent）仅为8.5，虽高于欧盟国家7.7的平均值，却远远落后于北欧国家（如芬兰为15.7），与韩（12.8）日（10.2）两国差距明

显；4. 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教学衔接不畅；5. 尖端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的高等教育师资和优秀生源力量不足，发展缓慢；传统支柱产业的高等教育水平虽居于前列，却缺乏革新活力。而联邦各州各高校的教育政策独立原则，增大了教育改革的难度。

3. 政策短板：创新型创业和小微企业创新

98%的制造业企业为中小企业，而90%的制造业企业为小微企业，然而政府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和创新型创业的措施效果不甚理想。根据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的调查，德国中小企业创新支出自2009年开始停滞，多数小微企业计划在2014—2015年缩减创新预算；制造业的创新性创业低迷，近五年来仅占德国创业总量的6%^{③⑤}；特别是始终低位徘徊的尖端技术产业创业率，成为德国新兴产业未成格局、现有产业结构僵化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力度削减中小企业创新及创业壁垒，使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创新需求相衔接，拓宽针对小微企业和尖端技术企业的融资工具。

1995—2013年德国的创新性创业



图表来源：曼海姆企业组委会。

③④ 根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2年的调查。

③⑤ 80%的创新型创业来自服务和贸易领域。

4. 政策缺口：税收型资助及非研发型企业

如今，已有 26 个经合组织国家和 15 个欧盟成员国通过税惠政策激励企业的科研创新且收效良好。已实现财政无赤字的德国政府也应尽早实施税惠政策，减免中小企业的创新研发税负。此外，高技术战略下的资助项目仍以技术创新导向为主，在流程和市场组织创新领域有优势，又是制造业就业和产值（42%）重要依托的非研发型企业^{③⑥}却鲜有受益。政府应提高对非研发型企业创新的政策投入，包括使资助项目和创新类型多元化，

塑造更加开放包容的需求市场等。

5. 滥用创新成果

2015 年 9 月曝光的大众公司尾气造假门事件给“德国制造”蒙上阴影。仍有企业非法创新或滥用创新成果，见利忘义令人唏嘘。除了企业自身应反思创新企业文化外，政府及相关部门更应扮演好监督者的角色。要借助公众媒体规避法治漏洞，奖惩制度有效并行，如此才能真正促进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创新成果投产和扩散。

作者简介：陈扬，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③⑥} 低端产业及高端制造业中均有。

文 教 论 坛

阿尔弗雷德·韦伯及其文化社会学^①

姚 燕

【摘要】德国现代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文化社会学不是狭义的社会学理论，而是秉承德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从哲学高度来解释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整体发展的历史，关注整个人类发展的命运，深蕴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涵义。因而他的文化社会学也被视为一种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是对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发展做哲学解释，并具有时代批评性质。它不同于当时西方社会学的又一特色在于，它的思想内容表现在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与阐发中，史、论融贯一体，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强调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主张对东、西方多样的文化应平等看待，而对西方技术文明及其文化局限性则多有反思。

【关键词】文化 文明 文化社会学 跨文化交往

国内哲学与文化界对阿尔弗雷德·韦伯尚很少研究。本文概要述评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学术生涯和主要学术思想，包括他的文化社会学的总体思想特点，着重论述他的文化社会学表现为对世界文化史的一种独特研究，至今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借鉴意义。

一、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学术生平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是德国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在他执教多年并最终退休于此的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就以他的名字命名（Alfred-Weber-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和以其兄长、为我国所熟悉的学者马克斯·韦伯命名的社会学研究所（Max-Weber-Institut für Soziologie）同居重要地位。在我国，早先已有影响的是他的工业区位理论。他还为德国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创立作出了理论贡献，亦是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奠基者。德国研究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学者艾伯哈特·德姆（Eber-

① 本研究论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hard Demm)评价他“不仅是文化社会学的创立者,而且是在很多其他领域作出开创性研究的最后一批学者之一:工业区位理论、劳动和企业社会学、官僚的研究、比较统治学和历史哲学,这些还只是他广泛涉猎的领域中的几个重点。”^②这体现在他丰富的著述中。他的德文版全集共有10卷,其著作译成中文的有四部。^③

阿尔弗雷德·韦伯曾经学习艺术史、考古学、法律和国民经济。1897年,他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的指导下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899年获得国家科学和国民经济教授资格,在柏林大学任教。1904年,他应聘到布拉格的卡尔·费迪南大学(Karl-Ferdinands-Universität)任教,辅导过后来成为作家的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菲利克斯·维尔迟(Felix Weltsch),著名的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也接受过他的辅导,获得博士学位^④。1907年,他应聘到海德堡大学任教,直至

1958年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志愿者到阿尔萨斯前线,尚属于“自由的帝国主义者”,一战后,他参与组建德国民主党(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坚决反对纳粹,弃教海德堡大学,并通过学生与德国的反抗运动组织克莱稍小组(Kreisauer Kreis)保持联系,讨论重建纳粹垮台后的德国政治秩序。二战之后,他加入社会民主党,积极参与战后德国秩序重建的讨论和提议,鼎力支持海德堡大学以民主原则进行重构,肃清纳粹的因素和影响。鉴于他坚决反对纳粹的精神与切实行动,1954年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德国共产党(KPD)提名为德国总统候选人,但只获得12票。

二、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主要学术思想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学术思想广博深邃,这里仅概述两个主要方面。

② Demm, Eberhard: Einleitung, in: Demm, Eberhard (Hrsg.): “Alfred Weber als Politiker und Gelehrter”, Stuttgart: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 1986, S. 7.

③ 《欧洲哲学史》(朴社, 1935)、《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 1997、2010、2011)、《西洋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2010)、《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除此之外,其代表作还有:《宗教与文化》(Religion und Kultur. Jena 1912)、《欧洲现代国家思想的危机》(Die Krise des modernen Staatsgedankens in Europa. Stuttgart u.a. 1925)、《悲事与历史》(Das Tragische und die Geschichte. München 1943, 1959)、《告别之前的历史——克服虚无主义?》(Abschied von der bisherigen Geschichte. Ueberwindung des Nihilismus? Bern 1946)、《第三类人或第四类人——谈历史性此在的意义》(Der dritte oder vierte Mensch. Vom Sinn des geschichtlichen Daseins. München 1953)、《社会学引论》(Einführung in die Soziologie. München 1955)、《我们德国人在1945年以后失败了吗?》(Haben wir Deutschen nach 1945 versagt? Polit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79)、同 Alexander Mitscherlich 合著出版的《自由的社会主义》(Freier Sozialismus. Hedidelberg 1946)。

④ 有德国学者认为,卡夫卡的多部小说都受到阿尔弗雷德·韦伯对官僚体制观点以及韦伯划分人的类型的影响,如 In der Strafkolonie (《在流放地》)、das Schloß (《城堡》)、das Urteil (《判决》)、die Verwandlung (《变形记》)、der Prozeß (《审判》)。参见 Lange-Kirchheim, Astrid: Alfred Weber und Franz Kafka. In: Demm, Eberhard (Hrsg.): “Alfred Weber als Politiker und Gelehrter”, Stuttgart: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 1986, S. 113-149.

1. 政治与经济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一生围绕着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两个中心。其学术研究涉足多个领域，经济学（工业区位理论、经济政策）、社会学研究（文化社会学）和哲学研究却是相互融通。例如，他“在课堂上用社会文化学的方法讨论政治问题和现实问题”^⑤，而恢复人的自由、个性是他贯穿所有学术领域的观点之一。他在二战后提出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想涵盖了关于德国经济政策、国内政策、外交政策、社会政策、教育等内容，这“并非首先是一个经济理论，而是旨在构建一种二战后的生活形式”^⑥，以建立法治国家、保障人权、议会民主，使所有社会力量在经济领域进行共决，^⑦促使一种“独立、正直、自信、追求自由权利”^⑧的新类型的人产生，这种人热爱自由、承担自我责任、具有仁心和判断能力，因此他主张教育不仅要传授实用性和技术性知识，更要注重对学生的人文教育、个性的培养。^⑨他反对德国对外扩张，但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主张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也主张工人应在企业中进行共决，要把企业领导和决策的权力给予工人和职员。他反对资本的垄断，也反

对计划经济和国家统制经济。在二战后，他仍然坚持德国经济重建应走介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称这种经济政治体制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⑩。他的一些思想元素体现在德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中。他还批判当时的官僚主义，认为工业化大生产型社会、国家中的政治制度和劳动分工造成了人的异化，扼制了人的创造性、活力和自由的个性。

在对外关系上，他在二战后主张德国保持中立，不参加任何一个集团，以实现德国的统一。^⑪他反对战后关于使鲁尔区国际化的提议，认为鲁尔区是欧洲两大工业中心之一（另一个是上西里西亚，战后划归波兰），鲁尔区的国际化会分化该工业中心的实力、降低效率，实质意味着德国经济死亡，从而使整个欧洲的经济萎缩。他提出：鲁尔区仍然应该属于完整的德国，而且，由于德国被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等欧洲重要工业国环抱，包括鲁尔区在内的德国作为一个整体都已处于国际监管下，实际上，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完成监管德国的任务：建立欧洲联邦（europäische Föderation），统一的德国作为整体纳入这个联邦体系。这样，不仅

⑤ Demm, Eberhard: Geist und Politik – Alfred Webers Beitrag zu Theorie und Praxis der deutschen Nachkriegspolitik. S. 350. In: Demm, Eberhard: “Geis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Gesammelte Aufsätze zu Alfred Weber”, Frankfurt a.M.: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S. 350.

⑥ Ebenda, S. 325.

⑦ Demm, Eberhard: Alfred Webers “Freier Sozialismus”, Ebenda, S. 328.

⑧ Weber, Alfred: Abschied von der bisherigen Geschichte. Überwindung des Nihilismus? In: “Gesamtausgabe in 10 Bänden. Band 3”, Marburg: Metropolis-Verlag, 1997, S. 322.

⑨ Alfred Weber, Alexander Mitscherlich, Freier Sozialismus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Verlag, 1946) S. 88-89.

⑩ 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体制，与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我国学者沈越对此有介绍。沈越：《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韦伯模式对联邦德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影响》，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4期，第62—68页。

⑪ Demm, Eberhard: “Alfred Weber”. In: Demm, Eberhard: “Geis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Gesammelte Aufsätze zu Alfred Weber”, Frankfurt a.M.: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S. 26.

鲁尔区、而且整个德国都受到国际监管，德国由此事实上便实现了国际化。这个联邦还会使欧洲所有国家在经济、政治上受益，其核心地区会成为世界上除美国、苏联之外的第三大工业中心。这个欧洲联邦虽地处欧洲，却绝非自我封闭的政治经济权力集团，而只显示为密集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联邦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要纳入联合国的体系。^⑫阿尔弗雷德·韦伯在1946年提出此构想，恰似对最近60年德国与欧洲发展的前瞻性预言。

2. 文化社会学

韦伯的预言建立在对世界历史深入研究和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德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以社会学为理论基础，只是全面的社会科学的一个方面，其理论由社会学的构建思想和对社会的分析发展而来。而且，从费希特、黑格尔到斯宾格勒和舍勒，社会和政治生活都是哲学的经验性来源。^⑬

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即是秉承上述德国学术传统：以基于科学的哲学来阐释社会和政治生活，将社会、文化、历史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并解释其间的关系。它被有的学者视为一种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⑭是对社会与国家历史发展的哲学审视。他认为人类“此在的整体”（Daseinsgesamt）分为三个领域：文明、社会与文化。文明是生活理性化、人们运用科技手段控制自然的过程，是意识

的逐步明晰（Bewußtseinsaufhellung），包括科学技术的演进，这“意味着给社会建构提供经历改造的方法手段，为精神思想的整体塑造提供经历改造的、物质和精神的客体世界”^⑮。社会领域包括国家建构和经济力量的运动发展。文化则是人的精神和思想的塑造（geistig-seelische Gesamtformung），与前两个领域发生的“生活聚集过程”相适应，是对物质条件和生存境遇的回应，“面临着社会生活聚集过程，要塑造精神和思想，并且从经历中形成态度”^⑯，包括艺术、哲学、宗教、神话。韦伯以此划分来分析精神、社会结构、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历史的发展。他所说的“此在”范畴，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此在”范畴。

韦伯的文化社会学还反映出西欧早期社会学的另一个特点：关注整个人类发展的命运。这种早期社会学从整体上体现为处于危机和剧变时代的学科。尤其在德国，社会学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呈现一种危机感。19世纪初开始，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开始，旧制度渐渐被废除，这使人们面临新的生存境况，社会学便试图寻找人类命运发展的答案，方法便是回溯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社会现状。德国社会学家在19世纪末形成了特有的危机意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深化了其危机感，因为这些学者具有历史整体认

^⑫ Weber, Alfred/Mitscherlich, Alexander: “Freier Sozialismus”,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Verlag, 1946, S. 56-62.

^⑬ Riesterer, Beate: Alfred Weber’s Position in Germ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Demm, Eberhard: “Geis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Gesammelte Aufsätze zu Alfred Weber”, Frankfurt a.M.: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S 85.

^⑭ Ebenda, S. 86.

^⑮ 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姚燕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2页。

^⑯ 同上。

识和社会整体意识，他们体验到，传统的人文、宗教态度与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显示出自我演进的力量之间出现了矛盾。^⑰ 韦伯的文化社会学作为当时具有历史哲学性质的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探求人类发展的未来命运，还带有时代批评（Zeitkritik）的性质。

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又有不同于早期社会学的另一个特点：摒弃本质为民族中心主义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德国社会学研究者安德里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认为，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学一直是现代西方语境中的学科，它的首要志趣在于研究西方现代性的结构，一部分志趣也在于研究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和现代中的某些社会领域，这些领域在结构和文化方面发展最快、并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种本质为民族中心主义的社会学从根本上为研究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关系、研究西方各文化之间的关系造成了障碍。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叶成为独立学科，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美国成为学术机构正式研究的专门学科，其核心一直建立在一种主要的差异之上，即现代西方社会和非现代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后者既包括非西方的地区，也包括现代之前（中世纪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社会。以现代性为立足点来看，社会学的中心是一个现代性中自我普遍化的结构（现代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性、现代法律、现代科学、现代艺术和世俗化等），而传统社会只体现为现代性的对

比手段，只具有局部的、暂时的价值。^⑱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则将非现代的传统社会放到与现代西方社会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考察，其代表作《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即体现了此特点。

三、《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对世界文化史的独特研究

1. 著述的时代、目的与基本态度

韦伯的文化社会学实质上并非狭义的社会学思想，而是一种对世界文化史所作的历史哲学解释，也是一种文化哲学思想，这集中表现在他的名著《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als Kulturosoziologie*, Leiden）中。该书始作于1931年，1935年出版，1951年的第二版中增加了“谈当前形势——第四种人出现了？”一章。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是德国及其所处的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经济危机、希特勒上台等大事件后的动荡时代，韦伯“意识到旧有的文化在分崩瓦解，这个过程被延迟了，或者说被掩盖了，然而深刻的变化必将到来。……必须从历史的深度去认识这种分崩瓦解的深层原因。”^⑲ 韦伯虽然身处危机重重的德国，却并非只关注德国本身的命运，而是在书中提出了他研究的中心问题：“我们不作为单独的一个民族，而作为由历史的潮

^⑰ Vgl. Riesterer, Beate: Alfred Weber's Position in Germ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Demm, Eberhard: "Geist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 Gesammelte Aufsätze zu Alfred Weber", Frankfurt a.M.: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S. 87-88.

^⑱ Vgl. Reckwitz, Andreas: Kulturosoziologie. In: Straub, Jürgen/ Weidemann, Arne/ Weidemann, Doris: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mpetenz", Stuttgart: J. B. Metzler Verlag, 2007, S. 201-211.

^⑲ 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姚燕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页。

流向前推进的人类，到底处于历史潮流中的哪个位置呢？这一潮流通过我们实现了什么呢？”^⑩ 韦伯在书中回溯和分析世界历史中文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变化对人类整体“此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展望人类发展的方向：“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却不能马上完全理解这个转折的深刻程度如何，……我们感到急需澄清当前这种前所未有、含混不清的局面，了解这种局面的重要意义，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在于全面掌握历史潮流的驱动力、历程、形态和引起变化的动因，我们希望，能够由此看到一些我们自己的命运。”^⑪

在他看来，要看到人类的命运，就要先理解每个历史时刻特有的既定条件，因为正是这些条件引发出人们自发的（spontan）创造性行为，而生命的本质则在于利用既定的条件、材料、力量和机会创造出新的事物。每个历史时刻的深度就同一切生命一样，是无法预知的。这是韦伯看待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度，因为它“让我们拥有动力来熟悉条件，澄清那些从历史深层角度可以观察到的、我们行动和创造事物的可能性，使我们在处于令人迷惘、遭受威胁的境况时，综观人类的全部命运，尽可能地排除我们自发的意愿所可能导致的收获寥寥的途径，使我们的创造力的潮流能够取得符合时代要求、解放人类的成就。”^⑫ 在整本书中，韦伯将那些重要的、看似自发的创造性事物置于当时历史的政治、经济、思想发展的条件下予以分析、阐释，分析其偶然中的必然性。

2. 对历史上社会和文化的分析

考虑到文化的历史悠久性与开阔多样性，更关注对世界历史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在当时的条件下，韦伯在这本书中略去了非洲大部分、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文化，而关注分析亚、欧和北非的文化，对每个历史时期的每一种文化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并将所有文化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划分为四种类型：神魔主义、神话性质、象征性质、理智性理解与解释。有的文化内涵一种类型的，有的则涵有多种类型。

1) 神魔主义的史前文化：原始人已通过制造工具、狩猎、种植开始改造自然，非常清晰地发展出经济—社会性“此在”的原始形式，但尚无法理解自然界。后世一切神话的、玄学的和真正宗教的思想都发源于这个世界，现代人仍然处于原始世界的影响之下。

2) 包括埃及和巴比伦文化、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初级发达文化：历史的四根基柱。其共同特征在于，以神秘性为基础，神秘性将人的精神维系起来。人类有记载的历史由此开始，成为真正的、伟大的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和印度文化比埃及和巴比伦文化的本性更加自由灵动，历经变化和多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根基却始终未被动摇，它们是内省文化，神秘却赋有高度理性，内含“既可……也可（sowohl...als auch）”的并存原则，人们不仅宽容，而且将各种鸿沟及对立面对联结起来，使之彼此配合协调，各种宗教并存便是其体现。中、印文化吸纳万物，虽屡遭外族入侵，却不放弃自身本质，而只像钟摆一样进行自我变异（Idiovariation）。

^⑩ 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姚燕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3页。

^⑪ 同上，第4页。

^⑫ 同上，第6—7页。

其中，中国的部落统治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封建主义与宫廷和国家官僚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统治强度较弱的一些时期里，民族发生了一次次的分裂，但也促使整个民族进行长期的深刻自省，由此涌现出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他们奠定了中华帝国稳固的思想基础，其思想成为以后中国历代思想的标准。中国文化的本质则是隐藏在父系社会假象下的母权制存在，建立在由妇女主持的、极其稳固的家庭基础之上，祭奠祖先即是其反映。中国人此在的最高原则是“道”，是自然宇宙魔力，是融入自然界神秘性的秩序，只有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宗教、自然科学、伦理、礼、历法、风水、诸神，都体现了人、社会与自然、宇宙的融合。中国文化的本质不会改变，不会从内部被其他思想摧毁，在发展历史中，它始终反映生活、自然和宇宙，而且梳理和调整三者的关系。

正因中、印文化的不变本质，二者首先提出了人在深不可测的世界中到底会经历怎样命运的问题，使该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并由此在文字和思想中超越自身，构成了西方跌宕起伏历史的依托背景，人们只有在理解东方全部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完全理解西方历史。

3) 包括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文化的二级文化第一阶段：这是游牧民族侵入西方后，西方文化的发端，在埃及和巴比伦文化及与之并存的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小亚细亚文化圈虽主要为波斯人所统治和影响，但从世界史角度看，它最主要的民族和重心是犹太人。由琐罗亚斯德教发展而来的拜火教不仅深刻影响了波斯，而且它和犹太教一样，都产生于奋争幸福的民族，共同构成了基督教的基础，深刻影响了西半球不断奋争的历史。

希腊文化是神话和象征性质的。希腊人的本质是建立象征着完美的符号。他们创造

出自具独特风格的、尊贵的、体现男性刚强的文化，其内容丰富的精神生活，在肯定世界的同时，感受到人的“此在”的脆弱和可怀疑性。其民族精神中蕴涵着人对“此在”的强大的塑造能力。希腊民族发现了人，将人的形象进行形而上学的提炼，其中隐含着神性成分。希腊民族的创造性方式，就是以象征为手段寻求终极性。

罗马帝国的古典文化仍以古希腊文化中公民自由和合作特性为基础，罗马帝国的文明为西方文明和建立自由的文化生活打下基础。但罗马帝国在后期实行军事专制主义，每个地区拥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特别的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同，无政府状态摧毁了古典文化中的社会组织，罗马帝国却没有找到一项根本统治原则。罗马帝国政治和社会建构中存在的思想和现实结构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矛盾，即尘世的自由与人的内心受到束缚，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终结。

在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晚期，三个形势奠定了基督教古典文化发展的基础：希腊化古典文化的衰败；经济的衰落将军事统治下无政府状态的罗马帝国拖上没落之途；帝国西部古典文化的社会形式解体，统治者试图按照东部模式调整西部社会结构，引起了西部第一次严重混乱及其他灾难。社会“此在”的外壳全面崩溃，基督教萌发于此时，力图开始彻底改造一切，拯救世界，它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嵌入并填补帝国空虚的社会结构，不仅代表一种信仰，而且塑造“此在”。教皇主持的宗教大会开始，论争教义纠纷，这两点使东西方基督教世界明显分离，对基督教的和西方世界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哥特人的入侵使罗马政权垮台，古老国家的“此在”建构解体。奥古斯丁将全部基督教神学、宇宙学和伦理学总括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代表教会和基督教系统地回答了人类命运的问题。其本质是使蕴涵于

神学中的基督教内涵直面正在形成中的完整的西方世界，没有割断与古典希腊罗马文化思想精髓的联系，甚至拯救了这些思想财富，使之成为西方世界的基石。其根本贡献在于，使基督教的基本论点清晰重现，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性动力和活力，而且固守了希腊民族首创的质疑态度，提出了信仰和知识处于怎样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由此为西方世界的发展推开了大门。而东部的基督教世界仍然固守柏拉图式象征性思想，西部与东部的基督教世界的距离由此日渐拉大。奥古斯丁作为西方世界宗教和神学的奠基人也为东、西方精神生活埋下了深刻冲突的种子。

4) 二级文化第二阶段至公元1500年之前的文化，包括拜占庭文化、伊斯兰教、俄罗斯文化、西方文化：拜占庭帝国是古罗马帝国的遗产，其本质是一个古老的城邦，底蕴则是古典文化时期首创于世界的自由精神。拜占庭将东方文化与希腊文化结合在一起，对斯拉夫人、伊斯兰教地区都产生巨大影响。它的性质坚韧，即便拜占庭被占领之后，它依然不断接受新思想，发展出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媲美、甚至促进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它不断接受新思想，但其本质是保守的，代表一种不会被打破的社会生活，承载着被延续下来的、新形式的古老思想意向，要实现某种目标。而对于世界文化来说，这种状态也有决定性的作用。

伊斯兰教的基本社会状态建立在两大支柱上：受到多种文化影响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和包括拜占庭、波斯的古老文化世界。重建巴格达之后，发达文化和文明的成就汇集在伊斯兰教中，发生变化，伊斯兰教的本质却没有改变。表面上看，它被外来艺术征服了，而实际上，它以自己特有的生活情感塑造了外来艺术。伊斯兰教更借助以往的文化，使哲学、法学、医学、占星学、化学等发展到新的高度。伊斯兰教的“此在”是稳定的，

通过“达成一致”(Idschma)的方法，使外来因素顺应自身，自己始终保持不变。

俄罗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19世纪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又深刻影响了西方的精神生活，但俄罗斯人精神思想特质与西方人完全不同，他们亦非亚洲民族。俄罗斯此阶段的历史总是处于建设-退行的往复循环中，文化呈非直线发展，它不断受到外来者的统治和外来思想的渗透。基督教文明在此渗透缓慢，彼得大帝改革才使俄罗斯的“此在”出现大变革，但没有出现根本变化，其艺术实际只是对欧洲的模仿。而且，俄罗斯时进时退的不连贯的历史发展扼杀了任何一种自我塑造、自我建设的萌芽。它的“此在”几乎一直与外来的民族和外来思想统治结合在一起。基督教信仰没有深入俄罗斯民众的内心，也没有全面塑造过俄罗斯的社会生活。西方世界是在衰落的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基础上，随着游牧民族入侵而渐渐形成的。它接受了罗马帝国区域里城市网的管理组织，吸收了以往罗马文化中萌生的封建领主制，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向外扩展。相对于古老、稳固且统一的东方而言，西方世界的历史跌宕起伏，在争斗中不断改变着权力中心，但始终没有脱离古典希腊罗马的传统。对古典希腊罗马科学和思想财富的研究，以及人的认识不断扩展和深化，这两者促成了西方的文化成就。构成其框架的，则是西方发展历史中的四种紧张关系：接受教会；宗教统治与世俗权力之间的矛盾；城市的自由和农村的人身束缚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形成及多语言区和思想区相应形成，同教会和以拉丁语为依托的区域进行精神和思想的竞争。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外观形态差别分明，有各自独特的本质和形式。这些文化表面上毫无关系，实际却是一个延续性的整体，渗透着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精髓，即对人的深入理解。

路德的宗教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生活和思想的革命，质疑社会性的事物，甚至质疑社会生活形式本身，将人置于一个清醒理性的世界。自宗教改革之后，西方世界分成两部分，分界线横穿德国中部，自此，这里一直是欧洲紧张关系所在。分界线以北，宗教改革派生出主宰新教世界、塑造新教徒的职业伦理，塑造了虔信的新一代人。思想革命伴随着开普勒、哥白尼学说所开启、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革命。尽管宗教性仍然强烈影响着人们改造和征服世界的活动，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时代的“此在”都发生了变化。

5) 公元1500年之后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文化，主要是西方开始对外扩张的文化：从1500年以后的近代开始，欧洲逐渐建立起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同时，欧洲各国家稳固成型。宗教斗争成就了现代国家，这些国家具有专制主义的特点，却越来越放松了对教会、经济、科学等社会生活领域的控制。现代国家的建立同对外征服世界和争夺欧洲统治权结合在一起。但是，其扩张不同于古希腊殖民和罗马扩张的人口迁移办法，而是以欧洲为中心，要使世界臣服在自己脚下，接受西方文明。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发展，与民族国家建立、世界性扩张相辅相成，在几个世纪中，它采取的都是卑鄙无耻的掠夺方法，并得到了宗教的支持。

资本主义和精确科学都由近代国家培植而成，成为近代“此在”中两股具有决定性的革命力量。数学引导下的科学发展，第一次改变了以往经院哲学统治下人们对“此在”求质的理解，形成求量的个体主义，是自然科学对世界进行理性和数学性解释的结果。个体主义又促成了关于国家的契约理论，国家被看做由彼此分离的个体这一基本要素按照理性组合而成的整体。

在公元1500—1800年之间，日本文化

也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日本文化并非自创，而是生成于中、印两大东方文化主体的影响下。大化改新是日本在中国影响下在自身发展历史上首次进行的“此在”的革命（明治维新则是第二次，使日本一跃而跻身于西方的世界性文明行列）。日本自我封闭，没有能力创造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唯一真正伟大的贡献是绘画及相关艺术，是禅宗对后世深远影响的产物。

6) 从法国大革命之后至韦伯所处时代的现代文化：法国大革命目的在于创造权利平等的公民（Citoyen）和资产阶级理解的经济自由。拿破仑破坏了旧有社会，建立一种公开透明的、体现物人相容而成的秩序。与此同时，德意志浪漫主义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智主义都含有保守性的意志，并未改善旧有思想，而是使之湮没在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大变革之中。从18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1830年之前，社会生活的大变革未对世界文化产生根本性影响。从1830年开始，社会生活物质方面的大转变才打破原有的框架条件。技术、科学、资本主义发展、人口增长、人的需要和空间拓展等方面似乎都在发生不受限制的演进。传统在消解，帝国主义的发展在自由的世界经济所构成的框架内相互渗透，彼此界定和划分势力范围仍然是主流，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爆发频率迅速上升。理性的态度也渗透在所有社会领域，限制帝国主义性质的权力。“此在”充满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表征了历史、社会和精神思想方面深刻的大转变。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崩溃之后，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其建构确立在一些主流力量平衡的基础上。19世纪3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划分世界，德国尚未成为帝国，但经济势力极其强大，已向欧洲以外地区渗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归结于一个中心问题：是应当在维护世界自由经济的基础上，将德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

纳入全球平衡的体系呢，还是打破全球平衡体系？或者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19世纪文化的思想、文明基础和精神基础都在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瓦解。20世纪在经历突破。距离的限制被跨越，交往在增加，使东方伟大的古老文化民族印度、中国及其影响下的亚太区域面临解体，也使西方自身分裂。民族重组，民族多样性凸显民族的价值，然而彼此间的排斥也加重了。技术文明将地球变小，将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却没有促进彼此间的理解和共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真正开始分裂。经济原因使得到处呈现民族对抗、国家对抗的景象。大战带来的更加深刻的后果在于，几个世纪以来民众享有自由权利的社会生活原则正受到威胁，它原本植根于社会各个领域，受到国家保护，而一战后，旧有国家形式崩溃，使该原则岌岌可危。一切都经历动荡和革命性的巨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暂时终结。

韦伯从更深层次分析了突破带来的各种后果。他认为，这种突破只是表面现象，世界距离的缩小和技术化作为文明的表层基础，正在触及内部基础——人生存的某些心理前提条件。西方人借以征服世界的技术，在自身与自然之间创造了一个中间王国。在这里，人虽然是创造性的，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己创造的机制的仆从，他所创造的机器、器械，还会使他面临自身和本民族被毁灭的命运。在1957年第二版增补的章节中，韦伯详细阐述了对第四类人出现的担忧——受制于自创的理性“机制”、人格分裂、不再具有传统西方文化中自由、责任、人的尊严等意识的人。²³

从世界史发展总体上来看，精神对世界

理解的发展轨迹一直呈直线型，表现在技术和“此在”的组织形式得到改进。20世纪的突破，是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在希腊理智主义哲学思路影响下发展到理智主义的层面的表现，而理智主义此时显现出极限。人的内心矛盾日益严重。以理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已经崩溃，没有一种哲学具有以往哲学那样的普遍约束力，能为人的全部“此在”提出或揭示出既定的标准，或经过明释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标准。

这种突破又显示出西方在世界上传播自己创造的外在文明、自己逐渐明晰的意识及其各种后果，它侵吞原始人和不发达文化，使不发达文化解体，使之濒于解体，而且还要消解同西方文明与经济并存的发达文化中的思想世界、形而上学和宗教，包括中国和印度的文化。

3. 对人类发展的判断与希冀

韦伯在书的最后部分简要提出了一些判断和希冀，作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展望。

1) 新的历史区形成：世界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仍会促使保留或重新形成几个彼此间联系较紧密的大区。资本主义仍会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在世界上迅速扩张。几个历史性大区将会形成：东亚、俄国、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印度东部和中南半岛。西方的人口数量会出现停滞，西方世界人口的重心会偏向有色人种。

2) 非西方世界的未来：会受到现代技术进步及其改造作用的影响，其程度主要取决于各大区的社会结构和人们如何看待技术进步。俄国将会被理性主义技术方式改造，在思想上则会反传统主义。在东亚、印度和伊斯兰世界，资本主义将会大规模进军，其势

²³ Vgl. Weber, Alfred: "Kulturgeschichte als Kulturosoziologie", München: R. Piper Verlag, 1960, S. 447-450.

头在东亚会最强。印度和伊斯兰世界被资本主义改造和技术化的速度尽管不快，但也会加入此进程。

3) 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的各种技术性组织，而且是大型组织，会形成等级化的运作方式，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同一切都将变得大众化（*Vermassung*）的趋势构成矛盾。解决该矛盾的过程将是社会结构重构的过程，亦是民族、国家、经济建设中的根本问题。

国家和经济不再分离，因为大型经济形态对于社会生活至关重要，国家不能放任它自由运作，民众成为经济领域组成部分，却不能控制民族命运。因此，将经济纳入国家体系，使它为国家服务，使它融入民众思想精神的整体，使民众思想精神的整体在国家中体现，即是西方世界面临的挑战。大型经济只能借助国家力量和国家在多方面的干预才能运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越来越联结为国家中的“民众共同体”，而国家的任务则在于形成一个能让民众充分发展经济的框架。

在西方的思想建设方面，现代技术文明让人们生活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但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必定会是思想精神存在的尺度之一和基础之一。民族多样性、民族命运多样性、各民族中群体多样性体现出哲学具体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将会继续存在。但一个事实无法抹杀：有三种特性仍然活跃在西方人身上，它们汲取了西方人最初的本质和历史上的文化精神，是西方构建新认同感的要素，即：具有扩张性的生活欲望、基督教世俗化时期保留下来的博爱感、西方人的自由意向。

四、简要论评

韦伯虽然在书的结尾指出：“本书的任务不在于深刻理解历史的意义，而是尽可能借助社会学手段来阐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的本质性。”^④ 但该书精要勾画了世界主要古老文化和社会、国家的发展历史及其主要成就，展示了人类文明从蒙昧到理智的发展，人类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及其纵向与横向渗透与交流，以及人类不断超越自身、创造历史的过程；它从历史哲学角度以共时、历时两条线索，阐释了社会、文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梳理了每个主要文化区在各个历史阶段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并分析了这些文化区及其历史大事件的本质。由此，韦伯在书中展示了人的自发性（*Spontanität*）创造历史的进程，这种进程又是各种文化、文明相互渗透和交流的过程，它成就了多样性的文化与文明，而每种文化与文明亦是其相互交往的结果，包涵着其他文化与文明的成果。

韦伯的这种注重人的自发性的根本态度来源于他生活其中的西方文化语境，深受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精神和基督教影响。他身处工业文明位于世界前列的德国，但没有秉持社会学的传统基调，看待人类发展问题的视角并无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依然高度评价当时尚未经历工业化的国家、社会和地区曾经对世界文化和文明史作出的巨大贡献，如中国、印度、埃及、伊斯兰世界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印度和其他东方文化的稳固状态构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依托和背景，并在书的最后指出这些古老文化都因西方技术文明扩张而面临消解的危险，透露出

^④ 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姚燕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406页。

担心与遗憾之情，反映出他并无民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而是对西方技术文明及其文化局限性多有反思。

韦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指出的传统古老文化如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所谓西方“理性”的扩张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此问题日益凸显。它和韦伯指出的文明进步并没有促进国家间的彼此理解和共识这种现象相伴相随，一直延续至今。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文明发展促成了新的文化、文明的产生和丰富，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社会变迁是民族迁移和战争征服所致。在技术文明克服了地理距离、民族不再大规模迁移的今天，战争却没有消除，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依然起因于国家间经济利益的争夺和不同文化之间，甚至同一文化之中不同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而且，技术还使战争的危险性和破坏力上升，技术文明的外壳不能解决思想意识、精神文化这个文明内部核心中产生的根本冲突，人类生活的空间因为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开阔，拥有更多选择，但也面临和技术文明伴随的价值观冲突、战争危险、生态平衡遭破坏等多种威胁。如果没有多样文明之间和平合理的跨文化交往，这些威胁依然不会消除。正如韦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指出：“我们今

天不再生活在 19 世纪的地球，19 世纪还可以使地球根据权力强弱分崩离析、切割分离，形成相互争斗的一个个区域，且不强求人类内心的归属感和人性的水平为这个过程做心理基础。我们现在生活在地理范围依旧，但距离变小的新地球上，每天，一切都对一切产生影响，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一切又取决于一切。只有实现和积极地激活这种内心的归属感，即一体感，一种与地球新整体及其各组成部分相适应的外交政策，才能存续，才能完成为未来几个世纪做准备的任务。国家间的对抗转变为亲近，从政治上使经济的密切联系上升为符合这种亲近关系的共存秩序，便是这任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②5} 世界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历史是各国、各地区、各民族跨文化交往的进程，每种文化本身都蕴含着跨文化交往的历程与成果。国家间的跨文化交往和文明间交往将会继续，其规模之大和辐射范围之广都不同于往昔，与之相伴的仍将是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融通或冲突。然而，国家间的对抗转变为亲近，意识到当今人类处于命运共同体，建立韦伯所说的“共存秩序”，也就是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国际秩序，仍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与首要任务。

作者简介：姚燕，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

^{②5} Weber, Alfred/Mitscherlich, Alexander: “Freier Sozialismus”, Heidelberg: Lambert Schneider Verlag, 1946, S. 62.

六阶跨文化敏感度模型的 民族中心主义局限性^①

赵倩

【摘要】贝内特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六阶模型分为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相对主义两大阶段，共六小阶。该模型本身存在民族中心主义的缺陷：开发者是从西方文化出发，将模型建立在俯视或平等对待异文化的基础上，而未考虑缺乏自信的弱势文化视角。弱势文化成员的文化敏感度无法归于其中任何阶段，因为其是以仰视眼光看待强势文化的。本文在对中国留德学生的质性访谈基础上，借助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现象，论述该模型的局限性并对其进行补充。

【关键词】六阶跨文化敏感度模型 民族中心主义 他者中心 质性访谈

理论是解释和预测概念间相互关系的连贯体系。“研究翔实的理论给跨文化交际情境中产生某些情感和行为的原因提供了系统的解释”^②，而“模型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模式，可以展示对特定事件的解释或预测”^③。很多理论模型能更加直观地展示理论内涵，因而更容易推广和为人接纳。与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相关的理论模型很多，这些模型在诸多研

究中广为应用。但随着国内学者文化自觉的不断发展，人们渐渐发现很多应用广泛的理论和模型均来自于西方，其研究过程以及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研究者母语文化的影响，因而使用这些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研究者常常会体会到这些理论的文化局限性。

早在上个世纪中叶，人类文化学、民族志学的研究者便注意到了“研究者文化背景

① 本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② 丁允珠：《将面子——协商冲突理论用于实践》，载《跨文化培训指南》，关世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1—302页。

③ 狄恩·普鲁特，金盛熙：《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第三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

的影响”^④。研究者的个人理论倾向与社会实践都会影响到资料收集的方向、内容以及研究路径和结果阐释，“研究者的文化背景也往往无意识地影响了其对被研究者的了解”，^⑤因此，在与人类文化学和民族志学一脉相承的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和知识建构中，如何规避研究者的文化偏见是一个重要问题。

一、六阶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

弥尔顿·贝内特（1993）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MIS）是用来界定人对跨文化环境敏感程度的。该模型以开发者长达15年的跨文化培训和教学经验为基础，^⑥是描述人们跨文化学习过程的一种建构性发展模型，

展示了在跨文化学习过程中人们的敏感度不断发展变化，与此同时他们的认知和行为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该模型展示了个体对待另一种文化和其差异的情感态度。”^⑦它既与跨文化学习联系紧密，也和跨文化能力的发展息息相关。

所谓跨文化敏感性，指的是有能力了解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和相似之处，而这又会影响不同文化人群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⑧ Hammer et al 认为跨文化敏感度和跨文化能力不同；前者指的是能够认知重要文化差异的能力。^⑨而 Thomas 则指出，跨文化敏感性的意义在于，行为者能够通过对自身和他者导向系统的对比，继而在跨文化语境中敏锐地作出反应，并部分接纳交际对方文化专有视角的能

④ 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1页。

⑤ 同上。

⑥ Göbel, K.: “Qualität im interkulturellen Englischunterricht: Eine Videostudie”, Münster, 2007, S. 39.

⑦ Barmeyer, C.: “Taschenlexikon Interkulturalität”,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2, S.42.

⑧ Scott, E.: “Digital research cycles: How attitudes toward content, culture and technology affect Web development”, Ann Arbor, 2009, S.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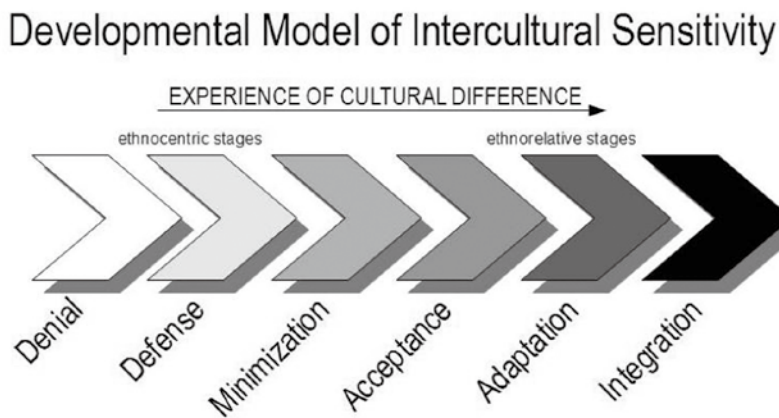
⑨ Vgl. Hammer/Bennett/Wiseman: Measur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The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 S. 422,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Nr. 27, S. 421-443.

⑩ Thomas, Alexander: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Grundlagen, Probleme und Konzepte, S.121-140, in: „Erwägen, Wissen, Ethik“, Nr.14, 2003, S.141.

力。^⑩

1. 模型结构

图 1：贝内特六阶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MIS）^⑪



该模型将跨文化敏感度的发展分为两大阶段：民族中心主义阶段和民族相对主义阶段，二者表达的是人们对文化的基本态度。所谓“民族中心主义”，有的学者也称其为“我族中心主义”^⑫，是指“不加反思地将本群体或者社会的规范和观点转嫁到其他群体或社会的态度”^⑬。它将本文化视作正确、合理和先进，将其他文化视为错误、不当和落后。而所谓“民族相对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态度，人们愿意探究自身文化标准和观点的缘由及背景条件，愿意接纳和理解其他群体或社会的文化标准和观点，并将其视为“势均力敌”或者平等。^⑭民族相对主义在面对其他文化的时候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

并认为不同文化是平等的，没有孰优孰劣的差别。通常意义上人们认为，“民族相对主义构成了跨文化学习过程以及有效跨文化合作的基础”。^⑮

这两大阶段又分别由三个小阶段组成。民族中心主义阶段里包括：否认、防御和忽视（或：差异最小化）三小阶；民族相对主义阶段则包括：接受、适应和融合三小阶。

2. 各个阶段的内涵

贝内特六阶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的前三小阶被命名为“民族中心主义阶段”；后三小阶被命名为“民族相对主义阶段”，这两个概念分别为两大阶段确定了文化态度的基调，

^⑪（作者不详）：<http://jilltxt.net/wp-content/uploads/2009/09/bennet-model-final.png>，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年4月30日。

^⑫ 陈国明，安然：《跨文化传播关键属于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6—67页。

^⑬ Barmeyer, C.: „Taschenlexikon Interkulturalität“,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2, S.55.

^⑭ Ebenda.

^⑮ Ebenda, S.55.

前者以母语文化为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的核心标准，而后者则恰好相反。

贝内特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第一阶段的第一小阶是“否认”。这一小阶的特点在于，文化成员不假思索地将本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视为绝对正确，对异文化则不知不觉，甚至将异文化成员视为异类非人。^{①⑥}之所以存在这种极低的跨文化敏感度，原因通常在于人们与外界隔离，无法接触到异文化，因此极度缺乏对异文化的认知和经验。按照麦格

雷恩的观点，“早期西欧人常常将异文化的他者视为非人，如食人野兽一般，或是像儿童一样心智未开的人类。”^{①⑦}中国台湾土著布农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之前，就曾把异族人视作“非人”，与其相遇便会将其“出草”。“出草”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土话，指的是把敌人的头颅割下的行为。^{①⑧}当时台湾土著少数民族的这种跨文化敏感度较为明显地处于“否认”小阶，文化成员由于生活环境的闭塞而对异族和异文化的存在浑然不觉。

表 1：贝内特六阶跨文化敏感度（DMIS）的具体内容概括^{①⑨}

民族中心主义阶段 将自己的世界观作为现实的中心。在第 3 小阶里人们借助文化相似性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			民族相对主义阶段 文化在彼此的关联中得到理解。在具体文化语境的背景下对行为做出阐释。没有对或错的绝对标准。		
否认	防御	忽视（或：差异最小化）	接受	适应	融合
在跨文化情境的概念中不考虑文化差异。	十分强调文化差异，同时贬低其他文化（负面刻板印象）。	“所有人都是相似的”差异被最小化。文化价值被误认为是普适性的。	文化差异被接受和尊重。意识到行为受文化的制约。	能考虑其他文化的参照框架。从认知上预言并考虑文化差异，以便有效地与异文化的人打交道，共情 ^{②⑩} 。	可以适应不同文化。在不同参照体系的基础上评价价值观念，进行跨文化调解。

第二小阶“防御”相对于第一小阶文化敏感度已有所提高。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异文化以及文化间差异的存在。这是与第一小阶主要的不同之处。不过在第二小阶里，人们

一方面强调文化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却仍旧遵循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态度基调，而将母语文化置于异文化之上，认为自己的文化更加文明和先进。比如人们会采用诸如“排

①⑥ Bennett, M.: “Becoming Interculturally Competent”, Newton, 2004, S.63.

①⑦ 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页。

①⑧ 同上，第16页。

①⑨ Göbel, K.: „Qualität im interkulturellen Englischunterricht: Eine Videostudie“, Münster, 2007, S. 40. 由作者译成中文。

②⑩ 所谓“共情”是指“为了正确地理解和诠释异文化成员的观点和行为方式而设身处地体会他人感受、想法及意图的能力”。Barmeyer, C.: „Taschenlexikon Interkulturalität“,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2, S. 50.

谤”或者确立“负面定型观念”的手段来对异文化进行防御和抵抗。^① 异文化成员往往被强加以负面的性格或文化特征。比如在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被奉为支配性宗教，受其教义的影响，有着其他信仰的异文化他者被认为是受到撒旦的引诱而堕落的人群。另如《镜花缘》中描写的中国文人对中国以外的异域风情缺乏探索动力，笼而统之地做出负面的价值判断，甚至对其嗤之以鼻，可以说，其跨文化敏感度也处于“防御”这一小阶。

在第三小阶“忽视（或：差异最小化）”中，文化敏感度进一步变化。人们了解异文化，但同时认为它很不重要，其意义被降到最低。在此前提下人们开始漠视文化差异，认为不同文化的人群都是类似的，而自己母语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不仅适用于本文化而且适用于异文化。第三小阶的特点类似于大国沙文主义，即，尽管人们很清楚其他文化与自己不尽相同，却认为自己的文化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具有这种文化敏感度的人群通常会尝试对异文化的他者进行同化，使其皈依并接纳外来的价值理念。比如，罗马帝国统辖的疆域除了希腊诸城邦之外，还包括西欧、地中海、北非等地区，那些地区的文化千差万别。在必须想方设法维持帝国秩序的背景下，基督教的地位被不断提升，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宣扬普世价值，它教化众生容忍，并提倡平等对待异文化的他

者，因此它协助罗马帝国建立起了包含不同文化在内的帝国秩序。但是基督教并未发展建立起了解异文化的系统知识，而更多的是将自身的普世性教义推广给了异文化他者，从而对其进行了同化。^②

在民族相对主义阶段，人们“承认并尊重”文化差异，并将文化差异看做是基础和必要的。^③ 比如随着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以及哥伦布在美洲大陆的地理大发现，当时一直笃信太阳绕着地球转、欧亚非大陆是世界中心的世界观幻灭，这开启了一种崭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人们逐渐发现地球是一个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整体，民族相对主义的文化态度渐渐产生。^④ 第四小阶到第六小阶，即“接受”、“适应”和“融合”都建立在民族相对主义的基础上。

“接受”阶段强调平等地看待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并接受这些差异。下一小阶“适应”阶段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不仅在认知层面上接受差异，而且还会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或思维方式，以便适应异文化，并可以根据文化参照框架或者文化差别，运用共情能力在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转换自己的行为和思维范式。^⑤ 而第六小阶“融合”是个对不同文化融会贯通的阶段。处于该阶段的人们不再会将自己绝对归属于某种特定文化，而总能根据具体的文化语境来决定自己的言行举止，并同时也超然其外。这个阶段的行为方式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具体行为必须放在具体的

① Willems, J.: „Interreligiöse Kompetenz: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 Konzeptualisierungen - Unterrichtsmethoden“, Heidelberg, 2011, S. 195.

② 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17页。

③ Willems, J.: „Interreligiöse Kompetenz: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 Konzeptualisierungen - Unterrichtsmethoden“, Heidelberg, 2011, S. 195.

④ 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18页。

⑤ Willems, J.: „Interreligiöse Kompetenz: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 Konzeptualisierungen - Unterrichtsmethoden“, Heidelberg, 2011, S. 195.

语境中加以衡量和判断。

六阶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是在跨文化培训实践中基于对人们跨文化敏感度发展的观察总结得出的。除了可以用来描述个体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之外，该模型中单个阶段的特征还与不同地域的某些历史阶段的总体跨文化敏感度特征相吻合。当然，不同地域的历史阶段文化敏感度的发展并非是按照贝内特模型的顺序进行的，而是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态势。

二、他者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相对主义的中间阶段

纵观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自从人文主义方法论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相分离，人类学、人类文化学等人文学科便不再纠结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二者如何超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对立问题，转而强调在人文科学中不仅仅被研究对象是“人”本身，具有主观能动性，而且也有必要思索研究者的自我角色问题，并主张研究者不断自省。如何在研究中剔除“研究者的文化偏见”成了人文主义方法论的重要话题。^{②6}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贝内特的六阶模型会发现，模型本身恰恰暴露出开发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以及文化偏见。该模型的开发者显然是立足于西方文化，自上而下，或者至少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母语文化和异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的。从美国、西欧文化出发来看六阶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会觉得模型的各个阶段合情合理而且完整易懂。然而以比如中国文化特定的发展阶段或者某些中国人的文化敏感度作为研究对象时，却会发现该模型缺少了一个中间阶段。因为从处于弱势地位，缺乏文化自信，甚至带着些许“异文化中心主义”倾向的文化视

角观察这个模型，我们会发现该模型本身打着模型开发者民族中心主义的烙印。

1. 他者中心主义

贝内特六阶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缺失的中间阶段不仅仅是该模型个案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化态度只有两种：一是“民族中心主义”；二是“民族相对主义”。这种基本文化态度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方研究者自身的文化强势感。处于弱势文化的人群，由于长时间处于劣势，其文化态度很有可能会展现出“他者中心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弱势文化群体在经历了由生存环境闭塞所导致的民族中心主义，继而逐步了解了西方强势文化之后，在文化势差、经济差距的影响下，可能转向“他者中心主义”。在这种“他者中心主义”阶段中，他们会表现得对母语文化缺乏文化自信，甚至倾向于认同他者文化，尤其是强势文化的行为思维范式、文化规范。可以说，对于弱势文化群体而言，这种“他者中心主义”存在于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初期阶段，尤其是在特定人群身上会较为明显和突出。下面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以及德语专业学生为例来分析这个问题。

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人们一夜之间看到了西方国家发达的经济，自由的作风和富足的生活。相比之下，当时国内的情况，无论是从经济硬实力上，物质条件上，还是从文化软实力上，在精神层面上，都与西方国家差距较大。人们意识到，自己之前一直所笃信的生活在所谓“水深火热”中的外国人原来早已把中国落下很远。在这种中西方经济差距和文化势差的作用下，文化自卑感在很多人身上悄然出现，甚至产生了崇洋媚外的心态。持有这

^{②6} 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0页。

种文化自卑心态的人凡事必称国外，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标准，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有人盲目追求国外的行为方式、穿着打扮和生活作风；崇信国外科技和产品而导致了对外国产品技术的假冒伪劣行为，有些国产品牌则堂而皇之地被冠以外国名称。所有这些社会现象都与某些国人“他者中心主义”的文化自卑心态不无关系。

这种心态也影响到了人们跨文化敏感度的发展，有些人在认识世界以及与异文化成员打交道的时候，会以异文化的规范作为标准。在这种以他者文化为中心的心态下，人们同样可能表现出“接受”或者“适应”，但这却与贝内特六阶模型第二大阶段中的“接受”和“适应”区别显著，因为后者是以文化平等，即民族相对主义的态度为基调，而前者则认为自身的弱势文化应该服从于他者的强势文化。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个特殊时代具有一定程度的他者文化中心主义色彩，那个时代的国人也一定程度上具有以他者文化中心主义为基调的文化敏感度特征。

只要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间的文化势差存在，弱势文化群体就会抱有这种“他者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态度。

2. 中国赴德交换生的他者中心主义倾向

笔者在 2015 年简短采访了 3 名赴德学习

过一年的中国交换生和 2 名德国留学生，以了解中国交换生在中德交际中的文化敏感度特点。作为德语专业的研究生，她们在过去 5 年中系统学习了德国语言、文化、经济、社会等课程。

1) 中德文化间的文化势差

受访的中、德研究生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双方都认为在中德跨文化语境中，中国学生显现出“忍耐”和“防御”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妥协、接受、沉默和回避”以及“被动、谨慎、不够决断”。而德国留学生则偏向“主导”和“进攻”：具体表现为“绝对、权威和富有决断力”以及“攻击性强、积极主动和主意多”。中德双方学生遇到问题时的交际行为，如在批评行为、论理行为和坚持行为上也存在差异，受访的中德学生都表示，中方一般不愿批评、论理能力较弱，对自己的观点不够坚持；而与此相比，德方则倾向于直接批评且批评得更为频繁、习惯于论理并显得更为坚持。

如果将较为普及的中德两种文化的特征进行对比（见下表），会发现，相对于德国文化，中国文化具有更高的情境取向（社会和谐、人际关系、人情、面子等），就个体表现而言，显得更为内敛，而不是直接或者外显。

表 2：中德文化标准对比

中国文化标准 ^{②7}	德国文化标准 ^{②8}
社会和谐与差序格局	就事论事

②7 Vgl. Liang, Y./Kammhuber, S.: Ostasien: China, 173-182, in: Thomas, A./Kinast, E.-U./Schroll-Machl, S. (Hrsg.):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operation, Band II: Länder, Kulturen und interkulturelle Berufstätigkei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7, S. 171-185.

②8 Vgl. Schroll-Machl, S.: Deutschland, 74-82, in: Thomas, A./Kinast, E.-U./Schroll-Machl, S. (Hrsg.):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operation, Band II: Länder, Kulturen und interkulturelle Berufstätigkei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3, S. 72-89.

续表

中国文化标准	德国文化标准
等级观念	重视结构和规则
关系和人情	时间计划
群体导向	内化控制
面子观	私人领域与工作领域分开
礼貌	低语境（直接）
规则相对主义	

上表中的中德文化特征并不是跨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是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²⁹。不过，在中德跨文化交际语境中，中国文化的内敛与德国文化的外显很多时候上被放大，因而突显出来。当中德两种文化相遇时，就事论事、注重规则且表达直接的德国文化会显得更为强势。

对5名中德研究生的小规模访谈基本印证了表2中理论对比的结果。当然，在现实交际场景中，中国学生显现出的文化弱势不仅来自于两种文化的内在原因，而且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这个中德跨文化群体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莫过于他们学习的专业以及他们交际使用的语言。

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德语专业的中国学生在和德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者中心主义”的文化态度更为明显。因为他们所学习的专业以及主要使用德语作为交际语这两个特点都强化了双方间的文化势差，从而凸显出了中国学生“他者中心主义”的倾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能展示中德文化相遇时，在文化势差影响下交际者的文化态度。

2) 中国学生的他者中心主义倾向

在与德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中国学生的文化态度呈现出以下特征：

• 忍

根据受访的3名中国学生的讲述，德国人在争论时习惯于较为直接的批评、更善于论理，并愿意坚持自己的观点。在遭遇德国文化的这种强势展现时，几名中国学生的表现有点“忍气吞声”。她们尽管有时会暗自生气、不满，但却囿于各种因素而大多选择了默默忍受，她们为此列举的原因有：“我们毕竟是外国人！”“现在是在他们的地盘上（德国）！”“我们说的是德语，学的是日耳曼语言文学，规则是他们说了算，我们怎么争！”

中国学生A被一名德国同学拉到一个数十人组成的微信群里，该德国同学在亚洲旅行途中曾在微信群里抱怨在中国经历的一些小事，比如她一路上就说“中国的厕所什么的确实很臭”，还说：“虽然我不能说我喜欢俄罗斯，但是我觉得它肯定比中国好，……只要这个东西不是中国的，我就会觉得它很好。……”布尔津那个地方可能比较有异域

²⁹ Liang, Y./Kammhuber, S.: Ostasien: China, 173-182, in : Thomas, A./Kinast, E.-U./Schroll-Machl, S. (Hrsg.):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operation, Band II: Länder, Kulturen und interkulturelle Berufstätigkei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7, S. 171-185 ; Schroll-Machl, S.: Deutschland, 72-89, in : Thomas, A./Kinast, E.-U./Schroll-Machl, S. (Hrsg.): “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operation, Band II: Länder, Kulturen und interkulturelle Berufstätigkei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3, S. 72-89.

风情，然后她就一直说：“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在中国了，感觉好高兴啊！”或者是说：“我今天居然在布尔津找到了一个不臭的公共厕所，这更让我觉得不在中国了……”

看到诸如此类的留言，A 的感觉是：“当时我就最生气！……我就觉得天啊，这个话好伤人啊，你要不就把我从这个群里删出去，要不就别说了！尤其就觉得当着别人的面，毕竟我们是有中国文化圈的成员在里面！我就觉得她这样说话，按照我们的想法就比较伤人……”

后来这个中国学生 A 没有再看过那个微信群的聊天内容，但是也并没有主动退群。

在交际双方行为规范发生偏差时，3 名中国学生大多选择了忍。从某种意义上讲，“忍”这种行为范式是弱势文化成员“他者中心主义”的一个特征。

• 接受

3 名中国学生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德方的规范。在和同学老师进行专业交流时自不必说；除此之外，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日常生活里和其他德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她们也倾向于接受德方的想法。

中国学生 B 回忆自己在德国的经历时这样说道：

“只要没有让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就是我不太愿意去跟德国人争，因为在人家的国家，肯定是他们知道得更多，……，（我）可能会倾向于接受他们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就是不到特别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小问题的话，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那你是德国人，那就你的好了。”

但针对这一点，当被问及曾遇到过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而和德国人去争论过的时候，笔者得到的回答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事情基本没有发生过。

当出现误解，气氛变得紧张时，学生 B 常常会这样想：“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肯定是我听错了，我的德语出了问题！”

中国学生 C 则认为：“自己在德国的时候可能会更小心，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外国人。”当她有不同意见时，她表示：“跟德国人有的时候我会表达出来吧，但是少。中国人我就觉得无所谓，差不多我都会表达。”

• 适应

在长时间与德国人接触的过程中，学生们的行为、思维范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学生 B 讲述了自己去德国交换学习前后对不同意见的看法，认为在这一点上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在 3 名学生中颇有代表性：

“……在我们遇到不同看法的时候，他们（德国人）会去陈述他们的观点，你也看不到他们很 emotional（情绪化），大家都是在就事论事，谁能说服谁就采用谁的观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交流的状态。我觉得我以前的话会更情绪化一点，就会上升到个人啊，上升到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什么的。我现在去讨论事情的时候会更加就事论事一些，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改变其实还是有的。”

除此之外，学生 A 感觉自己的适应或者行为变化并不彻底，她觉得中国传统的面子和人情关系观念仍旧对她是否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比如直接表达不满、就事论事地展开论理等产生影响：

“我觉得我们反而是更陌生的人，比如说一个服务员‘咚’一下把瓶子砸到桌子上，经常上菜不注意，溅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很生气，然后找人家理论。但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是熟人不可能吵，就觉得以后大家还得天天见面。……关系怕受影响，但陌生人的话就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跟陌生人更好开口。”

从对几名德语专业的中国交换生进行的

简单访谈中可以看出，她们在与德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处于一个相对的文化弱势地位，对本文化的做法和规范缺乏自信，因而大多会选择接受、适应德方的观点和规则；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未能在真正意义上平等地看待本文化与德国文化，因此她们在接受和适应德方的过程中内心会产生纠结、不甘甚至苦恼的感受。这正说明了，她们体现出来的“接受”和“适应”这两个跨文化敏感度的特征既不是建立在民族中心主义，也不是建立在民族相对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带着“他者中心主义”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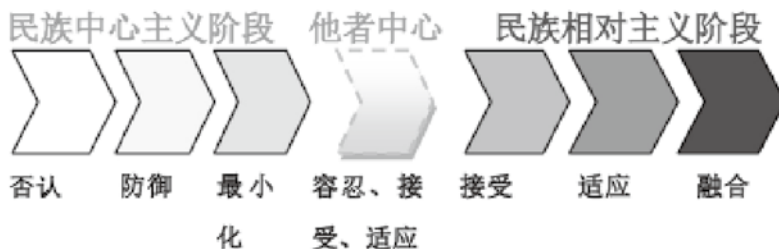
如果说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贬低母语文化，盲目崇拜他者文化包含一些负面色

彩的话，那么中国政治经济硬实力都得到大幅提高的今天，“他者中心主义”更多地应该被理解成为中外文化势差以及环境因素导致的一种中性的、很难加以褒贬的、自然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态度也相应地约束和影响着当事人的文化敏感度。

三、从弱势文化视角对模型的补充

综上所述，弱势文化群体成员“他者中心主义”的文化态度以及受其影响的特殊的文化敏感度现实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些人群，但并未被纳入贝内特六阶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补充。

图 2：补充后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



正如图 2 中所展示的，在不改变“民族中心主义”定义的前提下，笔者给贝内特的六阶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DMIS）补充了“他者中心主义”这个中间阶段：作为适用于某些弱势文化、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些人群的跨文化敏感度阶段，它可能显现为“容忍”、“接受”和“适应”。不过这个阶段的“接受”和“适应”与其后“民族相对主义阶段”的“接受”与“适应”有着不同的文化基本态

度。前者更多地是以他者文化为标准，后者则以平等看待不同文化为基础。

通常情况下，这一中间阶段往往会在弱势文化群体成员的跨文化敏感度上显现，而且会在一些外部环境因素，诸如经济实力和行业特征的影响下得到强化；或者随着这些外部环境的积极变化而被削弱，从而成为一个向着民族相对主义发展的过渡阶段。为此笔者在图 2 中给该中间阶段使用了虚线框。

作者简介：赵倩，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关于《中德关系》课程建设的思考与探索^①

于 芳

【摘要】结合本课程的教学实践与教师培训的理论收获，笔者从教育理念、教学思路、推动阅读、合作学习、反馈与评价等方面阐述了对于课程建设的思考和探索，以及目前取得的成效，在不断地改进中寻求实现更理想的教学内容、更合理有趣的教学大纲、更生动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更体现学生思考与成长的评价方式，使学生的国情研判能力、创新和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所增强。

【关键词】教育理念 阅读 合作学习 评价

在多年教学和生活中，我和同行们注意到有一些现象经常出现，比如：

— 学生学习了德语、了解了德国汽车、足球等其他相关信息之后，觉得德国什么都好，是一个完美的典范，甚至在不同主题的小报告中提出，中国应当直接采用德国的模式；

— 在中文媒体中不乏对“德国制造”的溢美之词，以对青岛下水道的报道^②最为典型，诸如“中国最不怕淹的城市，不管下多大的雨，积水从不会没过脚脖子，这得益于上世纪初德国人……早在100多年前，德国人就为这个沿海小渔村，设计了足够使用百年的现代排水系统，其中雨污分流模式，即使

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城市未能做到”，此类文字，对德国产品的质量近乎神话式的夸赞，但没有显示出对于事件的真相多加关注；

— 学生在完成学业后，跟德语国家的友人打交道时对对方国家比较了解，对于德语国家的文学作品、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有比较系统的认识。但在谈及到本国国情和社会事件的时候，却往往失语。这里有不了解本国国情的因素，也有不会用德语表达具有中国特色内容的因素；导致的结果便是能够将德国的优秀之处传播到中国，但对外解释中国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① 本文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德关系课程建设项目》的资助。

② 《青岛下水道传奇》，<http://dichan.sina.com.cn/zt/gulli/>，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5-12。

以上种种现象不仅令人思考，只了解对象国、带着玫瑰色眼镜看待对象国的学生是我们的培养目标吗？我们的培养计划、课程设置是如何导致了这种现象？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如何能够改进这方面的不足，让学生能够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真正做到具有自己的思考？

笔者带着这些问题参加了2016年4月外研社组织的全国高校德语专业青年教师培训。在这次培训中，无论是贾文键教授关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导向的解读，还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及浙江大学的专家做的报告和演示，都给笔者带来了许多启发。

经过思索和整理，笔者结合最近几年来在教学上的实践、困惑和收获以及在培训中所吸收的最新理念，写成本文，作为对几年来专业倾向课程建设和教学的一个总结，也激发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创新，努力完善专业倾向课的课程设置、教学效果和教材编写。

一、教育理念和思路需要跟随时代需求而转变

根据国家教育长期发展纲要，对各专业本科生的教育教学质量都提出了新的规划和要求，因此，德语专业教学也应当立足于国家标准，培养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对于德语专业本科生能力的要求，国家标准提出了如下几点：

1. 语言能力：学生应能理解德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的信息、观点、情感；能使用德语口语和书面语有效地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情感，再现生活经验，能借助语言工具书和相关资源进行德汉互译工作；能运用语言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对语言现象进行思考和分析。

2. 文学能力：学生应能理解德语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主要思想；能欣赏作者的创作风格、创作技巧和语言艺术；能运用文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

3. 国情研判能力：学生应能掌握德语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知识，对德语国家的重大社会事件作出初步研判。

4. 跨文化能力：学生应能通过专业学习认识世界的多样性，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现象；能敏锐觉察、合理诠释文化差异；能运用适当策略完成跨文化交际任务；能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5. 思辨与创新能力：学生应能对概念、论据、方法、标准、背景等要素进行阐释、分析、评价、推理与解释，能综合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提出见解、探索方法、解决问题。

6. 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应能对学习进行自我规划、自我监管、自我评价、自我调节；能组织、配合他人开展学习活动；能及时总结、善于借鉴有效学习策略、改进学习方法；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学习。

这份规划对于德语专业教师而言意味着，教学应当遵循《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德语本科教学大纲》，以教学内容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导向，重视语言综合运用和思辨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要面向全体学生授课，同时也要应当合理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采取不同方式组织教学，注意因材施教，帮助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保证教学质量。

浙江大学李媛教授在报告开场播放了一段名为《未来扑面而来》的视频短片^③，主题是“这是一个变化的世界”，其中令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几帧画面是：

“纽约时报一周的信息量是18世纪的人一生的资讯量。”

③ 《未来扑面而来》，<http://baidu.ku6.com/watch/826370351856834756.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6-5-12。

“收音机达到 5000 万用户用了 38 年，电视机达到 5000 万用户用了 13 年，互联网达到 5000 万用户用了 4 年，Ipod 达到 5000 万用户用了 3 年，Facebook 达到 5000 万用户用了 2 年，新浪微博达到 5000 万用户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些数字呈现出的趋势也是目前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的信息飞速传播。而在巨大的信息量和知识量面前，教师是否有能力有必要将所有知识传授给学生？还是选择打破陈规，将获取知识、筛选知识、分析信息、做出判断、进行研究的能力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未来做好准备？

无论是国家的长期战略规划，还是我们切身感受到的社会变化，都表明作为一名教师，需要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在传统的语言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能力、国情研判能力和思辨创新能力。随着理念的转变，必然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方面面提出新的要求，应根据具体课程不断调整。下面将依次阐述笔者对上述两大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二、教学内容的调整

1. 教学大纲的设计

对于课程建设和建设而言，制定一个好的教学大纲非常关键。然而如何制定好大纲是一个挑战，尤其需要摆脱教师自己在做学习者时所学的相关课程对自己的影响，摆脱所谓的“核心参考书”和“基础课题”的影响。之前，在制定教学大纲时，笔者多以自

己手头所掌握的教学材料为基础，先设定好学生每次课需要阅读的材料，然后在课前给学生安排阅读任务以及课上的研讨主题，然后以此来设计大纲。然而，当笔者转换理念，从教学目的的角度来思考时，我开始明白，制定教学大纲应该首先考虑本课程的基本目标，根据基本教学目标来确定每次课的阅读材料和主题。

教学大纲对于吸引学生选课非常重要。除了每次课的主题和阅读材料之外，教学大纲还应该对学习这门课应当具备的背景知识、上课内容、阅读书目和教学顺序有详细的说明，还要说明各种作业和考试在期末总评中所占的比重。对于学生完成作业情况和出勤率的考核标准也应当在教学大纲中有明确的书面要求。教学大纲是师生间的一种契约，为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提供保障。^④

2. 教材编写

《中德关系》课程最初的教学材料是以 1949—1989 年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1949—1989 年中国和联邦德国关系、1990 年至今中国和联邦德国关系为主要内容的读本，每次课的阅读材料按照上述关系的时间顺序排列，因而每次讲到靠近时事部分的时候，已经是一学年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对中德关系现实发展充满兴趣的学生看来，前面漫长的等待无疑逐渐减少了学习兴趣和乐趣。每课阅读材料之外，还有较多篇幅的词汇练习，其中一部分与课文内容关联不大，主要是关于德语中常见习语的练习和语法练习，练习的重点放在语言知识的掌握上，阅读材料的要求只停留在读懂。

在经过与学生的沟通之后，笔者又翻阅了诸如《中美关系概况》《中日关系二十讲》

④ [美] 哥德史密斯、孔洛斯、戈尔德著：《芝加哥学术生涯规划——从研究生到终身教授》，吴波、叶丽芳、梁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71—172页。

等国际关系专业的双边关系教材，思考外语专业倾向课的特殊之处与应设置的教学目标。经过一系列的交流、反馈和反思之后，笔者明确了一点，即三年级的外语专业倾向课固然要继续巩固语言能力，但仅仅聚焦在语言技能上已经远远不够，必须将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无论是阅读材料本身还是配套的练习，都必须体现出二者的有机结合，不能顾此失彼。在这种考量之下，笔者先将原有阅读材料放在一旁，尽量减少其先入为主的影响，根据教学目标重新搜集和设计课程所需的资料。针对原有教学材料所面临的困境，笔者主要从三个角度重新思考了《中德关系》课的核心内容应当如何确定：

1) 结合学生的学习兴趣、背景知识掌握情况和文字材料的语言难度，让学生能够从形成感性认识到展开理性思考、从理解材料到形成观点再到表达观点，循序渐进地对建交以来的中德关系形成整体认识，以此为序编排相关材料。

2) 借助国际关系学的框架来考察中德关系这一对双边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德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而是将中德关系放在整个国际关系中，作为一组具体的双边关系实例来了解和学习国际关系中的各个要素，了解中德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中国和德国各自的对外关系中所占据的位置，了解除了双边交流与合作之外，还有哪些固有的矛盾和潜在的冲突点，影响中德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中德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及各自依据是什么。这样一来，有助于学生树立起整体观、大局观，并可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依此类推的去观察和分析其他双边关系，避免学生学习后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只了解中德关系；认为中德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认为德语阅读材料不过就是中文官方政策的德语版，没什么意思。

3) 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建立了较好的语言基础，并具备了在课前预习中解决词汇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学材料中简单的德汉对照的词汇表之外，增加了德语释义的动词用法讲解，并辅以德国最近几年《时代报》(Die Zeit)上的句子作为例句，让学生能体会到这些词汇最鲜活的用法。学生的自主学习部分解决了大部分语言障碍，因而对应的词语练习减少，增加了课文理解、德汉互译、小组项目等主观性的、语言输出性的练习，一方面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另一方面对学生的分析思辨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本课程的教材编写尚未结束，但已经完成的部分在使用中带来了新的效果和反馈。

3. 课外阅读

关于学生对中德关系、国际关系、历史、外交等领域的背景知识，本人通过问卷调查有所了解：他们在课前的阅读量比较少，阅读量最多的一位同学也只读过三本相关书籍，论文大部分人都没读过，也不了解在哪里能找到相关论文（参与过大学生国家创新项目的学生相对来说更为了解文献搜索方法）。如果没有课外阅读，那么一学期乃至一学年下来，学生的专业阅读量并未增加多少，这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是大忌。同时，专业知识、背景知识的缺乏又会加剧对德语文字材料的不理解，造成互相影响的不利局面，因此，提供延伸阅读材料非常必要，毕竟课文的篇幅有限，语言难度有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主题做简明导入和概括介绍，如果要深入钻研，还需要查阅更多相关的文献。从学习专业知识的角度来看，仅有课文的阅读远远不够，需要大量的专业阅读，而这一点单靠一周2小时的课堂学习是无法做到的，还需要学生在课下自己安排。

以往笔者会在开学初始给学生一份德语书占多数的专业书单，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到期末时，经过调查发现真正按照书单去阅读的学生非常少，有的学生觉得老师没有做硬性要求，我就不读了，反正也不算成绩；有的学生觉得这些书比课文难得多，读了几页就放弃了；有的学生觉得中文的都还没完全搞明白在说什么，看德语的更看不懂了……学生的反馈表明：仅仅发一份书单显然不是有效的做法。诚然，大学生应当更自主地去学习，应当去对所选的专业课积极地自主钻研，但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教师也应当帮助他们增强兴趣、更有效地引导他们去进一步阅读。

此时，笔者参考了一系列给国际关系学入门学习者的中外教材，发现比一份笼统的书单更实际的做法是，为每一课推荐一到两本与本课主题相关的专著、论文、时评等阅

读材料，以中文为主，外文为辅，供学生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参考。对学生来说，阅读量、语言都不再是负担，更容易激发他们深入学习的兴趣，并且在部分主题中，我也将补充材料的阅读同小组项目结合起来，让学生读完后讲述自己读过的部分或最感兴趣的部分、主要观点、与中德关系的关联，或者通过思维导图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可视化，或者扮演一位关心国际关系的公民角色向相关报刊写一封信，将自己所读所思介绍给收信人，或者写一篇个人反思，探究自己所读的部分有什么观点，文章使他们想到了什么，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学生进行课外泛读。

具体推动学生阅读的做法可以从了解学生阅读开始，注重培养学生坚持阅读、课外大量泛读的习惯。通常在开课之初，笔者会用一份专门的调查表来了解学生的阅读习惯和现状：

表 1：

你与阅读	
名字：	日期：
1. 你觉得自己一周平均阅读多久？（ ）小时	
2. 通常阅读哪些小说、书、杂志、报纸？	
3. 你最喜欢的杂志是_____因为_____	
你最喜欢的报纸是_____因为_____	
你最喜欢的书是_____因为_____	
4. 你喜欢阅读吗？是（ ）否（ ）因为_____	
5. 你最近读过的最有趣的专业书是_____	
6. 你喜欢德语阅读吗？是（ ）否（ ）因为_____	
7. 你觉得德语泛读有助于理解德语文章吗？	
是（ ）在哪些方面有帮助？	
否（ ）为什么？	
8. 你觉得中文泛读有助于理解德语文章吗？	
是（ ）在哪些方面有帮助？	
否（ ）为什么？	

在学期过程中，有部分教学主题和推荐的阅读材料相关，需要学生做小组项目，此时可以看到学生的阅读情况。在其他情况下，笔者会每月抽出一定时间对学生的课外专业阅读加以监督，此时笔者会让学生两人一组，

本人会每月抽出一定时间对学生的课外专业阅读加以监督，此时本人会让学生两人一组，由一人对另一人的阅读情况进行采访并做录音记录或笔头记录并上交，采访内容见表 2：

表 2：

关于课外专业泛读的口头采访记录	
采访者：	受访者：
1. 采访日期：	采访时长：
2. 此次采访中所涉及的课外专业书 / 论文是：	
3. 受访者如何介绍该书 / 论文的内容：	
4. 受访者完成阅读时是什么感受？	
5. 受访者觉得这本书 / 论文怎么样？会推荐给其他人吗？	
6. 受访者的讲述是否自然（不盯着桌子或背诵等等）：	

为了让学生切身体会到坚持阅读的好处，笔者还会采用另外两种方式让学生有直观的感受。通常在第一学期，学生的专业词汇量尚较少，学期初时发给每个人一篇和课程内容相关的文章，让学生阅读一分钟，在停止的地方做上记号，然后在文章上写上名字，交还给笔者；到学期末的时候，我把这篇文章再次发给每个人，还是给他们一分钟阅读时间，这样学生能够直接发现自己通过学习和坚持阅读，阅读速度和理解速度改善到什么程度。每个学生的进展程度不一，可以促使他们反思，更加重视阅读。

到第二学期的时候，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都有所增强，笔者会分别在学期初和学期末发给学生一段 500—600 词的德语文章，附上 10 个问题，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阅读和问答。学期初和学期末学生的完成程度自然是不一样的，再次体现了学生的

学习成效和坚持阅读的效果，也让学生自己切身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教学方式的转变

麦肯齐在 1986 年就提出，优质教学取决于三种以上的专业知识，即学科知识、对学生的了解、对教学方法的认识。艾兰·斯凯尔顿在《对高等教育中优质教学的认知》一文中探讨了“什么是优质教学”的问题，提出了四个认知高等教育优质教学的模型，即传统型（传统的讲座形式为主，加入少量互动环节）、绩效型（课程设置受到考试成绩、评教情况的限制）、心理学型（促动学生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主要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批判型（愿意尝试改变的，教师会提供新的方法和理论，打破学生对事物现有的认知和理解，创建新的教学环境，打破

常规思考及行为模式)。^⑤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讲授式教学曾经非常有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学生学习状态的不同,笔者发现这种方式不能被所有学生有效地接受,因此后来我主要尝试了后两种教学模型。结合前述两位专家的观点,笔者尽量全面了解学生的已有知识,培养学生间的交流与合作,让学生多花时间在实际任务上,在小组项目合作中学生共同确定主题,明确个人的责任,充分利用同伴压力,推动学生个体学习。

自己在备课时需要不断考虑这些重要的问题:

1. 我的课程可以帮助学生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培养什么技能,我应怎样在这过程中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

2. 这门课程需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怎样的能力?

3. 为更好地回答课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自己的疑问,学生应掌握哪些知识?怎样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知识?

4. 当学生面对有争议性的问题时,我应该如何鼓励学生协力解决问题?

5. 怎样帮助学生学会学习、评估、检验自己的学习,保证自己的学习更加有效、主动?

6. 怎样创建一个富有批判型的学习环境,可以在作业里体现我想传达给学生的知识与技能,并通过这些真实的问题和任务吸引学生,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原有的假设和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怎样才能给学生创建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让他们愿意尝试,即便失败,也能得到反馈,并敢于再次尝试?^⑥

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实现教学的目标结构、内容结构、社会性结构、过程结构、行为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实现目标、内容和方法的契合,使得教学过程连贯流畅,遵循教训的导入、习得、巩固三大步骤,这样才能提高有效学习时间所占的比例,令学生注意力保持集中,减少教学干扰。^⑦

从宏观上讲,课堂教学有四种基本组织形式:集体教学、讲授型教学、合作式教学和个体化教学。每种形式都有其优点和不足,见表3^⑧:

表3:

教学组织形式	优点	不足
集体教学	无差别的课堂教学,培养全班同学的学习能力	不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讲授型教学	有大量的教师讲授和引导,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	学生学习成果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很难培养学生的自主性

⑤ 多娜·博伊德,弗雷德·辛格:《优质教学的含义与演变过程:弗吉尼亚雷德福大学教学改革案例研究》,载《教学的智慧——来自世界最好的大学教师的经验》,邢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6—57页。

⑥ 罗娜·弗里:《研究性教学的新尝试》,载《教学的智慧——来自世界最好的大学教师的经验》,邢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⑦ [德]希尔伯特·迈尔著,黄雪媛,马媛译:《怎样上课才最棒——优质课堂教学的十项特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21页。

⑧ 同上,第61—62页。

续表

教学组织形式	优点	不足
合作式教学	训练团队协作行为，为职业生活做准备	不适合用来练习和巩固新知识、新能力
个体化教学	即自主学习，适合用来练习、巩固、复习和检查已学的内容	缺乏合作，对教师传授的知识要求具有严格的系统性和计划性

总的来说，在知识的习得和专业学习上，讲授型教学的效果更好一些；在传授学习方法和能力上，其他形式更胜一筹。最理想的教学形式是讲授、项目学习和自主学习三种形式的均衡运用，目前本课程还未能做到这一步，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在实践中，笔者更愿意将各种方法和理念整合到一起，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个流行的教学方法和理念。

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合作学习。因为团队精神与合作是对学生未来及今后的工作成就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关键素质，二者只有通过社会集体活动才能学会。而教师需要经过有策略的教学行动才能实现有效的伙伴和小组学习，那就意味着在课程准备阶段，教师就必须考虑好以下几个问题^⑨：

1. 计划的教学中，哪些主题、内容和项目适合伙伴和小组学习？
2. 哪些团队学习形式比较合适？
3. 教师如何进行分组？
4. 教师如何鼓励学习小组进行合作性学习？哪些任务设置、展示形式以及学习刺激适合哪个特别小组？
5. 为了解决不同类型的任务，学生应具备哪些能力？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持续不断地

提升学生的这些能力，并让他们意识到这些能力？

在分组原则方面，可以随机分组（如在分组卡片上写上口算题，计算结果相同的为一组；抽取扑克牌，相同花色的为一组；抽取写有小说人物信息的卡片，拿到描写相同人物的学生为一组等等），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分组，那么志趣相投的学生能汇集到一个小组，更有助于互相促进。

在分组之外，更重要的是确立每个小组成员的角色分工，如：

- 组长负责组织工作，分配具体任务
- 汇报员负责准备汇报材料，以小组名义向全班汇报讨论结果
- 时间管理员要随时关注小组的学习气氛，成员是否按照时间规定认真准备
- 记录员负责做学习笔记，记录学习过程，记录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
- 如果小组超过四名成员，还可以考虑增加发言主持人和汇报设计员，设计小组成果的展示形式。^⑩

在课堂导入部分，也有不同的方式来推动所有学生参与进来。目前课堂教学中PPT已经广为使用，但除了展示学生的图片、照片、卡通画、文字之外，在导入部分还可以

⑨ [德] 埃尔克·德赖尔，卡特琳·哈德尔著：《合作学习的99个小贴士》，夏立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⑩ 同上，第32页。

有其他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入主题:

1. 提出一个大胆甚至惊人的主张或论点,但其真实性还有待证实

2. 播放一段无声的电影片段,如纪录片,随后让学生推测片段内容

3. 准备一篇缺少主干部分或结尾的文章,让学生进行猜想

4. 展示照片或图片的一部分,引发学生对缺失部分的推测^⑪

在导入过程中可以通过小组分析来引导思考和学习,而不局限于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问答形式。例如在播放一段无声的纪录片片段后,每个组员得到一张练习纸,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下猜测的主题和问题,然后把自己的练习纸按顺时针方向传递给下一位,每个组员在别人的纸上写下自己的评论;练习纸转完一圈后,每个人总结成果,随后可以用这些成果来继续学习。^⑫浙江大学李媛教授也提到过,学生的学习成果对学生而言是最好的教学材料。在教学实践中,笔者的确感

觉到这种方式的妙处,愿意向同行推荐这种做法。每次学生小组项目完成后的成果,笔者都会妥善保存,作为下届学生的“参考期望值”、激励和知识辅助。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有些教师避开小组学习的一个理由是合作学习期间常常意味着不再有安静的教室,取而代之的是噪音和嘈杂。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参考了一种做法:即播放安静的背景音乐,特别是用于冥想的音乐,不仅使人心绪平静,同时也制造出平和、轻松的学习氛围。^⑬

对于学生的表现和小组项目的评价,笔者借鉴了文秋芳老师在“综合素质实践课”上的评估体系,采用了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和教师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这种做法有利于训练学生的评价能力,对学生形成一种无形的自我约束机制。^⑭当然,评估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因此评估的具体要求必须在学期初就向学生讲解清楚,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

表4:学生自评表^⑮

学生自评表			
姓名_____	学号_____	班级_____	项目名称_____
1. 出勤情况			
有无缺席? 有()无() 缺席次数()原因:			
有无迟到? 有()无() 缺席次数()原因:			

⑪ [德]埃尔克·德赖尔,卡特琳·哈德尔著,夏立群译:《合作学习的99个小贴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⑫ 同上,第52页。

⑬ 同上,第86页。

⑭ 文秋芳:《综合素质实践课——从理论到实践》,载《文秋芳英语教育自选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396页。

⑮ 同上,第399页。

续表

2. 个人在项目中所承担的任务:
3. 对所承担的任务的投入程度 (A 为最好; E 为最差)
A () B () C () D () E ()
4. 对自己完成任务质量的评价 (A 为最好; E 为最差)
A () B () C () D () E ()
5. 与其他组员合作的情况 (A 为最好; E 为最差)
A () B () C () D () E ()
6. 对本次活动的意见和今后活动的建议:

表 5: 学生互评表^⑩

学生互评表				
项目名称:			评估者:	
姓名	出勤情况 (有无缺席和迟到)	投入程度	完成任务质量	与他人合作情况

说明: 1. 互评对象为本小组成员
 2. 请按 A, B, C, D, E 五个等级给其他组员评分, 其中 A 为最高等级, E 为最低等级。
 每个学生对别人评价的准确程度是自己成绩的一个部分。

⑩ [德] 埃尔克·德赖尔, 卡特琳·哈德尔著, 夏立群译:《合作学习的99个小贴士》,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52页。

表 6：教师评估表^{①7}

教师评估表								
项目名称：								
学生姓名	出勤情况 (15%)	个人完成任务情况 (35%)			小组成绩 (35%)	评价能力 (15%)		总成绩
		投入程度 (10%)	完成任务质量 (15%)	与他人合作情况 (10%)		自我评价 (5%)	评价他人 (10%)	

说明：请按百分制给各小项打分，总成绩由系里统一计算。

在对学生合作学习成果展示进行评价时，也同样需要在准备阶段就告知他们评价标准。通常，这类评价主要分为两大基本方面：

- 信息内容
- 成果展示的质量

如果是书面成果，那么评价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

- 形式：主题结构、逻辑顺序、目录等
- 内容：与主题的关联度、主题的角度、客观正确性
- 表现：涉及目标群体、语言质量、原创性

如果是口头汇报，那么评价分为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

- 与主题设定相关
- 主题结构有意义
- 报告具有逻辑性，听者容易理解
- 主题经过充分且客观正确的处理
- 语言质量
- 口头汇报是否流利、清晰、语速适中

- 媒体使用
- 与听众互动
- 处理中间提问

最后，笔者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学生对于学习和课程的反馈。在每次开课前和学期结束后，笔者会分别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方式等情况加以了解，多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以下是调查的问题摘要：

1. 选修本课程的原因是什么？
2. 已经阅读过哪些相关的书籍和文章？请列出，最喜欢 / 印象最深的是哪本 / 哪篇？还记得哪些观点？
3. 本学期课外阅读了哪些相关书籍 / 文章？对哪一本 / 篇印象最深？有哪些观点和研究方法？
4. 每次课前如何自主学习？学习哪些内容？用什么方法？能在课前达到什么掌握程度？
5. 是否每次都认真听取其他小组的课堂陈述，并认为有帮助或有用？
6. 希望老师在课堂上做什么？

^{①7} 同上。

7. 希望本课程改变哪些地方?
 8. 通过这门课程学习到什么知识?
 9. 通过这门课学习到哪些(研究/分析)方法? 哪些你会在实际中用到?
 10. 这门课上最让我喜欢的是什么?
 11. 如果我是教师,我想改变这堂课的哪些地方?
-

在收集到学生的反馈之后,笔者对比分析学生开学之初和学期末对相关问题的回答,看是否发生变化,如果有变,变化的原因有哪些,这些反馈为本课程的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四、小结

在建设《中德关系》课程的过程中,教师理念与视角的转变带来了课程建设各个方

面的变化,从以教师视角出发,变成从学习者的视角来看,如何能促进学习,如何更好地形成习惯、如何为未来做准备,如何能够切实具备本科标准中的能力。不断地变化对教师而言意味着推翻旧有的、习惯的思路,意味着重新进行大量的课前准备,但这是走向未来的教师必经之路,因为所有教师都清楚,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去武装将要面对未知挑战的学生,只能授之以渔,使其具备应对变化的能力。具体到这门课程当中,通过扩大阅读、构建专业知识框架、合作学习、评价与自我评价,使得学生逐渐从专业的视角去看到中德关系中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德两国的优势和不足之处有更清醒的认识和解读,为将来在跨文化交流中实现有效沟通打下基础。

作者简介:于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Fernsehdiskussionen im Vergleich: Hart aber fair und Tiger Talk (一虎一席谈)

Von Pan Ying

Während in Deutschland zur Zeit allein von der ARD nahezu täglich eine politische Talkshow angeboten wird, ist dieses Sendungsformat in China eher eine Seltenheit. Als eine der wenigen Sendungen in China, in denen argumentativ über Politisches diskutiert wird, erfreut sich 一虎一席谈 (*Tiger Talk*) sowohl bei den chinesischen Fernsehzuschauern als auch bei Forschern der Medien- sowie Sprachwissenschaft großer Beliebtheit. Wie unterscheidet sich dieses Sendungsformat in China mit Tiger Talk als repräsentativem Beispiel von dem in Deutschland? In Bezug auf das Sendungskonzept wird die chinesische Sendung mit dem deutschen ARD-Talk

Hart aber fair verglichen.

1. Zur Definition des Sendungsformats

Für eine Definition des untersuchten Sendungsformats muss beachtet werden, dass aufgrund des unterschiedlichen Rundfunksystems und der Fernsehgeschichte ein in Deutschland üblicher Begriff für das Sendungsgenre auf das chinesische Format kaum zu übertragen ist. Um das untersuchte Mediengespräch in ihrer deutschen und chinesischen Form von anderen Talk-Formaten abzugrenzen und eine einheitliche Definition für beide Sendungen einzubringen, verwende ich den Begriff Fernsehdiskussion^①, womit auf der einen Seite auf

① Die Bezeichnung Fernsehdiskussion ist nicht unproblematisch, so kommen Holly/Kühn/Püschel (1986) durch ihre Untersuchung zum Ergebnis, dass in den politischen Diskussionssendungen nicht im eigentlichen Sinne diskutiert wird, sondern „lediglich die Inszenierung einer Diskussion, letztlich eine Show“ (Holly 1986, S.11) stattfindet. Neuere Untersuchungen (Schultz 2006, Gäbler 2011) weisen aber trotz der medialen Inszenierung auf diskursive Elemente in politischen Fernsehdiskussionen hin. So enthält die Mehrzahl der Beiträge in den von Schultz untersuchten Fernsehrunden erkennbare argumentative Anstrengungen (Vgl. Schultz 2006, 245). Die Kritiken an dem Sendungsformat als „medienspezifische Inszenierung von Propaganda als Diskussion“ (Holly/Kühn/Püschel 1986, 200) sind laut Schultz „in ihren normativen Voraussetzungen problematisch“ (Schultz 2006, 306). Diese Ansicht wird auch hier vertreten.

den Mediencharakter des Genres hingewiesen wird, und auf der anderen Seite eine spezielle Form von Konversation bezeichnet wird, in der mehrere Teilnehmer themenbezogen Meinungen austauschen.

Fernsehdiskussion ist unter einen weiter gefassten Talkshow-Begriff einzuordnen.^② Mit Schicha und Tenscher (2002) verstehe ich Talkshow, deutsch: Gesprächssendung, als Sammelbegriff für eine Fülle von unterschiedlichen Subformaten, zu deren konstitutiven Merkmalen folgendes zählt:

„die zentrale Relevanz des Bausteins ‘Gespräch’ (…), das den inhaltlichen und formalen Ablauf der Sendung bestimmt, die Schlüsselrolle des Gastgebers bzw. Moderators, die Anwesenheit mindestens eines, oftmals jedoch mehrerer Gäste, der Seriencharakter (…), sowie das häufig vorhandene Studiopublikum.“ (Schicha/Tenscher 2002, 10)

Wegen der Vielfalt der Talkshow-Sendungen ist es ratsam, die vielen verschiedenen Formate zu sortieren, was bislang schwierig bleibt. Eine Kategorisierung nach thematischen Schwerpunkten, welche die deutsche Arbeitsgemeinschaft Fernsehforschung vorgenommen hat, unterscheidet

- Politische Gesprächssendungen
- Kultur-Talkshows
- „Menschen“-/Zeitläufe-Talkshows

- Daily-Talkshows
- Late-Night-Talkshows
- Und Sport-Talkshows.^③

Für die politische Gesprächssendung in Deutschland, die Gegenstand der vorliegenden Analyse ist, gibt es in der Forschung viele verschiedene Termini.^④ So werden „Polit-Talkshow“, „Polit-Talk“, „politische Diskussionssendung“ etc. weitgehend als Synonyme verwendet.

Zhou Zhanwu 周占武 unterscheidet nach Themen vier Sub-Formate der chinesischen Talk-Sendungen (2015, S. 47):

- News talk programs, die aktuelle Ereignisse thematisieren und Meinungen dazu präsentieren.
- Social education talk programs, die alltägliche Themen als Anlass der Gespräche bzw. Diskussionen haben, zu denen Bekenntnis- und Mediationsendungen gehören.
- Entertainment talk programs, die darauf abzielen, die Zuschauer durch Stand-Up-Comedy und weitere Präsentationen zu amüsieren.
- Service talk programs, die Vermittlung von Service-Informationen zum Ziel haben. Zu ihnen gehören Ratgeber-Sendungen zum Thema Geldmanagement, Antiquitäten, Gesundheit sowie Schönheit.^⑤

② In der Forschungsliteratur gibt es keine klare Definition für das Fernsehformat Talkshow. Es wird allerdings häufig versucht, es von anderen Sendungsformaten abzugrenzen. Während Mühlen (1985) und Linke (1985) zwischen Diskussionssendung und Talkshow unterscheiden, unterteilt Holly (2002) Talkshows im engeren und weiteren Sinne und macht damit die Übergänge der Talkshows zu anderen Gesprächsformen wie Interview oder Diskussion fließend.

③ Vgl. Schultz 2006, S. 139.

④ Vgl. Girth/Michel 2015, S. 2.

An den Kategorisierungen wird ersichtlich, dass sich die Sub-Genres der Talkshow in China stark von denen in Deutschland unterscheiden. *News talk programs* haben mit *politischen Gesprächssendungen* gemeinsam, dass sie als Themen aktuelle Fragen der Politik,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sowie des öffentlichen Interesses behandeln. Wenn nach Eisentraut das politische Element der politischen Talkshow in erster Linie in den Inhalten bzw. Themen liegt (Eisentraut 2007, 31), so wäre die untersuchte chinesische Talkshow *Tiger Talk* als *news talk program* auch dem Sub-Genre ein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Talkshow zuzuordnen. Es ist jedoch anzumerken, dass es in China eine politische Gesprächssendung im deutschen Sinne nicht gibt. So sind öffentliche Auftritte von Politikern in Talk-Sendungen in China sehr selten.^⑤ Außerdem scheint das Wort „politisch“ im Deutschen einen viel größeren Referenzbereich zu haben als seine Entsprechung im Chinesischen^⑦. Das Themenspektrum der vier großen Polit-Talks Deutschlands^⑧ zeigt, dass zu Themen einer politischen Talkshow sowohl innen- und außenpolitische, als auch wirtschaftliche, finanzielle und gesellschaftliche Themen zählen.^⑨ In China wird da stärker differenziert und ein wirt-

schaftliches oder gesellschaftliches Thema würde nicht unter die Kategorie 政治 (Politik) fallen. Dies soll verdeutlichen, dass die Sendungsformate *news talk programs* und *politische Talkshows* von den Themen her den gleichen Typ einer Fernsehsendung darstellen, die Themen aber einem unterschiedlichen Verständnis unterliegen.

Neben einer thematisch orientierten Kategorisierung gibt es sowohl in der chinesischen als auch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weitere Typologierungsversuche, die zu sehr ähnlichen Ergebnissen führen. Je danach, ob die Sendung hauptsächlich in der Form einer Debatte läuft oder nicht, werden für die chinesischen Talkshows zwei Grundtypen unterschieden:

- Debatten-Talk
- und „Plauder“-Talk^⑩

Als Vergleich kann man hier Plakes Typologisierung heranziehen, welche

- Debattenshow bzw. Forum
- Personality-Show
- und Bekenntnisshow unterscheidet.^⑪

Als Debattenshow werden nach Plake in dem deutschen Sub-Genre Fragen der Politik und

⑤ Vgl. 周占武 2015, 第47-49页。

⑥ Ab 2011 entwickelte sich in China schnell ein neues Fernsehformat namens TV Politics vor allem auf regionalen Sendern, das bereits 2005 mit seiner ersten Sendung kurz ins Fernsehen kam und dann stagnierte. Politiker regionaler Regierungen höchstens der Stadtebene werden eingeladen, um von der moderierenden Person und Bürgervertretern befragt zu werden. Zwar nehmen mehrere Gäste an der Sendung teil, die Gespräche bestehen aber hauptsächlich nur aus Frage-Antwort-Sequenzen (kritisierenden Fragen auf Seite der moderierenden Person sowie Bürgervertreter und rechtfertigenden Antworten auf Seite der Politiker). Eine Diskussion findet nicht statt.

⑦ *Politisch* wird im Chinesischen mit 政治的 übersetzt.

⑧ Gemeint sind die vier Talk-Sendungen des ARD: Anne Will, Günther Jauch, Hart aber fair und Maybrit Illner.

⑨ Im Internet unter: <http://apps.lokal.de/meinungsmaschine>.

⑩ 周占武 2015, 第52页。

⑪ Vgl. Plake 1999, S. 32ff.

des öffentlichen Interesses behandelt und in erster Linie Politiker, Betroffene und Experten eingeladen, während in dem chinesischen Format eines Debatten-Talks auch alltägliche Themen behandelt werden und ausschließlich nicht-prominente Gäste auftreten können. Gemeinsam haben beide Formate, dass Gäste, die unterschiedliche Standpunkte vertreten, das Problem bzw. Thema im argumentativen Austausch diskutieren.

Die politischen Talkshows in Deutschland sind nach Eisentraut (2007, 28) als Debattenshow im Sinne von Plake aufzufassen. Es wird also von politiknahen oder-fernen Gästen über Politisches diskutiert, typischerweise über ein aktuelles, kontroverses Thema von (gesellschafts-) politischer Bedeutung. Hier liegt ein Unterschied zu den chinesischen News talk programs, die sich nicht unbedingt in der Form einer Debatte präsentieren.

Die untersuchte chinesische Talkshow-Sendung Tiger Talk als News talk program und Debattenshow ist sowohl in der Themenauswahl als auch in ihrer Form d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Gesprächssendung sehr ähnlich. Ein weiteres gemeinsames Merkmal des Sendungsformats liegt in der Form der Gruppendiskussion mit einer „heterogene(n) Teilnehmerstruktur“ (Tenscher 1999, 318). In dieser Form sind nicht nur Kontrahenten- und Koalitionsbildung möglich, sondern eine Vielzahl verschiedener Standpunkte und Perspektiven kann auch gegeneinander antreten.

Zusammenfassend finde ich Eisentrauts Definition für das Subgenre „politische Talkshow“ im deutschen Fernsehen besonders geeignet für das untersuchte chinesische und deutsche Sendungsformat, das ich Fernsehdiskussion nenne:

„(1) die regelmäßige Ausstrahlung zu einer festen Sendezeit, (2) die zentrale Figur des Moderators bzw. Talkmasters, (3) Gespräche über ein bestimmtes politisches oder öffentlich relevantes Thema als dominierendes Sendungselement, (4) die Teilnahme mehrerer Gäste mit jeweils unterschiedlichen Standpunkten zu diesem Thema, (5) die Verarbeitung der nonverbalen Kommunikation durch Kamera und Bildregie und (6) die parasoziale Teilnahme von Fernseh-Publikum, evtl. ergänzt durch Studiopublikum.“ (Eisentraut 2007, 31)

2. Die Beispielfälle: Hart aber fair und Tiger Talk

2.1 Zu den Sendungen

Die Gesprächssendung Hart aber fair startete 2001 auf dem Fernsehsender WDR und wird seit 2007 in der ARD ausgestrahlt. Wöchentlich läuft sie seit 2011 am Montagabend für 75 Minuten. Moderiert wurde die politische Diskussionsrunde von Anfang an von Frank Plasberg, der für seine Leistung mehrfach mit Medienpreisen ausgezeichnet wurde. Die Sendung ist eine der erfolgreichsten Talk-Sendungen in Deutschland und hat einen stabilen Marktanteil. So lag die Einschaltquote im ersten Halbjahr 2015 bei durchschnittlich 10.1%¹². Im Vergleich zu anderen großen Polit-Talks wird die Sendung vor allem für ihre

¹² Online unter: <http://www.quotenmeter.de/n/79538/die-talkshow-halbjahresbilanz-viele-kleine-verlierer-und-maischberger>, letzter Zugriff am 22.10.2016.

autoritäre und provokative Moderation und ihr konfrontatives Konzept gelobt, allerdings wird Plasberg mittlerweile von verschiedenen Seiten kritisiert, er sei weich geworden und nicht mehr so kritisch (vgl. Munninghoff, 2011).

Eingeladen werden in Hart aber fair zu 30% Politiker (Stand 2014/15)^⑬. Im Vergleich zu den anderen drei Talk-Sendungen der ARD interessiert sich Hart aber fair mehr für innenpolitische als für außenpolitische Themen.^⑭

Die seit 2006 vom Hongkonger Sender Phönix ausgestrahlte Talk-Sendung Tiger Talk, chinesisch 一虎一席谈, ist eine der wenigen Gesprächssendungen in China, die als Debattenshow im Sinne von Plakes Unterscheidung aufzufassen sind. Auf der Web-Seite der Fernsehanstalt des Hongkonger Phönix wird Tiger Talk wie folgt vorgestellt: Tiger Talk „wählt große Ereignisse, Brennpunkte und heiße Themen der Woche aus und lädt Betroffene, Gelehrte, Experten und Prominente aus allen Bereichen als Gast zur Diskussion ein, die dabei Wahres sagen.“^⑮

Der Hongkonger Phönixsender hat zwar seinen Hauptsitz in Hongkong, viele Sendungen werden aber auf dem Festland aufgenommen. Die meisten Gesprächsrunden der Sendung Tiger Talk finden im Studio in Beijing statt. Eingeladen sind zum größten Teil Festlandschinesen. Sehr oft ist auch ein ausländischer Gast bei der Diskussion dabei, der aus der Perspektive eines Ausländers zum Thema spricht.

Die Themengebiete von Tiger Talk weis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deutlich steigende Tendenz zu immer mehr außenpolitischen Themen auf. So wurden vor 2008 nur innenpolitische Themen behandelt, bis zum August 2015 betrug der Anteil der nicht innenpolitischen Themen dagegen etwa 69%.^⑯

2.2 Hart aber fair und Tiger Talk im Vergleich

Wie oben erwähnt haben Hart aber fair und Tiger Talk im Hinblick auf das Genre Fernsehdiskussion viele Gemeinsamkeiten. Allerdings zeigen beide Sendungen auch viele Unterschiede auf, was das Sendungskonzept betrifft.

Anzahl der Gäste

In Hart aber fair diskutieren in der Regel fünf Gäste, während die Anzahl der Teilnehmer in Tiger Talk zwischen 6 und 8 variiert, wobei in den Anfangsphasen die Diskussion zwischen 4 Gästen stattfindet und weitere Gäste erst im Laufe der Diskussion zuschalten. Außerdem ist in Tiger Talk üblicherweise mindestens ein weiterer Studiogast eingeladen – in einer der untersuchten Folge waren es sogar drei. In Hart aber fair ist oft, aber nicht immer ein Studiogast dabei. Aufgrund der größeren Anzahl der Gäste in der chinesischen Sendung fällt die Redezeit für jeden einzelnen Gast im Schnitt etwas kürzer aus, zumal auch Studiozuschauer sich während der Diskussion zu Wort melden können. Hinzu kommt noch, dass im Vergleich zu den 75 Minuten Sendungsdauer von Hart aber fair den chinesischen Teilnehmern nur 48 Minuten für die Diskussion

⑬ Online unter: <http://apps.lokal.de/meinungsmaschine>, letzter Zugriff am 22.10.2016.

⑭ 30% der Talk-Themen in Hart aber fair 2014 und 2015 sind innenpolitische Themen, 21% außenpolitische. Quelle: Online unter: <http://apps.lokal.de/meinungsmaschine>, letzter Zugriff am 22.10.2016.

⑮ Online unter <http://phtv.ifeng.com/program/yhyxt>, letzter Zugriff am 22.10.2016.

⑯ 周占武 2015, 第52页。

zur Verfügung stehen.

Räumliches Arrangement

In Hinblick auf das räumliche Arrangement scheinen die Konfliktkonstellationen in der chinesischen Sendung prägender zu sein: Während die deutschen Diskussionsteilnehmer an einem leicht gekrümmten Tresen nebeneinander sitzen, stehen die chinesischen Diskussionsteilnehmer jeder für sich hinter einem kleinen Stehpult und in zwei Gruppen einander gegenüber. D.h. Teilnehmer mit ähnlichen Standpunkten stehen nebeneinander und ihren Kontrahenten gegenüber. So werden Teilnehmer schon von Anfang an als zwei Kontrahenten-Gruppen evident. Während der Diskussion können sie einander unmittelbar sehen und mit den Augen adressieren. Außerdem ermöglicht die Körperhaltung des Stehens mehr körperliche Bewegungen, mit denen die Diskussionsteilnehmer ihre Emotionen zeigen können. Zu der räumlichen Position des Moderators ist anzumerken, dass Frank Plasberg in Hart aber fair während des Gesprächs an einem Pult steht, das sich unmittelbar neben der Sitzgruppe befindet, während sich Hu Yihu in Tiger Talk im mittleren Bereich des Studios zwischen den zwei gegenüberstehenden Pultreihen bewegen kann. Diese Position ermöglicht Hu Yihu u.a., sich bei Streitigkeiten zwischen die Teilnehmer zu begeben und sie mit Gesten und Worten zurechtzuweisen.

Beteiligungsweise der Studiozuschauer

Ein weiterer Unterschied betrifft die Beteiligungsweise der Studiozuschauer: Während sie in Hart aber fair in einem isolierten Publikumsbereich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s Studios sitzen und während der Diskussion nur eingeschränkte

Beteiligungsmöglichkeiten wie Klatschen oder Lachen haben, sitzen die chinesischen Studiozuschauer unmittelbar hinter den Diskutanten auf beiden Seiten und haben viele Möglichkeiten, sich an der Diskussion zu beteiligen, in dem sie etwa ein Meinungsschild mit der Aufschrift „Für“ oder „Gegen“ hochhalten, ferner durch Zurufe oder Applaus oder indem sie sich in der sogenannten Publikumszeit, die über die Sendung verteilt ist, zu Wort melden. Durch die aktive Beteiligung des Studiopublikums werden die Äußerungen der Teilnehmer unmittelbar bewertet und die Diskussion somit angeheizt. Außerdem werden durch die Wortmeldungen des Studiopublikums neue Perspektiven oder zusätzliche Argumente für oder gegen bestimmte Standpunkte eingebracht, und die „Stimme des Volks“ wird präsent. Die Darstellung und Bewertung von Publikumsmeinungen werden allerdings auch in Hart aber fair als ein weiteres Element integriert: In einem zusätzlichen Sendungsabschnitt werden verschiedene Zuschauermeinungen, die vor und während der Sendung per E-Mail, Fax oder Telefon an die Redaktion abgegeben worden sind, von einer sogenannten Zuschaueranwältin vorgelesen und bewertet.

Auswahl der Gäste

Ein für die Untersuchung wesentlicher Unterschied der beiden Sendungen betrifft die Auswahl der eingeladenen Gäste. Zwar werden in beiden Sendungen Vertreter verschiedener Interessen wie Politiker, Unternehmer, Anwälte oder Journalisten etc. eingeladen, aber in der chinesischen Sendung sind die eingeladenen Gäste in der Regel nicht so „hochrangig“ bzw. „prominent“ wie in der deutschen Sendung. In

der Gesprächsrunde diskutieren üblicherweise Wissenschaftler, Journalisten und Vertreter von nichtstaatlichen Organisationen.

Aufbau der Sendung

Für beide Sendungen haben sich formattypische Standards für den Ablauf herausgebildet. *Hart aber fair* beginnt mit der Begrüßung und thematischen Einführung durch den Moderator, gefolgt von der Vorstellung der Diskussionsteilnehmer und deren Hauptposition, die von einer Off-Stimme übernommen wird. Das Gespräch bzw. die Diskussion beginnt dann und dauert knapp 60 Minuten, anschließend werden Publikumsmeinungen von der Zuschaueranwältin vorgelesen und bewertet. Am Ende wird eine Schlussrunde durchgeführt, wobei der Moderator eine hypothetische Frage der Reihe nach an alle Teilnehmer stellt. Manchmal wird auch ein Studiogast zu einem Einzelinterview eingesetzt, das normalerweise während des Gesprächsteils stattfindet.

Der Ablauf von *Tiger Talk* ist trotz eines standardisierten Modells zeitlich oft nicht festzumachen. Dies ist wahrscheinlich darauf zurückzuführen, dass die Sendung nach der Studioaufnahme redaktionell bearbeitet wird. Grob gesehen kann man die Sendung in vier Phasen teilen, zwischen denen Werbung platziert wird. Oft stoßen neue Gäste nach der Werbung zur Diskussion hinzu. Die Sendung beginnt mit einem Filmeinspieler, der ins Thema einführt. Dann begrüßt der Moderator die Zuschauer und stellt anschließend an alle Gäste dieselbe Frage, damit der Gegensatz zwischen den Positionen deutlich

wird. Damit beginnt die Diskussion, die sich zuerst zwischen 4 Gästen abspielt. Nach dem ersten Schlagabtausch zwischen den Diskutanten werden dann Studiozuschauer gebeten, ihre Meinung zum Thema zu äußern. Auch können sich die Studiozuschauer während der Diskussion zu Wort melden. Diese Form der Diskussion wiederholt sich in weiteren Phasen. Zum Schluss werden oft die Gäste gebeten, ein Schlusswort zu sagen. Manchmal folgen darauf noch weitere Wortmeldungen von Studiozuschauern. Daraufhin beendet der Moderator die Sendung mit einem Schlusswort.

Weitere Gestaltungsmittel

Ein wesentliches Gestaltungsmittel für das *Hart-aber-fair*-Konzept sind die sogenannten Einspielfilme, deren Anteil „für eine politische Talkshow relativ hoch ist“ (Einsentraut 2007, 92). Klemm zählt für den von ihm analysierten Korpus¹⁷ 9 bis 10 gesendete Einspieler pro Sendung, deren Länge zwischen knapp 30 Sekunden und drei Minuten beträgt. (vgl. Klemm 2015, 102, 105)

Die Einspieler haben in erster Linie die Funktion, zu informieren, zu veranschaulichen, die Volkesstimme zu repräsentieren, aber auch die Gäste zu provozieren, mit Daten und Fakten zu konfrontieren bzw. deren Behauptungen zu widerlegen. Somit wird die Diskussion angeheizt und die Argumentation zugespitzt (vgl. Klemm 2015, 105-106). Den Einspielfilmen liegt eine zum Teil aufwendige Recherchearbeit zugrunde und sie fördern laut Plasberg „die Wahrheitsliebe mancher Gesprächspartner“ (Spiegel online

¹⁷ Seine Analyse basiert auf einem Stichproben-Korpus von 13 Ausgaben zwischen Dezember 2007 und März 2012.

2005).

Auch bei Tiger Talk ist ein Bildschirm eingesetzt, der allerdings nur statische Bilder in Form von Texten oder Text-Bild-Kombination zeigt. Während der Diskussion zeigt Hu Yihu damit manchmal themenbezogene Daten, Fakten sowie Medienaussagen. Die Texte werden dann von ihm schnell vorgelesen oder es wird nur auf den Hauptinhalt hingewiesen. Genauso wie die Einspieler in Hart aber fair dient dieses Instrument vor allem der Steuerung der Diskussion und der Bereitstellung von Hintergrundinformation. Die vielen anderen Funktionen von Einspielern bei Hart aber fair nimmt es aber nicht in Anspruch.

Moderationsstil

Die Charakterisierung der Sendung *hart aber fair* durch ihren Namen prägt auch den Stil des Moderators. Frank Plasberg wird von Medienkritikern als „Dompteur“ (Gäbler 2008, 2010, 2011) bezeichnet. Gelobt wird auf der einen Seite seine Hartnäckigkeit und Härte, mit der er versucht, Themen durchzusetzen und möglicherweise die Gäste von einer bestimmten Strategie abzubringen. Andererseits wird kritisiert, dass er Gedanken der Gäste grob unterbreche und den Diskussionsfluss zu einer „Häppchen-Abfolge immer neuer Reize“ zerhacke (Gäbler 2011, 21).

Der Moderationsstil des *Tiger-Talk*-Moderators Hu Yihu ist durch eine Eigenart gekenn-

zeichnet, die in der chinesischen Medienkritik sehr gelobt wird. Er fördert auf der einen Seite eine heftige Auseinandersetzung zwischen den Gästen und eine klare Positionierung der Gäste, auf der anderen Seite wird Polemik von ihm streng kontrolliert (bis auf zwei, drei von den Medien sehr kritisierte Sendungen¹⁸). Selten stellt er die Antworten eines Gastes selber in Frage, sondern konfrontiert lieber einen anderen Gast damit. So solle es, wie er immer wieder in der Sendung sagt, zum PK¹⁹ (Player kill) zwischen den Gästen kommen.

Plasberg und Hu Yihu haben beide einen harmonieverhindernden Moderationsstil, wobei sich im Übrigen ihre Art und Weise, mit dem Thema und den Gästen umzugehen, stark voneinander unterscheidet.

3. Schluss

Aus dem Vergleich wird ersichtlich, dass zwar in beiden Sendungen angestrebt wird, eine heftige Meinungsauseinandersetzung zu strittigen politischen sowie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Themen zustande zu bringen, die zwei Sendungsformate in ihrer Funktion und Zwecksetzung sich aber stark voneinander unterscheiden. Während es in Deutschland bei Polit-Talks um Politikdarstellung und -vermittlung geht und bei den (politischen) Teilnehmern um „Medienpräsenz und somit Machtressourcen“ (Dörner 2004, 247),

¹⁸ In der Tiger-Talk-Folge im Jahr 2008 nach dem Sichuan-Erdbeben z.B. kam es zu sehr emotionalen persönlichen Angriffen zwischen dem Medienkommentator Guo Songmin und dem Schullehrer Fan Meizhong. Letzterer hatte als Erster das Klassenzimmer verlassen und seine Schüler in Stich gelassen, als das Erdbeben geschehen war. Guo wurde wegen seiner ungezügeltten Beschimpfung an Fan in der Medienkritik stark kritisiert, auch der Moderator geriet in Kritik, weil er die Schimpferei zugelassen hatte.

¹⁹ Das Wort stammt ursprünglich aus dem Bereich Computerspiele. Seit seiner Einführung in China wird es immer öfter für Situationen verwendet, wo Menschen sich verbal miteinander auseinandersetzen.

versteht sich das chinesische Sendungsformat vor allem als mediale Öffentlichkeit, in der unterschiedliche Positionen präsentiert werden. So werden hier als Gäste eher Meinungsvertreter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eingeladen. Und durch die vielfältigen Gestaltungsmittel in Hinblick auf die

Beteiligungsweise von Studiozuschauern und das räumliche Arrangement wird eine öffentliche Debatte inszeniert, wobei die Bedürfnisse der Gäste und der Druck auf sie zur Selbstdarstellung viel geringer sind.

作者简介：潘颖，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研究生。

智
库
天
地

2016年，二十国集团高峰会议在中国杭州召开。作为东道主，中国展现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诚意，并加强了这一多边机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作用。本智库研究团队以此为契机，同北外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合作，跟踪G20集团中主要经济体的年度发展情况，适时发布了《二十国集团（G20）发展报告（2015—2016）》，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提升了我校智库和学者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本期专栏主题为“智库视角下的二十国集团经济观察与研究”。

2015年欧盟经济观察报告^①

张 凯 刘立群

一、2015年欧盟经济总体概况

2015年欧盟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继续呈现温和复苏迹象。整体经济发展略好于前期预测值，就业市场、投资市场以及消费市场都出现明显转暖迹象。

1. GDP发展

2015年欧盟28国GDP总额达到13.4万亿欧元，欧元区GDP总额为9.8万亿欧元（按2010年价格计算）。欧盟整体GDP实际增长约为1.9%，欧元区为1.6%，分别高于2014年冬季预测值0.3和0.2个百分点。除希腊之外，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均为正增长，这表明欧洲正逐步摆脱欧债危机的阴影，步入

良性增长的轨道。据欧盟2015年11月的年度报告预计，2016和2017年欧盟GDP仍将保持2%至2.1%的增长水平。

2. 进出口贸易

在对外贸易方面，得益于世界经济的同步复苏，尤其是美国和新兴国家的需求重新放大，欧盟商品和服务贸易延续自2010年起的增长，在2015年依然为进出口双向增长，其中进口商品和服务总额为5.89万亿欧元，出口商品和服务总额为6.38万亿欧元，在进出口贸易中商品贸易分别占比为73%和72%。出口增长明显高于进口增长，这也使得整体商品和服务贸易顺差额4800亿欧元同比增长了25%，商品贸易顺差为2800亿欧元，

^① 本文节选自彭龙主编：《二十国集团（G20）发展报告（2015—2016）》，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43—54页。

猛增了 57%。欧盟的商品贸易额（含欧盟内部贸易）在世界总贸易额中的比例略有下降，从 2014 年的 32.8% 调整到 31.9%。尽管有小幅微调，但欧盟在国际贸易中依然占比近三分之一，是世界进出口的中心之一。美国、中国、瑞士、俄罗斯、土耳其、挪威、日本、韩国、印度、巴西为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

3. 人口与就业

2015 年欧盟总人口数为 5.1 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38‰，明显高于 2014 年的 2.33‰ 的水平。15 岁至 64 岁人口占总人口数 65.8%，达到 3.35 亿，同比增加约 16 万人。

伴随着 2015 年欧洲经济缓慢复苏脚步的是劳动力市场的回暖。欧盟重新开启结构性改革，深化欧盟内部市场，尤其是在能源、通信和交通领域消除投资障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为欧盟内部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欧洲各国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从退休养老体系改革、推动革新技术、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为劳动力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截至 2015 年 12 月的数据显示，欧盟的劳动人口为 2.52 亿人，整体失业人口数约为 2300 万人，其中欧元区失业人口为 1670 万人，分别同比下降了约 170 万和 150 万人。整体失业率在 2015 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其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降幅尤其突出，相对 2013 年的历史高点下降了近四个百分点，分别降为 12.6% 和 22.3%。作为欧洲经济领头羊的德国的失业率为 1991 年以来的最低点，只有 4.8%。尽管希腊仍以 25.7% 的失业率高居欧洲失业率榜首，但也出现了同比下降的趋势。几个之前受欧债危机冲击较小的国家如土耳其、瑞士、奥地利、法国和芬兰在 2015 年的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反而出现了小幅的失业率上升。总体来说，欧盟失业率近 10%，目前仍处于高位，今后解决失业问题还将是欧盟各国的核心任务。

4. 消费与价格水平

就业机会的好转为欧洲的消费支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私人消费支出的拉动作用明显。2015 年欧盟总体私人消费支出为 8.27 万亿欧元，比上年增加了近 3400 亿欧元，增幅达到 4.28%，是自 2011 年以来的最高增幅。欧盟整体消费者信心指数呈回升状态，尤其在 2015 年下半年，叠加年底节日因素，在 12 月达到下半年的峰值。但私人消费的增加并没有过多地抬升低迷的物价水平。尽管欧盟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在 2015 年出现小幅回升，但依然处于通货紧缩的危险区。该指数从年初的 -0.5% 的低位缓慢上升为年底的 0.2%，并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各国价格走势看，罗马尼亚、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亚的物价水平下降最多，通胀率为负值（-1.5% 至 -0.8%），而比利时、奥地利和瑞典的物价上涨相对较高，约为 1.8% 至 1.3%。造成这种通货紧缩危险的主要因素源自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燃料价格在 2015 年 12 月同比下降了 22%，电力、其他能源以及原材料的价格也都随之萎缩。这也使得工业产品价格出现了 1.2% 的降幅。与此相反的是服务业价格（快递、保险、客运、餐饮、教育等）以及蔬菜、水果、食用油和烟草等食品价格上涨相对较快。另外，占家庭支出近五分之一的房租也出现小幅上涨（1.4%）。

受国际原料和原油价格的影响，欧盟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在 2015 年波动较大，从年初价格下跌 0.8%，猛增到 2 月和 3 月上涨 0.5%，之后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下滑，8 月的 PPI 同比下降 0.9%，为全年最低点。之后的三个月价格降幅虽有所减少，但仍为负值。2015 年 12 月 PPI 再次出现大幅下降。CPI 与 PPI 出现背离趋势，一是因为世界经济复苏情况并不稳定，企业生产订单增幅出现停滞，甚至是下降，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低迷，二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受汇率和利率的传

导影响较为直接、快速。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将会影响欧盟地区经济的复苏进程。

二、2015 年欧盟主要事件分析

1. 欧央行再次下调利率

保持物价稳定水平，对抗通缩风险，同时为正在复苏的欧洲经济提供更充裕的流动性，成为 2015 年欧央行的一个重要目标。自 2014 年欧央行下调利率后，2015 年 12 月再次宣布，下调欧元区隔夜存款利率 10 个基点至负 0.30%，维持主导利率和隔夜贷款利率在 0.05% 和 0.30% 不变。同时决定延长每月 600 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扩大宽松举措，释放流动性，以推动欧元货币市场的信贷规模。欧元区私人消费信贷和企业信贷规模都在 2015 年企稳并出现上升趋势。在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的影响下，政府部门信贷增速相对更快，整体规模达到近年来的高点。欧元区宽松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正向回馈或将成为欧央行今后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政策有利理由之一，但欧央行近年来持续的低利率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引发了在欧元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的质疑和反对，尤其是坚持以币值稳定为中心任务的德国央行对欧央行的现行政策并不认可。一是因为再次降息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刺激作用很小，企业并不会因此而更有信心地去加大投资，相反银行体系却会因超低利率带来的风险和资产收益减少而收紧银根，以保证合规的自有资本水平，应对欧洲银行监管的审查。二是因为流动性过剩就会引发价格虚高，为下次危机埋下伏笔。

2. 欧债危机的缓解与延续

经历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双重打击后的欧洲各国政府在 2015 年继续实施国家财政稳定措施，并取得良好效果。塞浦路斯宣布

实现财政目标承诺，并在 2016 年初即可脱离欧盟和 IMF 的纾困计划。欧盟各成员国除希腊和丹麦外，财政赤字比例继续呈下降趋势，欧元区国家整体财政赤字水平为 2%，欧盟 28 国为 2.4%。其中德国、爱沙尼亚和卢森堡实现财政盈余以及财政平衡，而芬兰、丹麦、法国、英国、希腊、西班牙和克罗地亚 7 国的财政赤字依然超过了 3% 的欧盟标准。欧盟国家和欧元区国家整体负债比例依然较高，分别为 87.8% 和 94%，同比下降 0.8 和 0.5 个百分点，这与欧盟的趋同标准 60% 还有较大的差距，但已有见顶下滑的趋势。

希腊的整体负债水平在 2015 出现大幅增加，已高达 194.8%。2015 年 7 月，希腊因无法兑现实现财政紧缩的承诺而使得债务危机再次爆发，并引发了希腊是否要退出欧元区的猜测，证券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和债券避险，欧洲金融资本市场出现恐慌性崩盘。经过磋商，希腊与欧央行、IMF 和欧盟达成新一轮救助协议。2015 年 11 月，在对希腊改革和资产重组的工作进行审核后，欧洲稳定机制批准了 21 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从希腊 2016 年预算计划看，希腊仍将继续开源节流，增加税收并同时削减政府开支。尽管此次危机已逐渐平息，但希腊的债务危机并没有根本消除，距离重返稳定增长还为时尚早，而且希腊已是欧洲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暂时无法消除的隐患，一颗不知何时就会引爆的炸弹，具有极强破坏力。

3. 难民潮涌入

2015 年欧洲经历的另一个危机就是大批涌入的难民潮。据欧盟边境管理局 (Frontex) 统计，2015 年抵达欧盟的移民超过 120 万人，欧盟委员会称这是二战以来全球最大的移民危机。2015 年 9 月，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以多数票决定，除此前商定的安置 4 万名申请避难者以外，在欧盟 28 个成员国中的 23 个国家中再安

置 12 万欧盟境内的难民。中东欧国家明确拒绝执行此决议。英国表示只接收在叙利亚边境联合国难民营的难民，而不是现已在欧洲的难民。法国也声明将接收的难民数量不会超过此前承诺的 3 万人。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与奥地利实行联合登记难民机制。截至 2016 年 2 月底，只有约 600 名希腊和意大利境内的难民被送往欧盟其他国家。德国成为欧洲接收难民的主力军，2015 年共接纳约 100 万难民。瑞典是人均接纳难民数量最多的欧盟国家，这个仅有 980 万人口的国家，2015 年约有 16.3 万名难民涌入，今后几年瑞典可能会遣返 8 万名避难申请未获批准的难民。德国政府 2016 年 1 月宣布加强对避难申请的限制，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列入“原始地安全国家”名单。

欧盟委员会于 2015 年 9 月决定向成员国额外拨款 17 亿欧元以应对难民危机。为阻止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向欧盟移民，2016 年 2 月欧盟同意向土耳其拨款 30 亿欧元。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也使得欧盟各国在各自为政的同时，相互抱怨和指责。从目前的形势看，短时间内弥合各方分歧，找到应对危机的良策的希望渺茫。在当前针对难民危机的讨论中，也不乏积极的声音。欧盟委员会和德意志银行都在报告中预测德国的经济将受益于难民，从短期看，政府安置难民将提高国家支出，进而提升 GDP。从长期看，主要为青壮年的难民将给劳动人口紧缺的欧盟国家带来劳动力的补充并可以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但并不是每个欧洲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如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这些过境国家就只能产生短期的效应。

4. 英国脱欧

正当外来的难民危机考验着欧盟各国一致行动能力和凝聚力之时，久已蠢蠢欲动的英国“脱欧”风潮在英国保守党赢得大选后正

式袭来，使得欧盟雪上加霜，面临涣散瓦解的风险。从卡梅伦提出的让英国留在欧盟的条件可以看出，英国不甘于欧元地位的上升，不满欧元对英镑在国际和欧洲货币体系中的挤压，也恐惧欧元区国家危及自身经济增长的可能性。2016 年欧盟春季峰会经过 30 多个小时谈判，终于在 2 月 19 日深夜就英国提出的欧盟改革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最引人瞩目的条款是，英国可以在出现“紧急”状态时采取紧急措施，“刹住”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移民的工作福利，“紧急”状态可持续 7 年。2 月 22 日英国一项民调结果显示，48% 的受访者支持留欧，33% 受访者支持脱欧，不过有 19% 的受访者仍未决定。22 名内阁部长中有 6 名部长已表明支持脱欧，330 名保守党议员中约有 140 人表示反对卡梅伦的欧盟方案和支持脱欧，有 100 名保守党议员支持留欧。英国政府决定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盟。2015 年 9 月一项调查表明有 41% 的英国小企业希望退出欧盟。但 IMF 和国际评级机构都在评估报告中指出，英国脱欧会使双方两败俱伤。不仅欧盟经济地位会因失去英国而出现下滑，欧洲一体化进程将遭到重创，英国自身经济实力也会因失去欧盟这棵大树而大打折扣，出现收入下降、资金外逃的风险极大。德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德意志银行正在考虑一旦英国退出欧盟，该银行是否要将部分业务撤出英国，迁回德国。

5. 欧美自贸协定谈判

始于 2013 年的欧美自由贸易协定 (TTIP) 谈判一路磕磕碰碰，进展缓慢。旨在进一步简化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规则，最终建成美欧自由贸易区的 TTIP 在 2015 年共进行了 4 轮谈判，年底结束了第 11 轮谈判，但并未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双方都公开表示将加快进度，期望在 2017 年 1 月前完成谈判，但从目前的状况看，并不乐观。

首先 TTIP 面临着欧盟内部意见不一的尴尬。从政府的层面上看,法国在谈判中态度强硬,英国积极支持。从民众反应看,更多出现的是反对之声。在德国、法国先后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 TTIP 的运动。他们主要担心的是一旦谈判成功,那些跨国企业巨头的垄断地位会愈加强化,而中小型企业将面临被挤压、被弱化的风险,尤其是长期处于欧盟补贴保护下的农业将会受到重创。其次 TTIP 谈判中在美国食品及化学品标准、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方面,双方分歧巨大,争议颇多。另外即便双方谈判完成,TTIP 在欧盟和美国是否能够在国内获得批准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考虑到审批流程漫长,TTIP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

三、未来与展望

2016 年欧盟经济在复苏的道路上将面临多重挑战。从目前主流经济研究机构对欧盟 2016 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测看,欧盟还将继续温和复苏之路,各项指标都有稳定好转的势头,但趋势分化愈加明显。如包含 OECD、欧盟、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德国国内权威经济研究所的 16 家主流经济组织和机构对德国在 2016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的平均值为 1.84% (最低 1.3%,最高 3.5%)。总体评判为平稳向好。根据欧委会的预测,欧元区的 GDP 增幅将为 1.7%,欧盟为 1.9%。其中爱尔兰、罗马尼亚、波兰都还将保持 3% 以上的增幅,但对希腊、法国等国的前景并不看好。欧委会还预测,2016 年欧盟出口或将继续增长。得益于欧元贬值、工资水平停滞,单位劳动成本的下降,欧盟地区,尤其是欧

元区的出口工业会延续 2015 的发展势头,甚至是提速增长。但全球经济仍然脆弱,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风险尚未消除。中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需求不稳定,国际汇率大幅震荡,都会给欧盟的出口经济蒙上阴影。

大宗商品及原材料价格的走低一方面使得工业生产成本和整体物价水平降低,但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通货紧缩的风险。欧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还有多大的空间值得进一步讨论,但一味地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并不是一味良药。尽管低利率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欧元区国家的债务负担,可以刺激投资和消费,但低利率也会触发欧元进一步贬值的风险,导致国外投资的减少,国内投资的转移。如果欧版 QE 在全球宽松货币的竞争中越走越远的话,负利息和高货币量只能是短时的饮鸩止渴。

从 2015 年底,欧盟经济已经隐隐地冒出一些悲观的声音,如德国企业信心自 2015 年 11 月开始连续三个月下降,制造业预期指数也创 2008 年以来最大降幅,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上升趋势转为停滞不前。英国出口企业的订单量自 2015 年第三季度起也出现自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乏力的增长。

另外,欧盟是否能尽快解决难民危机,达成解决方案的共识或将决定欧盟经济 2016 年在复苏之路上的速度:是加速还是减速或者是停滞还是衰退。从目前的形势判断,经济减速的风险随着难民危机的愈演愈烈而不断放大。在夏天英国有关“脱欧”的全民公决前,欧盟的经济信心恐怕很难恢复,恐慌和避险情绪将阻碍投资的升温,进而拖缓就业市场向好的步伐。

作者简介:张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德国智库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①

徐四季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适应形势变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景气下行压力之下，中国经济开启了划时代的结构性改革和增长模式转型进程。德国智库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转型，一致将其归纳为从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向靠消费和创新驱动的质量型增长模式，新模式致力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在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②

一、现状认识——经济转型的直接动因是景气下行压力

德国智库一致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直接动因是持续的景气下行压力。近年来，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增长活力有所减缓，主要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重工业和建筑业都发生了较大波

动；经济产出、投资、出口和商品价格尽管并未直线下降，但都出现了缓慢而持续的减退。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仅为6.9%，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GDP增速。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强调，这绝非暂时性的、周期性的景气下滑，而是一次涉及关键行业的结构性危机。^③

二、需求侧调整的局限——“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动力不足

中国一贯的经济政策致力于需求侧要素的调整，即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驾马车”。德国智库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进一步依靠出口和投资来拉动增长的可能已经走到了极限，因为已经出现了“刺激计划－负债高企－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经济停滞”这一恶性循环的部分征兆；同时确有较大提

① 节选自彭龙主编：《二十国集团（G20）发展报告（2015—2016）》，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6年，第135—145页。

② Tempel, Sylke: Reich auf der Kippe, 1, in: *IP-Länderporträt China*, Juli-Oktober 2015, 1.

③ Heilmann, Sebastian: Unter Abwärtsdruck – Wie reagiert Chinas Regierung auf die Krisenanzeichen der Wirtschaft? 84,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vember/Dezember 2015, 84-91.

升空间的私人消费很难在短期内有所起色。

三、供给侧改革的希望与瓶颈——财政、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改革及创新支持喜忧参半

德国智库高度认同中国高层所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重点关注财政制度改革、金融体系自由化、国有企业重组改造和创新支持政策这四个方面。中国问题专家们评价到，当前的改革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市场效率的提升必须在继续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中进行；因此，改革进程可谓“喜忧参半”，有雄心，有进步，但也充满矛盾与迟疑。^④

1. 财政制度改革：坚冰未破^⑤

德国智库专家认为，以下几项政策措施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

2014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了《预算法》的修订，取消了对地方政府的债务禁令，允许省级政府发行债券，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须公开全部收入、支出和预算信息；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禁止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可疑的融资平台贷款，规定地方政府须严格遵守债务限额并在预算中公布所有债务；

2015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环保税法》草案，旨在促进环保型经济增长模式。

相应的，财政部2015年3月出台的《2015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管理办法》在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看来只成功了一半。

该办法试图将地方政府通过可疑融资平台获得的贷款转变为低息、长期债券；但此债券首轮发行遇冷，因为鲜有投资者愿意购买这种低利息、高风险的债券；随后，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指示各大银行用这种新发行的债券代替它们已经发放给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德国智库专家强调，这一国家干预尽管迅速改善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但对金融体系改革而言是一次倒退，因为它同银行的商业化背道而驰，也有违债券市场上由风险等级确定利率水平的规律。2012年就开始的将营业税转变为增值税的进程虽然被部分专家称道，因为它有利于加强服务业；但也被一些研究人员指出具有明显的副作用——它将进一步减少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因为增值税主要归中央政府所有。此外，德国智库专家认为，就财政资源在各级政府间的再分配而言，目前的改革鲜有作为——当然这也毫不奇怪，财政资源的再分配在所有政体中都会遭遇巨大阻力——但此坚冰不破，中国财政制度的警报就不能解除。

2. 金融体系自由化：曲折中前进^⑥

德国智库专家高度认同以下一些金融自由化举措，并强调其重大意义：

逐步放松存款利率上限，直至2015年10月完全取消；自此中国正式取消了对利率的行政管制。

2015年5月引入存款保险制度；该制度对所有银行的存款一视同仁，这有利于中小银行吸储，从而改善了创新型私企的融资状况，因为中小银行比大型国有银行更乐于为私企提供信贷。

④ Heep, Sandra/Meissner, Mirjam: Mehr Markt nach den Regeln der Partei: Eine Zwischenbilanz der Wirtschaftsreformen seit dem Dritten ZK-Plenum 2013, 1, in: *China Monitor*, Nr. 27, 11. November 2015.

⑤ Ebenda, S. 7-8.

⑥ Ebenda, S. 3-5.

首批私人银行获批准入，银行业竞争加强；2014年有5家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获得网上金融服务许可，这些网上银行主要向小型企业提供信贷，填补了中国现行金融体系的缺口。

2014年11月，沪港股市联通，一些外国投资者可以更好地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放松企业跨境现金池管理；2015年10月，国务院启动上海自贸区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项目，为中国人个人投资海外拓展渠道。

201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这一改善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制度市场化、灵活化。

2015年1月，证监会允许非上市企业在股市上发行债券，由此扩大了企业债券市场；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简化了外国央行、国际金融组织和主权财富基金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程序。

同时，德国智库专家也犀利地指出了中国目前金融体系改革的不彻底性：其一，他们认为，大银行掌握在国家手中，因此在官方放开利率政策之后，国家依然有可能在必要时“幕后”影响利率。其二，开放资本往来仅局限在特定的投资渠道，中国政府并不会完全放手，而是希望在阻止投机性资本流动、保证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更自由的资本往来。其三，汇率制度灵活化之后，为避免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持续进行了支撑性购买；在中国问题专家们看来，这一国家干预基本中和了汇率制度的灵活化。其四，中国政府在2015年夏天股

市震荡后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遭到了德国智库专家的强烈批评，被认为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极大后退；他们预测，中国股市发展为重要企业融资渠道的目标变得很渺茫，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也大打折扣，因为在外国投资者眼中，中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也急剧下降。

3. 国有企业重组改造：方向不明，步伐很小^⑦

德国智库专家认为，中国近期的国企改革仅在两个方面取得了具体进步：其一，2014年，财政部要求提高5%的分红，这样部分工业行业（如烟草业）的分红率提高到企业盈利的25%；其二，2015年引入的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挂钩制度实际降低了不少大企业经理的薪水。

多数德国智库专家对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持批判和怀疑态度，认为该文件在许多关键上都表述模糊，只提纲挈领地阐明了改革路线，缺乏具体落实方案，例如该文件强调要在国企中发挥党的作用，却没有明确如何将党的领导和提高盈利性的目标结合起来。此外，他们认为，迄今为止的改革实践并不能证明推动混合所有制和组建控股公司是提升国企效益的有效途径。相反，中信集团和中石化的重组改造说明，出售部分公司股份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投资者影响力的扩大；南北车的合并经验说明，通过组建控股公司的方式重组国企往往意味着市场垄断地位的进一步强化。

4. 支持创新经济：转型之亮点^⑧

德国智库专家高度认同中国以“自主创

^⑦ Ebenda, S. 5-7.

^⑧ Vgl. Conrad, Björn/Meissner Mirjam: Wege zur Innovation, 24-28, in : *IP-Länderporträt China*, Juli-Oktober 2015, 24-28.

新”为核心的转型政策——对中国而言，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成本优势正在逝去，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将不断推高工资水平；新的经济增长点只可能来源于更高的价值创造和不断提升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来，中国对研发的投资巨大，2013年约为GDP的2%，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当然，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鼓励创新成为一种政治目标的时候，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创新能力欠缺的“专利冠军国家”。当专利数量成为衡量一个国企或一家研究所是否完成“自主创新”目标时，中国新注册的专利数在短短几年中突飞猛进，从2008年的约40万项增长到2013年的130多万。从数量上看，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注册专利最多的国家，但很多专利来源于既有模式和设计，或由一项专利拆分而来。此种趋势必须警惕。

四、总体评估——转型进程领先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及转型国家^⑨

贝塔斯曼基金会设有专门评价各发展中及转型国家民主和市场经济状况的“转型指数”。依据2014年的“转型指数”，中国的转型进程领先于在亚欧大陆的主要竞争对手印度和俄罗斯，位列全球第二；但和居于首位的金砖国家巴西相比，除了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自由化之外，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还存在较大差距。

作者简介：徐四季，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五、前景展望——机遇与挑战并存

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景，不少中国问题专家持观望态度，表示很难预测。例如韩博天专门撰文分析了四种可能的未来情形：^⑩

中国领导层所希望的情形，即所谓的“新常态”：在国家调控下，未来几年经济增长将缓慢减速，政策影响会削弱经济下滑的幅度，中国经济将在社会环境可承受的前提下小步过渡到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和高附加值增长模式。

最理想的情形：相较于其他转型国家，中国确有更快度过经济低迷期的潜能。若消费、服务和卫生保健行业的增长强劲，私人 and 互联网经济发展迅猛，中国经济有可能只经历一段较温和的过渡危机，出现“勺子型曲线”发展趋势——在短暂、中度的经济下滑后迅速实现持久的、平稳的经济增长。

最危险的情形：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经济将在2016/2017年出现“硬着陆”。经济的短期大幅下滑将引发政治危机，在世界经济范围内产生严重的连锁反应。

最可能出现的情形：如果“新常态”和“勺子型曲线”发展都不能实现，那中国政府极有可能重新开启经济刺激计划，以消化一些必须进行的，但社会很难承受、政治风险较大的改革举措，为必要的适应性调整赢得时间。

当然，多数德国智库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持乐观态度。长期来看，在中国政府的强势措施下，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只是时间问题。

^⑨ Bertelsmann-Stiftung: Chinas Entwicklung, 74, in: *IP-Länderporträt China*, Juli-Oktober 2015, 74.

^⑩ Heilmann, Sebastian: Unter Abwärtsdruck – Wie reagiert Chinas Regierung auf die Krisenanzeichen der Wirtschaft? 86-89,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vember/Dezember 2015, 84-91.

科 研 环 视

科研新动态

邹 露

一、国内学术会议和报告

- 2016年4月12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和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学术讲座上，德国Speyer行政管理大学经济系Frau Prof. Gisela Färber教授以*Vom „Aufbau Ost“ zum „Aufbau West“ - Länderfinanzausgleich und Solidarpakt als Lösung regionaler Disparitäten in China?*为题作了报告，以德国模式为例对中国地区差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并在互动环节中对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解答。
- 2016年4月15日，“新经典”高等学校德语专业高年级教材建设编审委员会成立及项目启动仪式暨“国家质量标准背景下的德语专业课程体系统建设和教学资源开发研讨会”于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举行。
- “多样性中的统一”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思想传统，也是当前欧洲深化一体化进程和应对诸多挑战的基本原则，对国际关系及其他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启示意义。为深化高校学生对欧盟

一体化的理解，加强欧盟研究相关方向各机构人才培养层面的合作，促进中欧人文交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第四届欧盟语言文化节”举办之际，2016年5月6日至7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利用开展全部欧盟官方语言教学和欧盟区域及其成员国国别研究的基础和优势，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阿语楼国际会议厅举办“多样性中的统一：地区一体化视角下的欧盟与成员国”研究生论坛。本届论坛承办单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和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英国研究中心。本次论坛诚邀国内的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史、国际关系等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领域在读硕、博士研究生参加，同时也欢迎在校本科生和在华的外国留学生参加，讨论议题主要包括：1) 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问题；2) 欧盟成员国与欧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3) 欧盟经济、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4) 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文化（含语言）政策；5) 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认同与欧洲认同。

- 6月4日至5日，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北京歌德学院协办的首届中国青年德语教师发展论坛于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75名德语青年教师代表参加了论坛活动。与会青年教师就德语教学、德语教师职业发展、德语和德国研究论文发表、德语和德国研究相关项目的申报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讨。在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中,不仅有高水平的教师报告,也有教师互动的圆桌会议和12个分小组的热烈研讨。参会代表认为,首届论坛活动的举办有利于我国青年德语教师的职业发展、有助于青年教师之间的意见交流,应该成为全国高校青年德语教师经常性的职业发展论坛。

- 2016年6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欧洲学会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中欧大使论坛暨欧洲蓝皮书(2015—2016)”发布会在京举行,会议主题为“欧洲形势与中欧关系”。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院校代表参会,欧盟和欧洲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出席发布会,并有人民日报国际部、中国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多家新闻媒体进行了会议跟踪,会议规模有百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主持会议并发表开幕致辞。欧盟驻华使团团团长史伟大使发表主旨演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发表出版方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主任田德文研究员发表题为“后冷战格局变化中的欧洲难民危机”的蓝皮书主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陈新研究员发表“当前欧洲经济形势评述”。中国前驻英大使马振岗、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副主任周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均发表各自评论。与会代表还就英国“脱欧”、中欧关系的机遇和挑战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 第四届北京洪堡论坛于2016年9月17日上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幕。本次论坛以“绿色经济、文化遗产与工业4.0”为主题,邀请了来自中、德、日等国的150余名知名专家学者和政商界人士。对外经贸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表示,绿色经济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是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发达国家应与发展中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站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建设符合各国国情的绿色经济体系,实现制造业智能化。德国驻华使馆经济处副处长Jan Hendrik van Thiel表示,科技创新是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中国“十三五”规划、“中国制造2025”以及刚刚结束的G20峰会所提倡的重要理念。北京洪堡论坛为中德学者提供了发展机会,也在中德创新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活动由德国洪堡基金会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北京洪堡论坛承办,宝马(中国)、北京祥龙(BXAM)、百度时代(BAIDU)、德国欧洲经济研究院(ZEW)、德国哈勒大学(MLU)、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院(FhG)、哈勒材料力学研究所(IMH)、上奥地利应用科学大学(FH-OOE)等协办。
- 2016年9月10—11日,由中国欧洲学会、中国欧洲学会欧盟研究分会以及欧洲经济研究分会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承办的中国欧洲学会2016年年会“全球治理框架下的中国与欧洲”在北京举行。会议具体讨论:1)当前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2)中国和欧洲在全球治理中的对话与合作;3)一带一路建设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4) 中欧关系。在本次年会期间, 中国欧洲学会还进行了换届工作。

- 2016年9月17—18日,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年会”在对外经贸大学举办。在开幕式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教授、教育部外指委德分委主任委员贾文键教授、德意志学术中心主任 Schmidt-Dörr 博士、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副院长 Deschka 先生分别致辞。在本次年会上, 贾文键教授题为“创新人才培养与德语专业发展”的报告、孔德明教授的“2016年德语四级考试总结”、姚晓舟教授的“2016年德语八级考试总结”、黄克琴教授的“德分委十年教师培训工作回顾及2016年培训总结”等报告是对德分委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 也对德语教学发展与改革的方向和趋势做了阐释。来自歌德学院、DAAD 和外研社的代表作了2016年工作总结及2017年工作预告。
- 2016年9月19日, 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SWP) 亚洲研究部副主任高亭亭博士(Dr. Nadine Godehardt)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楼1053会议室作了学术报告, 题为“视觉冲击与国际政治”。
- 2016年9月21日, 德国汉堡联邦国防军大学施塔克教授一行18人在北京-首尔学术考察(Akademische Exkursion nach Beijing und Seoul) 之际,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围绕德国当前内政外交主题作了报告, 并与德语系师生们进行了互动和学术讨论。
- 2016年9月24至25日,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办的“中德智库与中德关

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来自中国、德国和瑞士的智库学者、中国问题和德国问题研究专家就中德智库建设与合作、智库与中德关系议题进行了研讨。该学术研讨会由北外德语系系主任吴江副教授主持, 北外副校长贾文键教授、德语系主任王建斌教授参会并致辞。中国驻德国前大使梅兆荣、德国汉堡国防军大学施塔克教授就智库的重要性、中德关系的最新发展以及面临的挑战发表了主旨演讲。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应抓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契机, 深入研究、汲取以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智库建设经验, 推动中国高端智库建设, 同时努力探讨中德智库合作的有效途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促进中德关系的发展并开拓中德合作的全球维度。专家还就智库影响力的衡量方法和智库评价的指标体系等难点, 交换了彼此的经验。与会专家总结了德国研究在德国以及德国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丰硕成果和发展前景, 探讨了自身作为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者的角色定位问题, 即如何协调研究者和建言者的双重身份, 如何在保持学术研究科学性的基础上学以致用, 为政治决策者献计献策。与会国内外专家还充分肯定了北外在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在国别智库研究方面做出的大胆尝试。

-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第36期、37期外交、经济研究生论坛分别于2016年9月27日和10月25日17:00—21:30在综合楼1053德语系会议室举行。德语系教授殷桐生、副教授徐四季分别就“G20杭州峰会提出的经济蓝图及德国的立场”“欧盟对华市场经济地位”作了报告, 德语系硕士研究生窦明月、陈扬、丁思齐和孙浩林分别以“变化和延续——21世纪

德国对非洲发展援助政策”、“21 世纪德国政府产业创新政策研究——以制造业为例”“默克尔政府的以色列政策——基于路径依赖的外交政策分析”和“工业 4.0 对德国汽车制造的影响分析”为题作了报告，与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针对报告主题进行了现场提问和讨论，教师们对报告作了点评。

二、科研与获奖成果

- 《德国商务环境》，史世伟著，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6 年 9 月。
《德国商务环境》由德国概况、德国法律环境、德国贸易环境、德国投资环境、德国金融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六章构成。主要包括：德国的界定、德国政治经济概况、德国法律性质与渊源、市场法律法规、法院体系、德国进口管理制度、企业法律形式与注册企业程序等。中国与德国在经济贸易方面合作很多，本书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介绍了德国商务环境，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投资经商、工程承包提供智力支持，对德国商务环境的进一步认识将有助于加强中国和德国的贸易合作。
- 《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 2 辑）言论自由》，张翔主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年 8 月。
“出版自由是否保护涉及军事秘密的文章发表？”“否定纳粹屠杀的言论是否也受宪法保护？”“色情文学是否是艺术？”“新闻报道自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侵入名人的私生活领域？”“说‘士兵就是谋杀犯’是否损害了军人的名誉？”……这些争议出现在德国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并形成了宪法案件。本书译介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12 个关于言论

自由的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言论自由对自由民主的宪法秩序的特殊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思考言论自由（广义上包括意见的形成与发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艺术创造、科研教学、集会游行等权利）与国家安全、人格保护、青少年保护、隐私权、社会安宁等法益的权衡关系。

- 《德国创新信息概述》，张明龙、张琼妮著，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6 年 8 月。
本书以本世纪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集中考察其科技活动的新进展。本书着手从德国现实创新活动中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博览与之相关的论著，细加考辨，取精用宏，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抽绎出典型材料，经过精心提炼和分层次系统化，形成本书的思维脉络和框架结构。本书分析了德国电子信息、纳米技术、光学技术、天文与航空、新材料、新能源、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生命科学，以及医疗与健康领域的创新信息，以简洁明快的格调和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德国发明创造的前沿学术知识，宜于雅俗共赏。本书适合科技研发人员、准备前往德国留学和培训人员、高校师生、政府工作人员阅读。
- 《德国唯心主义时代——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第六卷》，（美）罗伯特·C·所罗门、凯特林·M·希金斯著，储昭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8 月。
19 世纪的转折标志着哲学能量和哲学天才的丰富且令人激动的爆炸。由康德开启的哲学革命的巨大威力是可以和结束中世纪的哥白尼革命相提并论的。他在运动中确立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快速运动并常常刚愎自用的辩证法激励着现

代一些最有创造性的哲学家，包括黑格尔、叔本华和那些反对他们的哲学家例如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本卷追溯了德国唯心主义从康德和他的后继者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出现，到克尔凯郭尔的“非理性主义”的终结。每一章都由该领域中的著名学者所写，作者包括刘易斯·怀特·贝克（德国的背景），丹尼尔·波奈华、唐·贝克尔、帕特里克·加德纳（康德），丹尼尔·布雷蔡勒（费希特和谢林），罗伯特·C·所罗门、威廉·德弗里斯、利奥·劳赫（黑格尔），凯特林·M·希金斯（叔本华），罗伯特·诺拉（青年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和朱迪思·巴特勒（克尔凯郭尔）。《德国唯心主义时代》为哲学和相关学科的学生对这一时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术性的导论，对哲学家也提供了新颖独到的解读。该书还包括技术性术语的名词解释，哲学、科学和其他重要文化事件的历史年表。

- 《国家大战略：从德国工业 4.0 到中国制造 2025》，韦康博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 年 8 月。

从 2010 年起，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在诸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制造 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首个十年期行动纲领，旨在应对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高端制造业跨越式发展。本书着眼国际国内的经济社会现实，以《中国制造 2025》九大任务、十大领域、五大工程和八大政策为框架，围绕政策制定背景、行业发展现状、产业变革趋势和具体应对策略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与解读。

- 《德国天才 1：德意志的命运大转折 第三次文艺复兴》，（英）彼得·沃森著，张弢、孟钟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年 8 月。

- 《德国天才 2：受教育中间阶层的崛起》，（英）彼得·沃森著，王志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 8 月。
- 《德国天才 3：现代性的痛苦与奇迹》，（英）彼得·沃森著，王琼颖、孟钟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 8 月。
- 《德国天才 4：断裂与承续》，（英）彼得·沃森著，王莹、范丁梁、张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 8 月。

歌德说：“每当想到德意志民族，我常感到痛苦，这个民族的个体都如此值得称颂，但作为整体却如此令人神伤。”自 18 世纪中叶，德国日渐由一个文化贫瘠的西方国家转变为举足轻重的文化强国，甚至比当时的欧美诸国更具创造性和影响力。德国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灿若辰星，将其科学文化推向了难以想象的高度。然而，20 世纪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统治使天才锐减，折断了这一进程，这个残酷的事实使得德国取得的许多成就至今仍被阴影笼罩。“二战”后，德国重整旗鼓，跻身发达国家前列，但其光辉历史至今仍被纳粹罪行的阴霾所笼罩。德国人是如何扭转国家大局，造就了文化领域一枝独秀的地位？在这本兼容并包的文化与思想史中，彼得·沃森追溯历史真相，探索了德国天才的起源。他解释了德国文化为何能蓬勃发展、如何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德国的科学文化如何持续影响着我们的世界。《德国天才》力图纠正世界对德国的陈旧观念。它是一封“写给日耳曼知识分子长达 850 页的情书”，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在这部兼容并包的文化与思想史中，彼得·沃森拨云见日，追溯历史真相，探索德国天才的起源。他不断追问德国的科学文化

为何能蓬勃发展，又如何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如何持续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该书共分四册，第一册主要讲述德意志秉性的形成，德意志精神的兴起，及德意志国家初期德国的天才人物和思想。第二册主要讲述伴随工业革命的兴起，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中等阶层迅速崛起，成为德国不可忽视的力量。出现了众多发明家、科学家和思想家。第三册主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历了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和如何战胜这些苦难，迅速崛起的过程。一切得力于德国伟大的创造精神。第四册主要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一分而二，但均继承了德国传统，各自在不同的环境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诞生了许多天才级的人物。

- 《欧洲社会党组织转型研究——以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陈露、张小劲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

本专著在研究方法、路径上，力图追赶西方学者的步伐，在国内率先采用政党组织的研究方法和路径，除了对历史和已有的成果进行考察，本书作者更注重对近年来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运作情况进行实时的追踪性考察，广泛搜集了最新资料，尤其是相关组织的资料，其中不乏独到的类型，如党员状况、财政收入、领导结构等等；在此基础上，刻画了三党组织转型和组织改革的大体进程和趋势特点，分析了三党进行党内改革的客观原因以及党的领导层面的主观认识，概括了三党组织改革的三大特征，揭示了三党在组织层面、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扩大民主参与之战略选择的趋同性。

- 《20世纪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演变研究》，孟钟捷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

企业代表会是一种企业层面的劳资协调机构，由企业雇员选举产生，代表雇员利益。它在企业中同资本家一起共同介入福利、人事与经济事务中。它的最早形式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德意志，到魏玛共和国建立初期实现制度化。经过纳粹时期的缺位后，企业代表会重新出现在联邦德国的舞台上，并建构起彼此相互联系又存在区别的三种体制：1951年企业代表会体制（即煤钢共决模式）、1952—1972年企业代表会体制与1976年企业代表会体制。它逐渐成为极具德国特色的“社会伙伴关系”的二元制度之一（另一制度是集体合同制）。90年代后，伴随两德统一的步伐，企业代表会体制成功实现东扩。在欧洲一体化的浪潮中，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成为《欧洲企业代表会法》的制定基础。到21世纪初，企业代表会体制仍然在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青岛日德战争丛书）》，（德）乔治·弗朗鸠斯著，刘姝、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7月。

1897年8月德国入侵胶州湾前夕，德皇威廉二世为最后确认入侵的必要性，专程派本书作者对胶州湾地区进行了秘密的重点调查。本书作者从一个水利和港口专家的视角，对香港、广州、厦门、胶州等中国沿海城市进行了细致考察，并在综合比较后得出结论，唯有胶州湾适宜德国建造海军基地。这也解释了许多年以来一直困惑史学界的一个问题，即德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占据青岛，而不是将相对更为容易获取、也更为西方人

熟知的厦门据为己有。在此基础上，作者专门对胶州湾位置、地势、港口、面积、岛屿、风力、潮汐差度、地质状况、饮水、居民和工商业等近30个项目做了详细记录和研究，并提出了对胶州湾未来发展的设想和规划，成为德国日后在青岛建设“模范殖民地”的基本蓝图。此外，作者还在考察途中记录了当时中国的一些别具地方和时代特征的风土人情，如游街示众的罪犯、愚孝的贞节牌坊、早期的中国铁路等，对于读者重新认识和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6——欧洲难民危机背景下的德国》，郑春荣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

本书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四个方面来分析德国在2015年出现的新变化。政治篇分析了难民危机对德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考察了对德国大联合政府执政情况以及德国政党体制的影响；经济篇从就业、收入分配、需求结构和流动性、利率与物价等方面分析2015年德国的经济形势及其所面临的挑战；社会文化篇围绕“德国认同”产生的集体焦虑进行剖析，梳理了欧盟和德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外交篇围绕德国成为中国在欧盟内的“关键伙伴国”对中德关系进行了论述。

- 《欧洲蓝皮书：欧洲发展报告（2015—2016）——欧洲难民危机》，黄平、周弘、江时学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

本报告分为四部分，即“主题报告”“欧盟篇”“国别和地区篇”和“中欧关系篇”。“主题报告”主要探讨了欧洲难民危机的成因及其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

析了欧盟成员国对难民的态度以及欧洲移民政策的变化；“欧盟篇”紧扣当前重要的政策、机制、协议等议题，重点研究了欧元区量化宽松政策、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结构调整和政策走向、欧盟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的努力和立场、欧盟与美国的TTIP谈判、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现状与前景、欧盟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关系，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欧盟即时发展图景；“国别和地区篇”则从具体的国家入手，介绍了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如英国的“苏格兰独立公投”等）及其演进历程，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应对措施并进行了前景展望；“中欧关系篇”则从中国中东欧合作、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和中意合作等方面把握中欧关系新进展，并指出了推进中欧关系的重要机遇和前景。

- 《黑格尔的政治神学：〈精神现象学〉与〈法哲学原理〉释义》，丁凡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

本书以政治神学作为解释路径，勾勒出一个“政治神学家”黑格尔的形象，选取了作为黑格尔思想成熟标志的《精神现象学》与作为其政治思想成熟标志的《法哲学原理》作为解读对象，通过细腻、深刻、扎实的文本分析，一方面梳理黑格尔体系的逻辑，另一方面循着黑格尔的逻辑检验黑格尔对其所继承的西方文明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体系的分析与反思，最终在此基础上对黑格尔体系的得失做出一定的评价。这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颇有分量的一部黑格尔政治思想研究专著。它在国内已有黑格尔研究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视角阐释了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对学术界全面理解黑格尔乃至德国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 《论德国浪漫派》，陈恕林著，上海：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6月。

18世纪末发端于德国，随后在欧洲各地出现的浪漫主义，是一次波及范围大，影响深远，其“余波”至今尚未停息的文化思潮。其波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席卷了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本书探讨的德国浪漫派，是这个思潮的源头，特指18世纪90年代至1850年前后由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等掀起，随后又有布伦塔诺、阿尼姆、克莱斯特、霍夫曼、艾兴多夫等大批作家参与的一场文学运动。德国浪漫派对后世有着难以估量之影响，它不仅是现代派当中诸多流派之源，更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论德国浪漫派》是自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者系统研究德国浪漫派的第一部专著。不仅对德国浪漫派的形成历史研究得十分透彻，而且将德国浪漫派放入启蒙运动、德国古典文学，以及同时代的斯拉夫语世界的文学、英语世界的文学（包括北美文学）、罗曼语世界的文学、北欧文学等与它有关的文学广阔视野里一起考察。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对历史上关于德国浪漫派的论争有着独到见地。方便读者一本书把握德国浪漫派，更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对德国浪漫派的深入研究。

-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德）亨利希·海涅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写于1833—1834年间，是海涅的政论作品中最精彩的一本。本书的主旨是要论证：从马丁·路德以来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发展是德国社会革命的一种准备。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论述了宗教史（从基督教的产生到路德宗教改革运动时的德国宗

教）；第二篇论述德国古典哲学的来源，介绍了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的哲学和影响；第三篇论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侧重于表述它的革命意义。

- 《专利法（第6版）——德国专利和实用新型法、欧洲和国际专利法》，（德）鲁道夫·克拉瑟著，单晓光、张韬略、于馨淼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5月。

本书为德国学者鲁道夫·克拉瑟的德国专利法经典著作。本书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从基础问题、专利和实用新型保护的前提条件、发明权、专利和实用新型的产生与丧失、专利和实用新型的效力及其实施、发明权的交易等角度出发，全面介绍了德国专利法的历史沿革，专利和实用新型的授权及实施，以及欧洲专利法、国际条约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是全面学习德国和欧洲专利制度的经典之作。本书为《知识产权经典译丛》的一册，入选“2015年国家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 《德国证券法律汇编（中德文对照本）》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5月。

《德国证券法律汇编》汇编了德国资本市场七部基本法律：《有价证券交易法》《交易所法》《有价证券保管与购买法》《有价证券收购法》《有价证券招股说明书法》《有价证券销售说明书法》和《存款保护和投资人赔偿法》。这七部法律构成了德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

《有价证券交易法》于1998年9月颁布，最近一次2011年7月对部分条款进行了微调。较大的修改是在2009年7月，主要是配合将《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arket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Union, MiFID) 转化为德国国内法而修订相关条文,特别是配合落实欧盟《反市场滥用指令》与《上市公司透明指令》,修改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范,包括持股申报通知中有关持股比例、通知期间等条款,修订后全文分为13章共47条。《交易所法》自1897年1月1日起生效,是德国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行为的法律,2007年11月为配合MiFID实施对条文进行了较大修改。《有价证券保管与购买法》制定于1937年,最近一次修改是2009年7月。《有价证券保管与购买法》主要是规范证券保管以及证券权利变动。《有价证券收购法》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最近一次于2011年4月5日作出了修订,共计9章68条。该法对收购的监管、收购的实体和程序规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德国对在交易所市场交易的证券的信息披露适用《有价证券招股说明书法》,非在交易所市场交易的证券的信息披露适用《有价证券销售说明书法》,采取了不同标准。《存款保护和投资人赔偿法》自1998年8月起实施,2010年最近一次修订。

- 《平衡的艺术: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研究(1998—2005)》,吴江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5月。本书以德国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时期的德国外交为研究对象,选取典型案例,从多维度论证了德国红绿联合政府缘何面临两难抉择的内生和外生因素,并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德国红绿联合政府的外交平衡术予以了客观中肯的评价。红绿联合政府外交面临的两个两难抉择不仅是这个特殊政府组阁时期的产物,对新时期的德国外交产生了延续影响,同时还折射出新时期德国外交的平衡术:联

合执政伙伴之间如何兼顾?价值观和利益之间如何取舍?历史重负和现实责任之间如何平衡?西方世界内部之间的合作与分歧如何协调?外交之道,贵在平衡。平衡将在较长的时期内成为德国外交的常态。

- 《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梅然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

1870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堪称欧洲最强大和最繁荣的“崛起中”强国,但它在1914年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由此衰亡。德意志帝国为何会走向大战?其背后的主要战略考虑是什么?基于大量著述和档案材料,《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涵盖了德意志帝国的40余年历史,从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对外关系实践等多角度剖析了上述问题,强调了预防性战争思维的影响,也谈及了当政者的政治性格的作用,对于一战前40年中欧洲国际关系的宏观进程和其他大国在其中的角色也多有展现。本书较好地体现了对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借鉴和辨析,并在多方面提供了有所新意或更中肯细致的看法。本书可被视为中国学者在一战前国际关系和一战起源问题上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为当代中国对外实践提供某些借鉴,也适合作为国际关系史教学的基础读物。

- 《德国侵权法(第5版)——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及痛苦抚慰金》,(德)埃尔温·多伊奇、(德)汉斯·于尔根著,叶名怡、温大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

本书是一本经典的德国侵权法教科书,全书分为三个部分:1)一般理论:主要包括侵权行为的构成(行为、因果关系、

违法性和过错)、数人侵权、免责事由。2) 具体的责任构成: 过错责任、危险责任和客观的担保责任。3) 责任的后果: 财产与非财产损害赔偿、预防请求权、程序和赔偿。本书的特点在于用最简短的语言表述最深刻的侵权法原理。

- 《德国物权法概述与实体土地法》, (德) 乌尔斯·彼得·格鲁贝尔著, 王强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德国物权法概述与实体土地法》是德国美因茨大学民法学教授格鲁贝尔博士(Univ.-Prof. Dr. Urs Peter Gruber) 倾数年心血撰写而成的《德国物权法》(以下简称著作) 的一部分。《德国物权法》由格鲁贝尔教授在其已故先师, 原美因茨大学民法学教授、德国法学家穆勒博士(Univ.-Prof. Dr. Klaus Müller) 于1997年撰写的物权法教科书基础上, 彻底扩展并改写而成, 由德国法学界久负盛名的专业出版社贝克(C.H. BECK) 出版社2016年审校出版。《德国物权法》一书结构依傍以《德国民法典》(以下简称BGB) 物权法编为核心的德国物权法脉络体系, 与其相辅相成, 环环相扣。本书是一本关于德国物权法实体土地法方面的译著, 章节内容层次清晰、译文准确精当, 在版式、内容上与德文原书对照、统一, 系统地展现了德国物权法在实体土地法方面的具体规定以及相关解释, 突出地体现了德国法律严谨、系统、富有逻辑的特点, 并能够让我国相关研究者清楚地看到德国的物权法关于实体土地法是如何规定的。

-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第三帝国社会生活史》, (英) 马修·休兹、(英) 克里斯·曼著, 于仓和译,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6年2月。

纳粹德国为什么能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后迅速崛起? 纳粹德国依靠什么力量成为一台让世界深受苦难的战争机器? 希特勒是怎样从一个流浪汉一样的退伍士兵成为一度横扫天下无敌于世的杀人狂魔? 所有这些问题也许能在本书中得到些许的答案。本书是目前为止较为详尽地探讨第三帝国日常生活的一部佳作, 它和其他政治历史, 比如《第三帝国的兴亡》, 军事历史比如《第三帝国的兴起》《第三帝国的覆灭》《闪击战》等不同, 它探讨和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的真实的第三帝国的面孔。正是这样的一个第三帝国在政治上野心勃勃, 在军事上一度所向披靡; 正是这样一个第三帝国, 在国内聚集起强大的工业生产和运转能力, 使得这部庞大精确而又有效的战争机器让世界为之战栗! 但是这里边的秘密是什么? 它有什么致命的弱点? 它又是怎样被击败直至灭亡的? 本书能够给予一些答案。本书还配有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 帮助读者充分理解并展示了那个黑暗年代德国的真实面目。

- 《欧债危机和德国应对危机的政策分析》, 关海霞著,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2月。

欧债危机, 全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是指自2009年以来在欧洲部分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欧债危机的爆发给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蒙上了阴影, 时至今日, 其影响仍在继续。有关欧债危机的原因、解决方案研究以及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研究一直是热点所在。在解决欧债危机的过程中, 欧盟、欧央行以及欧盟各成员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但同时矛盾冲突不断。德国凭借在危机中经济发展出色的表现, 成为了解

决危机的领导者。但其很多强硬的做法遭到了其他成员国的诟病，这使得德国在整个危机的解决过程中有时候进退维谷。本书抓住欧债危机发生和发展的主要脉络，深入分析欧债危机的本质及其影响，探讨德国在欧债危机中采取的政策、救援方案和态度，以及有关危机的思考和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北大德国研究（第五卷）》，黄燎宇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
《北大德国研究（第五卷）》所收录的文章是关于德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文学、法律等各方面的研究。作者有北京大学各相关院系的教师，以及如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等其他高校的教师。对于读者较深入地了解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很大帮助。本卷主要围绕着一战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展开讨论。
- 《德国哲学（2014年卷）》，邓晓芒、戴茂堂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2月。
《德国哲学》是由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主办、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协办的专门研究德国哲学及相关问题的学术性刊物。《德国哲学》从1986年至2001年由张世英先生任主编，洪谦先生、贺麟先生和熊伟先生为顾问，一共联合出版了20期，对推进中国学术界关于德国哲学乃至整个外国哲学的研究做出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贡献，在中国哲学界乃至外国哲学界都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学术影响。2007年《德国哲学》改由邓晓芒、戴茂堂任主编，张世英先生、梁志学先生、杨祖陶先生、王树人先生为顾问，继续为国内外热爱德国哲学、热衷于外国哲学研究的学界同仁提供一个深入研究德国哲学和外国哲学的理论平台，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一个思想交流、观点碰

撞的前沿阵地。《德国哲学》创刊以来，几乎国内从事外国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研究的主要专家都曾在《德国哲学》上发表了自己的重要论文。

- 《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庄振华、李华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
本书是海德格尔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以往我们通常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放到近代哲学的背景下，从知识论或理性主义传统，将其理解为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经基督教的洗礼与近代科学的影响而达到的巅峰。本书则从现代哲学视野重新审视三位德国古典哲学巨匠，非常有助于我们把握德国观念论与现代哲学的内在渊源，看到作为主体哲学之顶峰的德国古典哲学带来的困境，以及其中包含的“现代元素”，书中对三位大师的分析细致而独到，既反映出海德格尔深厚的学术功底，又充分展现出他本人的独特思想，这在目前的国内海德格尔研究，乃至哲学史研究中都是比较欠缺的。
- 《德国民事诉讼法（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丁启明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
《德国民事诉讼法》颁布于1877年1月30日，是一部至今已有130余年历史的经典法典。该法历经一百余次修订，沿用至今。“二战”后的民事诉讼法改革，特别是2001年的民事司法改革，使该法呈现出新的生命力。在新的立法意旨和司法理念指导下，本法诸多条文得到了修改与完善，法典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德国民事诉讼法发展的最新动态，译者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2014年的最新版本重新进行了翻译，译本比对了《德国民事诉讼法》

的德文版本与英文译本，力求使译文更加准确；参考了国内各位大家、学者对译法的不同意见；吸纳了域内外研究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文献，对法条中晦涩难懂、更新频繁、体现最新立法动态的部

分，以及重要法条的修法轨迹进行注释；同时，在译者前言中对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百余年的发展做出述评，以期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比较研究、法典编纂等提供可靠而有所助益的参考。

作者简介：邹露，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大事记

德国外交经济大事记（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

李倩瑗

2016年

4月8日至9日，德国联邦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访华。在北京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外长王毅会晤并与王毅展开了第二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之后，施泰因迈尔访问了长沙并为博世公司在长沙的新厂房揭幕。

4月11日，美因茨地方检察院宣布，以污蔑国家领导人为由对德国电视二台节目主持人波默曼提起了刑事诉讼。3月31日，德国知名主持人波默曼朗读了一首针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讽刺诗。

4月1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基社盟主席泽霍夫和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一同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德国政府对移民融入法的讨论结果。就此的磋商会谈长达7个小时。

4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强调希望巴以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

4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菲利佩·纽西。会见中，默克尔强调

德国会继续加大对莫桑比克的发展援助，并与其进行防洪、环保等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4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德国汉诺威并与默克尔举行会谈。在与默克尔共同出席新闻招待会时，奥巴马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表示赞赏，默克尔表示“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对德国经济和欧洲经济都非常重要，双方还同意在反恐和安全领域加强合作。奥巴马和默克尔共同出席汉诺威博览会的开幕式，美国是此次汉诺威博览会的伙伴国，参加博览会的美国企业达465家，也是美国企业在其境外参加博览会数量最多的一次。

5月10日，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在柏林宣布，到2023年德国将扩军7000人、新增军队文职人员4400人，随后还将陆续从装备、预算和人员三方面强化军力。冯德莱恩表示，这标志着持续1/4世纪之久的联邦国防军军力收缩政策已经成为过去。

5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上表示，欧盟将无法如期于2016年7月1日起给予土耳其公民免签进入申根区的

待遇，“因为土耳其还没有符合一些条件”。

5月24日，德国慕尼黑伊福经济研究所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德国经济学家反对英国退出欧盟。这份调查报告的调查对象是由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其中85%的受访者反对英国“脱欧”，只有10%的受访者表示赞同。

5月29日，德国和法国在法国东北部地区举行仪式，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100周年。两国领导人在仪式上呼吁欧洲团结。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称凡尔登是两国和解、欧盟融和的象征。奥朗德和默克尔并肩而立，共同缅怀当年在凡尔登阵亡的30万将士。

5月31日，德国大众集团发布业绩报告显示，一季度大众集团经营收入510亿欧元，同比下滑3.4%；税后利润23.7亿欧元，同比下滑19.3%。

6月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两人就即将在波兰华沙举办的北约峰会、德国在北约中的角色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6月6日，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发表声明说，在2017年3月任期结束后，他将不寻求竞选连任总统。

6月12至1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6月13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主持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两国总理认真听取了双方外交、经济、工业、财金、教育、科技、交通、环保、住建、农业、商务、司法、社保、医疗等26个部门负责人的汇报。双方对中德合作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并就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一系列新的共识。

会后双方发表《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联合声明》。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习近平欢迎默克尔再次访华，祝贺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成功举行并取

得丰硕成果。习近平指出，经过建交40多年来的共同努力，中德关系已经进入十分成熟的发展阶段，务实合作达到很高水平。14日，默克尔在结束北京访问行程后，前往辽宁沈阳开始她的“东北首访”。

6月21日，欧盟28国驻布鲁塞尔代表一致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六个月。延长六个月的制裁措施对象包括俄罗斯的石油业、金融业和军工行业。这一系列制裁措施在经过延长后将持续到2017年1月。

6月2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称，德国计划提高国防支出以应对外来威胁。默克尔说：“德国只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2%用于国防建设。为了应对外来威胁，德国计划提高国防支出，将达到像美国那样国防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3.4%的国家。”同时她还补充道，不希望欧盟其他国家将国防负担纳入长期规划。

6月25日，欧盟六大创始国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的外长在德国柏林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敦促英国尽快落实公投达成的“脱欧”决定，消除不确定性。

6月27日，在柏林举行小型峰会的德、法、意三国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希望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为欧洲建设“注入新的动力”。三国领导人正式排除在英国启动“脱欧”程序前与其做任何谈判的可能性。法国总统奥朗德再次敦促英国尽快启动“脱欧”程序。

6月27日，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和法国外长艾罗基于“内部和外部安全、难民危机以及经济合作”的原则提交了“一个更紧密的欧盟”计划。

6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院发表讲话，呼吁英国以外的27个欧盟成员国团结应对危机，打消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默克尔指出，英国需要向欧洲理事会正式申

明决定“脱欧”。此后，欧盟将在未来两年内同英国就“脱欧”协议展开谈判。退出欧盟后，英国就不会再享有欧盟成员国所有的特权，其他退出欧盟的国家同样如此。默克尔说，当前的问题不在于欧盟扩大或缩小，而在于能否建立一个让民众参与、认同并受益的“成功的欧洲”。只有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减少青年人失业、重振欧洲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打消对欧洲一体化正确性的怀疑”。

6月28日，德国内政部长德迈齐埃表示，忧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或因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溃败，而加大对欧洲的袭击。

6月28日，美国司法部宣布，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已就尾气排放作弊丑闻提交和解协议，同意支付近150亿美元用于回购涉案车辆、赔偿消费者和投资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等。

7月1日，欧盟正式宣布，将对俄经济制裁延长6个月，至2017年1月31日。

7月4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巴黎同巴尔干半岛国家领导人召开会议，并在会上强调他们继续相关谈判的决心。奥朗德指出，英国决定“脱欧”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承诺。欧盟将按照原先确定的条件遵守这些承诺，并且对这些条件进行核查。默克尔则表明，英国的脱欧决定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莫盖里尼也表示，欧盟决定继续其扩大进程。

7月8日，德国联邦内政部公布的2016年上半年难民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在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电子难民分配系统（EASY）登记的新申请避难者人数约为22万人。联邦内政部指出，这一数字与2015年同期相比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德国面对的难民危机已经得到“显著缓解”。

7月14日，德国成为首个在政府拍卖中以负收益率发行10年期国债的欧元区国

家，全球债券收益率呈现普跌局面，分析人士称这是市场预期各大央行将采取刺激措施的表现。

7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乌兰巴托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双方就中德、中欧关系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7月20日，英国新任首相特雷莎·梅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特蕾莎·梅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会谈，她表示，英国不会在2016年年内开启正式的“脱欧”谈判，为确保英国从欧盟理性和有序地退出，需要时间。梅表示，英国愿与德国这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和特殊的朋友”继续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

7月26日，德国巴伐利亚州7天内受到3起血腥谋杀案冲击后，基社盟要求出台新的安全措施，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也不再妥协。巴州州长泽霍夫表示，恐怖主义已抵达德国。“受到严重伤害”的巴州将“十分坚决”地捍卫公民的安全。泽霍夫还表示，他不会就难民问题再次迎合默克尔。

7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首次谴责日前的维尔茨堡火车砍人事件和安斯巴赫餐厅爆炸事件是“伊斯兰激进组织恐怖袭击”，并宣布了共有九项内容的全新反恐安全计划。但对其从2015年夏天以来实行的上不封顶的难民政策是否会改弦更张的问题，默克尔仍明确表示否定。

7月31日，数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在德国城市科隆举行示威游行。

8月3日，德国内阁批准新的交通修建计划，预计到2030年，联邦政府将向公路、铁路和水路投资2696亿欧元。

8月9日，德国显著加强了阻挡新难民入境以及遣返不符合条件难民的力度。德国联邦政府当日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2016年1至6月德国边境和机场共计拒绝了13324人的入境请求，这一数字已比2015年全年总数还要高出50%。同时，德国上半年遣返了

13743人，与2015年全年共遣返20888人相比增长趋势同样明显。

8月11日，德国内政部部长德梅齐埃准备推出新反恐措施，作为对恐怖组织IS 7月对维尔茨堡和安斯巴赫犯下的两起攻击的回应。德国于当日宣布的新措施，包括加快把有犯罪前科的寻求庇护者驱逐出境的程序，理由是“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新措施还包括：增加1.5万名警力，取消双重国籍，放宽医生的保密义务等。

8月29日，德国社民党领袖、副总理加布里尔对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提出了批评。他表示：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低估了挑战。一再说“我们能够做到”是不够的。必须为此创造条件。但联盟党却一直加以阻拦。

8月29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表示，美国与欧盟成员国正在商谈中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事实上已失败”。

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习近平指出，德方愿将创新、结构性改革、发展、数字经济等继续作为2017年峰会的重要议题，确保议题和成果的延续性，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中方愿同德方保持密切沟通和协作，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取得成功。

9月16日，欧盟27国领导人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举行非正式峰会，会上讨论了欧盟的内部合作问题以及英国脱离欧盟

后欧洲的未来。英国首相没有出席此次会议。

9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50国难民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德国和加拿大实行的开放边境政策表达了感谢。

9月22日，德国不伦瑞克地区法院称，大众集团的投资者要求大众赔偿因股价暴跌造成的约82亿欧元损失。

9月22日，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到访莫斯科，与俄罗斯经济部长乌柳卡耶夫磋商。俄罗斯期待德国公司参与到俄罗斯大型建设项目中，比如从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速铁路建设以及连接德国与俄罗斯的油气管道项目。

10月3日，德国德累斯顿举行庆祝两德统一26周年纪念活动，联邦总统高克、联邦总理默克尔出席。

10月3日，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抵达伊朗，就经济与政治话题同伊朗副总统纳巴克特及财经部长塔列巴尼展开讨论。这是加布里尔在伊朗核制裁解除后作为经济部长第一次访问伊朗。

10月6日，德意志银行宣布在德国进一步裁员1000人，本土裁员人数上升至4000人，全球裁员规模达90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9%。

10月6日，德国多家媒体报道了中国芯片生产商三安光电有意收购德国照明公司欧司朗（Osram）的计划。

10月20日—21日，欧盟秋季峰会在布鲁塞尔召开。本届峰会的重点是：消除难民产生的根源以及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

作者简介：李倩媛，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稿约

一、本刊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办，研究德语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文教问题的刊物，但凡上述内容的稿件，一概欢迎。

二、请用电子邮件投稿。来稿一律投编辑部邮箱。

三、正文使用 Word 文档，五号宋体，注释用小五号宋体。

四、来稿请在正文之前附上 300 字以内的中文提要或 150 字以内的德文摘要和 5 个以内的关键词，并附上中文及外文标题和作者简介。资讯稿件总篇幅以 1000—5000 字为宜，研究稿件以 5000—8000 字为宜（包括注释）。

五、文中第一次出现不常见的外国人名、地名及机构名称或专业术语时，请在中文译文名称后加圆括号注出原文。

凡涉及引文或引证的观点，请注明出处，体例如下：作者（外文姓名也是姓在前，名在后，但用逗号隔开）：书刊名，期刊号，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页码等。引用外文著作的注释请用原文，无须译成中文。引用网络资源，请注明具体网址和访问日期。

每篇文章注释一律采用脚注，脚注编号通篇连续。

六、本刊编辑部可能对来稿作一定的修改或删除，作者如不同意，请在投稿时声明。

七、本刊编辑部在接稿之日起三个月内将通知作者有关处理意见，在此期间请勿一稿两投。未被采用的稿件本刊不负责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八、凡作者在本刊发表的文章，一律文责自负。

九、来稿需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单位、地址、邮编、职务、专业等信息，写明电子邮箱及电话以便联系。凡学生来稿请务必注明学校、专业和年级。发表时可用笔名。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相应稿酬。

十、《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24 号信箱。邮政编码：100089，电话：(010) 88816516，13641271934，E-mail: dygjzxyyj@bfsu.edu.cn

